

中国科学史

weij



此书受 2003 年贵州出版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4/10/20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伪科学史/涂建华著. —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3. 8

ISBN 7—80650—387—0

I. 中… II. 涂… III. 伪科学—历史—中国
IV. NCS—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4573 号

中国伪科学史

涂建华 著

出版发行 贵州教育出版社

社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1)

印 刷 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字数 14.75 印张 23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650—387—0/N·2 定价: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贵阳市友谊路 186 号 电话:6745177 邮编:550001

中国伪科学史

涂建华 著

贵州教育出版社

伪科学是由骗子和相信骗子的人造成的。

——伏尔泰

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人明白道理，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便须想一个方法排除它，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扯西扯，屏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

——鲁迅

序

于光远

《中国伪科学史》是以“中国伪科学研究”课题结题材料为基础做成的,作者研究这样的课题,又写出这样的专著,很不容易。像“中国伪科学史”这样的问题,系统研究过的人很少,这的确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现在他的工作已经完成,这本专著即将出版,对此我表示祝贺。

“中国伪科学”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它涉及学术腐败、思想腐败等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中,研究伪科学的历史,彻底批判伪科学是有阻力的。现在情况当然好多了。长期姑息养邪的人恐怕不敢出头了。但是总有人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作者同这样的人不一样,毅然进行研究,而且卓有成效。

在这本专著出版之前,作者希望我写序,我欣然同意了。

我的工作实在忙,不可能去看书稿,但是我发现有些地方因为作者不是当事人,不可能完全掌握材料。我是当事人,知道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但这样的文章我已写过了,现在重复写,没有必要,我也没有时间。于是我想采用我过去写的两篇文章,作为这篇序的主体部分。

第一篇文章是1999年4月20日,在中国科协纪念“五四”八十周年的会上,我作的一个发言,讲了七个问题。这篇文章收入了我的文集、“四大恶人”丛书的《我是于光远》中,全文如下:

极严重的现象,极严重的责任

一、二十年来在我们中国有一股反科学反社会的势力,他们发展的势头颇盛,他们的活动在全国泛滥成灾,十分猖獗。我认为这是一个可悲可忧的、极为严重的现象。我认为一切关心祖国历史命运的人,面对着这一种极为严重的现象不能有任何轻视,而应该正视它、重视它,对之深思,做出恰当的判断和采取行动。

二、二十多年来伪科学猖獗的历史,可以视作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中的一个消极的部分。它经历了下面的七个阶段:

1.1979年3月,四川出现一个谎称“耳朵认字”的名叫唐雨的少年。《四川日报》出于猎奇作为事实进行报道,就有不少人信以为真,四川医学院到唐雨所在的大足县进行调查,揭露了这一骗局。《四川日报》作了自我批评,事情告一段落。

2.但是这时候香港有一位名叫李学联的在报上发表意见,说这在西方叫做超常感知,是一种“人体特异功能”。说国内对这种现象的批评是不现代化、不科学的。在我国内地也有一位著名科学家出来说类似道理。于是事情又翻了过来。在各地各种传媒的宣传下,具有“人体特异功能”的人纷纷出台。这是反科学宣传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在台前表演的是小孩子们。在这个阶段中,反对人体特异功能的工作也开展起来的。但是由于当时中央负责人中已经有了相信或者不反对这种反科学宣传的人,这种反科学的宣传还是未能遏止。最后中央宣传部发了个“人体特异功能不是我们研究的方向,不要宣传介绍,但也不要批评”的通知。

3.接着又是那位著名科学家提出这种现象不但外国有,中国也有,而且是同气功、中医理论密切联系的,还打出“人体科学”的旗号;于是出现一批一批的气功师,乃至“具有神功”的“大气功师”;成人——社会上的骗子——代替小孩子登上舞台,说人体特异功能能够治病养生,骗取不少老干部,其中包括某些中央领导机关负责人的支持,甚至骗取了个别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从事“人体特异功能”、伪气功等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多。

4.接着从个别的气功师发展起一个一个“功”,其中以“中华养生益智功”力量最强。而且成立了不少机构、不少研究会。这些组织有教主、教徒。它们有的是打着某种科学旗号,有的虽不打着某种科学旗号,但性质都是提倡迷信的邪恶的组织。有的拥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掌握有自己的舆论工具,办有刊物和报纸,拥有众多的徒众,有的号称达到几千万之多。尽管这种数字有很大的水分,但的确很多。它们还有自己的活动地盘——自己的根据地。

5.这些组织的反动政治色彩、反社会色彩越来越明显。它们千方百计吸收中共党员,包括党员干部,参加到他们的“功”里去,甚至在他们的“功”的组织里建立听命于教主的中国共产党的委员会,并且渗入我国的党政机关和统一战线的组织。总之无非采用“打进来”、“拉出去”这样的办法,而以“拉出去”为主。湖北莲花山“元极功”的教主张志祥不但担任当地政协副主席职务,而且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这样的职务。在党政与文化教育机构各部门的许多单位有他们的组织成员。

6.这些组织中有一些与境外的邪恶组织有了勾结,充当境外组织侵入我国的

帮凶。台湾破获了宋七力的组织后,在宋家中抄出他们在大陆的组织成员的名单,这些成员一直在大陆活动,有的“功”在国外发展组织,如严新气功研究会,在美国有些地区就建有分会。“中华养生益智功”的头头张宏堡和法轮功的头子李洪志就长期住在国外,他们经常往返于中国与外国之间。

7.现在这种反科学反社会的活动进入第七个阶段。沈昌和他的信徒包围苏州姑苏晚报社和苏州市法院,直到包围北京东城区法院,使法庭不敢开庭审判。这是前两年的事件。近期内则发生法轮功练习者包围北京电视台的事件,他们的力量大了,就要显示自己的力量,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写的这七个阶段都是事实,都有可靠的资料。只是限于篇幅,未能把事实较充分地表示出来。

三、写这段历史不能只讲那些搞反科学反社会活动的人这一个方面,还应该写我们维护科学保护社会的人们同他们斗争的情况,还要讲讲我国党政部门对待这种活动的态度。

应该指出,这些反科学反社会的活动一开始就遭到反对。四川医学院的揭露就很有力,如果不是某个著名科学家等人出来支持,四川医学院的行动就会对抑止这种伪科学活动起决定作用。在第二阶段,四川医学院奉四川省那位文教书记之命,要他们支持“耳朵识穿”之后,他们仍在1982年春节进行了一次揭露“耳朵识穿”之类的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拍摄出小孩子如何偷看的长达几十分钟的录像。上述的第一、第二个阶段中,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人民日报》、中国杂技团等单位都曾有力地揭露、反对这种反科学的活动。当时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胡耀邦是坚决反对人体特异功能的,但是未能遏止这种活动的发展。1982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一个要求停止人体特异功能,但也不对这种宣传进行揭露批判的通知。在这之后,停止批判是实,而那些搞反科学反社会宣传的人却根本不听中央宣传部通知,利用不对他们的活动进行批判的机会变本加厉地活动。近十年来反对这种“三‘伪’一‘所谓’”(三“伪”就是伪人体科学、伪生命科学和伪气功,一“所谓”即“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人,忍无可忍重新投入战斗之后,我们党的意识形态部门一直坚持“不宣传、不批判、不争论”方针,这是邪恶势力之所以发展到如此猖獗程度的根本原因。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这一点是必须强调指出的。那就是不但不准正确思想对邪恶思想进行批评,反而成立了有几个部门的负责人组成的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的小组。在新闻出版工作中反对特异功能的书籍一直实行限制的政

策,而宣传人体特异功能的书,如柯云路的书,却一本一本地出版。在组织上除了那个小组外,公安部的前部长还担任“严新气功研究会”的会长(不是名誉会长而是会长)。这一段历史,我认为需要查明并作处理的。

四、需要对这反科学反社会的活动的历史作一番总结。我们要对之做历史研究,也要展望其发展前途。我们也看到,某一个邪恶组织遇到有效的抵制、被揭露,或者因罪行败露受到法律判决(如被立正),但另一个组织“主神教”又接着活动。我们也看到比较大的组织没有一个受到致命的打击,他们或者暂时潜伏起来,或者借尸还魂。一个组织暂时不行了,另一个组织又风靡全国,现在还看不到这种活动已经走下坡路,更看不到它的终止。真不知伊于胡底!

五、这种活动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

首先是众多的居民的心灵受到毒害。有相当多的居民受欺骗,相信这些反科学反社会的宣传超过相信科学知识,因而排斥科学知识,失去健全的良知。甚至有些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人也受到这种反科学宣传的影响。受到了这种影响的人在他们的头脑中也就不可能有科学思想、科学态度、科学精神。

其次是众多的居民的身体受到摧残。得了“气功出偏”病的人很不少,这是一个方面,更多的人是因为相信伪气功,耽误了及时治疗。有的甚至被像胡万林这样的“神医”害死。柯云路吹捧胡万林的罪责已得到揭露,但是必须做出严肃处理,不能允许他再以作家的称号害人。

再次是耗费了大笔钱财,包括居民手中的钱,也包括国家或某些组织的钱财。

他们的活动损害到人们用更多的注意力去从事积极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领导部门也不得不分出一部分注意力去对付他们,这是必要的。

这种现象的存在也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形象。

六、我们应该深思,提出几个为什么?弄清楚这些极严重现象存在和发展的原因。

我们不是说要以科学的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吗?我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我们不是说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吗?五四运动提出民主和科学不是已经有八十年的历史,我们现在不是正在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吗?为什么我们能容忍这种极严重的现象存在达二十年之久?为什么容忍这种严重的现象继续发展?为什么有些犯罪分子现在仍继续逍遥法外?我们到底准备不准备打击这些邪恶势力?我们现在对这有没有明确的方针和有利的部署?现在全国在哪些地

方邪恶势力占上风,而反对邪恶的力量受到压制?

我还想问一下,我在这里说这是一个极严重的现象,这种说法是否符合今天我国的实际?是否言过其实?是否危言耸听?我希望在纪念“五四”八十周年或者“五四”纪念八十周年过后,大规模地展开讨论。现在这种反科学反社会的邪恶活动已经发展到走上街头显示力量的阶段,我认为应该充分认识这一现象的严重性,而我们的行动一定要快,千万不要轻视漠视这一现象的严重性!

七、如果情况的确极严重,那有关方面就要担负起极严重的责任。

首先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对改变这种现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它必须领导人们与这种反科学反社会的现象作有力的斗争。它的责任是要有反对这种反科学反社会的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以及要用这种指导思想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求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各级干部,提出相信这种反科学反社会的宣传是同共产党员的称号不能相容的。要让党员和各级党组织认识到,反不反对这种极严重的现象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如不能做到这一点,是党组织的严重失职。

我们的国家机器对这种邪恶势力一定要严肃对待。对于一般的分子与为首的分子当然要严格区分。对那些为首作恶的分子绝不应软弱无力,不能姑息养奸。你越怕,他们就越认为可以欺侮你。他们越来越神气,谁也不许碰我,我是碰不得的,谁碰我,我就要他知道我们的厉害!

科学界在坚持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态度上,有特殊的责任。在反对三“伪”一“所谓”的斗争中,科学界毫无疑问地要起带头和教育者的作用。提倡这三“伪”一“所谓”的人,就不配被称为有科学态度的科学工作者;支持搞三“伪”一“所谓”的研究机构,就不配称为科学机构。科学界在反对伪科学的活动中必须发挥有力的积极作用。造成今天这样严重的局面,个别的著名的科学家要负严重的责任。中国科协在八十年代初也曾经起劲地支持过“人体特异功能”,这也是个历史教训。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也不应该忘记。教育界,我指有几个著名的高等学校也曾经支持过这种伪科学的活动。我的母校也是一个。我不清楚现在如何,不过我知道不少学校中搞伪气功的人不少。在学校中不应该允许教员和学生去做反科学的宣传,而要把反对反科学的讲授作为学校不可推卸的责任。

舆论界也曾对反科学反社会的宣传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近年来我国舆论界在反对三“伪”一“所谓”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过去的错误也不应忘记,应

该进行深刻的反思,从中找出应该接受的教训,如不应该猎奇和要很好学习科学知识就是一条。我们要运用牢固地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舆论力量对反科学反社会的现象予以揭露,进行道德上的谴责,呼吁党和政府采取有力的措施,批评有关这方面问题的错误观点,强调对邪恶势力姑息不得,姑息养邪才是致乱之源。我认为新闻出版界、广播电视界都要这么做。该做自我批评的要做自我批评,做了自我批评,自己就主动了,可以轻装上阵,投入战斗。

我们对宗教有一贯的宗教自由的政策,宗教界有责任严格划分自己与这种邪恶活动、邪恶组织的界限,不要去做支持这些邪恶活动的事,不要让这些邪恶力量利用自己来进行邪恶活动。

我们的卫生保健部门要担负起保护人民健康的责任。要克服整个卫生系统中种种不良现象和对邪恶活动的软弱无力的现象。

对反对极严重现象有极严重责任的这些机构都需要反思过去是否做了应该做的事情。这几年科学界和舆论界有了很大进步,党和政府部门也开始注意这方面的工作,希望能够更有力些。

我认为每个关心社会进步的人都应该根据本人的条件,在反对这种极严重现象的斗争中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

纪念“五四”八十周年的时候,我想讲的话很多,今天我只按照会议组织者提出的这个题目讲一个反对反社会反科学的邪恶势力的问题。

这篇文章末,我加了一个说明:“由于时间限制,在会上没有讲得充分。会后用半天时间,在4月22日根据自己发言时的提纲整理成稿。正准备送出,就发生4月26日法轮功练习者围攻中南海的事件,一直没有拿出去发表。”

第二篇文章是1999年8月15日我在长沙写的《反对伪科学八条》,全文如下:

反对伪科学八条

一、充分认识伪人体科学、伪生命科学、伪思维科学在我国已经发展成为危害社会、危害人民身心的极严重的现象。

二、只有不再回避,不再掩饰产生这种极严重现象的深层原因,才能真正取得教训。

三、冰冻三日非一日之寒,三尺冰冻亦非一日能解。即徒为了达到近期目标仍有颇为强大的阻力,需要众多的人进行艰苦的努力,去排除阻力,大踏步前进。

四、必须公开纠正事实上鼓励伪科学,只是不准批评伪科学的宣传政策。长期姑息养邐,乃致乱之源。

五、同伪科学至少要用很大力量斗一百年。

六、党、政府、新闻出版界、广播电视界、科学界、教育界要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积极投入反对伪科学的斗争,克尽自己极重大的责任。其他领域也要如此。

七、科学精神的普及教育工作要从娃娃做到老翁、老妪。

八、《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其他与反对伪科学有关的文章,是从根本上破除伪科学的理论武器。要重振自然辩证法雄风。

我用这两篇文章,向读者提供一些材料。同时读者也可以在文中大致看出我在反伪科学历程中干了些什么,态度怎样。并以此为《中国伪科学史》序。

2003年8月21日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 | | | |
|-----|-----------|------|
| 第一节 | 科学的涵义 | 1) |
| 第二节 | 科学与伪科学 | 5 |
| 第三节 | 科学与伪科学 | 10) |
| 第四节 | 科学与伪科学 | (17) |
| 第五节 | 伪科学与社会 | (24) |
| 第六节 | 伪科学的危害 | (32) |
| 第七节 | 本书写作与研究方法 | (38) |

第二章 伪科学之原

- | | | |
|-----|----------|-----|
| 第一节 | 伪科学的原始家数 | 42) |
| 第二节 | 伪科学的原始内容 | 58) |
| 第三节 | 伪科学之原 | 64) |

第一节	气功神学	(77)
第二节	易学神学	(91)
第三节	藏密神学	(99)
第四节	历代邪术	(104)
第五节	江湖骗术	(114)

第一节	气功	(124)
第二节	气功特异功能	(138)
第三节	气功	(154)
第四节	伪气功	(170)

第一节	“气功功”与“气功师”	(184)
第二节	伪科学类型	(198)
第三节	反伪科学	(214)
后记		(221)

第一章 导 论

科学,是人们对自然现象产生原因的一种猜测和解释,是人类与周围环境相协调的理性的手段。如果说迷信产生于恐惧,那么,科学则产生于“好奇心”和“生活的需要”,这二者构成科学的哲学家传统和工匠传统。人类科学发祥于公元前七世纪到前六世纪的古希腊,科学的源头则可推到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年代。伪科学是科学的伴生物——而原始形态的迷信和巫术比科学更古老。

科学和哲学、宗教、艺术、巫术等,构成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方法。科学之外的方法称为非科学。科学与非科学有十分复杂的关系。科学和真理是不同的概念。

反科学是一种反对科学的思潮。宗教是反科学的主要力量,科学自身的失误是反科学思潮的诱因之一。

邦格认为,任何一个尽管本身不是科学却自称是科学的知识领域都叫伪科学。科学划界在历史上有不同的流派。陈健的“模糊”划界理论具有不可操作性,邦格的划界理论的实用性却很强。我们要掌握科学划界的大众标准,并明了谁来划界的问题。

科学精神的迷失和人文精神的困惑是伪科学产生的历史原因;神秘主义是伪科学的文化基础;从众、胁从、轻信盲从、猎奇和逆反心理,是伪科学的心理基础;法律滞后和社会腐败是伪科学流行的社会制度基础。

伪科学危害极大。应从道德教化和法律规避两个层面上处置伪科学。

第一节 科学的起源

科学是桂冠是鲜花是油彩,人们喜欢把它戴在头上佩在胸前画在脸上。科学是好东西。约翰·霍根则与我们大异其趣,他不喜欢科学。约翰·霍根是美国记者,

他在《科学的终结》中,对科学的未来表示出杞人忧天般的悲悯,他所代表的思潮叫反科学。反科学是一种“非科学”思潮,很像是一个正气凛然,以振臂一呼而期待乱者四应的起义者,其中不乏对科学所造成的战争和环境问题、全球变暖冰雪消融海水以百年一毫米的速度长高,低地以相应的速度沉没等危害而发出的对科学的非议和责难。反科学宣称“科学是一种癌症,很快将杀死文明本身”。[1]以偏激的心智对科学的反思于社会的进步无补,但反科学有反对者的气量。相比之不,假科学或曰伪科学,却要委琐得多。但是,如果科学不是好东西,伪科学为什么要假冒科学呢?这样简单地,作者就认可科学了。于是,话题就从科学开始。

19世纪,科学建制的出现使科学家从日益明显的科学的作用中寻回了自我寻到了尊严。科学家可以骄傲地称自己为科学家而不必称自然哲学家。但此时并非科学的起点。17世纪实验科学的兴起是科学勃兴的一个标志,自然科学由此承认了实验是检验资料真伪的标准,但此时仍不到科学的源头。由此上溯到公元前7世纪至前6世纪的古希腊,有三座科学山峰矗立于人类进步的史册,他们是由欧几里得及其《几何原本》、阿基米德及其杠杆、浮力原理、托勒密及其《天大论》组成的古代几何学、力学和天文学的顶峰。古希腊由此被称为人类科学的发祥地。所有这些,只有当其与伪科学的源流相关时,我们才注意到它对本话题的意义。

科学,是人们对自然现象的产生原因的一种猜测和解释,是人类与周围环境相协调的理性的手段。从这个定义我们应该大胆地把科学的源头推到青铜时代,推到最原始的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年代,因为这个时候的人民,已经有意识地与自然界中的循环节律相协调。在人类与大自然的斗争中,生产工具和生产技艺的进步、人对自然知识的积累,使人们可以理性地分析和解释自然。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上观天象,不视地理,从月亮的阴晴圆缺到植物的春华秋实,从气候的冬寒暑热到水文的潮涨潮落,获得了最初的感性认识。最初的天文学和农学就从这个时候产生了。

《诗经》说:“七月流火,九月授衣。”[2]火就是大火星,即心宿二,天蝎座 α 星。每年夏历五月间心宿在中天,六月以后,就渐渐偏西。至十月,已流落西天了。七月暑去秋来,是添衣的季节,古人观察到:心宿中天时,正是暑热季节;心宿西沉,暑热消退。故把心宿称之为火星,与火有关之意。只有多年关于大火星东升西沉的记录,才能总结出这样的自然与生活 and 家事相关的经验,因为天象的变化是微小而缓慢的。但是古人没有现代人的休闲和娱乐,盛夏之夜纳凉于星空之下,他们对那

些显眼的亮星的观察是十分自然的事。最初的天文学就从这些观察家那里产生了。这是中国的情况。在世界上其他地区,比如在埃及,天狼星(Sirius)在空中的位置和尼罗河水涨落的对应,使他们知道了怎样不违农时,最早的天文历法也产生了。

我们相信,人们对于环境的认识和谐调,不仅可以从科学的角度去解决,同时也可以由巫术、宗教、艺术或法律去解决。几乎每一片联系紧密的星群都被古希腊人确定成了星座,人们把众星用线条连接起来使之生动活泼,成为各种动物或人物,并且附丽上神奇的故事,成为最早的艺术创作。假如人们的命运与什么有关,那么,原始人想像不出还有什么比人与星座的关联更合适的了。因为星座远在天空,遥不可及,人们不可能影响它,而它时刻都在变动着。天文学一开始就寓含了人们了解天神旨意、诠释命运机理、避凶趋吉的善愿,包含有占星术的成分。而后人们不断观察记录,总结归纳,使天文学与占星术齐头并进,共同发展。从我国古籍《春秋》和《左传》中天文观察材料统计,公元前 722 年至公元前 481 年,共有 37 次日食记录,公元前 613 年关于哈雷彗星的记录是世界上最早的。如此众多的记录为后来的预测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与此同时,日食或哈雷彗星这种奇异天象给人以恐怖。在恐怖的日子人们更加注意天象与人事的关系,久而久之,这种关系成为占星术的依据。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科学和伪科学如影随形的伴生关系。我们也不难理解占星术这种伪科学经久不变的原因,根深致叶茂,源远流长。在今天,美国的占星术士是天文学家人数的十倍。而 40% 的美国人不同意“占星术终究不是科学”这样的一种说法。

科学的来源有两个,首先是好奇心,以及对一个整体世界认识的内在要求,一种系统的全面的理解世界的方面,它构成科学史上的哲学家传统;第二个来源是满足人类物质生活需要而进行的工具的改进和劳动技艺的提高,它促进技术和工具的进步,构成科学史上的工匠传统。人们倾向于科学的进步是天才的科学家从他们伟大的头脑中创造出来的这种观点,如牛顿和爱因斯坦。人们对于哲学家传统的科学源头怀有崇高的敬意而对工匠传统有所疏忽。而事实上,正如现代天文学和生物学、医学的形成,是与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分不开的,对工匠传统的疏忽是背离事实的。1608 年,荷兰眼镜商汉斯·里珀希用两块眼镜片观看远处的教堂尖顶时,发现了奇妙的放大现象,进而想到了这一发现不同寻常的意义。这就是“工匠”汉斯·里珀希发明望远镜的故事。炼丹术是典型的工匠事业。在中国,道家修

炼者尤其热衷于这项工作。这种以贱金属炼出贵金属甚至黄金、用金属炼出教人长生不老的仙丹的意愿远不是令人嘲笑的“天真”所能理解的。人类认识自然掌握真理需要一个过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天真”“愚蠢”的炼丹术,就没有今天无处不受益的化学。炼丹过程中促进某些化合物生成的方法成为化学的源头。从这个具体的学科讲,化学是炼丹术这种伪科学的衍生物。非但如此,有确凿证据表明,牛顿的地心引力学说也是从炼丹术中获得了暗示。

伊萨克·牛顿生于1642年圣诞节,按照中国“命理学”预测,这种与圣人同生日的殊荣是一个吉兆,凑巧,后来牛顿的风光也证明了这一点。然而,至少在某些方面,牛顿又是不顺利的。这多少又偶合了耶稣基督曾经的苦难。牛顿生出来时很弱小,他母亲后来夸张说他小至可以装进一夸脱的杯子。牛顿体弱多病,感到缺少家庭的温暖。他脾气暴躁,不爱交际,当了一辈子的童男,后来又当了伟大的科学家。一个科学家的灵感不是与生俱来的,牛顿思想的成熟主要归因于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冲突。1665年夏季,严重的淋巴腺鼠疫席卷英国,正在大学读书的牛顿由学校遣散到家里。有关介绍牛顿身世的书籍称:在伍尔索普,牛顿在宁静的庄园里度过了一年半的时间,并且由于苹果落地的启示发现了地心引力原理。

哲学家伏尔泰就是这样的观点,他说,牛顿是在他的果园中看见苹果坠地时引起他揣度物体坠落的原因,并从而找到解决引力问题的线索的。但是传记作家迈克尔·怀特在1996年出版的牛顿传记《最后的巫师》中称,苹果落在头上导致牛顿发现地心引力原理的神话,只是历时250年的一项掩饰这位英国科学家秘密阴谋的一部分。怀特说,牛顿不仅是一位残暴色情狂,神经病患者,还是一个魔法师。他之所以精心炮制苹果落地的神话,是为了掩饰他对巫术的迷恋,而在当时,对巫术的迷恋会使他遭致绞刑的惩罚。当时,英国有关巫术的书要从欧洲大陆进口,它们价格昂贵,并且充斥色情,这也许是遭禁的原因。但是,牛顿沉湎于巫术和魔鬼研究,热衷于从普通物质中炼出灵丹妙药的化学实验,这就与现实有所矛盾。所以,牛顿必须想办法掩饰自己的行为。或许,对于熟悉牛顿的人来说,牛顿的嗜好并非秘密。怀特研究后宣称,“从牛顿的文件中能找到暗示他是由炼金术、而非苹果掉落在头上而激发地心引力灵感的内容”。^[3]牛顿的出版经纪人巴顿是牛顿的侄女,有迹象表明,她参与了牛顿苹果落地神话的策划。事实上这是成功的神来之笔,一如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作自由落体运动实验和瓦特从烧水壶的启示发明了蒸汽机的故事一样美丽得不可靠,但却使发明家声名远播。牛顿的知名度因苹果

落地而火速上蹿,而他对于巫术、对于炼丹术这些十足的伪科学的迷恋却深藏幕后,鲜为人知。

炼金术又称炼丹术、点金术,它是企图把普通金属炼为贵金属、黄金或“长生丹”的方法。在古代中国、印度、埃及、阿拉伯等地,都有炼丹术存在,这就说明人类的思维——即使是天真幼稚的想法——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人类的思维的趋同可能因为我们有相同的生存环境和相同的大脑等前提。中国自东汉以降,历代都有关于炼金术的书籍流传。西欧盛行炼金术是在12世纪至14世纪,它直接导致了化学的诞生。在历史上,炼丹家发现了许多化学现象,并制备了一些化合物。

我们试图从科学的发源追踪伪科学,这种目的我们显然已经轻而易举地达到了。作为一个门类的伪科学,不管其起点何在,它都是科学的伴生物,也许还要和科学共存亡。所以,于光远先生说,“同伪科学至少还要斗一百年”。^[4]虽然当代研究者在缠绕不清的理论纷争中,做出了从目的性定义伪科学的折中。例如,龚育之先生就说过:“假借科学的名义,或者假借气功的名义,宣传封建迷信、诈骗钱财、坑害百姓、坑害国家的,就是伪科学”。^[5]但这绝不会在当代伪科学流行中为占星炼丹一类法术免责,因为,占星术和炼丹术这类迷信从来就有而且永远具有“坑害国民”的成分或曰企图。无论定义松紧,它们都是伪科学,只是它们的历史更悠久,欺骗性更大。

第二节 科学与非科学

科学可以是一种认识论、一种方法、一种文化、一种思潮或一种社会现象,因而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学者们从科学起源、进步和社会功能归纳出科学的本质,认为科学是人们对自然现象产生原因的一种猜测或解释,它以作为形而上学的自然哲学为基础,以研究自然现象为己任。科学依赖人类经验作验证,并可以转化为技术。“科学的公式、定律等可以无数次被证明与人类的经验完全相符,但科学本身与正确或真理几乎毫不相干。”^[6]这样的陈述面面俱到以求完善,然而缺乏概括和抽象的定义恰恰不是科学的定义。爱因斯坦相对论深奥莫测,然而它的陈述可以抽象成 $E=mc^2$,并且不致产生误解和歧义,但如此精炼“科学”,对于每个科学哲学家都是困难的。据说“科学”有150多种不同定义,令人望而生畏。人们最需要了解的东西竟是如此复杂,这本身就是科学的无奈。

也许从“科学”一词的起源,可以找到理解“科学”的途径。自然哲学家造出科学一词时,已经对它的外延和内涵作了限定。这样来看待“科学”,我们就有了一种简单的归属感。当然,这并不是说“科学”只存在于“科学”这个概念之后。原则上符合“科学”概念规定性的此前的认识均可以划分在科学之内,这就使科学的起点上溯到了青铜时代。

1833年,在剑桥召开的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会议上,休厄尔仿照“艺术家”(artist)一词,建议用“科学家”(scientist)一词称呼出席会议的人。当时,该词的含义相当狭窄,只指那些缺乏正规训练,或者与研究机构的关系并不密切,但在科学上却很有能力的人。当时的科学家,就学术建树上讲,尚不及自然哲学家,而此前自然哲学家是指牛顿一类科学上和思想上均有建树的大“科学家”和古希腊的思想家。休厄尔有一个好朋友迈克尔·法拉第。休厄尔设想用“科学家”来称呼像法拉第这样的人。因此,尽管牛顿是现在举世公认的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但他并没有获得“第一个科学家”的殊荣。这个殊荣属于“电磁感应定律”、“电解定律”、“磁旋光效应”的发现者法拉第。

“科学”一词也是“自然哲学”一词发展而来的。“自然哲学家”在希腊文中有“热爱知识者”的意义,但是这个意义太空泛,缺乏确定性。随着自然哲学的发展,其研究对象不断扩大,人们希望有新词来替代它。这个词就是“科学”。在拉丁文中,它的意思是“去了解,去探索”。这个词义仍然空泛,但是,如果与具体的学科结合起来,它就实在了。比如,你要知道疾病是怎么一回事,你就要去“了解”和“探索”疾病,于是形成“病理学”。你要想知道如何打棒球,就必须了解打棒球的科学。至此,科学的定义就十分明确了。简而言之,它就是“探索”和“了解”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学问。如果进一步推论说人们对于自然现象的理解叫做科学,那就会犯逻辑上的错误。

人们对于自然现象的理解,可以是哲学的,宗教的,艺术的和巫术的,这一切的形而上集合,构成“科学之外”,或曰非科学。科学和非科学构成认识论群体,它们都在为认识世界服务。

英国著名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卡尔·皮尔逊(1857~1936)认为,神学和科学对自然和社会在不同的层面上进行了解释,而且相安无事。科学并不反驳神学。“只有当信仰侵入可能的知识领域,侵入实在的层面,科学才不得不严厉抗议;只有当信仰代替知识作为行动的基础时,科学才被迫批判信仰的道德性,而不是批判信仰的

实在性。"[7] 神话对自然解释作用是巨大的。在中国,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都能在神话中得到合理解释。由此而生的自然神崇拜源远流长,影响至今。每一种自然物都能找到它们的神,如风神、雷神、雨师、河伯。农业的成败至关重要,历代的动荡多与农民的灾荒相关,因此保一方平安的土地神被安排到了基层,土地神崇拜深入人心。

中国古人相信,混沌初开时是盘古开天辟地,修补天裂使天地方圆并制造人类的是女娲,而后有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经过以上多方奋斗,人类生存的空间才被基本确立。

至于后来的蚩尤共工之战,鲧禹两代治水,我们相信它不会是纯粹的幻想的产物。德国当代学者兰茨科维斯曾把古代神话总结为九类,并指出各民族的神话都可以归结为这九个母题。这说明,在人类的童年,不同民族所面临的是大致相同的自然对象和情境,要解释的是大致相同的问题。“神话既不是骗子的诺言,也不是无谓的幻想的产物,它们不如说是人类思维的朴素的和自发的形式之一。只有当我们猜中了这些神话对原始人和它们在许多世纪以来丧失掉了的那种意义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人类的童年。”[8]

然而,科学的、艺术的、巫术的认识,与科学相安无事只是一种理想。不同见解的冲突完全是必然的。如果“婆罗门(Brahmin)相信,世界是由无限的蜘蛛的本能产生的,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神启的”,那么我们在惊奇的同时,可能能够容忍。因为他们的信仰对于我们来说毫无意义,但是,如果他们断言现象世界本身给出从这种怪物的肠内吐丝结网的证据,那么我们就不能坐视不管,而必须从信仰层面行进到理性和科学的层面,果断地摧毁他们的怪想。同样,“当自然神学和形而上学断言,理性能够帮助我们达到某种超感觉的知识时,科学与它们的关系就完全不同了。”[9] 因为在这里科学是完全确定的和清楚的,而自然神学和形而上学从干预我们思想的那一时刻起,便由非科学走到了“伪科学”。

从科学与非科学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科学是对自然现象的一种趋于正确的理解。但是,科学正确吗?科学是真理吗?只有当我们得到否定的回答时,我们才会释然:为什么科学和伪科学的斗争那么持久而胶着,永无止境。

在爱因斯坦相对论动摇牛顿的经典物理学之前,至少从弗兰西斯·培根开始,人们普遍持有科学等同于真理的观念。根据牛顿的经典力学,首先论证了开普勒第一和第二定律,并对第三定律做出了精确性修正。接着还进一步解释了不少重

要的天文现象；木星、土星和地球等行星都绕轴自转，所以它们都成为两极扁平而赤道隆起的扁球体；月球、太阳对地球隆起部分施加的引力必然造成地轴的进动，从而导致岁差现象；地球上的潮汐现象，也可用月球、太阳对处于地球不同深度的物质单元所施加的引力的大小不同来解释。在牛顿之后，其他人应用万有引力定律也一再取得新的重要成果。例如，哈雷于 1705 年发现每隔 75 ~ 76 年出现的彗星是同一颗彗星。1846 年，法国青年天文学家勒威耶论证了一颗未曾发现的行星，德国柏林天文台的伽勒进一步发现了这颗行星——海王星。一系列的成就使牛顿成为“新上帝”，科学几乎完全垄断真理，凌驾于一切认识形态和知识形式之上。牛顿神话直到本世纪初，才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打破，这使科学等同于真理的观点发生了危机，在科学哲学领域至少从逻辑实证主义开始，或者说从原子主义者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开始，对主要来自归纳方法的经验科学的必然真理性发生了怀疑。此前，在老实实证主义那里，科学作为被经验事实证实的、完全无误的知识等同于真理。逻辑实证主义则认为，科学作为被经验事实确证的知识不再是完全无误的必然真理，而只等同于或然真理或概率真理。科学哲学发展到卡尔·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时，科学只被放在具有可证伪性的猜测与假设的位置，而历史学派库恩、费耶阿本德则干脆否认真理本身的存在。

由于科学是认识范畴，而真理是对事物客观本质的表述，所以，两者的等同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是我们认为，科学与真理还是趋近的。科学是对于真理的追求，它离不开真理，科学是实现真理的主要认识形式。这是因为：第一，科学认识有较强的理论性、抽象性和概括性；第二，科学向人们提供必然性和规律性认识；第三，科学以概念系统或命题系统为表现形式；第四，数学的引进使科学具有精确性。第五，科学具有批判性。科学的发展是对自己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的扬弃。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众多的认识方法中，科学离真理最近。其中有些科学就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所说的那种或然真理、概率真理。即：有些具体的科学成果就是真理。

科学与真理的这种关系，使伪科学找到了攻击对方的理论依据。我们常见的有布鲁诺遭火刑、其科学原理不被宗教承认的例子，说明科学在某些时候，特别是初起时可能会受到压制。这成为伪科学还击科学批评的堂而皇之的借口。由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修正了牛顿经典力学，这就使伪科学理论有理由向一切现存科学原理，包括相对论发起进攻。他们宣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要修改、却拿不出像样的修改方案。

美国物理学家密尔顿·罗思曼指出,科学与非科学,必有严格的界限。他认为,第一,科学研究的是空间和时间中实际存在的事物。第二,每一门科学都有哲学观的指导。第三,科学研究的内容由于新知识的不断积累而变化。第四,科学研究的成员都经过了专门的训练,他们之间需要经常沟通信息,并始终坚持自由探索的传统。第五,科学理论具有严密的逻辑性。第六,科学把知识作为自己的基础。这些知识包括可以检验的新理论、假设和实验数据。第七,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把数据资料和假设系统化,上升为理论或定律,然后运用这些理论或定律,具体地预测自然系统或人造器具的运行特点。由此可见,科学的内质是十分丰富的,它使每一个试图抽象它的研究者大伤脑筋。《现代汉语词典》说:“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这也许是我们能确见到的最简洁的定义。其中“分科的”三个字,留不有“科学”一词从日文移植时的定义特点,当可删去。如此,不能再简略了。与此相似的是《美国英语遗产字典》给科学的定义:对自然现象的观察、鉴别、描述、实验研究和理论说明。

在认识论范畴,有一类对于自然的认识,客观上是不真实的。它是人们对客观规律的猜测,并且不能严格地被经验证实,更经不起实验论证。如热质说、燃素说、以太说和灾变论。

热质说是流行于 18 世纪到 19 世纪初期的一种对热现象的解释。它认为有一种没有质量、没有体积的物质即所谓“热质”存在,物体含有这种热质越多,温度就越高,热的传递就是热质从高温物体到低温物体的流动。热质说存在时,便有人发现它无法解释摩擦生热等现象,后来,科学家逐步发现了热现象和物质分子运动相联系。热质的说法没有反映热现象的客观规律,因而是非科学的。

燃素说也是一种错误的学说。18 世纪时,研究者认为可燃物质中存在着燃素,燃烧时燃素以光和热的形式逸出,但物质的重量在燃烧后一般都增加了。因此燃素好像有负质量。这种学说被 18 世纪末的燃烧氧化说所取代。

以太学说是古希腊哲学家首先设想出来的。17 世纪后期为解释光的传播,以及电磁和引力相互作用现象而又重新提出。当时认为,光是一种机械的弹性波,但这类波的传播必须有某种弹性媒质作为媒介,就像声波的传播要有空气或水作媒介一样。由于光可以在真空中传播,这样媒质也应存在于真空中。这种媒质就是以太。以太具有许多不合理的特性,且不能为实验所证实。20 世纪初相对论发现光的传播和一切相互作用都通过场,因而宣告了以太说的终结。

灾变理论认为太阳系的形成是宇宙间某种引起巨大变化的偶然事件的后果。例如,一个恒星走到太阳附近,使太阳生起了巨大的潮汐;一个恒星和太阳相撞,飞溅的物质冷却成了各大行星等等。现在,灾变说已让位于大爆炸理论。虽然大爆炸理论目前仍然是一种假说,但其基本原理用于解释宇宙现象时已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哲学和科学站在各自的立场,依据各自的价值取向来解释世界。而科学与形而上学这两大思潮从古希腊至今,一直是时而融会、时而冲突,各自守住自己的阵地而又能发现自己的某些不足。这两大思潮都对人类精神做出了贡献:我们需要经验,也需要超验;需要实证,也需要思辨,需要理性,也需要非理性的联想、直觉和创造。在世界的认识方法上,科学和形而上学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和方法,形而上学家在这个有限的经验世界中总是身心不安,他们仰望星辰,呼唤着无限、永恒、绝对、彼岸,充满宗教情怀、神秘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色彩。他们对科学的成就和此岸世界的真理不屑一顾,认为那是有限的、不完善的、不真实的,而哲学的绝对真理存在于形而上学的彼岸。

第三节 科学与反科学

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反科学历史悠久,当古代科学处于原始形态时,反科学反对人对自然的认识,具体表现为宗教对科学人生观的反对。公元4世纪,圣·巴西尔在《创世纪》中说:“在一切事物中,我们宁可要朴实的信仰,而不要玄夸的理性。”^[10]这个时期的科学家被歧视为制造空洞预言的人,宗教提醒教徒们对科学家倍加小心。中世纪政教合一时代,自然科学同科学家一道被送上了绞架,这时大约有200万人因为不相信宗教或崇尚科学而被教廷处刑。到了法国大革命早期,狄德罗还因为要为盲人发明文字,被关了3个月的监牢。“创世纪”作为基督教信仰被视为颠扑不破的真理。直到1952年,在美国田纳西州,仍有像K·达罗这样的科学家因主张进化论而被治罪。“创世纪”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197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不得不以决议形式要求加州政府不要向宗教组织“创世研究会”的压力低头。

近代科学的发展对生产力的促进成为反科学的抵制对象,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J·吉兴说:“我憎恨科学,我害怕科学……我看到它破坏着生命的一切朴

实与和善,破坏着世界的美丽,我看到,它使人的精神萎靡,心肠很硬,我看到,它带来了一个发生巨大冲突的时代。"[11] 20世纪60年代,西方反科学以反对“科学文化”和“专家政治”为特征。T·罗斯扎克在《反文化形成》中对科学的客观性进行了十分尖刻的批判。他说:“当文学艺术不顾一切地向我们讲述,在我们这个时代,把我们导向毁灭的真正病因,乃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疏远,而科学家则把这种疏远奉若神明,并且拼命追求一种客观性,把它作为我们与真实存在密切联系的惟一桥梁。”[12]

进入大科学时代,反科学思潮带上了科学政治色彩。大科学主张一切与科学有关系的社会现象都应当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主张科学方法可以成为提示社会运动规律的有效工具,反科学主义者则坚决反对这样做。

反科学思潮的出现,除了来自宗教的顽固外,科学家自身的失误,科学研究的日新月异给公众造成的不可知感,以及科学技术的副作用成为重要的原因。

卡尔·萨根认为,“科学自身的善变导致了人们对它的不信任与攻击”。[13]当我们刚刚有些明白那些被科学家热烈讨论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却告诉我们那些东西已不再正确。即使它们仍然正确,科学家又开始讨论许多闻所未闻、难以置信、带给人不安暗示的“新发现”了。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如此的现状:美国有一半成年人不知道地球绕太阳一周需要多少时间,而同样的问题在英国上流社会的问卷中有四分之三的人不知道。同样,有一半的美国人在得知正方形一条边的长度之后,还不能求出另一条边的长度。中国的公众科学水平比这更糟,相似的工作是1998年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对愚昧迷信活动在我国农村情况的抽样调查:这个结果告诉我们,只有33.3%的成人完全不相信算命,另有13.1%的人对于算命不置可否。中国是一个自由神崇拜的国家,三大宗教的渗透并没有西方宗教那样的规范和规模,但是仍然有14.6%的人相信生死轮回,完全不信的只有50%,这些被调查者中基层领导、科技人员、教师、机关工作人员、工商业职工和学生占有70%的比例,其中有83.4%学历在初中以上,55.9%的被调查者为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中国公众的科学文化水平和信仰趋向不能不令人担忧。公众的科学素质偏低,当科学理论超出了他们的理解力或者需要费很大的努力才能理解时,他们宁愿相信通俗易懂一半是信仰一半是被愚昧强加的反科学知识。他们对科学的理解是:也许科学家在愚弄我们,科学家要变更一切,推翻一切,那才是社会动乱之源。所以,当1999年7月22日传媒公布政府取缔“法轮功”的决定时,我们遇到了难以想像的阻

力。作为一个有“反伪科学”课题在手的青年研究人员,我自己的一名学生就是一名顽固的“法轮功”维护者,令人羞愧。显然,“法轮功”修炼者不愿检讨自我的偏激和丧失理智,而是把矛头指向了政府,首先是科学家。1999年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第4期刊登何祚庥院士的《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一文之后,“法轮功”修炼者围攻天津教育学院。4月25日,一万多名“法轮功”修炼者更在中南海周围聚集,令人触目惊心。一些“法轮功”修炼者直接把矛头对准何先生。把对科学的仇视转化为对科学家的仇视,这是反科学主义猖獗的表现。

近几个世纪以来,科学经受了一系列的攻击。科学的善变、科学家的主观和偏见往往成为攻击的主要原因。科学家和普通人一样不能避免犯错误,卡尔·萨根指出:“即使是像乔哈尼斯·开普勒、伊萨克·牛顿、查尔斯·达尔文、格雷格·孟德尔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科学家也曾犯过严重的错误。幸运的是,科学事业是一种集体的事业,任何人的影响都不能超过集体的作用。因此,即使那些最有才华的科学家犯了错误,这些错误也能被其他远不如他们的科学家发现并弥补。”^[14]

但是,对于开普勒的天文学根源于他的中世纪的、一神论的宗教观,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被一种使他所属的特权阶层永存的愿望驱使、或是出于证实他所提出的无神论的动机,确已成为后现代主义反科学的借口。

宗教是反科学的主要力量。A·N·怀特海指出:“17世纪时,地动说受到天主教的宗教法庭所拒斥。距今一百年以前,地质科学所提出的时间广延性使得新旧教的宗教人士都大为震惊;而今天进化论的理论也仍然是宗教的眼中钉。”^[15]在美国有四分之一的人口,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呈急剧增加的皈依者生活在只是在几千年以前才奇迹般创造的宇宙中。他们认为地球上居住着的只有那些固定的有机类,他们在全世界性洪水中得救于诺亚方舟。原教旨主义的神创宇宙的权威性,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压制是不遗余力的。神在六天内创造了宇宙,并且依据自己的意愿让一些物种繁衍不来。这种学说是容不得达尔文们的“猴子”来参与进化的。今天的神创论者已经拥有雄厚的经济势力,他们有自己的媒体,并且同保守的政治派别或教会集团有很好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美国正统的世界观内,容纳了像占星术、不明飞行物、神创论这样一些反科学内容,与原教旨主义相一致。“神创论”者通常注意争夺年轻人。他们通过向地方学校董事会施加压力来把他们的“科学的神创说”纳入学校的教学课程,以此来代替进化论。他们认为进化论是受了撒旦的蛊惑,是反基督教的。有迹象表明,这个运动现在还要像对付达尔文一样对付哥白

尼,以便复兴地心说。

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后,遭遇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响。一方面,有人对它赞誉有加,称它为现代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另一方面,有人对它极尽诋毁之能事,致使1900年左右,达尔文主义进入“日食状态”,那时流行的口号是“达尔文死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于20世纪30年代。诚然,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一个科学假说并非完美无缺,目前我国研究者也普遍认为进化论尚需完善,尚需作进一步的科学的全面的诠释。达尔文进化论的产生也是在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启示下,通过远航考察得出的结论,达尔文的进化论理想并非一朝一夕的神灵启示或心血来潮,它有着充分的科学文化背景,这一点可以从比达尔文年轻一些的博物学家华莱士也曾独立地、几乎与达尔文同时地构想出进化论思想可以得到证明。一个有承前关系的思想,必然也可以启后,这顺应了科学永远不能等同于真理的哲学命题。反达尔文主义以太灭绝理论质疑渐变论,“盖娅假说”主张地球与生物“协同进化”,而且,微生物不是人类对地球进化的影响最大。美法律教授詹腓力的《审判达尔文》对广进化论的速度与机制提出质疑,却对达尔文的微进化理论予以了支持。后达尔文主义者,英国科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把达尔文的进化论推进到了“分子生物学”水平。美国的古尔德则修正达尔文主义,使达尔文主义的渐变论与反达尔文主义的突变论得到了综合平衡。古尔德指出,达尔文主义的核心是自然选择理论,而不是渐变论。应该相信,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可以借助分子生物学、古生物学以及复杂理论和手段,对进化论作进一步的研究,以便最终解决物种起源与进化这一千古之谜。我们的分析只是说明,达尔文主义是不排斥批判的,分析批判的目的,则是为了科学的进步而不是倒退。但神创论显然另有所求。全世界252个国家中的18亿人口信仰基督教,如果加上天主教、新教、东正教和圣公会等信仰上帝的宗教,那么占世界人口62%的人对创世论的信仰[16],令进化论腹背受敌!

1925年夏天,美国田纳西州的小镇戴顿上演了一出“世纪审判”。这个案件被看成科学和宗教冲突后科学击败了宗教的标志。爱德华·拉森的《众神之夏——“猴子审判”以及科学与宗教的论战》再现了那段历史,并分析了那场审判引发的关于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与宗教自由等许多深层的问题。该书获1998年度普利策奖。但是这种胜利是有限的。美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家,科学和民主的发达与宗教和非理性主义的发达是畸形共存的。这种畸形最终闹出了一个科学国家在教

材里不讲进化论的笑话。如果是因为进化论的缺陷,使它遭此冷遇那还可以理解,而问题恰恰不在这里。卡尔·萨根在《魔鬼出没的世界》中将此与苏联的李森科事件相类比。20世纪30年代,一个叫特罗菲姆·李森科的骗子得到了斯大林的注意和支持,随后,李森科进行了反科学的遗传学研究。按照李森科的说法,真正意义上的遗传说应该遵从共产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只要这样,它就能产生与原来意义上遗传学截然不同的结果。比如,可能培养出一种新的冬小麦良种。李森科据此爬到了苏联科学院院长的职位,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支持下,李森科冷酷地压制着经典遗传学的发展,因而20世纪60年代,苏联学校使用的生物学教材里几乎找不到关于染色体和经典遗传学的内容。

在那段历史里,穆勒据理力争,认为经典的孟德尔遗传学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苏联农业科学研究院前任院长N·I·瓦维罗夫也支持穆勒的观点。但是,他们均因此遭到噩运。后来穆勒逃脱了秘密警察的追捕,而瓦维罗夫则于1943年被杀死在西伯利亚集中营中。这正如杰拉耳德·霍耳顿所说:“反科学现象的严肃而又专心致志的部分同政治权力结合之时,确实发出了巨大的文化挑战的信号。”“把反科学现象的坚定而又有政治野心的部分看做是沉睡中的野兽的唤醒者是一种先见之明。一旦野兽醒来,正如过去几个世纪一再发生的那样,而且无疑有朝一日它将再次发生,它将使人们认识到它真正的力量。”^[17]1964年,李森科主义在苏维埃科学院被投票否决。至此,李森科主义这头野兽没有使苏联的原野长出理想的冬小麦以实现苏联人“面包会有的”的理想,反而使他们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学遭到了不可救药的落伍。他们失去了两代现代生物学家。

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推动了反科学思潮。20世纪70至80年代,核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和化学工业的飞速发展,造成了环境的污染。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造成了生态、能源、人口和生存问题。人们在媒体上看到“曾经一度是多么引人的小路两旁,现在排列着仿佛火灾活动后的、焦黄的、枯萎的植物。被生命抛弃了的地方只有寂寞一片……”^[18]这样的描写,在反科学主义者的眼中,科学成了十恶不赦的社会公敌。人们愤怒地写道:“我们需要的是用科学来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教我们在一个没有污染的世界里如何做人,而不是把我们当作活动的机器。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亮光,而是更多的温暖。”^[19]

美国小说家库尔特·冯内古特甚至极其幽默地表达了“宁要占星术,不要科学”的反科学观点。他说:“如果政府把它用于科学的钱取出来用于占星术和看手相,

我们会安全得多。过去我曾认为科学会拯救我们,而且科学确实试图这样做。但是我们不能再忍受任何更巨大的爆炸了,不管是为了民主或反对民主。只有在迷信中才有希望。如果你要成为文明的朋友,那么就要成为真理的敌人,热衷于无害的梦呓。我恳求你们相信不迷迷信中最可笑的迷信,例如,人处于宇宙的中心,是上帝最宏伟的的实现者和阻止者。关于占星术和看手相:它们都是好的,因为它们使人感到生动活泼并且充满可能性。它们是共产主义的最佳状态。每个人有一个生日,而且几乎每个人都有个手掌。例如,让一个单调乏味的人,生于8月3日,他是一个狮子座。他骄傲、慷慨、信赖别人、有活力、专横跋扈,并且有权威性!所有的狮子座都是如此!他是受太阳统治的。他的宝石是红宝石和钻石!他的颜色是橙色!他的金属是金!这是一个小人物?……要他向你展示他令人惊异的手掌。他有一条多么奇怪的手心线!警惕啊,姑娘们!你曾经见过一座像这样的月亮山吗?哦!这是某个人!”^[20]反科学思潮对于技术的失误和负效益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并且认为解决的方法是放弃科学。如库尔特·冯内古特所幽默的那样去信仰占星术和手相。反科学对以不问题或问题的方面提出了异议: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可能的核大屠杀而引起的巨大焦虑。

二、环境的破坏,比如臭氧层的破坏引起的人们对科学的恐惧;此种恐惧常常导致对一些技术的无理排斥。

三、由化学添加剂引发的毒性恐怖。对农药和化肥的恐惧造成世界范围的呼唤绿色,回归自然的运动。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恰恰是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导致了绿色革命,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减少了饥饿、提高了生活质量。在我国,对禽畜饲料中添加剂的恐怖因媒体的推动而达到了不该有的程度。我们应该知道,传统的饲料和喂养方法根本解决不了十三亿人口的禽蛋肉食供应。我们面临的选择不是吃土鸡还是吃洋鸡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吃到鸡的问题。

四、对生物遗传工程的怀疑。生物遗传研究一开始就遭到反对。许多人担心科学家会把新的细菌菌株排入下水道,然后遍及生态系统,扼杀大量生命。克隆技术的出现更造成了公众的忧虑,因为,一旦此种技术运用于人类,那么,复制多个希特勒造成战争危险和复制多个爱因斯坦对我们庸人造成生存竞争都是不可想像的。人们应该了解,尽管生物遗传工程可能确有某种危害,但它在治疗遗传病及创造新产品方面为人类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利益。合成胰岛素就是明证。今天,基因工程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基因歧视”已经为政治家提出。我们希望这个问题

能够妥善处理,而不至于因此阻碍了基因工程的顺利实施。

五、对医学的抨击。这些抨击有些是对的。比如科学使有条件延长人的寿命成为可能,但是,有些人却是违愿地活着。因而,医学伦理学家已经提出了“死亡权”这样的命题。对动物研究的反感,是反科学抨击科学的最好例证。1989年英国出现了一个危险的组织:“动物解放阵线”。这个组织的成员,盲目反对一切以动物为载体的科学实验,并且公开威胁科学家。据《科学与公众》杂志报道,牛津大学生理学教授布莱克莫尔研究早期视觉对大脑的影响时,采用猫来做实验载体。这个实验并不损伤动物,只是挡住猫的视线。但是,《每日报》记者却发文说《猫眼使人恐惧,科学家弄瞎了人的眼睛》,结果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布莱克莫尔不但受到了“动物解放阵线”成员的恐吓,而且连他的孩子也不敢出门。更有甚者,这个组织声称,还要制造一系列价值高达数千英镑的爆炸活动。这个活动后来付诸了行动,贝里斯托大学的实验室被高级爆炸药摧毁。无独有偶,在美国1990年发生了一桩怪事。康奈尔大学著名植物学家M·奥卡默特40年来一直坚持成功的医药实验,由于她使用了猫作载体进行实验,结果受到宾夕法尼亚州动物权利主义者的强烈攻击。他们四处散发资料,打电话抗议奥卡默特的药物研究,并且在她的实验室周围盯梢,干扰她的实验和科研情绪,不到两年时间,支持她研究工作的国家反毒中心和校方竟收到1万多封信,抗议这种科学实验,结果,她被迫放弃一项科研经费高达53万美元的科研计划。奥卡默特哀叹道:“兽道主义终于战胜了人道主义。”

六、对现行的精神病学的反对,和对“他择性健康疗法”的趋向。从信仰疗法到基督教科学派到松弛反应、虹膜学、顺势疗法和药草医学,现行医学科学在征服疾病、研制抗菌素和成功的外科手术方面的成功经验被反科学者抛弃,取而代之的是自以为是的另辟蹊径的信仰。

七、亚洲神秘主义冲击世界。二战以来,东方神秘主义凭借瑜伽冥想、中国气功、古鲁斯以及唯灵论闯入西方世界。据说这些古老的智慧形式和疗法会以现代医学做不到的方式导致身心健康,不幸的是,这种所谓的心灵疗法的可信的临床验证寥寥无几,而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胡吹乱侃和奇闻轶事的描绘。

80年代,不仅现代科技被指责为“奴役人类的工具”,就连科学家也被公众误认为“为军事利益出卖灵魂的人”。环保主义者J·皮卡德指责道:“我们现在所津津乐道的技术除了广泛地造成自杀性污染外,再没有什么其他东西了”。应该说,环保

是必要的,但环保至上就会扼杀科学。

第四节 科学与伪科学

在与非科学的比较中,我们已知“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于光远在《论科学与伪科学》中论述了“科学是研究客观状况、客观规律性的系统化了的知识”^[21]的道理,并指出这里的知识是“真”知识。什么叫“真”,这个问题正是我们本节要讲的问题。

与“真”相对的是“假”,真知识对应于真科学,假知识对应于假科学或伪科学。

1844年,英国首次出现“伪科学”(Pseudoscience)概念,以指代星相学、炼丹术、命相学和颅相说这样一些“知识”。可见,那种认为“炼丹术”出现在“伪科学”概念之前、不属于“伪科学”、只能称非科学的观点是不对的。因为“伪科学”正是指“炼丹术”这类假知识。故我们在考察伪科学时不必划界于1844年,与上述种种伪科学同时代甚至更前的歪理邪说,比如古罗马时期伊特鲁里亚人信奉的“牺牲占卜学”(haruspex)也是一种伪科学。

给“伪科学”命名的年代,是上述伪科学猖獗的年代。那种神灵作祟的盛况后来在恩格斯《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22]中专章提到,该文可能写作于1878年。文中提到的催眠颅相学专家斯宾塞·霍尔先生,是恩格斯于1843~1844年冬季在曼彻斯特见过的。恩格斯说这个“完全普通的江湖术士,在几个教士的庇护不在国内到处跑来跑去,用一个少女作催眠颅相学的演出。为了由此证明上帝的存在,证明灵魂的不朽,证明当时欧文主义者在各大城市中所宣传的唯物主义的无用”,^[23]其方法是少女在催眠状况下,只要颅相师触摸少女颅骨的某一部位,少女就会做出相应的反应。比如摸一不“敬神的器官”少女即跪拜神灵。上帝的存在由此得到证明。但是霍尔并不是颅相学的发明者,这一法术的源头可能十分久远。霍尔是在加尔(1758~1828)的颅骨地理学基础上发展自己的法术的。当时颅相学的风行的一个有力证明是,和达尔文同时提出进化理论的科学家华莱士对霍尔的颅相学也十分热心,他竟然不惜代价地使这些江湖法术重现。恩格斯说:“华莱士先生终于相信了催眠颅相学的奇迹,这样他的一只脚已经踏进神灵世界中去了。”^[24]

马利奥·邦格认为:“任何一个尽管本身不是科学却自称是科学的知识领域都叫做假科学。”^[25]邦格用二个条件规范了一个非科学体系,其中包括神学和文学

批评。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理性认识称为知识,知识有很多种,比如对宇宙的认识,可以有神学、占星学、哲学、文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生物学等方面的。神学和占星术是迷信的非科学,哲学、文学是意识形态的非科学,天文、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学属于科学。我们研究伪科学并不把哲学和文学放在内,这一类社会科学不在狭义的“科学”之列,称非科学。在此,只要占星术和神学冒称科学,它就是伪科学。事实上,从古至今,这两种学说都是以一副科学的姿态、冒称科学的。以上是知识分类的第一个层次。

将知识分成科学与非科学之后,我们对非科学中的一部分——伪科学的分析就方便多了。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只把伪科学分成伪科学理论和伪技术两种。伪科学理论中有一部分属于研究者的偏执和无知而进入死胡同的情况——如“永动机”研究——是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朗缪提出的“病态科学”的那种。国民党将领黄维在秦城监狱里关得无聊,就研究起永动机来,想当科学家。那样环境那样的人做的那样的事,本身具有“病态”意义。现在,中国工程院经常收到青年人关于“永动机”这类早已被现代物理学判了死刑的命题的研究报告,可见“病态”的人还不少。任恢忠先生《物质·意识·场》,是一本讨论哲学问题的专著,据说还是福建省福州市精神文明建设项目。它讲的是哲学问题,但由于在文本中引进了自然科学中的“场”理论,并专题分析了“力场”、“基因场”、“生产力场”和思维场,由此我认为放在这里提及的是较合适的。至于它的科学理论是否“病态”,容后专述。灵魂学、超心理学、神秘数学、《易经》预测学、飞碟学、《圣经》考古学、“人类神秘起源”、“气功外气”和“人体特异功能”等学说,均属于伪科学理论。

伪技术是伪科学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于“技术”具有可“推广性”,故危害极大。我们今天反对的伪科学绝大多数是这一种。针对什么是伪科学这个有争议的学术问题,龚育之先生曾巧妙地回避道:“不要去在学术上争论什么叫伪科学。就是说,我们反对的是‘假借科学’的名义,或者假借气功名义,宣扬封建迷信,诈骗钱财,坑害老百姓,坑害国家的‘伪科学’。”^[26]这个定义中的伪科学,指的基本上是伪技术。我国伪科学从1979年“耳朵识字”以来的特异功能和伪气功,也属于这一列。因为,当特异功能这个以“灵学”、“超心理学”和“魔术”为基础的伪科学作为一种表演、一种开发项目行世时,它已经具有了“产业”意义,是一种伪技术了。伪气功更是不言而喻,作为技术,它的推广造就了很多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早已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此外,还有:邱氏鼠药,使人体非自然增高的药物或鞋垫,百

病可治的磁铁,用汞化物漂白脸皮的方法,包括鸡血疗法、自来水疗法、尿疗法在内的信仰疗法,辟谷疗法,气功外气疗法,把红外线疗法胡诌为频谱治疗的方法,各种提高智力的药物,用磁石、抽取脂肪或用肥皂减肥的方法,扶乩和各种冒称科学的巫术,“人生预测”和“电脑算命”,等等。

科学与伪科学的划分,是我们伪科学研究的前提问题。这是一个难点,科学哲学研究的三个问题——科学划界、科学与真理、真理的意义与标准——中,科学划界是首要的。它涉及两个方面,第一,用什么标准划界;第二,用什么方法划界。在历史上,对于伪科学划界的标准,有逻辑主义的绝对标准,历史主义的相对标准和模糊主义的多重标准等。方法上看,有证实主义的证伪主义之分。从逻辑经验主义者的证伪主义绝对标准,到库恩·拉未托斯的相对标准,科学哲学家发现对科学划界其实很难,于是,费耶阿本德、劳丹、法因和罗蒂们主张把科学与伪科学边界“消解”,实行“怎么都行”政策。但这怎么能行呢?所以,针对复杂的划界处境,萨伽德、邦格、伽德纳和拉德纳等人提出了多元划界的标准。我个人认为划界越精确越好,越明确越好。所以,对邦格理论情有独钟。而我国划界理论研究者陈健、宋伟、李思孟等先生在综合了多元划界标准后提出的各自的理论均出现了一个亦真亦伪的“中间地带”。作为读者和伪科学研究者,我望着这个中间地带,十分失望。研究伪科学的目的是反对伪科学,制止、规避伪科学,可是分来分去,那些泾渭分明的我们大众能分的倒也分得好好的,那些真伪莫辨的你仍然给个“亦真亦伪”的结论,那叫分了界吗?

宋伟、李思孟认为:“由可检验性和超量内容标准构成科学分界必要条件的处理办法并不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划出清晰、明确的界线,在这二者之间似乎应有一个‘反伪科学’领域,”并说,“现代混沌学”、“复杂性理论”、“大量意识领域的研究成果”就属于“反伪科学”。^[27]

陈健在《科学划界——论科学与非科学及伪科学的区分》^[28]一书中,通过对历史上各划界理论的分析批判,吸取波普、萨伽德、邦格、费耶阿本德划界理论的精华,通过引进模糊数学模型,创立了“模糊划界模型”。这个模糊认为:第一,科学划界的标准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第二,划界标准集中的第一具体标准在整个划界中占的比重不同,因而有些必须“加权”。第三,由此可以把具体分析中的科学与伪科学因素量化,比如,通过量化,“UFO”理论得出了0.31、0.24、0.37、0.41四个供评判的指标,其中0.31代表科学性,0.41代表伪科学性。第四,作出判断。根

据评判的数字,接近似法作判断。比如“UFO”理论,它的伪科学性指数高些,达0.41。但是这里有个问题,虽然“UFO”理论中伪科学性较高,但科学性也不低呀!如果“UFO”热衷者拿出他那0.31的科学指数来宣称科学,不也让人觉得有几分道理吗?更有甚者,如果这一指数给出为0.37、0.33,我们又如果判断?难道真有一种既是伪科学,又是科学,既非伪科学,又非科学的知识状态吗?在实际中,有些问题是复杂的,但作为一种评判,太模糊了就不能操作了。

陈健的模型难于操作。因为陈健的著作自称是国内第一本论述划界的书,所以我在这里多谈几句。陈健在该书第十章举出了维利科夫斯基的《碰撞理论》作分析,看它为什么是“伪科学”,但是,我很愕然,作为一本用八章篇幅评论他人的划界方法,用一章篇幅推出自己的方法的专门著作,在分析惟一的例子时,却用传统的归谬法或曰证伪法而没有使用自己的“模糊数学”分析法!对此,作者的说法是:我们“可以在专业人员的帮助下,建立一个模糊划界模型。但由于笔者的能力及篇幅等原因的限制,这里我们仅仅综合地作一些定性的分析和讨论。”^[29]这就怪了,作者亲自创立了模型,作者却又以“能力”不够推脱,要另请“专业人员”。难道陈先生还不够专业吗?说白了只有一句话,这种方法不“可操作”。当然,可能陈健的模型还大致是一个粗线条构想。也罢,让我们看看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克基尔大学哲学教授,科学哲学家马利奥·邦格的观点吧。

邦格《什么是假科学》的论文是专门向我国《哲学研究》(1987.4)投稿的。翻译者把 Pseudoscience 译为假科学,为使本书用词具有一致性,在此均说成“伪科学”了。邦格的观点是多元精确的划界标准,他先分析了知识领域,认为知识包括信仰领域和研究领域两大项,前项如宗教、政治意识形态、伪科学与伪科学技术,后者包括人文科学、数学、基本科学、应用科学和科学技术(包括医学和法律)。其中科学有12个内涵,任何不能满足他所说的12个条件的知识领域都称为非科学,如神学和文学批评。任何一个尽管本身不是科学却自称是科学的知识领域都叫做伪科学。这就是本节开篇时提到的那个定义。这里,先解决了那些知识是科学的问题。

哪些具体指标满足于伪科学呢?邦格给出了一个 $E=(C, S, D, G, F, B, P, K, A, M)$ 的公式。括号内的字母是各指标词的第一个大写字母,实际上这个公式等于是 $E=A+B+\dots+M$,邦格所列12个条件,据我的理解,它们是指:

一、这个知识领域是长期不变的,即使变化,也是由于争论或外来压力而不是来自科学研究。如“创世说”。

二、这个知识领域的研究者自称为科学家,但不进行任何研究,或者从事为自己的观点服务的有很大缺陷的研究。

三、社会上承认这个知识领域的人或团体,是为了各自的私利,或者容忍它但把它逐出官方文化的疆界。对“特异功能”的承认,符合这个特征。

四、这个知识领域所研究论述的事物,都是些得不到确证找不到物质性实体的东西,如星象对人事的影响,气功外气,UFO和外星人。

五、这个知识领域的整体看法包含下面四种非科学因素:第一,一种支持非物质实体或过程的本体论,例如脱离身体的精神;第二,其认识论使用来自权威的认证作依据,或者,对于这种知识领域的认识只有那些得到了专门传授或解释经文训练的人才能掌握,是一种超自然的认识办法。如对严新特异功能的认识就依据某大科学家的讲话,而“法轮功”宣称其“功理”只有通过修炼和得到传授才能掌握,局外人是不能理解的,局外人没有那么高的“层次”。第三,一种不推崇清晰、精确、深度、融贯或真理的价值体系。反过来说,伪科学的成果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如“水变油”就拿不出像样的研究报告,一切由王洪成说了算,他说就这样就这样,他说“母液”和水的比例是多少就多少,发热量多少,对机器的磨蚀作用如何,他不能给出。第四,一种不主张自由探索真理、而是顽固捍卫教条、必要时使用欺骗手段的精神。

六、这种知识的形式背景地位通常很低,即使为了说明像超心理现象这样的原理而使用数学模式,这种模式也不能用实验方法检验,是虚有其表。

七、很少或没有特殊背景,一种伪科学很少或根本不从其他知识领域取得知识。同样,它对其他知识领域的发展也很少甚至不起什么作用。

八、伪科学研究的问题中人生的实际问题多于认识问题。

九、伪科学使用的知识停滞不前,而且包含很多与已被确认的科学假说相冲突的不可检验甚至错误的假说。

十、研究者的目的不是认识性质而是实用性质,他们没有典型的科学研究目标,也不能找出规律或使用规律来理解或预测事实。

十一、研究方法既不能用另外的(特别是科学的)方法加入检验,也不能用已被确认的理论来说明。伪科学特别不欢迎批评。

十二、也许除了任何一种伪科学外,没有任何知识领域与这个知识领域有重合的部分从而可以控制这个知识领域,换句话说,这一种知识领域实际上是孤立无援的。没有什么类似真正科学体系的伪科学体系。凡是满足上述十二条件的,都是

伪科学。不过邦格的例子，这个问题，比如：一个自然科学家，这两个条件吗？一个条件不一样？不能。这是行这个问题，所以他，立刻模糊模，in，克服。

邦格把科学、伪科学对待一系列，生命，他，程度列了一个表，in，如下：

科学家—假科学家的态度和比较

典型态度和活动	科学家			假科学家		
	肯定	否定	任选	肯定	否定	任选
认为自己无知，因而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认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充满困难—漏洞						
通过提出和解决问题取得进展						
欢迎新的假说和方法	✓					
提出并检验新假说						
努力找出和使用规律	✓					
希望科学的统一	✓					
依靠逻辑	✓					
使用数学	✓					✓
搜集或使用数据，特别是定量数据	✓					
寻找反面例证	✓					
发明或使用客观检验方法						
通过实验或计算解决问题						
一贯依赖权威				✓		
隐瞒或歪曲不利的资料						
更新自己的知识				✓		
征求别人的批评意见					✓	
写的论文要让每个人都看得懂				✓		
容易一举成名						

由，in，的繁，邦格，其，很简，拿我国，的各个领域

学到表中一对照,没有不原形毕露的。

严金海先生认为,科学划界有两种层次的标准,即科学哲学标准和大众标准,科学哲学标准的争论如上所述由来已久,似乎也暂无定论,我们的反伪科学却要现实服务。因为正如 1994 年 1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所指出的:“一些迷信,愚昧活动日渐泛滥,反科学、伪科学的活动频频发生,令人触目惊心。”^[30]我们就不能等划界问题学术结论作出来后才去反击伪科学。这就使大众标准十分重要。所谓大众标准,是学术界和大众能基本接受的、具有较高实用性的标准。我们在专业报刊上找到许多这方面的文章。前面所说的龚育之先生的以毒害断真伪的观点,用的就是大众标准。

据我理解,伪科学具有不列特征:

第一,研究者一般是不学无术者或跨学术表态者。

第二,伪科学研究的是非常规问题,是怪问题。其中好多是真正的科学家从未设想的可笑的问题:如气功外气,超常感知,灵魂学,把场理论滥用,飞碟,水变油等。

第三,伪科学理论害怕批评,伪科学技术拒绝检验。如果说伪科学也曾标榜过自己经得起检验的话,那不过是“眼见为实”一类的表演和魔术罢了。伪科学急了就不给你玩,说“信则有,不信则无”,这种信仰准则本身就是非科学的提法。

第四,伪科学不遵守基本的科学准则:检验,则有助手在场,违反“双盲原则”;鉴定,则请自己信任的人或外行,违反公正原则;“成果”不肯公开,违反科学无私利性原则;他们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在自己创办的报刊上或者出书,而不在同学科公认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以接受学术界的评议,违反学术的合理怀疑原则。他们的成果一般是前无古人的,不需要任何已有的科学原理作基础,也不会对其他学术研究产生指导作用,是孤家寡人,空中楼阁。

第五,伪科学的终极目的是名利。许多伪科学代表人物已是名利双收了,如严新、张宏堡、张宝胜、柯云路全都发家了。中国元极功领导人张志祥,获得过湖北省鄂州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的政治待遇。李洪志要进全国政协未成,却敢掀起上万人静坐中南海的运动,气焰嚣张。

以上,也算是一种大众标准吧。

关于划界的最后的一个问题是:“谁来划界?”陈健把它作为科学哲学的“元问题”,并认为:“划界的主体应该是个集合,它包括科学家、哲学家、政治家,以及各类

其他社会成员。“我认为,这种集合各界的折中主义是行不通的。你无法想像这四种类型的人在一起能得到一致的意见,假如所评判的是一个有争议的伪科学实例的话。而且,让政治家和社会各界来给科学划界也是没有道理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也需要限制,哲学家必须是科学哲学家,科学家必须是本专业或较为熟悉本专业的科学家。试想,一个唯心主义的哲学家能不把灵学当科学吗?至于懂行的科学家,甚至大科学家乱表态支持伪科学的事,在我国已有教训了。

由法院裁定科学官司,遇到科学取证和科学是非评判时,也只能由原被告双方认可的科学界人士来取证评判。相反的例子是邱氏鼠药案一审科学家败诉,引起了科学界的愤怒。

第五节 伪科学社会基础

作为反科学思潮和社会化现象,伪科学的存亡消长,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社会心理基础。科学精神的失落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困境,是伪科学产生的历史原因;东方神秘主义是伪科学产生的文化基础;从众、胁从、轻信盲从、猎奇和逆反心理是伪科学存在的心理基础;法律滞后和社会腐败是伪科学流行的社会制度基础。

一、科学精神的迷失和人文精神的困惑是伪科学产生的历史原因。

科学精神是指科学共同体从事科学研究活动所遵循的精神价值和道德规范。理性的精神、批判的精神、创造的精神和实践的精神和感情中立的原则,被称为基本的科学精神。龚育之先生曾对科学精神作过如不阐述:在长期的科学发展中形成优良的种种科学精神,包括“尊重事实、尊重真理、反对迷信、反对盲从的精神”,“善于革新、善于创造、反对因循、反对守旧的精神”,“在科学研究中孜孜不息、锲而不舍、自甘寂寞、自甘淡泊、不求富贵、不求闻达,把精力倾心在事业上,而不是花费在享乐上的精神”,“意识到自己从事的科学工作对于社会、对于人类的责任,积极地参加反对侵略、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维护人道、保护环境、保护生态的斗争的精神”。^[31]龚育之先生关于科学精神的论述,已经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紧密结合起来。

科学精神的迷失和人文精神的淡泊,是伪科学产生的历史原因。科学精神归根到底是理性的批判精神,这种精神在历史上曾与科学的兴衰相一致。如果说我

们曾经有过自春秋战国到汉唐的两次科学兴旺时期——这两个时期分两步把我国的科学技术推向世界科技高峰——的话,那么,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与之相适应的勇于探索、崇尚理性的科学精神。但是,研究中国科学史的英国学者李约瑟惊奇地发现:科学技术发达的文明古国——中国,没有能率先进入现代文明,这是什么原因呢?如果说北宋初期,我国尚有沈括等在当时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家的话,那么,自此以后中国在上世界上排得上座的科学家就寥若晨星了。我们应该从科学之外去探究,比如政治和思想界的情况,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如果我们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汉唐的“升平盛世”对科学的昌明具有某种关联的话,那么,在思想界推崇的“尊孔读经,八股取士”的程朱理学对思想的禁锢,应该是北宋以降科学停滞的主要原因。事实正是如此,在一个没有自由气氛的国度里,科学精神的沦丧是自然而然的。人们坐在“三纲五常”的“理学”圈子里尊孔读经,以求“八股取士”,哪有心思研究科学呢?相反的例证是,自宋以来堪称巨匠的李时珍,正是一位仕途不顺,屡试不第而放弃做官的奢望转而从医的不合时宜的人。这种情形延续到了近代。这使我们在牛顿、达尔文成功的年代里却无所建树,等到近代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我们的国门后,我们才从破碎的窗棂间闻到了一丝充满着原是我国发明的火药的气味的现代科学的西风。这段残酷的历史使我们看到了我们随着科学落伍而丢弃了科学的精神,取而代之的是因循守旧、迷信盲从的传统文化的禁锢。阴沉幽暗的四合院,是神秘文化和蒙昧主义的渊薮。

在人文研究上长期落后于社会需要现状,也是伪科学得以风行的原因。哲学研究落后,不仅直接影响到人文科学研究的整体状况,甚至制约着自然科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早期的人类常常借助宗教诱发对自然宇宙和生命意义的幽思,在幻想神灵保佑、超然度世的同时,一步步发展着科学。宗教、哲学和科学成为人类整体思维中各不相同却又密切相关的思维方式。在一个宗教不发达、哲学研究滞后的国度里,一些哲学和宗教的研究课题,一齐涌向了有耀眼光环的科学领域,于是伪科学就大量涌现了。比如神灵、生命、信仰、前途命运、宇宙意义等问题,被借用科学术语,从宗教和哲学领域转移到了科学领域,于是伪气功、特异功能和所谓“人体科学”便粉墨登场了。

五四运动开始我们打倒了孔家店,却没有真正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这样,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具有国家宗教意义的传统哲学不得不在位于多种主义、多种思潮的“对立互动”,一个世纪性的文化断层大势就这样形成了。与此同时的政

权转移疏忽了具有国家宗教意义的文化的传承和建设。传统文化的感召力突然地失去,使社会变得无所适从而动荡不安。砸碎旧文化建设新文化成为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而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政权和军事的实力较量。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文精神的迷失成为必然,人们思想的随意性如萍随水,人们对于君主专制式的随意政治麻木不仁,在一个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了是非曲直,有的只是站在这边与那边的抓阄式的取向。而且这种“麻木”一旦成为性格,人们便会产生一种浮躁和空虚。此时如有特异功能或“法轮功”一类的群众运动,即可显现“乱者四应”的荒唐局面。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伪科学的出现不是巫术和迷信的简单重现,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自宋以来我国对科学不利的思想环境造成了科学精神的迷失,而五四以来我们传统文化的断层又造成大众在人文精神上的迷惘,伪科学适时地成为文化断层中的填充物之一并且在人文精神缺失的人那里得到了承认。

在培养人文和科学精神方面,教育的作用是巨大的,然而,现行的教育没有很好地担负起这个责任,建国以来的教育,我们几经改革,结果是越来越向分割、封闭的小学科方向发展,学校教育使教育者的知识因专业化而脆弱。当伪科学超出我们所学专业的知识范围的时候,当伪科学以人文知识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面目出现的时候,我们的专家、我们的硕士或博士却无法辨别。从在极左思潮、伪科学、拜金主义面前,我们的大学生显示出的麻木或盲目,可以看到我们这一代人文的精神的迷失和人格自尊的脆弱。

二、神秘主义是伪科学的文化基础。

神秘主义既是一种宗教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又是一个伪科学品种。作为宗教的世界观,它主张人和神或超自然之间的直接交往,并能从这种交往中领悟到宇宙的秘密。

东方神秘主义生发的几个直系品牌,如气功外气,特异功能,瑜伽修炼,是直接的伪科学品种。与此同时,东方神秘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它对我国古代哲学、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发生过深远影响。神秘主义宣扬的神秘关联造成了人们思维偏激、重感性不重理性的缺点。在实际中往往造成对科学的过高期望和科学主义。

科学的本质是理性的。但神秘主义摒弃理性宣扬感性和神秘关联。这使人们希望在科学上获得最直接的最终极的成果。在医学界人类的顽疾尚有医疗死角,但伪科学则相信有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有些神医专治癫痫,白癜风,牛皮癣等现

代医学尚难解决的顽症。气功治病更是神乎其神,不用检查和打针吃药。将医学神秘主义发展到极致的是骗子胡万林,他仅凭一味砒硝水医治百病,并称为运动疗法,在实用技术方面,水变油技术,频谱治疗技术和对绝大多数恶性肿瘤的特效疗法等等,均带有明显的神秘主义色彩。

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科学的进步是一个过程,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而神秘主义宣扬的神秘联系,那些在科学上的突变式的发明创造,无缘由的巨大成果,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违反科学精神的。神秘主义的繁荣根源在于社会科学水平的低下。由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组成的科学,在大众中的普及状况令人担忧,甚至我们可以看到政治界、科学界的人士也缺少起码的科学精神,他们喜欢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作错误的表态,他们被表演性质的特异功能蒙骗而不自知却反而以“眼见为实”来推销伪科学,成为伪科学的胁从者和吹鼓手。我们有**60%**的大众在“相信命运”问题上持肯定或犹豫的态度,有**57%**的大众对算命占卜有兴趣。这样的现实怎不令人担忧。科学方法的缺乏使我们在一些简单的是非上扯来扯去,把科学常识当作难题来争论。对于“永动机”一类违反常识的研究,仍然引得起许多研究者的兴趣。“COT”制冷新技术在给美国一家公司寄去资料时,人家回电说“根本不可能”,而就是这种根本不可有的东西,在国内诈骗合作资金频频得手。老龄问题是我国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世纪之交,我国**65岁**以上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7%**,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在老龄化社会里,对于江湖骗子鼓吹的“不老术”,许多人“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表现出一种莫大的兴趣。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养生延年,正成为大众的普遍愿望。在一些群体事件中,更容易摆老资格,情绪激动,且有时间和精力的是些老年人。何况我国的老年人中,文盲和科盲数量巨大。1996年,沈昌状告《工人报》侵害名誉权案在北京东城区法院开庭审理前,10月10日一早,有一千六七百沈昌拥护者把法院门前围得水泄不通,这些人大多数在**60岁**以上。

三、从众、胁从、轻信盲从、猎奇和逆反心理,是伪科学的心理基础。

伪科学不管如何伪装,都有破绽可找,因此,伪科学的流行并不意味着伪科学有多么完美,而在于受众具有许多可资利用的人性的弱点。一般情况下,如果按照科学规范认真考察,我们就能认识大多数伪科学,只有少数的伪科学可以蒙蔽人,也只有少数人会被蒙蔽。然而,有时伪科学可以出现阵发性传播浪潮,如胡万林在陕西终南山医院时,每天有数百人前往就治。又如水变油在全国骗取一百多个企

业的数亿元资金。形成这种阵发性传播浪潮的原因是受众的从众心理使然。

从众心理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心理现象,它是指人们以某种群体规范或多数人意见为准则而做出社会判断,改变个人态度的社会心理现象。由于伪科学接受者对伪科学声称的科学研究大多是外行,无法判断真伪,由于伪科学接受者大多文化水平不高,缺乏判断真伪的知识水平,所以,他们只能以从众这种概率论原则来判断真伪,做出取舍。在“特异功能”问题争论时,安徽繁昌科委的袁一志撰文说,“已有人说,如果‘超知觉’有伪,为何肯定者及其文章会远多于否定者文章?”^[32]这样发问,就是从众心理的体现。1980年,当“特异功能”刚刚兴起的时候,肯定“特异功能”的人和报刊也认识到了从众心理的作用,于是,《自然杂志》就采取连发九篇肯定“超感官知觉”的文章的方式向读者进行集束式轰炸。与此同时,大量的否定意见被扣发,上不了报刊。袁一志说,他就有四篇肯定性文章,想参加辩论,却始终不为某报所容。

从众心理中有一个权威效应问题,即权威的态度就被认为是大众的态度。所以,在特异功能问题上,像著名科学家的表态,就能起到重要作用。在苏联的李森科事件也有权威效应问题存在。伪科学家,伪科学组织,新闻媒介和社会权威人物均有权权威益。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心态是:报纸、电视上都宣传了的,还能有假?一些伪科学家和伪科学产品千方百计上新闻媒体,就是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以便取信于民,欺骗天下。

在伪科学欺诈中,还普遍存在被骗者助从欺骗的情况。助从的心理是很复杂的。有些助从者走火入魔,真心推广伪科学,如一些伪气功练习者帮助发展练功者。有些人自己上当了,觉得面子上过不去,或者经济上有损失,于是以助从的方式来挽回损失或面子。一些“法轮功”练习者不愿承认错误,甚至帮助发展“法轮功”弟子就有这种情况。“发明”水变油的王洪成骗了一些企业后,那些企业为了挽回损失,竟然不承认“水变油”是伪科学,其中有的就是希望王洪成继续去骗别的企业,把新骗来的钱拿来弥补自己的损失。王洪成因涉嫌诈骗三次入狱,前两次都被被骗企业保释出来了。因为假如王洪成坐牢了,他们的投入就一分也收不回,全部泡汤了。陆祖荫,因帮助证实严新 2000 公里外发功改变了激光偏振面而成为严新的得力助手,与严新“长期合作”。

和助从相似的是归顺心理。归顺是想借他人之力,扬己之威,面对权威,放弃疑问而选择服从。有一种现象是自己上当了,却害怕被别人视为无知,进而主动归

顺。

轻信和盲从也是一种大众心理。轻信是一种社会知觉,是建立在错觉基础上的对人对的一种态度。其特点是不怀疑他人并过于相信他人。信任他人是人际交往的基本要求,也是一个人自信的表现。信任他人,才能使交往继续下去,然而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信任他人需有个限度。无故不信任他人和无故全信他人都是不对的。过于相信他人,往往是缺乏正确思维能力的表现。1979年起发生的“耳朵识字”等超感知“特异功能”,有许多记者现场观看了后就认为是真的,于是发表文章宣传报道“特异功能”,他们不曾想一些小小年纪的“特异功能”人也在大人面前玩魔术,变戏法,经验主义使这些作者陷入了“轻信”的思维误区。盲从也是一种轻信,是人们在轻信思维误区下的行动。盲从和轻信同样纵容了伪科学。许多“法轮功”或其他气功的修炼者就是盲从的结果。

猎奇和逆反心理也是受骗心理之一,逆反心理指人们对客观事物表现出与一般人对立或相反的情绪体验或行为倾向,它表现为偏激、攻击和独立意向,反抗权威、拒绝服从等。偏执是许多学者的心理状态,因为科学的创造离不开批判。人们对批判精神的赞许反过来又助长了学者的偏执心志。逆向的反常的思维给了许多人以成功的机会,但偏执同时又使许多人走进了学术的死胡同。许多在某一领域成绩斐然的科学家,在另一领域却又顽固地坚持了伪科学观点。他们不自知,或即使自知也不认错,这就是偏执的表现。逆反心理是由人类心理活动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决定的。它受好奇心驱使而形成。好奇心就是猎奇的心理,它是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欲望决定的。猎奇心如果受到邪欲的诱惑,就会产生消极结果,而伪科学总是千方百计制造邪欲诱人上钩。比如,“水变油”制造了高额利润的邪欲引诱企业家,而气功外气则宣称可治百病,免除人们的痛苦。伪科学宣传具有强大的诱惑力,它包括(1)将其“发明创造”渲染成最新颖的、首创的和闻所未闻的。(2)是现有科学无法解释的事物,是超自然的。(3)从古代神话中,史料记载或大众媒介中寻找证据,并当成真实事件报道。(4)依靠数量有限的例证来证明其有效性。(5)将自己描绘成正统的一部分。(6)不在公认的科学理论体系范围内解释自己的“科技成果”,或只用情景描述来作为其理论依据。种种美丽的宣传中,有许多就具有强大的诱惑力。

四、法律滞后和社会腐败是伪科学流行的社会制度基础。

我们应该看到,伪科学风行,应有科学自身的原因。欺骗的诱惑往往来自科学

的职业性。因为科学制度推崇著书立说、大笔的科研经费以及各种各样的奖赏。有利可图使非科学冒充科学从中渔利。欺骗之所以往往畅行无阻是因为科学界的那种自我制定政策的体系过于松散,以及科学界中有些人不习惯把功绩和创意归于同行。威廉·布罗德和尼古拉斯·韦德在《真理的叛徒——科学殿堂中的欺诈和蒙骗》一书中分析说:“为自私的目的伪造数据的作法是现代科学固有的病证。”有些科学家认为在专业领域撒谎被戳穿的概率极小,因此他们不断地编造统计数字和实验结果。科学作假的产品,就是假的科学成果,亦即伪科学成果,是伪科学的一个品种。科学造假的直接的目的往往是出名、晋升和获得科研经费,是一种科学系统内部的腐败。它是社会腐败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伪科学研究中,拉帮结派,逢迎上司,庇护同事、好友和属下,是另一种腐败形式。从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报道唐雨用耳认字到1982年2月25日李昌、于光远在《人民日报》上著文批判“特异功能”,其间特异功能宣传者和反对者的论争几起几伏。宣传者在1979年5月5日祖甲《从“以鼻嗅文”到“用耳认字”》一文和5月18日叶圣陶《关于耳朵听字的新闻报道》发表后,作过一些检讨。但是,随后而起的肯定派又作了许多验证性工作,更进一步证明特异功能的存在。在整个过程中,一些报刊形成合力统一口径集体作弊。

司法腐败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在一些涉及伪科学的官司中,法院视科学事实于不顾,使反伪科学一方屡屡败诉,从而助长了伪科学的气焰。一位党报读者因在新华社“内参”上揭露了一个自称“地藏王菩萨转世”的江湖骗子而被推上被告席。法院于1988年受理案件,1989年立案,1993年一审判决被告败诉,1998年终审支持原判。1999年法院还一再宣称要“强制执行”。至4月25日,“法轮功”信徒围聚中南海,党和政府的态度预示了形势的发展趋势后,此案才不了了之。^[33]被柯云路吹捧的“当代华佗”胡万林,本是一个在新疆服刑的犯人,作为在押犯,他居然能收治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出狱后,他的骗迹所至,当地政府或者有关行政部门居然一路绿灯。他是四川人,出狱后却持有长春的身份证,他到山西、陕西、河南行医,得到了当地的大力支持。这其中透出的问题,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司法和行政腐败。

伪科学家千方百计地拉拢、腐蚀干部和专家,把他们作为自己的保护伞。邪教头子李洪志就曾得到某些离休干部的支持。《天怒》和《都市危情》作者、作家陈放说,他曾有机会参加一次张宏堡发功会,到会的大约200人中,大部分是厅局级干

部,其中有近 20 人是副部级,处级以下干部是不能参加的。面对这些高级干部,张宏堡说:“我就是你们的父亲,你们必须像儿子一样尊敬我,如果你们不这样做,马王灾难就降到你们头上。”^[34]对这种侮辱人格的刺激性语言,会场上没有一个站出来反对。

法律滞后是伪科学流行的重要社会原因。伪科学冒用科学的名义行骗,利用政策的漏洞争名夺利,而法律,往往无能为力。

我们没有健全的专利制度,对于声称在实用技术领域有突破性进展的伪科学,我们无法鉴定。试想,如果新产品的宣传和销售,新技术的转让必须以专利证为前提,那么,像周林频谱仪这样的产品能上市吗?像水变油这样的技术能转让吗?名闻全国的周林频谱仪,实际上是人们熟知的普通红外线治疗仪。周林公司为了提高其科技含量和广告感召力,做了两件事:一是在中国发明协会盖了一个公章,二是搞到一个科技鉴定书。事后中国发明协会声称,盖在《周林频谱仪有关问题调查报告》上的公章是中国发明协会的个别同志在未经主持协会日常工作的协会领导签字同意的情况下,违犯协会办事程序盖上去的,并称此报告的公开发表不代表中国发明协会。1995年4月28日《中国消费者报》曾披露周林频谱仪的科技鉴定证明书是伪造的。这说明,专利鉴定对于科技新产品是十分重要的,周林公司的作假也说明他们看到了这一点。不过事有蹊跷,《中国消费者报》在前文刊登几天后,又在报上发表了与前文意见相反的文章。个中的猫腻,有谁知道呢?没有严肃的专利和科技鉴定,商家在报刊上宣传与反宣传就可以是玩家家一样,爱咋说就咋说,没有谁可以作公证人,老百姓信谁?即使将两种不同意见“争鸣”于报刊上,对老百姓也有负诱导,何况我们的报纸在登载广告时并没有也不可能充当公正的鉴定人。报纸的第一要义是收取客商的广告费,至于那些夸夸其谈的广告(有悖新闻在此例)对老百姓的误导有多大,他们是不管的。

这几年药品在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比重越来越大了,1999年以前有个三株口服液“祝您身体健康”,听了这个祝福如同有人强喂一只据说可以保健的苍蝇给我一样令人难受。科学家已确证三株菌在常温下只有短暂的存活期,从济南公司运往全国各地的三株口服液中已不存在有益的活菌,老百姓花钱买的是一瓶糖水。知道了这一点,心中不免难受。我干吗要你用假冒伪劣来祝福我。三株公司产品搞到的是一个保健品的批文,而他们在全国大打的是疗效广告。当然,现在三株的广告及其产品已经退出市场,也没什么必要打落水狗了,不过在无法制约约束的环

境,难保下一个假冒伪劣不会堂皇登场。

补血制品广告是不是应该说明遵医嘱服用呢?因为广告在轰炸我们,说是再贫不能贫血。农村的电线杆上一个一张“红桃 K”广告,还说喝了“红桃 K”,干活不觉得累,这是一种误导的虚假广告,应该有法来管一管,然而这种夸张性语言在许多药品广告中都存在。“红桃 K”的科技含量很高,品牌价值也很高,但一经广告公司策划,就变了些味,说“再贫不能贫血”,于是人们想通了,应该买。2000年的钙片广告在中央电视台太出风头,而我们身边已有人把钙当灵丹妙药,用以医疗百病了。这一方面说明我们在伪科学的文化基础中谈到的全民科学素质问题确实令人担忧,另一方面有“文化素质”的广告也在误导我们。我们难得听到相反的声音,传媒间或也说几句并非补钙越多越好的良心话,但这样的声音很少。

这里还涉及科学评价问题。科学研究的同行评议制度不健全,就很容易出伪科学成果。科学成果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接受评议,即在科学专业杂志上公开发表,科学会议交流和科学同行的私下交流。通过这些途径,科学成果方可得到承认。但是伪科学往往没有接受评议的勇气和机会。他们甚至达不到上专业杂志的水平,于是只好在自办报刊、自出书籍中自我标榜,自我宣传,或者花钱在报刊上买版面,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公布所谓科研成果。这种作法是没有法制的表现。新闻媒介在宣传伪科学中的作用不可小觑,其原因就在新闻媒介没有法律约束。出版部门也是一样,柯云路写了那么多伪科学书籍,包括宣传邪医胡万林的《发现黄帝内经》在内,不止一家出版社为其出版。瑞士籍德国新闻工作者埃利希·冯·丹尼肯的《众神之车》是一本典型的伪考古学书籍,这种书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就很臭,80年代引入我国后,产生了很坏的影响,然而,我们的法律却没有办法制裁甚至仅仅限制出版者。199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又把《众神之车》改名《回忆未来》出版,而且这次还不止一本,而是两辑共十本。新闻出版界不能自律,法律又有太多的空白点,所以谁畅销就卖谁,不管是天使还是魔鬼。如果说我们并不敢奢望报刊书籍为我们设一道伪科学的防线的话,那么,总不至于连他们不要成为帮凶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吧。而事实却是残酷的。

第六节 伪科学处置

伪科学的危害是极大的。科学家在反伪过程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因

此,为了缩小打击面,科学家一再声称“我们反对的是危害社会”的伪科学,而对不危害社会的伪科学可以任其发展。这其实是科学打伪的一种无奈,实际上没有危害的伪科学是没有的,有的只是危害大小有别,或者有现实的危害与潜在的危害、显性的危害与隐性的危害之分。比如研制永动机,就算一个人门关起来研究,它实际上也不是毫无危害的。只是对于这一种伪科学,我们不必太动干戈去反对它打击它。这就出现了如何处置不同伪科学的问题。

伪科学的处置分两个层次,一是道德教化的层次,一是法律规避和打击的层次。

伪科学的道德教化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针对科学家、政治家的。许多伪科学的背景上,都留不我们科学家的踪影,他们或参与研究或表态或支持。这个问题是有教训的,为什么我们的反伪工作十分艰难,与这一层原因是分不开的。一些科学家或政界人物,在一些他们并不在行的问题上给予了支持和关注,也许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不妥。因为科学家隔了行,也就成了外行。科学家如果没有自知之明,过于自负,那就容易表错态,看错问题,滑向伪科学的轨道。另一种情况是科学家受了蒙蔽而不自知。受了蒙蔽觉醒后决裂的,可以从此走向科学。发觉受蒙蔽后,自己已走得太远,虚荣心使其不承认错误,从而成为伪科学的胁从者,这种心理在前节我们已经分析过。这种人的危害也是相当大的。一些至今仍在进行“特异功能存在性研究”的科学家中,应有明知自己蒙蔽而不承认、进而成为胁从的。这就存在对科学家的道德教化的问题。

对于科学家,道德教化是要他们真正树立科学精神。科学工作者不一定都有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包括科学道德、或曰科学良心在内。病态科学家就是科学精神缺乏者,他们容易走死胡同、钻牛角尖。而科学造假者则明显缺乏科学良心。科学家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它包括普遍性行为规范,公有性行为规范,有条理的怀疑性行为规范和无私性行为规范等。但科学界并非一块净土,科学作伪作为伪科学的一种表现,在科学界已非个别现象。据报道,有人统计从1980年1月到1991年1月12年间,英国的Nature和美国的Science两种杂志上就载过226篇披露科学作伪的文章。布劳德等人估计,20世纪科学舞台上,只要有一起大的作伪案被揭露,就会有100多起类似的作弊者逍遥法外,还会有1000多起作小弊者得逞。原淮北煤矿师院的一位教师自1990年起发表的论文,经查全系国外论文的抄袭。不仅如此,他还捏造在国外发表论文23篇的事实。他以这种成就骗取了一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项目。在国外,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密立根为驳倒奥地利物理学家埃伦哈夫的“存在非整数电荷”一说,特意从 140 次观测结果中精心挑选 53 次对自己有利的数据加以发表,以此证明“只存在整数电荷”的观点。在美国,一位名叫萨默林的免疫学者,声称自己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已经解决了异体组织移植的免疫排斥问题。他说,他能够把老鼠的黑色皮毛移植到小白鼠身上,使小白鼠变成“黑白花”。萨默林的成果意味着将来可能成功地移植人体器官,使那些因器官损坏而难以治愈的患者获得新生,因而轰动了科学界。但是,好景不长,不久人们就发现萨默林实验的白鼠身上的黑毛褪色了,原来它是用颜料涂染的。这一事件被称为美国科学界的“水门事件”,出尽了科学的丑。

研究者已经证明,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剽窃和伪造科学成果是很容易的事情,《英国医学杂志》承认,在数以千计的已有杂志中,要检查一篇论文过去是否发表过,几乎是不可能的。彼特斯等人曾做过试验,他们把 10 篇已发表过的心理学论文改掉作者姓名和单位投寄给两年前发表过这些论文的杂志,结果只有 3 篇被杂志社发现了问题。在科研成果发布的管理监督的不可控前提下,科学作伪是很容易的。

只有道德教化可以控制这种科学道德沦丧事件的恶性发生。科学精神,科学良知比科学能力更重要。龚育之先生曾指出,科学精神应包括“自甘寂寞,自甘淡泊,不求富贵,不求闻达,把精力倾注在事业上,而不是花费在享乐上”^[35]的精神。

对于信奉伪科学者,也存在道德教化的问题。江泽民同志在 2000 年 6 月 5 日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有的领导干部不学习科技知识,或者看了也是装装门面,并没有用科学精神武装自己,反而热衷于封建迷信的东西,烧香拜佛,求签问卜,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这样的人,还配当共产党员吗?还配做领导干部吗?对这样的一些领导干部,有关部门要加强教育,并责令其改正,坚持不改的,要批评和处理。”^[36]据我理解,这里所指的“批评”“教育”,就含有道德教化的意思。对待党员干部如此,对待一般群众也应该“批评”“教育”。

伪科学处置的第二种方法是法律处置。但是,我们很遗憾地看到,处置伪科学的法律的现状是空白多、法律处置的案例失败的多。健全反伪科学的法制成为专家和学者的强烈呼吁,而由来已久的司法腐败在处理伪科学案件时显得比其他任何案件都更充分,更典型。

1992 年 4 月,为保护生态环境和人畜安全,科学工作者赵桂芝、马勇、汪诚信、

邓址、刘学彦联名写成《呼吁新闻媒介要科学宣传灭鼠》的文章,认为邱氏鼠药中含有国家明令禁用的剧毒农药氟乙酰胺。同年8月邱满国以五位科学家损害他的名誉权为由向法院起诉。1993年12月,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一审判五位科学家败诉,此事成为1994年中国十大科技新闻,也是反伪科学第一案。科学家的败诉震惊了科学界,汪诚信等人说:“这不是个人的耻辱,而是科学的悲剧。”虽然此案可能正是在何祚庥等众多科学家的强烈呼吁的压力下,北京市中级法院终审判科学家胜诉的,但作为反伪科学个案,在科学是非的判断问题上的处理方法,仍然发人深省。邱氏鼠药案的关键物证是“邱氏鼠药”中是否含有氟乙酰胺。被告方送交的证据是法定权威机构“国家农药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北京、沈阳各一家)、“公安部二所”、“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北京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作的检验,这些检验均测出邱氏鼠药含有氟乙酰胺或代谢物。但一审法院使用的证据却是委托华夏物证鉴定中心作的。该中心主任王敬尊教授参与了检测,检测中未发现氟乙酰胺或代谢物。但王敬尊教授说,他们只对样品负责,“至于样品,由于不是我直接取的,我不能说更多的话”。一审法院采用的就是这个物证,因而科学家败诉了。

1993年是科技界的多事之秋,此前此后“W型超浅水船”案,“保险王”案和“水变油”案接连不断,引起了世人的瞩目。

W型超浅水船是福建省船舶技术研究所周锦宇发明的。该发明宣称是“世界发明之最”,其“W型超浅水船”“宣告了100多年来船舶尾推进方式的结束”,说是只要将船的推进器(螺旋桨)的位置从船尾挪到船腹部,“船速可以提高2~3倍,节能40%以上”,所“设计的快艇,将比海湾战争法国的反潜驱逐舰装备的鱼雷每小时快16公里”。上述种种违反科学原理的宣传,既没有任何科学试验作依据,也没有任何一项生产实践作印证,因此,武汉交通科技大学的周俊麟教授等在报上著文指出周锦宇是“技术骗子”。周锦宇据此向武汉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称周俊麟等侵害了其名誉权。1993年8月,武汉中院判处被告败诉,1994年8月,湖北省高院终审维持原判。

1993年12月28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就长沙环达科技有限公司诉《电子报》社对其产品“保险王”名誉权官司做出一审判决,《电子报》社败诉。

1993年3月25日,原国家物质部燃料司副司长严谷良在新华社“内参”上发表了《应该用事实澄清“水变油”真相》一文,4月20日,王洪成以严谷良的文章侵害其

名誉权为由,向法院起诉。7月15日,西城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王洪成的起诉,王不服。上诉至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94年3月2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王的上诉。1993年起,韩成刚发表一系列有关“矿泉壶”的文章,披露事实真相,批评四家矿泉壶企业违法广告和虚假宣传。1994年8月30日韩成刚被人工矿泉水器具专业委员会告上法庭。一审韩成刚败诉。1996年6月28日,山西省高院终审判决韩成刚胜诉。

以上案件的审理结果,令事实上掌握着真理的科学界汗颜。其中韩成刚虽然最终于三年后胜诉,但他为此破财、费力,已是一个失败的“胜利者”。长沙“保险王”的真伪直到1997年1月24日中国专利局复审委员会正式决定宣告91220640号(即“保险王”专利号)实用新型专利权无效时才见分晓,然而此时《电子报》社早已花去了57万余元的赔款和40多万元的其他费用。“保险王”专利无效并不意味着对“保险王”官司的翻案。“W型超浅水船”的官司自1992年至1997年共有五次判决或裁定,判决和裁定法院分布在武汉、上海、北京三地。其中武汉和上海三次判决周锦宇胜诉。……种种伪科学的胜诉记录发人深思。以“周锦宇名誉权案”为例,主审法官明确地表示法庭不过问周锦宇理论的真假,不判定科学的真伪,并且毫无事实依据地主观地将被告对原告弄虚作假、搞伪科学的揭露判定为“学术争鸣”。终审判决书上写道:“本院认为,科学技术是在不断探索、不断实践的过程中去完善。学术争鸣应当互相尊重,有理有节。”其实,法院明明知道原告周锦宇并没有什么“理论”(终审判决书中专门用括号注明:原告论文未发表),但原告声称是在1979年就创立了“向经典流体力学挑战”、“对流体力学理论有重大突破”的周氏新理论,并在媒体上大加宣传;法院也明明知道原告18年来从未造出一艘成功的“周氏超浅水船”,但原告却在多家媒体上宣称“周氏的发明”将给中国运输业带来第三次大革命,“给中国经济的繁荣带来第三次奇迹”;法院也明明知道原告是在全国的航运市场上出售“周氏专利”,而不是在进行“科学的探索和实践”,但在判决书中仍主观认为原告还可以在“不断探索”、“不断实践”的过程中“完善”他的科学技术,这样就回避了原告假理论、假发明、假成果给国家和企业造成的重大损失,把揭伪打假视为学术争鸣。其结果是揭伪者向伪科学制造者赔礼道歉,使伪科学的“名誉”得到了保护。

法院不应该不懂得一个认识论问题,那就是行为的因果关联,只对结果起诉,必然陷入孤立的、片面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周俊麟等诋毁周锦宇名誉否,应该看周

俊麟等说的是否属实。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被法院抛到一边,美其名曰不判科学是非。在一个显然是科学是非的案子中,法官不判是非却断了案,假如周锦宇确是骗子,为什么不可说“他是骗子”呢!明眼人一定认为,像这种是非自明的官司,法院意外的判决若非司法腐败,便是法律本身出了什么问题了。而这样的问题还不是个别现象。

相对地说,北京对“W型超浅水船”和“水变油”案不予受理就明智一些。至今为止我们能希望的,也不过如此。要想科学诉伪科学官司不断涌现,那是一种奢望。科学家诉伪科学吗?这其中又存在种种隐情。这些隐情包括受害者为挽回损失的私了,受害者中个别负责人在被害案中的腐败,以及受害者对于赔不起时间和精力之畏惧。这正好给伪科学技术一方以口实。周锦宇及其代理人说:“如果说我诈骗,造成了经济损失,那么为什么没有一个受害单位起诉我?”剩不只有检察院的公诉了。但事实土这样的案例是很少的。更何况,对于处置伪科学,我们的法律还是一片空白。这表现在:

第一,没有有关科技新闻侵权的法律条文,甚至连准法律的司法解释都没有。

第二,对科技新闻官司所涉及科学事实的认定,不是由科学机构而是由法官主观臆断。

为此,科学界和法律界都在呼吁健全科技法制,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尽快建立科技审判庭或科技陪审团、陪审员制度,陪审团成员可以专职和兼职结合,可聘请既有法律知识又有专业知识的科技人员参加科技类案件的审理。

第二,要严格执行现有法律,如《广告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呼吁新闻(舆论监督)法早日出台。要制订《科技进步法实施细则》,明确伪劣科技条款。在已实现的《科技进步法》第59条中规定,对科技成果申报采取欺骗手段或参加成果鉴定人员中出虚假鉴定的,可给予行政处分。但对伪劣科技还没有法律的界定和制约,所以作伪者有隙可乘。将反伪劣科技条款列入《科技进步法实施细则》,依照伪劣科技造成危害程度的不同,用行政、经济和司法手段分别处罚。对构成经济诈骗罪的,按刑法处罚。新闻单位应对不实宣传承担法律责任,造成经济损失的应进行赔偿;对一意孤行支持伪劣科技、给国家和人民财产造成严重损失的行政领导,应追究其渎职罪;对地方保护主义应依法处罚。

第三,要严格科学管理。要逐步形成系统的科技成果和科技人才的鉴别、审议

制度,科学管理人才,科学确定科研立项、鉴定、贷款、成果申报及奖励、推广制度,避免这些环节弄虚作假和偏颇不公。科技主管部门对科技立项、成果鉴定的测试单位进行资格认可。要设立伪劣科技投诉和监督机构。要建立伪劣科技鉴定机构并经常向社会公布伪劣科技信息,提醒大众注意,以防上当。各级领导不要超越科技主管部门,尤其不要在非本专业范围对科技立项、拨款、成果评价、推广和奖励上轻易表态,进行干预。科技界、新闻界、法律界应建立沟通,在科学事实和真理面前取得共识。

第七节 本书宗旨和研究方向

我们将在书中对中国伪科学的某些方面作一次梳理性陈述,这项工作应该有反伪科学界的专家或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的参与和指教。研究伪科学,必须拥有反对伪科学一方的意见和观点,更重要的,必须拥有伪科学素材。如果像特异功能、气功、UFO、神灵崇拜、各种巫术迷信等等中有大量的伪科学的话,我们对这方面的材料还是拥有得不够多。比如说中国的特异功能,即令从1979年唐雨耳朵识字那时开始的材料,就能汗牛充栋,而我们却不能甚至是不屑收集,不过,我们如果因此而不能用完全归纳法论证,我们至少可以对已有的材料发表意见。

中国伪科学有自己的特点。比如外国的伪科学以神灵学为主要表现,而中国的伪科学则更多的是那些被称为东方神秘主义的东西。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伪科学舞台上中国人出尽了风头。特异功能和气功已经走向了世界,而此时在外国则更多的是科学主义和反科学的思潮。与神创论有关的伪科学在基督教社会中盛行,而中国却比较少,这也是中国伪科学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会在中国伪科学这个题目下,多做些现代的特异功能、气功、占星术、伪技术的文章。

读者也许注意到了上文中我把气功与其他伪科学并列了。我从心底里多次试图发表气功即伪科学的看法,而我们国家的现实是许多人,包括许多有地位、有身份、有影响的人都在练气功,这就使我们犯难了。其实如果我们对现有气功作一次考察,我们就可以看出气功界的现状是令人担忧的,研究气功的权威张洪林先生也不会同意我这种看法,他心中还是有气功和伪气功两个概念。何祚庥先生在反伪科学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就有一点:他总是谨言慎行的。他强调我们反对的是那些有危害的伪科学,其策略意义在于孤立那部分我们要打击的伪科学,各个

击破。但是我执著地认为对包括气功在内的许多具体事物作认真的考察是必要。我们假定找来一种最好的气功。如太极拳,然后我们应该分析它的机理的科学含量和伪科学含量,这一问题或许写《科学划界》的陈健先生最能作,因为他有一个“模糊标准”,比如判定太极拳有八成靠近科学,两成靠近伪科学,虽然这只是个假设。我们在本书的后面要好好分析一下气功的问题,看能不能出点观点,出点成果。

对于伪科学的研究,牵涉到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方面的问题,本书以“社会学课题”立项,然而实际的研究使我更倾向于历史范畴,这种始料未及也充分表现出作者的学而下精和伪科学本身的复杂性。

我将采用归纳法的理性论证来进行我的工作。在划界问题上,读者已知我基本倾向于邦格观点,并且比邦格要大众化一些。

证伪主义是波普尔对科学哲学的贡献,它能历史地看待科学,批判地认识科学的承先启后和不断进步,这是它的合理内核。然而这个理论固执地认为可证伪性是科学的惟一特性,归纳法不能成为科学方法的观点,这就使它走进了悖论的怪圈。事实上波普尔也是以“黑天鹅”证伪“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一命题的方法进行他的工作的,他以归纳方法反对归纳方法,这是悖论。同时,波普尔认为所有的科学都是可证伪的,都可以是非科学,那么,波普尔的“证伪理论”是下是科学呢?假如“证伪理论”是科学的话,那么,这个理论也是可以被证伪的。最终也是假的,则证伪理论是一个假科学理论,它所给定的方法又是下真实的,这就是波普尔的悖论。这个悖论令波普尔很尴尬,所以,我不认为这个理论是最好的理论。但是,“证伪”作为一种方法,我将在本书中广泛采取。

真理与谬论是相对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但我们下应该因此陷入下可知论。我们对伪科学的分析就是建立在相对真理的层面上的。伪科学的一个观点是你焉知今天的谬误下是明天的真理,但是我认为,今天的谬误要变成明天的真理总是有条件的,它必须有某种征兆,它必须能解释目前其他理论解释下好的现象,而现象必须是真实的。到了这个层次上,谬误下是谬误,它叫做假说,进一步可叫科学假说。科学假说下管如何“假”,它必须遵循一些基本的科学原理,不能是空中楼阁、异想天开,这种观点,将指导我们以后对伪科学具体形态的分析。

学术中立是科学道德的基本要求。在本书中我对学术上的分歧采取尽量客观的叙述分析方法,但是对于一些明显下是学术问题的问题,或者对于“权威派”、“病

态科学”在一些常识问题上的偏执,本人将有某些不冷静的言辞,应该说它与学术中立不悖,是可以理解的。本书在伪科学源流,伪科学社会文化基础,伪科学防范,伪科学现状分析方面的研究,采取了概论形式,事实上每一个问题都可以写一本书,而我必须在二十多万字中面面俱到,这样,提纲挈领、以点概面就在所难免。其中,对于中国伪科学流派的分法、伪科学著作的批判采用了学术界既有观点,具体的分析才是本人的工作。

对于一个问题的最大遗憾莫过于全部“成果”中没有多少自己的“成果”,如果变零碎为整体,变杂陈为系统不算创造性劳动的话。可喜的是读者和学术界在这方面,尤其是在伪科学这个费力不讨好的敏感地区的工作,会给予充分的宽容。当读者看了一本关于中国伪科学的书以后,认识了我们身边的伪科学的真面目和伪装,知道了伪科学产生的原因和赖以生存的基础,进而自觉地遵循科学的原则,规避和反对伪科学,就是一本书的荣幸了。虽然这是很难的,但作者却始终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注释:

[1] (美)杰拉耳德·霍尔顿:《科学与反科学·中译本序》第8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2] 《诗经·七月》。

[3] 骆爽:《现代人批判》,中国民航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4页。

[4] 于光远:《同伪科学至少还要斗一百年》,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5] 何祚庥:《何祚庥与“法轮功”——1999年夏天的报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6] 钱兆华:《科学究竟是什么?》,《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9年第4期,第38页。

[7] (英)卡尔·皮尔逊:《科学的规范》,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

[8] 俞建章 叶舒宪:《符号:语言与艺术》,《理论学习月刊》,1990年第6期,第45页。

[9] 同[7]。

[10] 赵红州:《论反科学思潮》,《科技潮》1999年第10期,第45页。

[11] 同[10]。

[12] 同[10]。

[13] [美]卡尔·萨根:《魔鬼出没的世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页。

[14] 同[13],第296页。

[15] (英)A·N·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74页。

[16] 《世界信教人口统计》(1990):《世界宗教资料》(北京)1991.1.42,第26页。

[17] (美)杰拉耳德·霍耳顿:《科学与反科学》,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229页。

[18] (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9] 同[10],第47页。

[20] 同[17],第210,212页。

[21] 同[4],第40页。

[22] 恩格斯著,于光远等译:《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页。

[23] 同[22],第53页。

[24] 同[23]。

[25] 马利奥·邦格:《什么是假科学》,《哲学研究》,1987年第4期。

[26] 同[5],第23页。在刘乾锋主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的《无神论教育读本》代序《坚持科学的唯物论和无神论》中,龔育之说:“只要是宣传迷信,即宣传鬼神、命运、灵魂和种种超自然物质的神秘力量,不管这种宣传把自己称之为什么门类的科学,物理科学也罢,生命科学也罢,人体科学也罢,这种以‘科学’的名义进行的迷信和神秘事物的宣传只能称之为伪科学。”

[27] 宋伟、李思孟:《科学分界问题的再探讨》,《华中理工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第81页。

[28] 陈健:《科学划界——论科学与非科学及伪科学的区分》,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页。

[29] 同[28]。

[30] 潘家铮:《大力开展科普工作坚决反击伪科学》,《中国科协报》,1995年3月5日。

[31] 龔育之:《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结谷》;朱耀根《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及其回声序》,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32] 袁一志:《以耳听字,未必科学》,中国科协伪科学典型案例调查课题组:《中国异常现象研究与“三W”真相》,第48页。

[33] 张扬:《邪教的“法治”》,《科学与无神论》,2000年第4期,第24页。

[34] 张英:《司马南与〈天怒〉作者陈放:我们是一条战线的战友》,《社科新书目·阅读导刊》2000年7月8日第4版。

[35] 张小林:《科学思想是重要的精神力量——访龔育之教授》,《科学与无神论》,2000年第4期,第11页。

[36] 江泽民:《在中国科学院第十次、中国工程院第五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科学与无神论》,2000年第4期,第7页。

第二章 伪科学之源

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和神灵崇拜等原始宗教是伪科学的源头。原始宗教的哲学基础是“万物有灵”。灵魂观念来自对自然的恐惧。儒教是不甚发达的宗教，而道教方术却与巫术合流。

我们从尊祖祭祖、八卦、阴阳五行和元气论、天人合一、激纬神学等传统文化上可以找到伪科学的文化之源。

神秘主义是对原始宗教和伪科学的文化传统所涉及的内容在另一个角度上的分析。世俗迷信、宗教和巫术中充满神秘主义。

第一节 有神论和原始宗教

作为意识形态，宗教是自然和社会现象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从原始人起，人们总是试图解释与我们人类息息相关的现象。我们理解原始人的这份求知欲和他们的无知与无奈，这就要求我们以历史的眼光对待原始宗教——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和神灵崇拜等。而后，那些系统化、理论化、仪式化、专业化的宗教的产生，给人们一个对于世界的系统的看法，填补了人们的信仰空白，这些如中国传统宗教儒教、道教和外来宗教佛教等。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都只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们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形式。”^[1]

正由于宗教是虚幻不实的，它背离事物的本来面目，违背事实的客观规律，所以，一旦宗教以科学的面目出现，或者宗教向科学渗透，它就成为了伪科学。

宗教是一种有神论的世界观。神、灵魂等概念，是宗教的基本概念。我们推测，灵魂的观念在很久远的古代就有了，比如石器时代，这比通常认为的科学萌芽的青铜时代还要久远。处在母系氏族的原始人从死亡和梦寐中悟出了灵魂的观念。灵魂依附于人身，又可独立于人外。山顶洞人把山洞分为三个部分，上室住人，下室埋葬死者，地窖堆放猎物。这种分类是很科学的。考古学家在埋葬死者的

层次里,发现了撒在尸体旁的赤铁粉末以及染上了红色的石珠,带孔的牙齿和边缘钻孔的鲛鱼眼上骨,据此认为,山顶洞人已有灵魂的观念。那些赤铁矿粉呈红色,代表血液和生命,撒在尸体旁,是希冀死者的生命在另一个世界里延续。那些好看的石珠和鱼骨,正是陪葬以供死者在另一个世界消闲玩耍的。考古学界对这样的臆测没太大的分歧,则灵魂信仰的出现是在人类的蒙昧时代。

原始人认为,灵魂在人死后依然存在。因为生者梦见了死者,还能与栩栩如生的死者对话交流。原始人不会蒙昧到认为那梦境中人即是死者复生的地步,不灭的只有灵魂。

我们提到的赤铁矿和陪葬的玩具,证明了原始的灵魂观念。类似的证据还有:在仰韶文化墓葬中,死者绝大多数头向西,马家窑文化氏族墓葬中,尸体则大多数头朝东,面向北,从这些一致性里,我们料想到其中必有某种缘故。西方,那是太阳沉落的地方。作家邓贤在《流浪金三角》中说,“在金三角数以百计的华人难民区,到处都是客死他乡的中国人的坟墓。上至高层军官,下至一般士兵,大陆知青,他们的坟头全都朝向北方。”那是他们家乡的方向。也许马家窑也是这样。今天,东北鄂温克人相信人死灵魂不灭,他们让死者把生前的用具带走,并宰杀一二头马鹿,将鹿头置于祭棚上,头朝西,让死者的灵魂乘着马鹿奔赴更为美好的世界。

灵魂的归宿观念应该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计维艰的原始人也许认为灵魂所往应该有他们未曾充分享受的幸福和快乐。氏族公社时,人们则已有灵魂归于冥府、阴间之观念,灵魂在阴间的幸福与否,取决于生前的功德和威望,这样,氏族英雄和本氏族的首领就能有很好的境况,生前作孽,死后难免受罪。再后,人们便产生了转世投胎的观念。

灵魂观念与其说是对来世的美好希望,不如说是对死亡的恐惧。正如列宁所说:“恐惧创造神。”^[2]霍尔巴赫进一步指出:“人之所以恐惧,只是由于无知。”^[3]人们有理由相信,睡眠中的梦就是灵魂的游离,死亡是灵魂出窍。人们对自然无知,因而也相信统治着他们的自然力和自然界的一切。他们认为,不论是日月星辰、山川湖海,还是禽兽虫鱼、风雨雷电,都有人一样的人格意志。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梦是什么?自然由谁主宰?对于原始人来说,这些难题是无法科学的解答的。也许那些神灵观念解释的人是他们中的智者,因为这些问题超出了他们的经验范畴。他们做不出其他的解释。他们以自己为参照物,把自然人格化。

人们以人类之心,度自然之腹。人类的种种恶习和劣根,全都附会到了神灵之

上。于是人们以奴才对待主子、下级对待上级的心情阿谀和谄媚神灵,极尽讨好和笼络之能事。人们把最圣洁的牺牲供神灵享受和淫乐,为了让神吃上可口的人肉,人们奉献上少下更事的童男;为了让荒淫的神灵发泄情欲,人们奉献上年轻貌美的处女。人们相信神灵是一些强大的、自私的、专横的、易怒的君王,是一个高居于人类之上的特权阶层,它们喜怒无常,可以随心所欲,它们有成年人的威严和勇敢,又有小孩子般的幼稚善变。他们没有王法,或者他们自己就是王法。他们以毁灭人类自娱,拿杀戮无辜取乐。他们先天下之乐而乐,后天下之忧而忧。他们住人间最好的房子,吃头一顿新米饭。一顿盛宴往往也是他们先吃,留给人们以残羹剩炙。邶地的河伯要每年娶几个美女,稍不如意就发洪水逞威;宓神要有童男童女祭红,否则下出好瓷;雨神要人们跪倒在烈日下受煎熬中暑昏厥,然后才稍施甘霖;财神把投资意向偏向奸商污吏,而下以天下为公。于是,人们只能百般无奈地面对神灵作祟的现实。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我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免灾逃祸。我们的祭祀很像请客,疏通,贿赂。我们的祈祷,是许愿,哀乞。鬼神在我们是权力,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烧香、敬神、杀牲、摆供,人们以种种方式讨好鬼神,献媚鬼神或买通鬼神,因为钱能通神。因为鬼的“鬼格”卑微,见钱眼开,不讲原则,嫌贫爱富。交际官,傍大款,在钱面前没有尊严,有钱连磨也推,因而贿赂之风日盛,鬼“场”腐败在所难免。人们烧香拜神颇有选择。现在种田成本增高,谷贱伤农,谷神已受冷落;一些走出乡村的农民,与昨日的土地神揖别,在城隍之下拜起财神来了;计划生育政策之下,送子娘娘权力骤减,已威风扫地,脸上无光,恭喜也曾主管送子的观音,另有救苦救难的太任,送子下过是一个兼职。

人创造了神,然后拜倒在神的脚下。

一、自然崇拜

自然是宗教最初的、原始的对象,自然崇拜,即崇拜天地日月、雷雨风云、水火山石等具体的自然物以及相应的神灵。自然崇拜的基础是万物有灵。

由于苍天在上,凡天空之中各种崇拜物均以“天”为舞台,故天是最值得崇拜的,它至高无上。也许,这种观念延续了好久。后来,“天”就被“神化”、“人格化”了,天成了“天帝”、“天公”、“天老爷”。《墨子·明鬼下》说夏征伐各部落是“行天之罚”,可见“天”是有权威的,可以成为征伐的理由。至商,“天”已称“帝”。

天高,或有多层,由地的四角用天柱或神龟顶着。由于现实的天本是气体组

成,故高而幽远。然而那又是天帝居住的地方,令人神往。为什么令人神往?因为天空常常是美丽的,而人力不可以达到。距离产生美。要上去,须搭天梯。然而天梯的上头搁在哪里呢?如果人们能够在为什么天望不到顶、人为什么跳不上天这些问题上沉思,或许还能早些悟出宇宙星球、万有引力之类科学来。但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似乎未能取得足以骄傲的成就。呼吸是人生命的重要内容,窒息是致死的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因此,想像土地之不那种窒息的感觉,还是天上来得舒畅。

地作为一个实体在天之不,在人足不,是人类的衣食住行的源头和场所,因而,接受人类膜拜,地也当之无愧。中国古代朴实的辩证法总把地与天同列,以阴阳学说解释自然,地为阴、为坤、为母,与“阳”光普照的浩浩“乾”天相得相随。地不是神奇的,但人除了入住天然的山洞外,掘地也不不了多深去。因此,地下的情况只能靠想像。地不黑、湿、少氧,或有三层,为地不之国、冥府所在。在中国古代人的观念里,似乎没有人愿意居于地不,那是灵魂受罚的地方。地震是令人恐惧的,可见地也得罪不得。但更多时,地也是慈祥温暖的、有母亲情怀,故称地母,其神曰“社”。

古人对天上的日月各自形单影只不解。也许早先它们是成群,因为太多反不好,比如日多太热,月多太亮,晚上睡不安稳。古人怎么会知道在宇宙中,像木星那样的行星,有12个卫星连珠环绕呢?但是古人确实认为原始人的天空太阳和月亮是很多的。各民族认为天空的原太阳数是:毛南族、黔东南苗族12个,汉族10个,藏族、傈僳族、布朗族9个,此外,还有许多民族认为古时太阳是不止一个的。最终只剩一个太阳是因为多日致灾,要把多的干掉。台湾的雅美、排湾族在神话中是以杵杵掉多余的日头的。满族是善骑猎的民族,他们用套羊的方式套掉了多余的日头。其余的民族都有如汉族中的后羿那种射手,把多余的日头射不,留不那个是用来照明取暖晒谷子的。

同样,黔东南苗族、毛南族、傈僳族、布朗族、水族、高山族均以与“日”相同的观点待“月”,认为今天的月亮是经过“间苗”留不的,汉族把月亮的故事编得凄婉艳丽,并形成了以月为基准的历法。以月亮的盈虚设置历法是最直观可行的。我国沿海一些地方仍以使用“阴历”为主,因为海上交通和海上作业须掌握潮汐规律,而潮汐规律是由“阴历”显示出来的。妇女周期性的子宫出血叫“月经”,生产后休息叫“坐月子”,大约都与“月”有关。其实,这种传统的观念也许受到过“神秘数学”那样的伪科学的影响,因为妇女月经的周期并非一个月,而是二才八天左右,而把坐

一个月“月子”作为金科玉律规定下来,是神秘主义的产物。产妇因身体状况和生产季节不同,其休息期应有较大的差异。

有月的夜晚是美丽的。人们于是在节日稀少的季节里安排了一个中秋节。当然,八月中秋北半球亚热带、温带地区秋高气爽,确有一轮好月。一轮中秋朗月是最美好的日子,而最恐怖的日子是月食。“天狗食月”引起的万民恐惧在我们年幼的时候经历过,那样的日子众人敲着锅盖吆喝,生怕下这样天狗就不会吐出月亮来。历代占星术士均把“天狗食月”当作重大的凶兆。谶纬之书对此事从来不敢轻视。

日食的出现同样是凶兆,它常常使心虚的国君惶恐下己。古人怎知道这是月影遮日呢?

我们民族的月神叫望舒。这个名字从字面上解就很合理,而且美丽。

星星对应着地上的人,“地上多少人,天上多少星”被许多青年学生写进关于奶奶的故事的散文,这种人星相应的观点使关于星星的信仰丰富多彩。人的肉眼能够分辨的星星只有 4500 颗左右,在这个数字上做文章已经足够。首先把星星分成三六九等富贵卑贱种种,然后给主要的星星附上性格和故事。最明亮的而且经年移位的行星是最具有异象的。它们是金、木、水、火、土。占星术士就是根据这些行星在天宫中的特殊位置来预测个人的命运和国家治乱的。某两颗行星运行到邻近的位置,这种凶兆被称为犯冲。1999 年 8 月 18 日九大行星连同太阳、地球运行到一个特殊的“十字”形位置,引起了人们对蛊惑人心的“诺查丹玛斯预言”的关注,然而那个日子已经过去,天下却很太平。在神话中,金星叫太白,主司征战,木星则是福星,南极老人星叫寿星。各民族普遍崇拜的“三星”却指“福、禄、寿”,其中“禄”星是概念星,并非实指。一些特殊位置的恒星备受崇拜者关注。如北极星曰紫微,是帝王之相;文昌星主司人间仕禄文魁,是文曲星。《史记》、《汉书》载,东方朔(前 154 ~前 93)曾任汉武帝的文学侍从,官至太中大夫,善于辞令,诙谐滑稽。但东方朔并非凡人,他是仙,是天上的岁星。道教传说《洞冥记》说,东方朔父亲叫张夷,字少平,200 岁时仍如小儿容颜。母田氏。东方朔出生三日时母亲去世,被邻人领养。抱养时东方渐明,就姓了东方。东方朔天资神异,3 岁可谳熟天下秘藏。又曾西游到母亲生前采桑的地方,一个黄眉老头指着太白星说,那就是你母亲。另一种曾传说是:少平死后,田氏守寡。夜梦一人扑怀而孕。从此移入东方里暂住,于五月初一生子,取一日“朔”为名。朔成人后在汉武帝朝中为臣,计 18 年,死前告

诉别人说天下只有一个叫太王公的知道自己的身世。后来武帝向太王公咨询,正值太王公在观星。武帝问诸星是否都在,太王公说已18年不见岁星了。于是武帝推断东方朔就是岁星,并为他在自己身边18年而自己不知其为岁星而感叹。所以今天占星士应该认为,某人出生之日若岁星照临,这人长大后当有东方朔一样的官运和艺术素质。东方朔,就是岁星之神。北斗七星也受人崇拜,它是人们狩猎、游牧、农耕时辨识方向、计算时辰、预知气象的主要坐标。至于流星、彗星,则是盗贼和灾难之星。

天象崇拜物包括雷雨风云虹等。中国民间信仰最直接崇拜的天象,首先是雷。巨大的雷声,对人类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同时,从春到夏的雷声与生长季节的同一使人们相信是雷给大地以生机,因而,雷是起动物物苏生、主宰万物生长的神。此外,雷又是天怒的标志。《魏书·高车传》说“震霆每震则叫呼射天而弃之移去。至来岁秋,马肥,复相率候于震所,埋羊,燃火,拔刀,女巫祝说。……时有震死,……则为之祈福。”这是北方民族对雷的崇拜。时至今日,北方民族仍有雷忌,凡被雷击中住所或牲畜,家人应避走,且举行仪式以祭雷。

一些特定的雷是应予注意的,比如春天第一声雷,是希望之象征,而第一声雷打在冬末,则是下祥之兆。

与雷相随的是闪电,它们是一个事件的两个方面,在民间成为对偶神,有雷公电母之说,《山海经海内东经》说雷神是“龙身而人头”的形象,善于“鼓其腹”。而最早的龙的形象是云龙,当是闪电之形象。

风、雨、云、虹各有其神,对其崇拜的原因庶几如雷电。其中祈雨的习俗从古至今,十分普遍。

对于水、火、山、石等自然物的崇拜,也在自然崇拜之例。水神曰河公。各水自有其神,如河神、江神、湘君、龙王等。火神曰祝融。各族均有自己的火神。《史记·滑稽列传》中的西门豹治邺,是狠狠地治了一下鱼肉百姓的巫婆和官吏,这是人们信仰水神的反面例证。对于火,我感触很深的是小时父母在除夕要烧大火守岁。至晚,用柴灰埋好火塘,大年初一早起扒开火塘,红彤彤的,父母大喜,这是一年红火的预兆。当然,那年月,似乎没有一年没有饥荒。预兆不灵,但火的崇拜依然流行。

山神之太,莫过于昆仑。《山海经·西次之经》说“昆仑之丘,是实惟常之都”,为“百神之所在”。实为神山。古籍中的神山很多。《史记·秦始皇本纪》说海中有蓬

莱、方丈、瀛洲三仙山；《列子·汤问》载有蓬莱、瀛洲、岱舆、员峤、方壶五神山；《淮南子·天文训》中共工与颛顼争帝时共工怒触的是不周山，等等。每一地域都有名山，每一名山都有一位山神、土地镇守。古时皇室喜欢举行祭山封山大典，而泰山封神被视为国力强盛的象征。今天人们旅游的名山大川中，多有神山。三山五岳，我们在那里可以听到最美丽的山神故事。

石头崇拜最早应出自女娲炼五色石补天的故事。直到今天，中原神话中还流传有这样的故事。据说，玉屋山主峰天坛山不五色斑斓的石块，这是女娲补天时剩余的，称女娲石。其他地方也有盘古石、大禹岩等。今天，我们看到的蒙古人的敖包和藏族人的嘛呢石堆，就会感到石头作为自然崇拜物所具有的水恒与广泛的意义。

二、动植物崇拜

自然崇拜与中国伪科学的亲缘是那么隐晦，以至于我们会觉得我们正在叙说一些与本书无关的话题。然而正是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使现代伪科学掩盖了它幼稚而迷信的历史渊源。我们对那些现代迷信意味浓厚的伪科学品种的研究发现，正是原始的多神崇拜，使他们找到了信仰的依据，成为有本之木，有源之水。现代气功讲究与山水结合，讲究在名山大川发端，就有这样的特征。东北的张宏堡就宣称“中功”发祥于青城山；严新宣称自己的气功源自山林中神秘出现的中年人；张香玉气功崇拜宇宙；我们均可从自然崇拜中找到渊源。山泉公谷报国则讲究“辟谷”，其直接源头来自道教辟谷修炼法。在中医药典中，一些珍禽异兽，奇花怪草更是名贵中药，其中折射出中国动植物崇拜的传统。

中医认为犀牛角、羚羊角、猴头、熊掌是名贵中药，这种观点显然具有动物崇拜的印痕。至于当代已有人“研制”出了疗效神奇的“狗骨酒”，则已在伪科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不是因为狗骨与虎骨有何重大区别，恰恰相反，我认为它们的区别是微乎其微。我的这种说法虽则缺少实验分析的依据，但却是一种常识判断。虎骨入药，药典说其性微温，味辛，主治筋骨屈伸不利，游走疼痛，足膝痿弱等症。虎骨含磷酸钙、蛋白质等成分，狗骨或其他动物骨亦含这些成分，难道独有虎骨可享入药的特权？我们说狗骨之入药已更大程度地滑向了伪科学，是因为它已经开中医用奇特动物走向普通动物入药的先河，它已经赤裸裸地制造动物药用神奇，连神秘主义的遮拦也不要了。至于神化龟鳖之营养和药效之类的闹剧，在近二千年里闹得轰轰烈烈。

人之敬虎,首先在于畏虎。人们也畏熊,却又不得不猎熊。所以对虎熊这两种动物的崇拜,反映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复杂心情。对虎熊的崇拜是人类动物崇拜的缩影。至于对麒麟、腾龙、凤凰等异兽、瑞兽、神兽神禽的崇拜,则是另一个范畴的崇拜,即神灵崇拜。虎,哺乳纲,猫科。分布在北至西伯利亚,南至南亚次大陆的印度等广大的亚洲地区。虎是兽中王者,其权威来自它的武力,故如野猪、鹿、獐、羚羊等均可作它的美餐。现代研究表明,当虎出现牙病或其他原因使它有餐饮之虞时,人便是它不得已的选择。能不敬畏吗?虎区的人们成为老虎爪不冤魂的事绝非个别事件,所以汉语中关于虎的成语个个透出唬人的虎气。虎口余生,谓之幸运;虎踞龙盘谓地势险要;虎口拔牙,好大的胆;有谁敢解开虎脖子上的铃铛吗?如果有,就只有系铃铛的人。这是一个虎铃佯论!没有人敢去系。因而假设并不成立。解铃还是系铃人从原义上讲是一句机智的妙答。但是,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先是把虎的生息地间隔成独立的几片;中国的东北长白山区、西南武夷山区、华南丘陵、南亚次大陆,并衍生出不同的虎之亚种——东北虎、华南虎、孟加拉虎等。再后来,也许从五十年代末大跃进时代开始,大量的森林被用于建设和“砸锅炼铁”,华南虎就不见踪影了。虎之骨入药,皮是珍贵裘皮,人为的猎杀使它们难得“人”口余生。剩下的几只被关进动物园的铁笼里,代代繁殖和驯化不来,已是虎威不再,满可系铃了。20世纪最后一年,有报道说福建和湖南又先后发现野生华南虎的踪迹,引人关注。

崇拜老虎是有老虎出没的地方的传统。在北方民族的萨满教信仰中,虎是神圣动物,猎人不敢猎取。故猎人行猎时忌遇虎,怕冲犯了虎大王。万一不期而遇,则远远跪拜、祷告。赫哲人更有连老虎喜吃的动物也不敢猎取、免得冲犯了“山大王”的习惯。土家族人认为本族与虎有亲缘关系,故自称虎族,以虎为祖神。

与虎不同的是,人们在对待另一个敬畏动物熊时的态度是:猎取它。东北的鄂伦春、鄂温克、赫哲、达斡尔族均为猎熊族,他们既尊熊为祖父祖母、老爷子或老太太,又千方百计猎取它。这是一种十分奇特的崇拜现象,它反映出人们在自然面前的矛盾,一方面是敬畏它,尊重它,祭祀它,笼络它,一方面又不得不取食它,它是重要猎源。一切宗教的基础,均以生存为前提。没有离开生存目的无缘无故的信仰。在这一点上,崇拜熊和崇拜虎是一样的。人们为什么崇拜虎且不猎取它?说穿了是因为猎虎的危险性太大。

人们猎熊之后,就举行各种祭熊仪式告诉熊我们是误杀了你,也没有吃你的

肉,是乌鸦吃了你的肉。熊你也没死,正在安睡。我们把你的头和骨架置于树杈上用烟熏火烧,祝你的灵魂早日升天。

北方民族猎熊后还要请萨满巫师施巫术,并且整个猎熊过程中让女人走开,——不是让女人离开危险和战争,而是认为女人不吉利。甚至狩猎前夕男人也忌讳与女人同房。这种禁忌的源头也许更古老,我们不知它是妇女卑贱地位的结果,还是其他原因。但是对于巫术邪教和民间信仰忌讳中对妇女的歧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是迷信的反动。女性歧视是父系氏族社会男权政治的结果,这种陋习在民间信仰中处处得到展现。甚而至于在英国 15 世纪后半叶开始的宗教对巫术的镇压这一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事件中,受到百般虐待和无情杀戮的,都是妇女。她们中有些还未成年。在英国《女巫统治法》中规定每判决一个女巫火刑处死,参加惩治者就能得到一笔奖金。在绞刑架上,一个 17 世纪中叶的监视者承认他曾用巧妙的作弊的方法“害死过 220 多个英格兰和苏格兰妇女,每害死一个得到 20 先令。”^[4]举例说吧,英国最后判处女巫死刑的事件中,一个女人和她 9 岁的女儿被绞死。她们的罪过是用脱长筒袜的方式招惹来一场暴风雨。^[5]我把同情心投向了这些女人们。因为用从肉体上消灭的方法对待巫是主流宗教的霸道和残暴。而问题更在于这些被处死的女性,绝大多数并非真正的“巫”。

乌丙安先生《中国民间信仰》中认为:“在熊崇拜中排斥女性的种种借口,都是为了表示对熊灵的献媚。”^[6]与虎相比,熊除了力量巨大外,民间尚给予它“未卜先知”等超凡的特异功能。这是中国民间文化中,“特异功能”附会的一个例子。虎、熊之外,苍狼、白鹿、豹子、野猪、大象,小动物狐、貂、鼬、刺猬及驯化了的牛、马、羊、狗等兽类都是人们的崇拜对象。“白鹿”作为地名,寺名全国有多处。

人类对飞鸟、游鱼和昆虫的崇拜亦自古而然。在《山海经》神话中,就有“青鸟”、“凤鸟”、“凰鸟”、“鸾鸟”、“黄鸟”、“精卫”等神鸟。太阳精魂是“三足鸟”;卵生商的是“玄鸟”;盖世大鸟是“大鹏鸟”。在自然界鸟类中,鹰、鹤、天鹅、喜鹊、乌鸦、布谷,在家禽中,金鸡、白鸽等均是受人崇拜之鸟,今天在每年的清明节,云南鹤庆一带的白族都要过“祭鸟节”,将鸟类崇拜发挥得淋漓尽致。

水生动物和爬行动物中的崇拜物,以蛇、龟为最主要。今天,被人臭骂的王八鳖也挤进了受人崇拜的队伍,成为药品和营养品的代名词。

我们尚可列个长单,把蛙、蜂、蚁、蚕、蝉、蜘蛛、蝎子、蜈蚣和蝗虫加入崇拜的队伍。

而龙、凤凰、麒麟、狮、狻猊、天马、海马、獬豸、斗牛这些人类思维创造出来的神兽神禽的队伍，威风凛凛。它们与植物崇拜中的松、柏、竹、柳、槐、榕、榆、菊、兰、梅、桃、榴花和牡丹一样，光彩夺目。

当然，最受人崇拜的植物也许是山西洪洞那棵老槐树。很久很久以前，村人被官吏押解移民远方的时候，长者告诉晚辈，要记住村头的老槐树，它是我们的根。

三、神灵崇拜

中国民间神灵崇拜内涵异常丰富，它既包括对神灵、鬼灵、精灵这些幻想物的崇拜，也包括对神、仙、圣、巫这些被附会有超自然力的人物的崇拜，还包括幻想的超自然力如灵物、灵魂、偶像的崇拜。

神灵崇拜的哲学基础是万物有灵的有神论。它贯穿于迄今为止的人类全部历史。我国汉代王充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由此上溯到《淮南子》和《吕氏春秋》的年代，这些古籍中亦有大量具有无神论倾向的文章。甚至更早，《左传》就曾对巫术和卜筮作过否定，但是，有神论的势力仍然强大。这主要在于有神论是蒙昧者无知者对世界的最可能的解释，有神论无论具有如何丰富的内涵，但它对世界的描绘却是粗线条漫画式的。而且科学对世界的解释，从近代的分子分析到现代的原子分析，如今已经进入了基因解密和使用纳米技术的时代，这种精确复杂的认识，不是凭想像能得出的，因而，有神论更适应了人类的无知、幼稚和异想天开。对于命理的信奉是一种有神论的表现，它相信神主宰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1998 年底调查统计称中国公众相信算命者虽然只有 28.9%，但完全不信的也只有 33.3%，这就是说有三分之二的公众对算命有不同程度的认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公众对待民意调查这种官方组织的活动的诚实程度十分不可靠，因而，相信算命者的比重也许会更大些。

在中国神灵中，有创世神、守护神和祖神、家神等。有神论认为，世界是神创的，汉族传统中的盘古就是天地的创造者，但盘古之前似乎找不到神了。《艺文类聚》卷一引《三五历纪》说：“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开天辟地，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盘古极长。”鸡子即鸡蛋，开天辟地之初，世界为一鸡蛋，以后由盘古长大撑开，这与当代宇宙形成于大爆炸的理论有些相似，也算偶合。

守护神又叫保护神，如山神、水神、乡村的土地爷和城市的城隍神。土地神又

称社神,《说文解字》说社是“后土之神”。村寨或部落的守护神是十分重要的,这反映了人们对安全感的追求。在中国地图上我们发现云南景洪地区有许多带“勐”的地名,“勐”即山间平地,是平地上建起的村寨,或几个村寨的联合体,村寨的守护神即勐神都是一些神奇人物,他们是因保护村寨的利益而献身者,死后仍一如既往地守护村寨,活在寨人的心中。

祖神信仰是对本族祖的崇拜,而家神崇拜则是从与家庭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而来的,在家中,灶、门、井、仓、床、厕均有神,民间扶乩巫术的源头可能与厕神的传说有关,而对除夕火塘的重视,则明显与火塘神有关。厕神,俗称“坑三姑娘”、“三姑”、“戚姑”、“七姑”、“茅姑”,统称“紫姑”。对此神由来,有各种说法,南朝刘敬叔《异苑》说“世有紫姑神,古来相传是人妾,为大家所嫉,每以秽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厕间或猪栏边迎之,祝曰:‘子婿不在,曹姑亦归,小姑可出。’捉者觉重,便是神来,奠设酒果,亦觉貌辉辉有色,即跳踉不住,能占众事,卜未来蚕桑,又善射钩,好则大,恶便仰眠。”南朝时紫姑信仰已经流行,且有以其目作形这种类似偶像的东西作法器。此风到唐代时已演变为“沙箕插笔”的“扶箕”。也有说厕神原是汉高祖妃戚夫人的,为吕后害死于厕。又说武则天封之为厕神。厕神主管的好像不单是厕所之事,正月十五日从厕间请出紫姑,是为家人占卜诸事吉凶,或预卜蚕桑与子女繁育诸事。厕所信仰是巫术扶乩的源头。

中国民间神、鬼、精灵遍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事无神,无微不至。一片土地、一个屋场、一垒灶台、一台木床,均有神灵保护,怀胎生产、求医问药,亦有专神司职。家庭生活中的安危、冷暖、饥饱、生老病死,均由众家神掌握,而玉皇大帝、王母娘娘、龙王及福、禄、寿、喜、财、各地俗神,在提倡无神论的今天,仍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鬼灵有鬼帝、阎罗王、东岳大帝、地藏王等鬼王级鬼灵,鬼王属下有鬼官、鬼吏、鬼卒,如判官、孟元帅、温元帅、张太尉、城隍、灶头、马面、白无帝、黑无帝、小鬼等。再就是过世先祖形成的家鬼和非正常死亡幻化的邪鬼。

精灵是一种把活人的生魂和死人的亡魂结合起来推衍到自然万物都具有各自灵魂的信仰。如《山海经》中的许多异禽怪兽、半人半兽或半鸟的具有超凡本领者,都是古人传诵的精灵。

但是,中国民间信仰并不只崇拜那些原始状貌的大自然物或纯属幻想的超自然力,也不只崇拜那些由对人的灵魂信仰扩展开来的对祖先的崇拜,还有那些附会

以超自然力的人物的崇拜值得我们注意。包括神人、仙人、圣人、巫师等。

神人崇拜比任何其他神灵崇拜都要实在得多，因为他们有历史人物作为原形。这种崇拜不过是对历史人物功德或罪恶的夸张。这些人物也包罗万象。如思想家老子李耳；高僧十八罗汉、五百罗汉、布袋和尚（弥勒佛）、地藏王菩萨、济公、王灵官；药王孙思邈；古代名将关羽、潮神伍子胥、二郎神杨戩；有海神天妃妈祖、土地神杜拾遗（杜十姨）、陈拾遗（陈十姨）、水利神李冰父子、门神秦琼、尉迟恭、江神林毅；酒神杜康、茶神陆羽、工匠神鲁班、纺织神黄道婆、艺神柳敬亭、饼业神汉宣帝刘询、医神扁鹊、窑神舜，以及各地城隍。

仙人崇拜是受道教影响而形成对飞升为仙者的崇拜，民间广为流传的有“八仙过海”的传说。五斗米道创立者张陵也是道教推崇的仙人。其为东汉光武帝时沛国丰人，自创五斗米道，又称正一天师道，故张陵又称张天师，张道陵。和八仙相区别，民间又信奉上八仙。张天师为上八仙之一，另有禄星神、寿星神、张仙神、东方朔、陈抟、彭祖、骊山老母。下八仙有“和合二仙”、广成子、鬼谷子、李八百、刘海、麻姑和孙臆。刘海又称刘海蟾、海蟾子，或称刘操，字昭远，燕山人。刘海是做丞相时仙化的。那时有一道人自称正阳子钟离权的求见，随后索十枚鸡蛋和十个铜钱，一铜钱上置一鸡蛋，依次向上，累为宝塔。刘海大惊称险。道人说居荣禄、履忧患，则更险。遂将钱蛋分置，掰钱破半掷之，辞去。刘海从此悟道，弃官交印，将家资施舍众人，隐于华山、终南山，得道成仙。传说刘海曾化名阿保在苏州巨商贝家为仆，侍奉少主，曾携少主连夜入广州观灯，并带回鲜荔枝作证，具有特异功能。又说刘海曾汲井水得巨蟾，故民间刘海造型，一律为披发少年戏蟾形象。麻姑为女仙，传为建昌（今江西）人，修道于牟州东南姑馀山，东汉时应仙人王方平之召，降于蔡经家，与王方平共教蔡经符咒之术。自称与王方平分别 1500 余年，却貌如十八九岁的少女，有驻颜之术。称来东海三次见沧海变为桑田，可见其寿奇长。能召鬼魔，变米为珠。

寒山、拾得为唐代异僧，寒山约于唐代贞观年间在天台山寒岩修行，他当时形容憔悴，衣衫褴褛，足踏木屐，头冠桦皮，笑口常开。善讨偈，后人集得 300 余首成《寒山子诗集》。拾得原是孤儿，被高僧封干拾得。后成为寺厨，接济关照过寒山，成为莫逆之交。后成仙，民间以之为好友，故以“寒山拾得”连呼二仙，尊为“和合二仙。”寒山拾得曾居于苏州枫桥镇的古刹，此刹后称寒山寺，唐张继《枫桥夜泊》云：“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寒山拾

得清贫自乐,而步入仕途的张继来到这里,却愁思难眠,仙人与凡人的差异是明显的。

对于在世时有大德、大智、大勇的圣人的崇拜,是民间崇拜中更贴近生活真实的一种,受崇拜的圣人有远古的部落首领,如神农、伏羲、黄帝,有奴隶制国君尧、舜、禹、汤、文、武,有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孔、孟、老、庄,有三国时的吴主和武侯,有历代明君名相名将名儒名臣名士。民间圣人崇拜以儒家思想为指引,以皇朝官方为倡导,以建祠立庙为标志,以崇拜祀奉为手段,成为中国信仰的独特内容。在实际崇拜过程中,原意上的崇拜被逐步变异,一些圣人最终变成了保护神,比如,岳飞在宋代被奉为太学守土之神,道教又附会成因果报应的速报之神,甚至附会为财神、门神;屈原在明代已附会成江读保护神;关羽附会成大显神通的神人。一些遗迹,被赋予神秘色彩,如包公祠的红莲藕“无丝”,“廉井”水贪官不敢喝。这就使人看到了圣人崇拜向迷信的流变。

巫师崇拜,包括对巫术的信奉,我们在下一章还要专题阐述,因为,它是迷信的主要品种。巫师是那种自称具有超自然力的半人半神的神职人员。《说文》认为:“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巫也有男的,称覡。中国的巫从古代商时开始盛行。从周至汉 700 余年,上自宫廷,下至闾巷,事无巨细,均由巫覡掌握,遍地巫风。以后至今,巫术和行巫之风在中国就没有停顿过。虽然各朝统治者对巫风的态度不尽相同,也由于我国自五四运动追求新思想,倡导民主与科学,有力地打击了巫覡势力,但是,我们毕竟没有出现过西欧自 1484 年教皇通谕开始长达两三百年的对女巫的残酷迫害和打击。也许因为西欧的巫在行恶方面更加突出,“梦淫妖运用它们的魔力、咒语、迷人的妖法和魔术似的手法,窒息和扼杀,使得女性不能出生,以及产生许多其他灾难。”^[7]那一场灾难可以看做是那些由保持独身生活的神父所担任的宗教法官的性压抑的变态表现,这些人有很强的性欲而又厌恶女性。审判时,宗教法官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被怀疑是女巫的被告与魔鬼或妖魔性交时性高潮的持续时间和出现的次数这些问题上。根据卢道维克·辛尼斯特拉里的描述,“魔鬼的标志一般在胸部或阴部”。结果,被指控为女巫者阴毛被剃掉,并由特别安排的男法官来仔细检查其阴部。在杀害 20 岁的阿卡迪亚姑娘琼的过程中,当她的裙子被火烧着时,鲁昂的刽子手扑灭了火焰,这样围观者就能看见“一个女人身上能有的和应该有的所有秘密了。”^[8]这些被杀戮者,许多并非真正的巫,更多是因为其为女人、为弱者,好让男法官来发泄被压抑的变态的情欲,或者,

是告密者为了获得没收巫师的财产所得到的分成。

在北方,满族作为满——通古斯语族的主体民族,从远古时就崇拜萨满这种巫师。这种巫术信仰有从白令海峡到斯堪的那维亚边界的乌拉尔河、阿尔泰民族(包括拉布兰人和爱斯基摩人)的广泛信仰区域。这种被称为 Shamans 的巫或方士之术曾引起英国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重视。李约瑟在分析 Shamans 术时,注意到了“巫”和“舞”字字音之间的近似性,进而认识了“行巫”与“舞蹈”的某种联系。他进一步发现,汉字“巫”的下部,正是一个巫字。当然,也许正因为巫是一种迷信,巫的话是下真实的,下足为信。所以,巫字加个言旁,就是欺骗的“诬”。萨满有家与野之分,家神即家萨满主持祭天、祭祖时穿衣裙,击神鼓,系腰铃,唱神歌,正是一种“舞”,这种“舞”者即大神。通常家萨满跳家神,请祖灵,征而下乱,野萨满跳大神则有众多法器,身缚铜镜,帽缀饰物,手使刀、叉、鞭,称有多种神灵附体,甚至还有“过阴”与亡魂交流的本事。巫师崇拜影响到对长生不老仙真崇拜和对在世活佛的崇拜。它贴近世俗生活,最具自然状态。

民间神灵崇拜的最后一种类型是对灵物、灵魂和偶像的崇拜,人们相信一些小物件可以帮人祛凶趋吉。如护身符,长命锁,项圈,压岁钱,均为灵物。歃血为盟这种灵物信仰,在全世界均有市场。血作为一种灵物,下仅可用鸡血,而且也可以用人自己的血。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在《汤姆·索亚历险记》中多次写到向往强盗生活的汤姆·索亚和哈克贝利·费恩幼稚地模仿这种巫风。作为猎人,一绺兽毛往往具有深远的含义。今天,灵物崇拜仍然鲜活在民间,从五月五日端午节家家门框土新插的艾叶和菖蒲,到九月九日插茱萸都可以看见。

生殖崇拜也是灵物崇拜的一种。“女阴崇拜”和“且崇拜”分别留下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对性物崇拜的遗风。石雕、木雕和陶制的性器是具有生殖魔力的灵物。一泓水,自然山洞或洼地均可作为女阴的象征物,而钟乳石柱则是当然的阳具(即且)象征物。黔东南苗族崇拜一对再生始祖姜央兄妹。每年祭祀这对央公央婆的仪式是,前后两人各背一只男女性器雕塑物追赶。女在前,男在后,称“追女”。男性器里吸注了酒槽水,追上女阴后即将酒槽水挤射出去。并大声问:“射中没有?”,众人齐答“射中”。还有的村寨由央公喊叫“夺张”(交媾),由央婆呼喊“沙降”(繁荣),众人欢呼。司祭师用竹筒或葫芦等男性器物象征,装满酒槽水向妇女射洒,妇女们掀起围裙表示受射。^[9]各民族均有自己的生殖崇拜方式,上述仪式是一种最具仿真性质的交媾式,而更多的是小型的或个人的活动。比如把一泓凹洼中的泉水

或一柱钟乳石上的水滴作为产子露喝下的信仰,并不会由于今天计划生育宣传的普及而无人问津。

回到我们人类自己,我们也具有灵魂。那种依附于人体的灵魂,叫做生魂,也许,生魂只有夜晚才喜欢离开肉体去走走,于是做梦了,有时受了惊吓,魂下附体了,就要家人把它喊回来。刚死的人也许魂魄去之远,于是也有喊魂的,想喊活死者。如果终于魂体相分,远去的就是游魂。现在,下论在西方,还是在我国,一种叫做濒死体验的心理学研究均下例外地杂有类似灵魂的描述。许多濒死体验描述的就是灵魂暂时离体获得种种经历然后又回到肉体上的过程。虽然,对于这种描述我们无法证伪,因为无法体验,但是,我们知道它是灵魂观念的具体阐释。

四、传统宗教

人是否有本能地追求信仰?在对“法轮功”邪教在我国风行一时的思考时,就有人提出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和无神论是一种信仰,同时也是一种科学。对于科学的推广下应是一味的灌输,而有赖于受众自觉的感悟和接受。而宗教强调虔诚,心无杂念。强调对崇拜对象的愚忠。邪教则具有巨大的欺骗性和强制性,因而更容易获得并保有信众。但是,中国的宗教并不发达,这就使一旦某一新的宗教或邪教出现时,人们对其怀有很大的兴趣和好奇心。下发达性,是中国传统宗教的总体特征之一。梁启超说:“中国人迷信宗教之心,素称薄弱,《论语》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盖孔子之大义,浸入人心久矣。”^[10]作为儒教崇拜对象的孔子,尤其缺少迷信宗教之心。《论语》说:“子下语怪、力、乱、神。”中华民族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宗教,人们的原始宗教信奉是天命,是众神。

佛教是公元前后的西汉之际传入内地的。东晋十六国时期,佛教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迅速发展,至隋唐时期已进入宗派林立的全盛期。佛教的基本教义是苦、集、灭、道“四谛”,即“四条真理”。佛教认为,人生皆苦,除了生、老、病、死外,还有精神上的痛苦,此谓苦谛;痛苦来源于情欲,即集谛;只有欲念的寂灭才可获得自由,此谓灭谛;欲念可以通过正道而寂灭,导向涅槃,此谓道谛。佛教宣扬三因六果、六道轮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佛教之后,回教(即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和祆教等传入我国,对我国宗教信仰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就影响力而言,又以佛教最大。佛教的“四谛”教义和“生死轮回”理论对我国有神论理论的充实和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儒教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为源头,李约瑟认为儒家学派成为一门宗教,是政府将孔子视若神明、诏令膜拜的结果。有人根据《史记》的《孔子世家》,推测鲁国有祀孔之举。汉高祖末年(公元前195年)政府曾至孔氏家庙设祭,公元37年,孔子后裔受封爵。公元59年,汉明帝诏令全国学校祭祀孔子。千余年来,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孔子庙(亦称文庙)。儒家根本没有专业教士的想法,因此庙中执事者与司礼者,便是地方的官吏和学人。孔庙的性质介于供奉神祠的庙宇与敬奉祖先的祠堂之间。

儒教没有规定的教义,没有专职的神职人员,是一种不成熟不完全的宗教。在孔庙对孔子及其弟子们祭奠是最基本的宗教仪式。孔子被视为读书人的祖师爷。儿童启蒙时面对孔子神像和牌位的叩拜,是极为郑重的入学仪式。汉族居民的堂屋设立的神灵牌位,有“天、地、国、亲、师”五位,“师”指老师,尊师是尊孔概念的推广。

在研究儒教源流的过程中,我在民间访问了一个八十高龄的匡耀武老大。老大曾是一名教师,1963年自愿回乡,此后长期兼作儒教的神职工作。在民间,儒教的神职工作主要表现为死者开路的仪式上。儒教认为人死后即去冥府。而没有天堂地狱之说。为了使死者灵魂顺利到达冥府而不受各路神灵各种小鬼的阻挠,须将神灵请来予以祭奠,并将死讯告之诸神灵,望其引路、准行、接纳。民间说,儒教是读书人的宗教。因而在“开路”仪式中就宣读告文,文质彬彬地布告各路菩萨和神灵。儒教中有菩萨的概念,是从佛教中借用的。告文中需要禀告的菩萨有龙王、土地、庙王等地方神,还有冥府曹王,共有十二曹王。在为死者灵魂送行中,礼宾唱着文雅的告文。祭酒时,多数礼宾是念唱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 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悲凉至极,催人泪下。

匡耀武先生告诉我,儒教仪式中祭奠大宋徽国文公朱夫子牌位,而不是孔子牌位。匡老的伯父也曾是礼宾先生。曾在一家做礼宾时当了大宾,即礼宾的头。那时把大宋徽国文公朱夫子牌位立于桌上、朝夕祭奠。礼宾要请神灵保佑,停尸奠祭期间尸首不腐,出殡时一切顺利,不伤人,不断抬杠器具等等。那次大宾发现出了意外,尸体腐烂,尸水流出。大宾不知是哪位没被照顾周到的菩萨在作祟,再三寻思查找,原来是帮忙大员在开餐铺席时,把朝夕祭奠的朱夫子牌位放到了桌下,有所不敬,触怒了神灵。大宾将牌位复位,再三祭奠求饶,则见尸水断流,一切如初。匡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告诉我这段神奇的灵验。

民间儒教先生尚从事一些“退煞”和“驱妖”的神事活动。其程序也是读以告文,以理服“鬼”,“退煞”时有占卦、赐水等程序,已与巫术合流。儒教认为天地间“煞星”众多,如“金、木、水、火、土”煞,墓煞,神龛香火煞等。儒教以卜卦、请神、赐水等方式退煞。儒教的讲道理令人感兴趣。匡老说,一个三岁小孩被雷打了,儒教先生以三岁小孩口吻把雷神告到了玉皇大帝那里。说:“雷打三世冤,三岁欠的什么冤?既是前世冤,前世也有天。”意思是说:“雷神要打的是前世、今世、来世有冤债的人,但这个小孩才三岁,他欠了什么冤债呢?假使他前世欠了冤债,那么前世时也有管他的天神去惩罚他,为何要在今世他才三岁时惩罚他呢?”玉帝一听有道理呀,于是让小孩活过来了。

道教是我国的民族宗教。道教尊老子为创始人,以《道德经》和后来的《太平经》为教义,其宗教场所为道观,神职人士为道士。道教是一种完备的宗教形式,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很大。道教兼容了老庄哲学和儒家阴阳五行思想,崇拜神仙,追求得道成仙。道教的基本信仰是“道”,《道德经》里,“道”是超时空的永恒的存在,天地万物的根源,道教信奉的最高神“三清尊神”是“道”的人格化。根据《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道教衍化出“洪元”、“混元”、“太初”三个不同的世纪,三个世纪又进一步衍化为“三清尊神”: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

道教有张道陵创立的五斗米道和于吉等人创立的太平道两支。

对于如何修炼才能成仙,道教的不同派别有不同的观点。“丹鼎派、全真道认为通过内养、炼养便可达到长生久视的目的;而符派、正一道则认为符咒语、科仪斋醮可以攘灾求福、祛病延年。”^[1]道教授丹术促进了近代化学的产生;道教方术,内养功和房中术等与现代气功和房中术等伪科学品种有直接传承关系。道教的符咒语、科仪斋醮之法,吸收了巫术的成分,并又发展和病变成新的巫术。

第二节 伪科学的文化源头

中华民族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被称为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化。五千年古国文化使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高山仰止。作为一个中国人,当邪教和伪科学意欲阻挠现代化的进程而为我们的骄傲抹黑时,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的过去,从灿烂的中华古代文化中寻找太阳黑子。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比如“天人合一”的观

点,它提供的人与自然的和谐观在今天仍然指导我们科学事业,但对天人关联的强化则进一步走向了灵学。“万物有灵”是泛神论吗?毫无疑问。然而,它或许还是科学胚芽萌发时的基料。道家对于天地本原为“气”的朴素解释,导致了后来的医学、文学、养生、哲学等一系列“气”观的泛滥,这是老庄始料未及的。把《周易》提升到可资解答计算机二进位制的构想和解释人类一切机理的玄思,都是对“易”学的吹捧和夸张。从魏晋玄学而始,中国古代哲人已变得那么理性,那么超然物外,那么鄙视经验而崇尚理想。以至于明代意大利教士利玛窦(1552~1610)在穿着中国的儒服向中国人谨慎地传授西洋宗教、一并带来西方的自然科学信息时,我们仍躺在四大发明的光荣簿上,承续宋代的“程朱理学”明代的“陆王心学”和清代“训诂、考据”的“朴学”。

利玛窦于16世纪80年代初来华。在那前后,1578年,李时珍写成《本草纲目》,1608年徐霞客开始游历,1634年宋应星开始编写《天工开物》。此时,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509年,哥白尼写出关于日心体系的《概要》,1642年,近代物理学之父伽利略逝世,次年,牛顿出生。牛顿被视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此后,近代自然科学在西方迅速发展,这种异象使研究中国科学史的权威李约瑟大为迷惑:为什么拥有最灿烂的古代文明的中国却把使近代科学勃兴的机遇拱手交与了曾经通过丝绸之路、陶瓷之路向中国取经的西方?吴国盛先生指出:“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放了生产力,开阔了欧洲人的视野。希腊学术特别是柏拉图的进一步发掘,为欧洲人提供了开辟一门新的科学传统的机会,就是在16和17世纪,先进的欧洲学者们抓住了这一机会,创造了改变整个人类历史进程和人类生活的近代科学。”[12]

中国四大发明中最晚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其时为1041~1048年。此后,虽然出现了明代《本草纲目》等几部集传统科学技术之大成的科技名著,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已步履蹒跚。我们相信,中国的传统科学发展有其固有的发展模式,而西方近代科学发展又借助于文艺复兴运动带来的机遇。但是,我们如果从宋代以来的理学观念和清代学者们对西风东渐、传教士们所带来的西方科学的拒斥态度,我们会感到,这里面一定有更深层的文化原因。一种文化的固执和偏颇,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甚至带来了后来的伪科学。

一、尊神祭祖与敬天保民

中国文化的源头在哪里?在殷墟龟甲兽骨的纹路里。这样的观点,我们在上

节已经作过探讨。从最原始的自然崇拜到图腾崇拜和祖宗崇拜,万物有灵观念构成原始宗教,亦即原始文化的源头。

到了殷商时代,迷信之风日盛,问卜之举频仍,鬼神这种支配自然和社会的神秘力量,被人们无条件地接受和依从。《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商代崇拜的“帝”或“上帝”,在卜辞中一再出现,为人类和自然的主宰。《诗经·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长发》又云“帝立予生商”。可见商来历不凡,君权源自神授。因而殷人敬祭天“帝”,因为那同时又是他们的祖宗。进而认为,尊天即尊祖,祭祖则为保民。商人所保之民,是自然血缘下的人。这些称商的民族,在周朝统治下四散避难,做买卖为生,是今天经商之人的祖师。

周人有周人的做法,神给人类的帮助似乎是有限、无形的,学乖了的“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13]他们不断敬天,而且注重人事,提出了属于道德范畴的“忠”。

其实,殷人尊神祭祖,周人敬天保民,实质都是维护统治,由于这些方式行之有效,后世多有仿效,这就注定中国的有神论思想将成为一种文化传统,不断传承,生生不息地发扬光大。

二、八卦、阴阳五行和元气论

万物有灵是原始人综合观察世间物象、进行逻辑思维的结果,是简单的自然哲学,是低级文化的形式特征。自殷商而周,这种理性思维的系统化、抽象化趋势更加明显。周贵族求神问卜,已经有了系统的理论。那种以阴阳二爻组合的卦象已被周人整理得有条不紊。其文即八卦,其理即关于八卦的“经”与“传”。汇集而成的这些卦象卦理,被称作《周易》。在《易》中,卦象的基本符号是“—”和“--”两种,分别代表“阳”和“阴”,谓两仪。《周易·象辞传》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宇宙原始于太极,太极生发出两仪,两仪生出“太阴、太阳、少阴、少阳”四象,四象再生出“八卦”,八卦分别是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其象征意义为乾为天,主南;坤为地,主北;离为火,主东;坎为水,主西;震为雷,主东北;兑为泽,主东南;巽为风,主西南;艮为山,主西北。八卦以卦象对应自然界八种事物,以八种事物分析自然和人事,预卜吉凶祸福。这种将自然万物的本原归结为天、地、火、水、雷、泽、风、山八种基本元素的观点,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念。而后,周文王把八卦演绎成了六十四卦,作了一道很好的关于排列组合的数学题,使八卦易

理更加丰富。其时,周文王被纣王囚于羑里,身陷囹圄而不坠大志,算得上一个优秀的阴阳家。此后《周易》成为中国古代哲学和东方神秘主义共同的源头,周文王功不可没。

人类文化思想演进的过程,应该受某种规律的制约,不然我们何以解释世界各地关于世界本原的各种近似的理论?古希腊,在哲学家苏格拉底以前,即已把水、火、土、气作为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在古印度,地、水、火、风被当作世界的“四大种子”。在中国,最初显然是把火、水、雷、泽、风、山作为世界的基本构成,天和地不算,因为天和地即世界的全部。这种观点只是因八卦的再演绎才被复杂化,而不能与古希腊的元素和古印度的“种子说”相提并论。

随之而来的是阴阳五行论。最早阐述五行观的著作是《尚书·洪范》,它比古希腊提出水是万物始基观点的泰利士早了几个世纪。《洪范》所指五行,指水、火、木、金、土。这里,五行是五种感性物质材料,但它们又是上帝所有,是笼罩在神学帷幕下的原始宇宙观。阴阳五行观在殷周之际曾经是一种包含一定积极因素的社会思想,但战国中期以后,它就被唯心主义所融化,而表现出极端的神秘主义色彩。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邹衍。

邹衍(约前 305 ~前 240),战国时齐人,他总结性地提出了“五行生胜观”,并把它附会到社会历史中去。邹衍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又认为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这些都不难理解。但他说,我国历史是按“五德转移”的顺序,完成从黄帝(土德)到夏(木德)、商(金德)、周(火德)的更替的。那么,代火者必为水,不一个朝代必有“水德”。邹衍就这样把自然和社会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混在一锅煮。

中国人一开始就把注意力放在了五行性质的分析上,并急于用它来解释自然和社会,而不探索宇宙的始基和本源,这就注定最终走上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希腊人在元素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原子论,追求现象后面的本质,而中国的五行论则最终归本于一个虚无飘渺的始基——气。

气的概念起源很古老,与阴阳概念相伴而生。周幽王时代的伯阳甫论地震就说:“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阳优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入,于是有地震。”^[14]这里“阳优”、“阴迫”是指天地之气,也就是阴阳二气的情况。气的概念是五行这五种感性物质构成宇宙的观察的发展。这正如在古希腊人提出水、火、土、气“元素论”之后,还不能令人满意,于是就造出了一些抽象的东西来。西方由留基伯和德谟克

利特造出了“原子论”，我国则把五行的感性形式剥去，而统一于气，使“气”具有多种多样的属性。《左传·昭公元年》中医和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左传·昭公廿五年》中子大叔引郑子产的话说：“则天之明，固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这里，五行和阴阳在气的麾下结合成了一个体系，所谓“天六地五，数之常也”。气是一，是宇宙统一的物质基础；五行是多，是世界万物中抽象出来的几个太类，阴阳是气内部的根本动力。

把五行和“气”说推广到医学上，已取得的成就，使人们把对中医“气”理论的批判列为了禁区，好像这是卖祖，是伤中国人的感情的事。然而，中医“气”之理论，除了在辩证观点上有可取之处外，真正经得起检验的又有多少呢？《内经》中说：“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足东南，故东方阳也，而人左手足下不如右强也。帝曰：何以然？岐伯曰：东方阳也，阳者其精并于上，并于上，则上明下虚，故使耳目聪明，而手足不便也。西方阴也，阴者其精并于下，并于下，则下盛而上虚，故曰耳目不聪明，而手足便也。故俱感于邪，其在上则右甚，此天地阴阳所不能全也，故邪留之”。这种观点明显已经走向了形而上学的神秘主义。

气和阴阳五行的宇宙运动模式是一种粗糙的系统论，这种系统模式支配中国人的思想几千年，其科学之外的神秘主义成分，一开始就不安分，与科学争夺思想阵地。当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停滞之时，神秘主义更是大行其道，无孔不入。所以，阴阳五行理论中的神秘主义成分的泛滥和中国近代科学的停滞是互为因果的。此间，阴阳五行已成为命运的代名词，沦为星相占卜、迷信和伪科学的理论基础。

将中国古代“气”理论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是道家的元气论。元气论自太极阴阳说发源，经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佛教传入和儒学复兴几个阶段，历数千年而绵延不断，成为与“仁学”平分秋色的两大思想观点。五四运动时期，仁学和气说均遭批判，代之以民主和科学，但是，作为一种曾经于哲学、天文学、医学等领域无孔不入的、影响深远的文化思想，“气论”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今天在气功养生之术上，我们难道还看不出神秘主义的阴影吗？

三、从“天人合一”到激纬神学

天人合一的观念源远流长。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天人合一的观点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期盼和谅解。人们敬畏自然，更祈盼与自然和谐统一。天，既是自然，又是人类命运的主宰。人，既可以能动地适应自然，又必须被动地顺从

命运。

“天人合一”观念成熟于先秦。孔、孟、老、庄都有这种观念。及至汉代的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含义已由强调“天”“人”的认同和和谐发展到了“天人相通”而感应的有机的整体的宇宙图式。董仲舒所诠释的“天人感应”已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去除，代之以人对“天”的臣服和顺应，这和他的“独尊儒学”观点一样，是为统治者的统治服务的思想工具。董仲舒之后，东汉王朝的经典《白虎通》更以神秘主义的形式反映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它说：“天子至尊也，精神与天地相通”。但是，西汉儒学早在其地位独尊之时，即已潜伏着危机。两汉儒学“天人感应”的宇宙观，在今文经学家那里被逐渐推衍为谶纬神学。

谶纬神学在西汉末年大为流行，再经东汉的白虎观会议，这种神秘主义思潮变为了官方的意识形态，“经学”失去了学术价值并让位于“纬学”，跌入了迷信的泥淖。

魏晋时期，玄风独振，社会潮流又涌向注解《老》、《庄》、《周易》的玄学。“三玄”以“有无”为命题，才摒弃董仲舒的“天命论”儒学观点，又进入了道家哲学的玄机中。

魏晋以降，至于明清，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佛教的传入和儒、玄、释、道的抵触和和解。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宗教斗争，一开始就是在温和的气氛中进行的。这可能得益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中国的宗教从来没有达到欧洲中世纪政教合一、以教行政的那种显赫地位，因而，在中国伪科学史上，找不到西方中世纪教会对科学、或者对巫术的迫害那样的惊心动魄的一页。中世纪教会对科学的恐怖和仇恨来自于对他们笃信的宗教的自尊，因而他们不惜用火刑来对付用《圣经》相反的理论解释宇宙的科学家。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许正是压迫愈烈，反抗亦愈烈，教会对科学的压制使科学发生了更大的反作用力，随着文艺复兴而来的科学的勃兴大大地推动了人类进步的进程，给世界带来了近代科学的春天。

那个时候，中国人正研究“天”“理”和“太极”，那个时候中国出现了宋明理学家、心学家。程氏兄弟要人们“灭人欲”以“存天理”，朱熹在全国各地行政讲学，告知人们：“三纲五常终变不得，君臣依旧是君臣，父子依旧是父子。”陆九渊创心学，提出“心即理”，心是宇宙的本源的命题，王守仁拾起陆九渊的心学命题，却道“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倡导“知行合一”。那个时候的思想界沉涵在对于宇宙的理性思

辨的氛围里,有点沉闷,有点老气横秋。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亦如江海,有波峰浪谷。对于一个固守在城墙之内的民族一个时期的落伍,我们应该可以理解。我们已知,尊神祭祖的有神论、八卦和阴阳五行的宇宙观、元气论、“天人合一”、谶纬神学,它们共同构成可资产生伪科学的文化源头。从时间上讲,北宋以后,已提不起多少与本节有关的话题。

第三节 神秘主义

使人摸不透的东西就是神秘的东西,神秘的东西高深莫测。神秘主义就是使自然和社会神秘化的主张和观念。在历史上,神秘主义既没有团体,也没有流派,它是一种贯穿于人类认识史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思潮,是有神论和不可知论的体现。神秘主义是一种认识惰性。因为客观世界纷繁复杂,客观规律绝不会轻易地自然显露而为人掌握。所以说神秘主义是认识惰性的必然结果。当一个认识的结解不开时,我们说它是某种神奇的力量在作祟。当科学解释不了时,神秘主义就自告奋勇地充当了解说者。神秘主义是一种有害的思潮,它直接导致了伪科学。神秘主义与理性主义相对立。

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神秘主义是古代哲人直觉经验的产物,它包括元气论、天人合一论、八卦理论和阴阳五行学说等哲学观点,是一种哲学流派。这个意义上的神秘主义,其内容已在上节叙述,此不赘及。我们认为神秘主义在哲学上是一种认识论,也是一种方法论,一种世界观。它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它的方法论是形而上学。万物有灵,泛神论,是神秘主义之源。在人类文化史上,神话对社会的解释可以看做是神秘世界的一种表现。社会对自然采取的方法是,已知的,就合理地叙说,未知的,就大胆想像。一部《山海经》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山海经》神话是后世文学的营养。葛洪《神仙传》、干宝《搜神记》,以及《封神演义》、《聊斋志异》,无不承传了中国自《山海经》始的神秘主义传统。至《西游记》中的石化神猴,《红楼梦》中的通灵宝玉等灵物和“太虚幻境”等意境,无不使用神秘主义的手法。当代贾平凹《怀念狼》中人狼幻化,陈忠实《白鹿原》中白鹿神奇,均使作品增色,只不过人们已能理解,那不过是承中国人爱玩神秘的传统,姑妄言之,而读者亦姑妄读之,不以为实。

中国神秘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最原始表现可以追溯至占卜、易数之上。占卜

以龟蓍异象定天理行人事,而易数之理,异乎寻常。古人认为,天理人事均有神灵昭示,譬如蓍草,此种多年生草本,气有芳香,形有异象,丛生于野,百茎以上者,据说还有神龟伏于其下,故神秘,可用来占卜,可用来演示易理。传统的易占就是用50根蓍草来玩弄。此中玄妙,容待后叙。

道家笃信的神仙方术,是宗教化了的神秘主义。在本章第一节中已有提及,稍后将有续叙。

引起学术界重视的种种神秘方术,如气功、特异功能和印度的瑜伽术是土生土长的东方方术,且于现代传入西方,影响甚大,被称为东方神秘主义。在西方也有神秘主义,比如对玛雅文明的神秘诠释,对埃及文明与数字神奇的信仰,对人类起源与外星文明的种种猜测,均在此例。世界性邪教科学教就以披着科学外衣的神秘主义著作宣扬教义,瑞籍德国记者丹尼肯炮制了一系列关于地球文明来自外星人的神秘著作。世纪之交,一部《世界伟大的考古纪实报告》把西方的神秘主义介绍到了中国。因此,相对西方而言,瑜伽冥想、中国气功、古鲁斯以及唯灵论被称为东方神秘主义,它们自二战以后传散到世界各地。东方神秘主义以古老智慧的面目出现,以宣称具有现代医学做不到的疗效而成为一种导致身心健康的方式。

一、迷信

迷信是一种低级粗俗的有神论,其特征是盲目信仰和崇拜神仙鬼怪和超自然力量,是神秘主义的一种基本表现形式。

风水术是我国流传甚广、影响深远的著名的迷信,是中国占验居舍和葬地吉凶的方术。古代称风水术为堪舆术、图宅术、相宅术、青乌术、青囊术、相冢术、地理术等。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以龟卜和筮占的方式占选居处、安排墓穴。以后历代风水术士将风水术抽象化、理论化,使之形成复杂神秘的理论。

风水术的理论基础是“生气说”。“元气说”认为,元气分阴阳,阴气上腾为天,阳气下凝为地,二气相交,则化生五行,生化万物,乃至于人。风水家就是推演上述理论来建立“生气说”的。风水术认为:人气与人气相通,死人气与活人气也相通,人气下葬,死去的人气便与土气相结合,但它若能得到土气的滋养,便旺盛,并庇护后代,使之兴旺发达。反之,土气贫乏,死去的人便得不到滋养,甚至土气还会吸走死人之气。这样,死者后代难受庇护,甚至要遭受灾祸。土气又分内外二气,内气于土内,外气指土外之山形水流。内外二气合称生气。

风水术运用中以强调审龙、观砂、察水、定穴四个步骤。龙指山势,砂是龙穴前后的地形地貌。水指地表的水流水道,在平原地区察水是一项主要的工作。此外,据死者去世之月份时日及死者的生辰,可以推算出种种宜忌方位,以作定穴之据。晋人郭璞,是著名的风水先生,著有《葬书》。死后却被葬在一个气散风冲、风水不好的地方。后人作诗云:“气散风冲哪可居,先生埋骨理何如?日中尚未逃兵解,世人今犹信《葬书》。”郭死于“兵解”,死前曾预言日中有人来救他。一个遭受杀戮的风水术士死后身葬何处,也许并不是他自己选择得了的,但此诗的主旨不在于他的葬地如何恶劣,而是人们有意嘲讽这位风水术士。

有些人认为,“风水”还是有的,比如闹市嘈杂之所与山清水秀之所毕竟有不同感受。但这是“俚俗”的风水,是“文学”的风水,“文化”的风水,与“风水术”中“风水”不相干。假如有人借“美学”之风水贩卖迷信,那只能说此风水术士连郭璞也不如,是见风使舵的假“风水先生”。

阴宅的风水术同样适合阳宅。阳宅的风水术也是以“生气”理论为基础的。

今人兴风水之风,愚昧迷信沉渣泛起。迷信来源于“恐惧”,怕发不了财,怕发了不义之财遭遇追究的心虚胆怯者,往往从迷信中寻求指示和慰藉。想想那些盖好了办公楼不入住的,那位听巫师之命将高速公路舍直取弯,绕道而只为修一座桥以图去凶逢吉的山东的官老爷,哪一个没有一些“恐惧”?假如可能的话,检察机关完全有必要对写信风水的官们立案侦查,多能查出问题。

算命术是又一种世俗迷信。中国算命术历史悠久,命理复杂,流派众多。算命术的基本理论依附于天干地支说、阴阳五行说、四时五方说和生肖观念。它综合上述学说,形成了一个神秘的理论体系。它将人出生时的星宿位置、运行情况与人生命运联系起来。因为人是禀星气而生,随星位尊卑而成贵贱之命。人出生时的年月日时反映了天星运数,也反映出不同人的尊卑贵贱命运的不同。

最常见的八字算命,是以人出生的年、月、日、时“四柱”的天干地支共八个字推演命运的方法。算命家先推出“八字”,然后根据八字之间五行生肖等变化的关系,推断出人生的吉凶祸福。在算命术看来,一个人的“命”和“运”与八字是相关联的。其中“命”管一生,而“运”管人生中某一阶段。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运”,所谓“否去泰来”是人们对厄运离去、吉运来临的美好愿望。算命术中的“命运”和平时常说的“命运”是不同的。假如“命运”是“机遇”的表达,又有什么不可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亲爱的读者,祝你好运。基督教说上帝与你同在,就是这种善愿。

禁忌迷信也是一种世俗迷信,它无处不在,西方基督教区的大楼大都找不到13楼,南部沿海城市的高楼也许没有4楼,因为这是忌讳的数字。在台北市,没有第八路车,有人对“八路”心怀芥蒂。而相反的情况是,在中南有些地方却喜欢“13”和“4”。因为“13”是哆咪(多钱),多赚钱就是“123”。“4”是“四季发财”之意,而且“4”在乐谱中正是“发”。中国的许多禁忌,都与汉语谐音有关,假如在某些具体的事件上,有人利用谐音的特点,比如不怀善意地为结婚者送伞(散),为生日者送钟(终),则这种对于恶意的反感是可以理解的,对于这类事情的在意也反映出一个人的文化修养,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其中蕴含着科学道理。

禁忌的产生与人类启蒙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语言和思维能力不强有关。原始人在一系列无法抵御的自然现象和事物面前,本能地产生恐惧心理和逃避行为,并因此产生记忆,经过多次记忆和印象的重复,强化为观念。比如说外出打猎时,碰见一妇女小便,结果没有获得猎物,这样的事情遇到过两次,或者三次,于是妇女小便与打猎两件事之间就有了某种关联,进而成为禁忌。广西一些地方壮族的男子外出做生意途中,若遇见妇女小便,要立即返回家中,以免晦气冲撞,人财两空。在我国少数民族中,过去视为禁忌的人首当其冲的是妇女。英国著名民俗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列举的不洁者有经期妇女、孕妇、产妇、寡妇、鳏夫、杀人者、大小便后不净手者、戴孝者和接触过尸体者,其中也以对妇女的禁忌为多。这种状况反映了自父系社会以来的妇女地位低下的实际。同时,人们对妇女,特别是对特殊生理期妇女的禁忌,正是对她们的保护。但是,各种禁忌不管原初的发始是如何具有统计学依据,不管它至今还昭示出多少合理的寓意,它在理性上只能是非科学的。

二、宗教

宗教神秘较之世俗迷信更具系统性。宗教神秘的系统包括神秘的宗教始祖,神秘的教理教义,神秘的宗教仪式和修行方法。“天主”耶稣、“真主”穆罕默德、佛祖如来、“道祖”太上老君等,均有神秘的身世。以佛教为例,释迦牟尼原本是凡人,只因目睹了世间生老病死等各种苦难,才毅然出家。他先到深山苦修,后到菩提树下冥坐沉思,经49天,终于悟出了“真理”。“真理”是什么?就是那个神秘的教理,即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一旦这些条件发生于变化或不存在,该事也就不复存在。因此,一切事物都是因缘而起的假象、幻影,都无自性,都是“空”的。既然如此,人们对于一切事物就不应该刻意追求。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就是教

义,即“佛法”。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尽除烦恼,终成正果,自此收徒传法,成佛教。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魏晋时,与玄学的玄理相迎合而发展。当时译出的佛教经典《般若经》,认为现象世界是因缘和合,空而下实的,只有通过“般若”(即智慧)对世俗认识的否定,才能觉悟和解脱。“般若学”认为“一切皆空”,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性空、法空等等,空空如也,神秘莫测。佛教非常重视修养,其方法和途径是“定”和“慧”。“定”即“止”,是禅定,是思维的修习。“慧”即“观”,是学习佛教义理,培养佛教智慧的工作。止定,可消除烦恼,观慧,能断除妄惑,定慧双修,然后成佛。

佛教派别很多,《般若经》的“空空”教义和“定慧双修论”是大乘佛教的教理。大乘佛教中又有瑜伽宗,唐玄奘翻译传播到我国的即此宗派。瑜伽宗否认客观现实世界而肯定思维的存在,认为“外无,内有,事皆唯识”。与佛教瑜伽宗相互影响的是古印度哲学中的瑜伽派。传说,其经典《瑜伽经》的作者钵颠利是该派创始人。“瑜伽”(Yoga)的意思是“结合”,指修行。瑜伽派着重说明调息、静坐等修行方法,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作为修行方法的瑜伽,历来被宗教和哲学派别关注,现代神秘主义者也利用瑜伽,编造出瑜伽冥想的修炼方法。由于魏晋玄学与佛教的迎合,以道家修炼方法为发端的中国气功亦明显吸取了“瑜伽”冥想的成分。

道教即信仰老子道,并以“道”为“教”的中国传统民族宗教。分为教团道教和民众道教,前者指拥有道观和道士的教团组织的宫观道教。后者指民间一切道教信仰者,道教内容包括:(1)道教哲学;(2)神仙说和各种修炼理论、方法;(3)符、禁厌和各种方术;(4)民间信仰和民众伦理思想。道祖是老子。道教祭祀以“三清”为中心的多神,以济世度人、长生成仙、与道合一为追求目标。道教的神秘主义色彩,非世界各大宗教可比。虽然在对道祖的神化上,道教没有超出其他宗教之处,但其神仙说和各种修炼理论、方法,其符、禁厌和各种方术,都达到了神秘主义的高峰。

“道”是道教的理论基础,道教神仙世界、方术理论、斋醮科仪等等都以“道”为哲学基础,道是天地万物之源,又是宇宙的原动力,也是大自然的规律。“道”无所不容,无所不包。“无为而治”则国泰民安,“清虚自守,卑弱自持”则身修,“深根固蒂”则长生久视。老子是道的化身,称太上老君。《道德经》是道教圣典。

道教贵生,追求长生久视,这与世界三大宗教追求灵魂解脱,重视来世利益的特点大相径庭。儒教的终极目的是现世成“圣”。佛教追求的是“涅槃”成“佛”,道教则是在现实和超世之间得道成“仙”。儒教承认人的生理生命必然死亡,只有道

德、事业和思想言论可以长留世间,是为“三不朽”。佛教认为人经过“三学”、“六度”,可以超脱生死轮回,进入无生死的涅槃境界,道教以今世生命为贵,相信通过修炼,不仅精神生命可以升华,肉体亦可永固不坏。

这种“道”理确实十分吸引人。长生不老,可以说是每个人的追求。如何长生久视,道教有许多的修养之道和丹道方术。“道无术不行”。道教不仅给人以信仰,而且还给以可以操作的各种道功道术。信道还要得道,得道必须力行。要重功法和炼养术。

道教方术内容庞杂,大致包括养生术、外丹、内丹、斋醮及杂术等。养生术,又有练气、日曝、辟谷、服食、导引、行气、房中术、饮食调养等等。

据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称,练气的功夫应在周朝即公元前六世纪中叶产生,其依据是一些刻在柱杖的玉手柄一类的东西上的文字,叫《养气铭》:“屏息以敛,息敛则充,充则降,降则平,平则盈,盈则复,复则长,长则还,还则升,而达皇廷。上逼皇廷,不逼会阴。顺之者生,逆之者亡。”^[15]

练气的最大目的,是要回复到胎息的状态。这是道家的一种构想,他们并不清楚胎儿与母体之间气体循环的情形。一呼一吸间,要求平静,尤其要能闭气,时间愈长愈好。“专气致柔,能婴儿乎?”^[16]专精守气,达到柔顺的地步,能像婴儿一样虚静无欲。道家对闭气所造成的后果认识不足,那种非常状态实际上与缺氧有关,耳鸣、头晕、出汗以至窒息的闭气状态并非妙不可言。《道藏》中有许多书都谈了练气的功夫,《胎息经》和东晋道士葛洪的《抱朴子》也有许多这方面的资料。到了唐代,练气思想又有发展。以前认为吸入的气不仅有呼吸的作用,还能滋补身体。唐代又有了内气之说,内气必须凭借观想才能循环与变化。同时,练气在时间和地点上,又有种种规定和限制。李约瑟研究道家养生术时,看到练气与瑜伽术士之间存在某些关联,并且认为那是一种难于明了的关系。佛家修行讲究呼吸宜有规律而缓慢,而道家故意使气在肺中欠欠停留。“印度瑜伽的资料是很难得到的,因为这些功夫都是师徒之间私相授受的,所以外人看来一派神秘,无法捉摸。……瑜伽的观想和出神冥想的功夫似乎需要修炼催眠术,自我催眠,以及用意识控制自律神经系统的功夫。瑜伽术大致已经过确实的鉴定(即停顿呼吸和心跳等),其内容到底与道家的功夫有多少相似之处尚无定论。其实瑜伽的功夫只不过是一种出神状态,在很多痴呆症的例子中都可以看到。惟一可观的,是训练有素的正常人,也能够随意进入出神状态。”^[17]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玄学融合。玄学所论证的现

象世界的背后,存在着真实的精神性世界“本体”的“道”或“无”的学说,与佛教以“般若学说”为基本内容的“大乘空宗”,在思想方法和致思趋向的观点上有相似之处,这促成了两种宗教的相互渗透。因此,道教的练气,虽然自有更古老的源头,但应该吸取了瑜伽术的某些成分。所谓玄学,是以解说、阐述、发挥《老子》、《庄子》和《周易》为主的学说,其基本内容与道教和神秘主义相关联,所以可以把魏晋时期玄学与佛教的融合视为道教与佛教的融合。

日曝之法并非今日所称日光疗法,它也有一些玄妙的机理和神秘的程序,男子手执一日字,将身体暴露在日光之中为“吸日芒之法”,而女子则手执黄纸之上黑色的“月”字,将身曝于月光之下。男女有别,遵循了男阳女阴的阴阳五行学说。

辟谷即下食烟火谷米。《山海经》说:“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风饮露,下食五谷,心如渊泉,形如处女。”这里讲的是一个神仙的事。

东晋道士葛洪的《抱朴子·对俗篇》中有两则辟谷的故事。其中一则引陈仲弓的《异闻记》称某郡人张广定避乱时将四岁女藏在有竖洞的古冢中,只给了数月的干粮和水,三年后回来,本欲收女儿尸骨,哪知她还活着,原来是断粮之后学着墓中一动物,以吸气为生。张广定找到那个吸气的动物,原来是只大龟,道教宣扬的辟谷故事均是无法查实的神仙故事,十分怪异。道士也有辟谷的,下过并非什么也不吃,而是食些松子之类下寻常之物,而那些什么也不下食的“辟谷”者多半是沽名钓誉,明里吸气为生,暗里偷食五谷者。1989年前后,郑州无线电厂退休工人谷报国自称“山泉公”教人“辟食功”,在北京广播器材厂等处作报告,“带功讲课”,致使“辟食”者中有人饿死。[18]

气功师严新也宣传辟谷之功,并认为辟谷而下饿,反而精力充沛是因为“打开了自身的‘营养库存’——贮藏有人体的蛋白质、脂肪、微量元素、维生素等生命材料。”[19]现代气功中的辟谷功法,继承了道教“辟谷”养生之术,并且将“辟谷术”进一步夸张和神秘化。

导引即身体的伸缩活动,是一种比较温和的体操,可能是由巫师祈雨时的舞蹈演变而来。导引后来又称为功夫、内功。李约瑟认为,导引的思想基础可能是上古中医的观念,即认为身体毛孔容易阻塞,毛孔阻塞则引起血液壅滞和疾病。导引之外,又有按摩之术。今天的太极拳、鹤翔桩是典型的导引体操。

房中术被作为教理讨论并操作,在儒教和佛教都是下可想像的,但道教做到了。对于人类最为敏感的隐秘的性技巧的研究,在生理学上颇有意义。冯发兰先

生说：“道教是世界上惟一不太反对科学的神秘主义体系”，即指其对房中术和炼丹术的研究。

房中术之所以能被道教研究，与“阴阳说”的盛行不无关系，阴阳二气说以二气解释世界，而男女即典型的阴阳二性实例。因此道家认为性不但不是成仙的障碍，反而是重要的帮助。男女私下练习性行为的功夫，叫“阴阳养生之道”。其目的是借还精以保全精与神。同时两性要彼此采补滋养，如《玄女经》所说的“一阴一阳相须”。

明代已有房中术方面的书籍，也许还早些。1903年叶德辉收集《素女经》、《玄女经》、《玉房秘典》、《洞玄子》和《天地阴阳大乐赋》而编成《双梅景暗丛书》。唐代诗人白居易有个弟弟叫白行简，据说《天地阴阳大乐赋》即白行简撰。日本的《医心方》成书于公元982年，但直到近千年后的1854年才出版，它和《玉房指要》都收存了许多古代房中术的片断资料。

房中术中大多并不离谱，但离谱的则离得很远，比如“采阴补阳”、“还精补脑”等。陈忠实《白鹿原》中有个郭举人，娶下了叫小娥的二房，“不为睡觉要娃，专意儿是给他泡枣的。每天晚上给女人的那个地方塞进去三个干枣儿，浸泡一夜，第二天早上掏出来洗干净，送给郭举人空腹吃下”。^[20]道家的“采阴补阳”本义是男性“交而不泄”，“数易女而莫数泻精”。由于“女性性交的高潮快可以加强男性的生命力，因此男性的性行为要尽量延长，以达到采阴补阳的目的”。^[21]这些方法到了小说里，已变成了泡枣的方法，而且这种说法在民间还有很多大同小异的版本，绝不是小说家空穴来风。但是，这种方法能达到“补阳”的效果吗？

“还精补脑”之术在《后汉书》中有记载，书中说冷寿光行容成之术以致长生。所谓还精，即在射精之时压迫阴囊与肛门之间的尿道，使精液进入尿道，以后与尿一同排出体外。对此，道家并不知情，他们以为精子上行，故能滋补身体。道家称还精为“黄河逆流”。据说，在民间行容成之术者，还大有人在。

道家宗教行为中最令人惊异者，是将一般的婚姻生活与个人私下修行的功夫公开化，成为一种仪式。这种仪式叫“中气真术”，又叫男女“合气”。该术始于公元二世纪，到公元400年之际，在孙思邈的领导下，已经很普遍了。“合气”之术的目的是“释罪”，行于禁食之后，新月和满月之夜。术前先来一种舞蹈，叫“龙缠虎弄”，继而是公开作宗教性的结合，或者是会众在庙中的厢房内运用各种技巧作连续的性交。这种会众轻视阶级、重视人文、不分贵贱打成一片的性交仪式，令苦行的佛

家和道貌岸然的儒家瞠目结舌。在气功宗派繁多的今天,房中术又沉渣泛起。据报道,已于1994年取缔的非法组织国际气功科学联合会主办的报纸《国际气功报》上曾经刊登广告,举办函授班传授道家“玄觉丹道”、“阴阳双修”。

除了养生术,道教方术还有外丹术、内丹术、斋醮及杂术。练内丹即练身内之气,即练丹田之气。其作法是利用闭气等方式使气牢固于五脏,不泄于外,使精气神混为一丹,以此“长春不老,与天齐休”。现代气功中真气、丹田之气、经络之气、脏腑之气以及放松法、呼吸法、行气法、入静法、意守法等修炼理论和方法,均从内丹理论而来。外丹术包括黄白术和金丹术。用种种技术炼出的金丹包括大还丹(氧化汞、氧气铅)、小还丹(硫化汞)、轻粉和粉霜(汞的氯化物)等。隋唐时,炼丹风气达到高潮,那时,甚至有皇帝误服金丹而死。炼丹的副产品是发现了固体王水的制作和雄黄的炼成方法,发明了火药。《道藏》中关于外丹术的著作有约百种。斋醮及杂术包括斋醮、符咒、禁咒、步罡踏斗、乘蹻、五遁、守庚申、拘魂制魄法、变化术等。

阴阳五行说是道教的思想基础,它贯穿于道教的宇宙生成论、神仙系谱、丹道方术的各个方面。在丹道方面,“万古丹经王”《周易参同契》言坎、离、水、火、龙、虎、铅、汞之法象,而配以阴阳五行昏旦时刻为进退执行之符候。道家方术如占候、望气、星命、奇门遁甲、堪舆等,更是离不开阴阳五行。

道家追求长生不老,这是很有吸引力的。汉武帝就是个追求长生不老的皇帝。那时,有个叫李少君的,自称会长生不老之术,投皇上所好,来到了长安。此君五十岁年纪,却自称七十岁,让人有仙风道骨之感。少君说对人“致物和丹砂可以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以此推销他的炼丹理论。可是还未传授完长生不老之术,此少君就死了,令汉武帝十分惋惜。武帝居然没有想到这一层:既然少君得道成仙了,怎么说死就死了呢?

同样的笑话在苏联也闹过。博戈莫列茨研究成功了一种有关长寿的理论。他宣称,人可以活到150岁。斯大林对这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很感兴趣,所以一直非常关心他的研究工作,博戈莫列茨的任何要求都得到了无条件的满足,物资和精神双丰收。他被斯大林授予各种奖章和荣誉称号:科学院院士,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博戈莫列茨于1946年去世,终年65岁。斯大林比汉武帝开窍一些,他顿悟道:“看来,这家伙把大家都骗了。”

三、巫术

道教除了神仙术、养生术和杂术外,还有一类重要的方术与之有关,那就是巫

术。

巫术和道教方术具有交叉的关系,即道教方术中有巫术,但并非所有的巫术都是道教方术。对于具体的方术,在道家叫方术,在巫覡则叫巫术。虽然,方术和巫术有不同的术理,但它们之间的彼此渗透和融合,相互利用和吸收的情况,使我们在许多具体的方术巫术上,没有分别它们的可能。

巫的产生和神灵的信仰、禁忌文化应无先后。黄伦生在《东方天国的神秘之门——中国巫术文化探秘》中把命、符瑞、鬼妖、讳忌、卜筮、风水、祭祀、祈禳、讖纬之术均归入巫术之中,如此,巫术的范围之广已囊括了本节已述的世俗迷信和宗教迷信的全部内容。

对巫的批判,早期的故事发生在周。周武王准备伐纣时,请巫师占卜,结果为“凶”兆。武王父一把夺过占卜用具,烧掉了蓍草,踏碎了龟甲,说:“枯骨死草,何知吉凶!”汉代王充在《论衡》中也对上述种种巫术进行了批判。曹魏以后,王朝曾经禁巫,隋炀帝派官吏四处搜集讖纬书籍并予焚毁,捕讖纬术士予以处死,致使随后讖纬之学走向衰微,但与此同时,一些新的巫术却又兴盛起来,与宗教结缘的巫术以巫和宗教的双重身份出现,顽强地生存。

巫被认为是装神弄鬼的事,巫师是神的化身,他通阴,用神的身份说法,实施符瑞咒语,驱邪祛鬼,或以妖术作恶害人。弗雷泽在《金枝》中把巫分为两类,其中一类认为“因果同果”,另一类认为物体一经互相接触,在中断实体接触后,还会继续远距离地相互作用。巫的善恶两重性,是导致它兴盛或灭亡的原因。巫与医结缘,以种种自以为是的机理治病救人,显示出善的一面。2000年8月27日,作者暗访湖南桃江县石牛江镇安陵村一中年女巫,其时为患者请神(观世音),并开具有苦荞糊糊一味单方,赐茶叶一撮,性显和善。然而,毕竟巫无科学的医理,在现代中医学中仍有它的影响。

巫职人员为巫婆、巫师、神汉。后二者为男性,称覡。在卡尔·萨根和李约瑟的研究中,都对古老的中国巫术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中国北方、直至亚洲和欧洲北部的部落,如西伯利亚的萨莫耶特人、北美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中,流行着萨满教(Shamanism)。这是一种原始宗教。萨满巫师据说能沟通人与鬼神,为人驱邪治病,预测未来。萨满巫师常常充当部落首领,施巫术时,口念咒语,手舞足蹈,声称“鬼神附身”,是为“跳大神”。萨根对萨满教的教义和治疗方法深感怀疑,他从萨满教对其教理的掩饰看出了宗教(或称巫术)的心虚和狡黠。他说:“假定我们都是思

想开放的人,而且我们确信在这些宗教里面存在一些有趣的事情。在我们向这些宗教的信徒简单地自我介绍之后,就请求他们对他们的宗教或信仰作个可以理解的概括。无一例外的是,在我们提出请求之后,他们总是告诉我们说这是个非常复杂、充满着神秘意味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的。不过,如果我们愿意花上 15 年左右的时间去实践一下虔诚的僧侣生活的话,那么,届时我们就会比较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了。我想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说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这么做。很多人还会怀疑所谓 15 年只能初窥门径恰好证明这整件事是个骗局:如果一件事难到让人无法理解,那不也就意味着我们无法有理有据地对它进行评判了吗?这样一来不就使得欺骗行为更加肆无忌惮了吗?〔22〕

李约瑟在《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中对萨满作了深入的考据,提出了 Shamanism 一词从佛教的梵文或从通古斯(Tungusic)字释过来的各种材料,指出萨满、萨门、沙门、珊蛮之类与神仙者流有关联,并说虽然种种说法不一,但后来中国人有了统一的叫法叫“巫”。并认为巫的原义有“舞”的意思,“巫”即“舞者”,是祈雨法术的舞者。

从典籍中考查巫之源头,可从甲骨文始。甲骨文中有巫字,《书经》、《论语》亦有“巫”之论述。《左传》说公元前 638 年僖公欲曝巫,焚巫以止旱,后因谏乃止。到《山海经》时,巫即与长生不老的仙丹和药草发生了关联,这就扯到了上一节我们谈的道家去了。

道家与巫的关系确实十分密切。道家术士和巫师没有多大区别。一种制蛊之巫术或主要是道家中流传的秘法。

《本草纲目》中讲,制蛊是用封闭的器皿让相克的毒虫互相残杀,以得胜者为蛊。毒虫可能是蝎和蜈蚣一类,此二虫今天仍是两味有毒的中药,用来治疗风湿或骨质增生之类病症。也许蝎和蜈蚣的有毒成分具有祛病或麻痹作用,而中医对此并无深知。制蛊之风,在今天已不复有。公元前 91 年,汉武帝宫中发生了可怕的巫蛊之乱,很多制蛊的嫌疑人被处死。又有资料说公元 598 年有圣谕禁蛊。或许蛊也有某些疗效,因为道士巫师制蛊不为投毒,它和道士炼丹和服饵有很大关系,只有随道教衰微而失传了。

前 415 年,魏国西门豹治邺时,巫师为河伯娶妇,成为巫“恶”的例证。西门豹把这种恶俗打压下去了,成为治巫史上的精彩一页。汉代对于巫的热衷与汉武帝的迷信有关。本节说到武帝养了个李少君,此君说大话,讲他见神仙吃过香瓜大的

枣子,他本人就有长生不老之道,于是炼丹献药,只是自己也未能长寿。后来齐国又出了个少翁,他听说皇帝十分怀念死去的李夫人,便搭一个帐子,里面点一盏灯,在夜半时分让人模仿李夫人在帐内显几不影子,武帝一看,挺像李夫人的灵魂显现,有感于少翁的魔术高明,遂拜为“文成将军”。这“文成将军”得寸进尺,又牵一头牛给皇帝看,说这牛有异相,腹中一定有宝贝。一剖腹,果然有一卷帛书,武帝看了半天,一摸后脑,哟,这不是文成将军的笔迹吗?遂以欺君之罪治死了术士少翁。少翁之后,又有栾大,以两枚磁性棋子在武帝面前表演磁力原理,功夫神奇了得,当了驸马。以棋子功夫,又散布可驱使众鬼推磨劈柴的奇术,皇帝对这些兴趣不大,他想的是成仙。栾大说,成仙之事,我修行不够,只得请师傅献技了。于是置办行装,送栾大去东海请师。可怜这皇帝,一盼三年,音讯杳无。派人一打探,栾大根本没去东海,而是在泰山脚不安居乐业,玩魔术逗耍子去了。龙颜大怒,派人要了栾大的小命。唐代,公元825年后,出了善作腹语的女巫,是现代“灵鸽”的祖师。宋代,巫受到了打击,清末刑典上已有惩处巫师和驱鬼捉妖者的条例。

道家法术和邀神弄鬼的巫,在秦皇汉武中兴之后,逐渐走向民间,宋以后,成为一种民间的、地不的、秘密的活动。宋代民间有很多道教组织从事反金的地不活动,元末的“红巾军”和19世纪的“太平天国”,均打着宗教的旗号行政治之实。19世纪20年代,湘川等地的“哥老会”盛行,湘军为镇压太平天国招募农民,使哥老会随军队扩散。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时,各地哥老会纷起响应。此时起,哥老会即称“红帮”。“红帮”在革命时期有过不俗表现,但它又与“青帮”成为近代中国民间邪恶势力的代表。

巫术直接导致了现代的特异功能。严新是一个以特异功能治病的巫医,张宏堡装神弄鬼,是个巫师。张香玉所宣扬的“理论,明显是从道家“精神”理论中捡拾而来,信仰特异功能者甚至直接尊称张香玉为“现代巫婆”。沈昌的“生命科技”是一种巫术,且沈昌师出有名,其母就是一个巫婆,沈昌在“巫”方面有很好的家教。现代特异功能中的超感,在古代巫术奇闻中也有例子。《梦溪笔谈》中有个故事说,山阳地方有个女巫非常灵验,凡是人间之物,虽在千里之外,问她,她都能说得出来,沈括的伯伯曾请他来当场实验,当众问她衣箱中有何物,她能准确无误地一一道出。人们心中出现一个念头,女巫马上就能知道。在李卫东《人有两套生命系统》第269页有这个故事,作者以此作为正面例证说明了“特异功能”。

在弗雷泽看来,“巫术始终是一种技艺而从不是科学”,挑明了说,巫术在

技艺上是一种伪技艺,在理论上是一种伪科学。

注 释

- [1]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4页。
- [2] 《列宁全集》,第15卷,第380页。
- [3] 刘戟锋主编:《无神论教育读本》,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188页。
- [4] 卡尔·萨根:《魔鬼出没的世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1版,第136页。
- [5] 同上,第139页。
- [6] 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64页。
- [7] 同[4],第133页。
- [8] 同上,第137页。
- [9] 同[6],第265~266页。
- [10]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
- [11] 田广林主编:《中国传统文化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52页。
- [12] 吴国盛:《科学的历程》,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287页。
- [13] 《礼记·表记》。
- [14] 《国语·周语》。
- [15] 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页。
- [16] 《老子》,第十章。
- [17] 同[15],第165页。
- [18] 涂建华:《走出骗局》,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版,第317页。
- [19] 郭庆华:《中国超人术》,时代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97页。
- [20] 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
- [21] 同[15],第169页。
- [22] 卡尔·萨根:《魔鬼出没的世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6页。
- [23] 黄伦生:《东方天国的神秘之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第三章 中国伪科学流变

中国当代伪科学与其古老的源头之间有一个漫长的流变过程。本章着重分析了这段历史。

巫术是一种普遍和复杂的迷信现象，奇门遁甲、扶乩、占星术类中的大量巫术品种历经发展，留存至今。

周易预测有哲学和术数两个传统，术数传统运用阴阳术数解释易经，走向神秘主义。

谶纬神学以唯心主义天命观解释人事，它是历代帝王将相维护自己的统治的舆论手段。最有名的谶书有《乾坤万年歌》等八种，《河图》、《洛书》经过复杂的流变过程，对今天的影响仍然很大。

邪教自秦以来从未间断，宋后犹盛。从“一贯道”这个典型例子，我们可以看到邪教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危害性。

清帮、洪帮、白莲教等民间秘密结社之风在当代仍有存在的土壤，三教九流的江湖法术使我们得以看清当代怪、力、乱、神的承传线索。

第一节 巫术种种

巫术种类繁多，错综繁杂。英国民俗学家费雷泽在十二卷巨著《金枝：巫术与宗教的研究》中，对巫术进行了如下两个角度的分类。

(一)根据各类巫术所由产生的思想原则，分为顺势巫术和接触巫术。

1. 顺势巫术。基于“同类相生”或“因果同果”这一“相似律”而产生的法术，也叫模拟巫术。由相似律引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巫师能够仅仅通过模仿就能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

2. 接触巫术。基于“物体一经互相接触，在中断实体接触后就会继续远距离地互相作用”这一“接触律”而产生的法术。根据接触律，巫师认为他可以通过一个物体来对一个人施加影响，只要该物体曾被那个人接触过，下论该物体是否为该人

体的一部分。

(二)根据认知过程分为理论巫术和应用巫术。

1. 理论巫术是巫师关于决定世上各种事件发生顺序的规律的一种陈述,它是一种伪科学。2. 应用巫术是作为人们为达到目的所必须遵守的戒律。它是一种伪技艺。应用巫术又分为积极巫术和消极巫术,积极巫术称法术,是利用各种手段趋利避害的行为,消极巫术即禁忌。

(三)民俗学家杨成志写于30年代的《民俗学问题格》中,涉及巫术的有如下内容:

1. 土地与天空、植物界、动物界中“关于自然现象的各种征兆、图腾崇拜、禁忌”。

2. 人间(迷信一般)中的“人生与死亡、异常人”。

3. 人工物(迷信一般)中的“咒术——宗教的器物制造”。

4. 超人间的存在(鬼魅之国)中的“人神交通法”、“崇拜、祈祷、牺牲、祭司、庙宇、偶像、祭礼、跳神、秘事、特殊的或个人的祭礼、神人、魔鬼、女魔、妖精界、幽灵”。

5. 预兆与占卜(咒术与占卜)。

6. 咒术技法中的“魔术、妖术、迷术、预言、占卜、祓除、咒诅、咒术的仪式与护具”。

7. “日历、斋日与祭日(祭礼的习俗)”。

8. 竞技、运动及游戏中的“运气”。

(四)黄纶生《东方天国的神秘之门》叙述了三类巫术:

1. 祭礼巫术:祭天(日神、月神、星辰)、祭地(土地神)、祭鬼(祖先、超度亡灵、招魂、驱除鬼魅)。

2. 卜兆巫术:占术(天占、地占、日月占、星占、风雨云占、动物占、植物占、梦占、梅花易数占、签占和谶语)、卜术(龟骨卜、《易》筮、文王课与金钱卜、拆字、扶乩、鸡卜)、相术(堪舆、相术、奇门遁甲、星命之学)。

3. 禁忌巫术。

凡此种种,分法不一。在伪科学流变的话题下,我们分述奇门遁甲、扶乩和占星术等三种。

一、奇门遁甲

幻术的概念在成书于后汉至魏晋的《西京杂记》中有记载,称那是一种“立兴云

雾,坐成江河”或“画地成江河,撮土为山岩,嘘吸为寒暑,喷嗽为雨雾”的奇术。宋人编纂的《太平广记》“幻术”一类中,除了上述神仙术外,又加上断绢复续之类,这在今天被称为魔术。幻术与僧成正果、道士飞升相关联,《太平广记》中收录神仙名目的古书,讲刘商空中骑乘飞举,黄初平白石变羊、隐游骑木鹄飞升、壶公竹竿变大之术,又有胡僧求雨失败、胡僧合长生内药武则天服后两年而崩之类,称为妖术。古人在巫风遍地、道观占山的时代且能辨妖魔之术,他们无法得知的是,所谓幻术,归根结蒂都是妖魔之术。

周楞伽先生编纂《幻术奇谈》中有这样的故事:潘烂头所居的道观在城外,门前跨一石桥,流水环绕。游人欢喜这个地方幽静,常常驻足桥头。这时有江西龙虎山张天师进观,将要渡江。有人对潘烂头说:“你常常炫耀自己的本领,现在张天师来了,你敢和他较量一下吗?”潘笑道:“天师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要渡江,我偏不让他渡,看他奈我何?”那人笑潘说大话,潘说:“你若不信,可以当面试一下。”于是倒水在盆里,取竹篾织的小船放在水中,用线牵着忽东忽西往来不停地玩弄。当时张天师已满帆渡江,不想刚想靠岸,即被逆风顶回原处,如此十多次,竟不能渡过去,江对岸的官吏迎候已久,见天师的船在江中团团转,都觉得奇怪。知内情者告诉镇江府太守,太守太惊,亲自到道观劝阻潘烂头,天师才得渡。后来天师知道了详情,深恨烂头,吩咐手下驾车造访他。恰巧潘出去了,他的徒弟跪拜相迎。天师在观门前看了一下,指着石桥对潘的徒弟说:“这桥妨碍风水,何不把它拆掉?”徒弟道:“没有奉到官命,不敢擅专。”天师道:“不要紧,我代你招工役。”连忙命令工匠拆桥。拆到一半,桥中得一白鹅,羽翼尚未丰满,受惊而飞,不到一丈远即跌落水边,死了。潘烂头从此得病。半月后死去。〔1〕

周楞伽先生认为,张天师潘烂头的这些奇术,就属于奇门遁甲术。

另有一个故事。德州宋清远访友,留宿。朋友说:“如此良辰,月明如昼,何不看一幕戏?”于是拿了十多条凳子纵横摆在庭院里,和清远在堂上点上蜡烛喝酒。二更过后,见一人越墙而入,在阶前团团作转,每遇一凳,就脚步蹒跚,慢吞吞努力好久才能跨过。起初是直走,弯曲地向上跳,接着回转身倒走,又屈身上跳。这样艰难地跨越所有凳子,最后疲惫到了极点,一跤跌倒在地。正是东方发白时候,朋友将来者引到堂上,问客何来。那人叩头求饶道:“我实在是个贼,进屋以后,只见一层一层都是矮墙,越跨越跨不完,所以困极被擒,现在死活随你的便。”朋友笑着把他放了,对清远说:“昨夜算准有这贼来,因此用小法术戏弄他一下。”清远问:“这是什么法术?”答曰:

“奇门术呀！”还说，精通奇门术者常以此法防盗，武原杨某用此法，次日一早见一贼在凳上行走不停，晕头转向。

“奇门遁甲”是众多邪术的统称。因其来自《奇门遁甲》和《六甲天书》，故名。计有先在墙上用手画个门，然后念咒，穿墙而过的“穿墙术”；骑上板凳闭眼念咒，飞上天去的“穿天术”；地不藏身或行走的“土遁法”；身贴咒符隐形的“隐身术”等。《聊斋志异》中的“崂山道士”有此术。郭庆华著《中国超人术》称张宝胜有穿墙术。^[2]

“奇门遁甲”的原型是一种兵家之法，然后演变而为占卜命相术，最后变成了当代的特异功能。据称，黄帝命风后写“兵法十三篇”、“孤虚法十二卷”，开创了“遁甲一千零八十局”；这是最早的《遁甲奇门》；建兴九年（公元 231 年），有《奇门遁甲之阵》、《三元奇门遁甲》及历代查禁的邪书《六甲天书》问世；诸葛亮作《三元奇门遁甲》，至今仍流传于江湖命相学的“巾行”中；此外，尚有其他不可考的“奇门遁甲”之书。据说，《三元奇门遁甲》始于黄帝，为“解明天地之法则，传授称霸天不之秘术”，黄帝命风后写成奇文，从而奇门“遁甲”。诸葛亮曾在五丈原布不“奇门遁甲”之阵，与魏将司马懿作最后决战。

何谓“三元遁甲”？三元，指天地人，在战术上指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奇门，是指天干中的“乙、丙、丁”三奇和世称“休、生、伤、杜、景、死、惊、开”八门。八门的由来不甚清楚，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一是八卦的变形，即仿八卦之名而表八种状态，如“休”指养息、静观、等待，“生”表生存，引申为发展等等；二是当代军事观念的运用。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八十四回描写孔明巧布八阵图，这八阵就是“反复八门，按遁甲休、生、伤、杜、景、死、惊、开。每日每时，变化无端，可比十万精兵”。^[3]遁甲即乘阴阳之变化，晦蔽人目，隐遁其身，趋吉避凶之意。据称尧帝创造了甲子，又由风后发展成遁甲。其法幽深隐秘，未易窥测，故谓之“遁”。三奇缺“甲”，故曰遁“甲”。

“三元奇门遁甲”属于秘术，从不公开，代代都是口传。姜太公吕尚编写了兵书《六韬》、《三略》，有《三略》传给丁圪上老人黄百公。诸葛亮得《三略》真传，在将要病死于五丈原之际，再传给丁姜维。世称孔明给姜维的文稿秘术灵显，姜维怕落入不良之辈手中，就烧了。又因“奇门遁甲”乃称霸天不之术，为历代当政者所禁，真法就全靠口授了。至于世传的《奇门遁甲统宗大全》等奇门遁甲的书，是伪造的或避禁而篡改了的。奇门遁甲作为政治军事谋略之书，也逐渐为命相占卜家利用，成

为命相占卜技法了。

台湾大学哲学系高山青先生编著《世界相命大全》对上述说法抱肯定态度,并考证作为“命相术”的“奇门遁甲”的种种技术。大致而言三元奇门遁甲占卜须有“遁甲盘”等工具,并考虑占卜的目的、“天时”、“地利”、“人和”情况及时间方位具体操作,把“天干”、“地支”、“五行”、“八卦”和“三元”巧妙混合以演绎扑克牌算命般的命理游戏。在所有的占卜术中,奇门遁甲被认为无论从观念上,还是从操作上都是最复杂的一种。它是融合了多种巫术的一种占术,被称为占验巫术的集大成者。

“奇门遁甲”被历代术士传说,又为求仙求道者追逐,成为一种诱惑人的奇功。今天穿墙遁隐之术已被换上“突破空间障碍”、“遥视”、“遥感”等名称,成为特异功能。

二、扶乩

巫术从发端到今天,也有面目全非的时候。许多研究者甚至把原始的占星术、算命术、风水堪舆和详梦说成是准科学,但随着历史的流变,它们的原有形态已不复存在。也许它们的科学成分早已分化了,如天文学从占星术中分离、实验化学从炼丹术中分离,这使今天的占星术、算命术、风水和详梦,找不到科学的影子,成为完全彻底的巫术。

扶乩是最好的例子。

最初的扶乩也许与真实的故事和民间祭祀有关,那种对于紫姑的虔诚的敬仰是可歌可泣的。但是,在当代乩坛上,再也找不到原来的紫姑。这种流变正是民间祭礼到神灵崇拜再到民间巫术的过程。

扶乩又称扶箕、扶鸾、请仙、卜紫姑等。“术士以朱盘承沙,上置形如玉字之架,悬锥其端,左右以两人扶之,焚符,神降,以决休咎。即书字于沙中,曰扶乩,与古俗卜紫姑相类。一曰扶箕,则以箕代盘也。”^[4]

扶乩最早发端于对紫姑仙的崇拜,宋人洪迈《夷坚三志》壬卷三“沈承务紫姑”条载:“紫姑仙之名,古所未有,至唐乃稍见之。近世但以箕插笔,使两人扶之,或书字于沙中,不过如是。”洪迈认为是唐时才逐渐出现扶乩,但南朝刘敬叔的《异苑》卷五却是早有这方面的记载。“世有紫姑神,古来相传是人妾,为大家所嫉,每以秽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厕间或猪栏边迎之,祝曰:‘子婿不在,曹姑亦归,小姑可出。’捉者觉重,便是神来,奠设酒果,亦觉貌辉辉有色,即跳踉不住。能占众事,卜未来蚕桑,又善射钩,好则大舞,恶便仰眠。”《显异

录》认为紫姑是唐时人,此说与刘敬叔在《异苑》中有记载一事相左,但《显异录》却记载得有名有姓,说明自南朝后,附丽紫姑之说的事还真不少,而真正的紫姑原型,已不可考。但不管何时,紫姑的故事却大同小异。《显异录》称紫姑,又名厕神,唐时人,姓何名媚,字丽卿,山东莱阳人。武则天时,寿阳刺史李景害死何媚的丈夫并把何媚纳为侍妾,引起李景的大老婆的妒恨。在正月十五元宵节夜里,大老婆将何媚“阴杀于厕中”。何媚冤魂不散,李景上厕所时,常听到啼哭声。后来,此事被武则天听到了,“敕为厕神”。也有的说被天庭知道了,“天帝悯之”,命为厕所之神。此后,民间便出现了一种习俗,妇女以想像中的紫姑之形作成纸偶或木偶,在元宵之夜于厕所中祭祀。有的说法是祭祀时妇女手提猪头,口中念念有词:“子胥不在,曹夫亦去,小姑可出。”“子胥”指李景,“曹夫”指“大老婆”,“小姑”即紫姑何媚。如果偶像动了,手中的猪头重了一点,那就是紫姑神来了,可以向休咎祸福,占卜诸事。

此种祭祀,就是原始意义的祭奠紫姑何媚,表现了对弱者的怜悯之心。从手持猪头供品以香烛供紫姑偶像到扶乩,人们以粪箕代替了偶像。箕在厕所里是十分自然的,取箕一只,饰以银钗,簪以花朵,用银钗一支插在箕口上,这就形成了一个抽象的紫姑偶像。将此箕供在粪坑边。另设供案,点烛焚香,小儿辈对之行礼。据《集说诠真》记载,此种供祭后来变成了将箕扶在供案上的形式,扶箕者为女性,不全拿在手上,而是让银钗一方搁在香案之碎米上。当然用木棍象征银钗也是很自然的事。人们在虔诚的祭祀氛围,香烟缭绕之中,未免有奇异的感觉,如觉得粪箕变重,变得不听使唤,这就被认为是紫姑神来了。由于手的颤动,箕的不平衡,银钗或木棍在案上便会移动。结果米上留不了银钗移动的痕迹。这被认为是紫姑神谕的显示。

这种厕中的祭祀后来被移到厕所之外,毕竟厕所的环境有诸多不便。于是在大堂的扶箕就有了市场。而且离传说的朝代越远,这种如厕实地设祭越没有必要。从厕所到大堂的跃进,也促成了由箕向罗筛的转变。最后专业扶乩者使用的用具,是用罗筛的外框,加一根横梁。横梁中心打一细孔,孔内插一支木笔。这样,箕边的“银钗”已变为插在中心的木笔,成为面目全非、惟剩象征意义的乩。

把厕所中的紫姑请入大堂后,单问厕所之事已嫌不够,而且既然是神是仙,其他事宜也应周知,于是便仕途功名、婚丧嫁娶、农耕商贸无所不问。专业扶乩人士的出现,使这种开场不易的神事活动也就不肯轻易收场。加上乩坛上的文字龙飞

凤舞,似是而非,为让人明白,满足问者心情,扶乩者又从事翻译“坛书”的工作,把旁人看不明白的“天书”译成白话,是为神谕。扶乩二人有专业的,也有东家的童男童女的,均能在乩坛上现出“字迹”来。假如不是自己的人配合写字,那么,童男童女在乩坛的香烟和术士的咒符之下,没有不心跳手颤、乩动笔移的。此时的扶乩,已成为完全的巫术。

扶乩巫术的变化,表现在紫姑的故事的变化、请神时间场所的变化和请神内容的变化诸方面,总之是越变越高谱,越变越完美。

附会于扶乩巫术中紫姑的故事,有多种说法。高祖因屡欲废太子立赵王如意,吕后深为不满,高祖死后,吕后就毒死了赵王,且殃及赵王母戚夫人。吕后断戚夫人大手足,挖眼薰耳,饮以哑药,置于厕中,后人遂把她当作紫姑来请。明朝冯应京《月令广义·正月令》称:“唐俗元宵请戚姑之神。盖汉之戚夫人死于厕。故凡请者诣厕请之。今俗称七姑,音近是也。”此外又有称“坑三姑”、“子姑”、“丁姑”的,其中“坑三姑”不属人鬼,而是天仙。《封神演义》第五十、五十一回说坑三姑系三仙岛上云霄、琼霄、碧霄三姐妹,专掌人间降生诸事。这些附会寄寓了人们的同情之心,而仙姑的加入又带上了浓厚的道家色彩。

扶乩之变,在请神时间和场所上也能表现出来。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旧俗,正月望夜迎厕姑。谓之紫姑。亦不必正月,常时皆可召。”地点则如上所述,由厕所移至正房。

请神的内容也随时间推移而变化,最后变成了无所不问。而神,亦由紫姑而七姑、子姑、丁姑、坑三姑。

扶乩的最大变化在于文人和道士、巫师操纵以后,已经变成了一种占卜游戏了。请来者不只是紫姑神女,又有各路神仙、名流。计有神仙吕纯阳、济公、邱长春、白玉蟾、道祖老子;佛教中的释迦牟尼、观音;历代名人关羽、文天祥;另有诗人、文人、名僧、名道、才女,想谁请谁。我们知道,道教是很宽容的宗教,正是博采众长,才使自己的教义丰富起来,因而道教乐得自己的神仙被巫覡占卜术士请去风光。民国初年出版的由于仲枯编纂的《道藏精华》收书 100 种,内有《唱道真言》,记载的就是钟离权祖师在南京乩坛所传仙谕,此书成于明代初年,被收入到正统《道藏》中,说明道教是承认扶乩的。但佛教却有些保守,它要维护本宗教的纯洁性。据云,民国十九年时,陕西名僧印光圆寂,半年后忽有北京的悟善社扶乩,请印光和尚到坛传不许多神谕。这些神谕被悟善社中人辗转传抄,流传到社会上。为此北

京佛教方面在佛教刊物《法轮周刊》上载文批驳,认为扶乩用释迦、达摩等佛祖的名义,是对佛的莫大侮辱。

扶乩之变为术士文人游戏的方式,则在历代笔记丛中传为美谈。《客窗闲话》卷一用嘲讽的笔调记载了一个书生扶乩问功名的故事。

有诸生群集鸾坛问功名者。鸾书曰:“赵酒鬼到!”众皆詈曰:“我等请吕仙,野鬼何敢干预!行将请天仙剑斩汝矣。”鸾乃止而复作曰:“洞宾道人过此,诸生何问?”诸生肃容再拜,叩问科名。鸾书曰:“多研墨。”于是各分砚研之,顷刻盈碗,跪请所用。鸾曰:“诸生分饮之,听我判断。”众乃分饮,讫。鸾大书曰:“平时不读书,临时吃墨水;吾非吕祖师,依然赵酒鬼!”诸生大惭而毁其坛。

这里戏弄诸生的,与其说是赵酒鬼,不如说是扶乩的巫师,因为鸾文是巫师译出的,说白了是巫师胡诌的。

亦有借乩坛显示机智才气的。这里的才气,也是扶乩人的才气。《七修类稿》卷三二载:尝有人召仙,请作梅花诗。箕仙遂写:“玉质亭亭清且幽。”其人云:“要红梅。”即承曰:“着点颜色点枝头。牧童睡起朦胧眼,错认桃林去放牛。”

又一箕仙题鸡冠花诗,亦如此改。其诗云:“鸡冠本是胭脂染。”人曰:“要白者。”箕又书云:“洗却胭脂似雪妆,只为五更贫报晓,至今犹带一头霜。”

《坚瓠首集》卷二说明代江南才子唐伯虎与箕仙对过句。唐伯虎召来箕仙,出了个“雪消狮子瘦”的上联,箕仙即对“月满兔儿肥”。当时的刑部郎中黄晦亦令箕仙对“羊脂白玉天”。乩仙说对句当出自丁家巷田夫口中。黄次日去试,一耕者锄土,问:“此何土?”耕者说:“露血黄泥土。”相似的文人故事在《志异续编》中也有。该书卷四说乩仙书“王马温赵四帅”,无人以对,乩仙又说:“定有才人来对。”这时金圣叹来了,对曰:“禹汤文武四王。”

扶乩之术,本不可信。在古人笔记中,信或不信,都有很多故事。清人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二记录了一则信乩行事者的故事:乩仙多系鬼狐假托,昔人论之详矣,然世人仍多信之。以余所闻,则无锡唐稚亭明府受祸最酷。稚亭以县尉起家,累擢至浙江之慈溪令,为人有才干,能饮酒度曲,上官俱喜之。而顾极信扶鸾,每事必谘而后行。在慈溪任时,乩仙忽告以大祸且至,宜亟去官。稚亭遂引疾,上官留之不可。未半载,滨海乡民入城滋事,后任官竟至罢斥,于是益神之。又询以卜居之所,乩言:天下且有事,惟金华府之武义县最吉。遂徙往居之。置田营宅,极园亭之胜,饮酒接歌,望者疑为神仙中人。咸丰戊午(1858年)二月,贼至处州,叩之,曰:

“无碍。”及破永康,又叩之,曰:“必无碍”。且云:“迁避则不免。”遂坚坐不出。此贼至,全家被虏,稚亭为贼拷掠,死甚惨。……至其家,断壁颓垣,焦原荒土,尸骸狼藉。

扶乩到了近代,已被会道门利用,成为帮会聚合会众和收敛资财的手段。会道门借神仙之喻向问乩者发号施令,信众鲜有不从,由此财源滚滚,会于茂盛。近代公开的会道门如“宣讲堂”、“道德会”、“红万字会”,秘密的“一贯道”均利用乩坛。民国初年锦州城北宣讲堂原只三间小房,因利用乩坛敛财,几年间轻易改建成大厦100余间的大庙,名叫三才寺。

三、占星术

占卜,是人类向神灵请求行动指令或获得神灵情感意志的手段,占卜有一部分是从兆应观念而来的,另一部分一出现就被当作向神灵乞求告知事态的前景、从而抉择适当行为方式的手段的,是纯粹的占卜。前兆迷信是对征兆的消极接受和适应,而占卜是对占验对象的积极观察和调节。占卜巫术是兆应迷信的承结,有多少种兆象和应象,就会有多种占验对象,有多少种兆应模式也就有多少种占验解释。

《唐开元占经》是瞿昙悉达对唐以前各种兆应模式进行总结的占卜之书,达120卷之巨。可见中国古代占卜巫术是很发达的。占验对象包括了天地日月、飞禽走兽、草木谷物各类自然物,占卜的方法更是千奇百怪,如龟甲占卜、《易》卜、金钱占卜、动物占卜、扶乩和拆字等等。古人最关注的并且也是最神秘的自然物是日月星辰,由此而生的日月星辰占卜内容十分丰富。日月星辰占卜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日月占涉及日月的光亮、颜色、运行速度和规律,日月中气的形状、颜色,日月与星的关系及日月形状等。星占也有丰富的内容。日月星辰占合称星占,即星占术或占星术。

我国最早的星占家是战国时代齐国人甘德,魏国的石申和相传商王太戊的大臣巫咸。前二人在司马迁的《史记·天官书》中有记载,依此例以后历代史书都要为占星术写下一节。

我们只知道甘德和石申是有名的天文学家,但须知天文学是从占星术中分离出来的。在甘石二人的年代天文学和占星术混在一起,天文学是后人给的美称,甘石二人等要研究的并非自然科学的道理,他们是利用一切资料和手段在研究天象与人事的关系。《唐开元占经》卷二十三中记录了甘宝的一段话:“单阙之岁,岁星

在子。与虚，危晨出夕入。其状甚大，有光，若有小赤星附于其侧，是谓同盟。“岁星即木星，是天空中肉眼可见的第二亮星，亮度仅次于金星。木星也是太阳系中最大的行星。它的公转周期为 11.9 年。甘德发现在岁星之侧的小赤星就是木星最亮的卫星木卫二。甘氏的发现是在公元前 346 年，两千多年后的公元 1609 年，伽利略才用望远镜做出了与甘德同样的发现。据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帛书《五星占》记载，甘、石对于金星和土星会合的周期都有十分精确的记载。金星的会合周期是 584.4 日，这个数字比现在的测值只大 0.48 日，土星的会合期是 377 日，比现在的测值只小 1.09 日。这种精确的天文数字，是占星家长期观测和利用历代积累的天文资料推算的结果。因为“历史有惊人的相似”，只有找到相同的天象，才能观测相同的人事。

古人肉眼可见的行星是五大行星，称五行，古人赋予五行不同的属性以解释自然和社会，五行相生相克，错综复杂。天空是一个巨大的气球，观察者站在气球的中央，而日月星辰都贴在天球壁上，气球是转动的，把观察者头顶一定宽度的天球带称作黄道带，则黄道带上不同区域有不同的恒星散布，行星和日、月则是按各自的周期在黄道带上移动的。占星术把黄道带上的不同区域与地面上不同区域联系起来。区域的分界是按岁星移动的周期划分的，因为岁星每 11.9 年绕黄道一周，所以，如果把岁星每年移动的区域为一个星次，则黄道可分十二星次，这相当于西方占星术的黄道十二宫。黄道十二宫是古代巴比伦人的一项随意性发明，此后更把每宫中的恒星视作一个星座。这些星座又被附丽了古希腊神话中的人兽形象，成为十二星座。今天流行的十二星座只是古代黄道带划分法的一种，却被占星家说成了必然性的结果。战国古代也有把黄道划为二十八宿的，《史记·天官书》中二十八宿与不同的州是对应的。比如角、亢、氏宿对应兖州；房宿、心宿，对应豫州。由于行星的移动，比如说木星进入到角宿，则兖州有某种兆应。由于占星术士有一张二十八宿与各州县对应的表格，所以异常天象比如行星干犯、日食、月食出现在那个星宿，就意味着地上某个区域会出现某种事态。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要占卜哪个区域的情况，也只需看那几个星宿就行了。

太阳光芒万丈，怎么看得出它位于哪个星宿呢？原来古人是在日落时观察到太阳的星宿位置的。比如太阳落下了地平线，星星依稀可见了，我们就知道了太阳落下后西边出现的是哪一个星宿，又从观察得知某一个星宿的西边和东边各是哪一个星宿，这样就可以推知随同太阳落下地平线的是哪一个星宿了。太阳就处在随

日落的那一个星宿之中。

星宿的异常主要有日食、月食、彗星、流星和各种行星的出现。不同行星的位置也在考虑之中。比如木星在心宿时,其他四大行星分别在哪个星宿,它们之间组成哪种几何图形,这都隐藏着某种寓意。这种星占的机理是中外一致的,比如1999年8月18日这个在现代中国世俗迷信中最为吉利的日月里(99-8-18:久久发呀发),各大行星和太阳地球在天宫图中形成一个十字,于是人们认为这是不吉利的。日本星占家五岛勉翻译了法国巫师诺查丹玛斯的《诸世纪》,在大十字问题上大做文章,这种说法牵涉到“世界末日”的邪说上,就认为如天主教所奉的“千禧”之年来临,魔鬼即将解除束缚,世界末日在此一刻。这种邪说在世界巫术信众中引起了恐慌,而事实怎样,我们都已经过。

《唐开元占经》除了介绍二十八宿占外,还介绍了五星占,石、甘、巫的“中外宫占”。五星指岁星、荧惑、填、辰、太白,也就是今天所称的木、火、土、水、金。中外宫则是指五星和二十八宿以外的星。星星日出即隐,日落则现,这是正常现象,但有时该隐不隐,该现不现,即为不祥之兆。星体伏见时间的早晚盈缩,也是预兆。《汉书·天文志》说“辰星”“出蚤为月食,晚为彗星及天祲。一时不出,其时不和;四时不出,天不大饥。失其时而出,为当寒反温,当温反寒。当出不出,是谓击卒,兵大起。”^[5]辰星离太阳最近,绕太阳一周只需88天,它与太阳的视角不大,总是伴随在太阳的左右,并受到阳光的遮掩,使人看不清楚,又因为受到地平线附近大气的扰动,使之看上去如在水中波动,故名水星。辰星在太阳的西边时,尚可在日出前见它一面,此为当出而出,假如在太阳东边,则当出不出了。以此预测天不温寒祸福,真是忙煞占星人。

五星的“合散犯守”,均为星占的重要依据。合,就是在某星宿相会。五行中某几颗聚会于某一星宿是常出现的,但会于哪一星宿,哪几颗相聚会,则有不同的兆应。散,是指不行列而聚,即违反常规的聚合。犯,就是干犯,即行星行到某星之近距离,“七寸之内光芒相及”大概是干犯的最低标准。犯的范围很广,五星互犯,五星犯二十八宿,五星犯各星等均是。二十八星宿指的是角、氏、亢、房、心、尾、箕、斗、井、女、虚、危、室、壁、奎、娄、胃、昴、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各宿分别兆应各地人事,所以王勃《滕王阁序》中说“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翼轸二星宿即楚之分野。唐王勃作文,很熟悉南昌之天地分界,说得清清楚楚,这说明占星之术在古代深入人心。“犯”在占星术中是凶兆。与此相似,守,一

般也是凶兆,守是指行星运行过程中在某一星宿的停留。守不是犯,是因为它不是近距离接触,不到“七寸之内光芒相及”的程度。

于光远先生认为,龟占和星占是古代大臣为皇上出谋划策的借口。大臣要皇上有所为,有所不为,但又怕皇上不听,于是借天意来发表意见。同时,这样做也避免了用谋策不当造成损失时所带来的风险。不过这只是占卜形成原因的一方面,而且这种规避风险的效果也是十分有限的。卡尔·萨根认为,“中国宫廷星占学家如果预测不精确就要被处决,因此许多星占学家将天文记录改头换面,使之符合后来发生的事件。星占学成了观测、数学和观点含糊、内容失真的记录的大杂烩”。^[6]星占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哲学基础,古人希望找到人事变化的征兆和事物发展的规律,他们将人事与自然物的变幻联系的想法是很自然的。中国占星术是一种皇家占星术,它占卜的是国家大事,虽然这种星占学理同样地一般适应芸芸众生,但在天人对应的观点不,把最明亮的星星都分配给了大人物,老百姓也只能对应一些无名小星了。星占中流星、彗星等异象对应人间凶祸,不过老百姓并不认为它是自己家庭将遇到什么不好的事的征兆,而是预示着社会性的大事,比如“灾年”和“荒年”来了一类。西方以占卜个人命理为主的生辰占星术在中国古代没有出现,中国的命理学更多是以生辰和相貌为依据的。虽然生辰中天干地支也对应“五行”,但此处的“五行”与其说是天土的行星,不如说是一组哲学名词了。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占星术对中国的影响。西方占星术较之中国占星术有更大的欺骗性,更大的市场。这表现在以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西方占星术的生辰占星术部分适应平民心理,尤其适合了青少年心理。西方占星术把黄道十二宫与人的命运理相对应,并杜撰出种种象征意义,如不:白羊座(3月21日~4月20日):勇气、斗志、领导能力、现实感、责任感、专横、自发性、激情、活力、本能;金牛座(4月21日~5月21日):沉着、冷静、思考、自控力、性爱、缓慢、固执、缺乏情趣、热爱大自然、惰性和质朴;双子座(5月22日~6月21日):心志强、好奇心、适应性、商业感、思维敏捷、三心二意、思考;巨蟹座(6月22日~7月22日):淋巴体质、母爱和家庭观念、易怒、怯懦、真诚、敏感、想像力、童心、直觉、组织能力;狮子座(7月23日~8月23日):意志、事业感、生机、雄心、专横、真诚、大度、虚荣心、激情;室女座(8月24日~9月23日):分析能力、谨慎、秩序、方法、实际感、功利主义、怯懦、批评精神、利己主义、雄心;天秤座(9月24日~10月23日):艺术感、精益求精、正义感、社交性、优柔寡断、懒散、浪漫;天蝎座(10月24日~11月

22日):顽强、耐力、吸引力、生机、好斗性、破坏欲、神秘、复仇心理、性爱;人马座(11月23日~12月21日):坦率、独立精神、高傲、自负、动摇、热情、慎重、旅行、冒险;摩羯座(12月22日~1月20日):内向心理、专心致志、严谨、责任感、廉正、持之以恒、节俭、权利意志、忧郁、怯懦、冷漠;宝瓶座(1月21日~2月19日):利他主义、独创性、社交性、独立精神、思想的即定性、争奇斗胜、革新精神、怪诞;双鱼座(2月20日~3月20日):神秘、献身精神、敏感、想像力、慷慨、忧虑、同情心、温情、浪漫、不健康的癖好、吸毒。我这里不厌其烦地把“星座与性格”的对应列出来,可以满足读者了解自己“性格的规定性”的要求,同时,更重要的是让读者从上述“规定性”本身找到它的矛盾。比如说每个星座性格都是模棱两可的,有些规定性显然与事实相悖。十二个星座中只有双鱼座的人有“吸毒”的规定性,这就与事实相去甚远。P·布瓦尔说过:“有人想到了著名的伏尔泰的例子,他在回忆里斯本的地震致使五万人死亡时说,遇难者具有相同的命运,但他们的出生天宫图是完全不同的。”他说:“记者曾做过一次实验,他们把一些人的有关情况输入计算机,结果得出的全是错误的预测。如对一个绰号为‘伦敦杀手’的歹徒,计算机所显示的星辰分析是‘性格活泼、开朗、精力充沛、富有合作精神和幽默感,’而对于63次杀人的比奥特,其性格描述是‘具有良好的道德观念,文明礼貌,因循守旧,是一个诚实可靠的公民’。”^[7]“星座与性格”的骗人之处还在于,当我们把自己的实际情况与占星术的规定性相对照时,我们对照的只是性格中的某一部分。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复杂体。我们可以从以下的试验中得到这种情况的说明。

假设我们要从以不三个候选人中选择一位来造福全世界,你会选择哪一位呢?

候选人甲:他笃信巫术和占卜;有两个情妇;有多年的吸烟史;而且嗜好马爹利酒。

候选人乙:曾两次被赶出办公室;每天睡到中午才肯起来;读大学时曾经吸食鸦片;每晚都要喝一夸脱白兰地。

候选人丙:曾是国家的战斗英雄;保持着素食的习惯;从不吸烟,只偶尔来点啤酒;年轻时没有做过什么违法的事。

答案是:甲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乙是丘吉尔,丙是阿道夫·希特勒!

也许有许多基本要素没有列举出来,否则我们何以会搞错?当我们沾沾自喜于占星术士为我们开列的性情清单时,我们应该意识到还有多少没有开列出来,即使已经列出的也大都那么牵强。未开出的有多少是至关重要的呢?

但是,作为开始关注自己的性格和前途青少年来说,当他们找不到更贴近他们实际的关于心理学的书籍时,他们往往会尝试查对“星座与命运”的小册子。而港台明星的“星座”煽动更易使“星座”相同的热衷者成为坚定的追星人。

西方占星术往往戴上科学的桂冠,成为伪科学。这就有很大的欺骗性。法国巫师、星占家伊丽莎白·泰西埃是用这样的逻辑使占星术混入科学队伍的——她说:星辰学可以预测未来,预测是科学的领域。虽然她也承认预测是星辰学的薄弱点,但她的言不之意是星辰学在科学的领域。今天,星占学混进科学殿堂的手法之一是列举历史上有影响的天文学家原来也是星占学家,如托勒密、第谷、开普勒。第二个手法是使用科学的名词,他们把占星术称为“星占学”、“星学”或“星辰学”,并找来许多科学名词放到他们的理论中。这些名词如:“宇宙能”、“宇宙影响”、“辐射”、“天体演化学”、“精确科学”、“人格科学”和“现代星辰学”等,很有迷惑性。

星占家还采用在统计上假造证据的办法来迷惑信众。严肃的科学家怎么也得出不了星占家的那种统计结果。1975年,物理学家约翰·麦克格维对16634名科学家及6475名政治家的生日作了统计,其结果表明他们并不是集中在某个星座中,而是平均分布于各个星座。澳大利亚化学家、星占学家丁恩曾组织五十多人编写了一部占星术百科全书,涉及近七八十年来发表的占星术书刊资料,研究了所有能得到的生辰占星术材料,然后,丁恩得出了一个对自己来说也不无讽刺的结论:没有任何明显的证据表明可以用古典占星术做出什么预言。

当然,西方占星术术理不只在“星座与性格”一项上,它有比较繁杂的内容,但这些内容庶几如“星座性格”分析,都是毫无道理的伪科学。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西方,法国人中的53%,德国人中的三分之一,英国人中的75%,认为占星术是科学的;虽然在美国有一万名职业星占学家,57.5万名业余星占爱好者;虽然像美国总统里根这样的人也敢于把自己和国家的命运由巫师琼·杰奎琳来掌握,但是,星占巫术仍然得不到科学和主流社会的承认。法国巫师、星占学家伊丽莎白·泰西埃曾将星辰节日搬上了法国电视台,但这个节目只办了几期,就被186名科学家(其中18名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美国《人道主义者》杂志上的联名声明赶下台去了。科学家揭露了星辰学试图将人的命运与星辰、行星和宇宙天体联系在一起的行径,而泰西埃竟恬不知耻地说“节目的开播处在十分矛盾的行星影响之下,也就是说,尤其是土星与我出生时的太阳方位相冲,这意味着好景不长,事实上果真如此,节目很快就中止了。”[4]星辰节目是为了打自己的招牌来

招揽生意,泰西埃绝对不应以在电视台半途而废的形象来塑造自己,那么,她为什么不选择一个黄道吉日来开播她的节目呢?

那个相信琼·杰奎琳的里根,也就是据称看见过飞碟的里根,也因为听信巫术,而在“伊朗门事件”中十分难堪。知道自己的命运被笃信巫术的总统把握的美国人这时才清醒占星术可不是55%的青壮年随便信仰一不的家家一样的小事情了,于是他们愤怒了。

我看过张东煜的《星座与命运》,他以对待洪水般紧张而又坚定的态度在此书的最后一个标题上说道:决不能让占星术在中国泛滥!张东煜君意想不到的,正是他那本小册子发行的那一年,那家出版社所在的省份的电视台文体频道正尝试着把“星座”故事放进了电视节目。

第二节 周易预测

假如皇宫的星占大臣可以任意更改星占记录,假如占卜预测之事没有严格精密的验证,而是任由占卜家对占卜之事作出解释——有时甚至是毫不确定的解释,那么,还有什么预测之事是不灵验的呢?

至迟在夏代末年出现的龟卜预测,是借灼钻龟壳出现的纵横纹路,来寻找所占事件的征兆的。许慎《说文解字》释“卜”为“灼剥龟也。象灸龟之形。一曰象龟兆之纵横也。”

司马迁在《史记·周本记》中说:“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龙止于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 而藏之,乃吉。于是布币而策告之,龙亡而 在,犍而去之。”

相传夏帝犍藏的龙 ,经殷代传到周厉王时,被打开来,由 水化的玄鼈,在后宫与宫女交媾,生不一女。此女后来被弃宫外,为一夫妇收养,长大后,就成为美貌倾国的褒姒。褒姒后来成为了周幽王的爱妃,幽王为博她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结果送掉了西周王朝。这个结果,与夏代卜人的预测正好相反。

龟卜之风,于殷为盛。殷代之后,却也流行。《左传·僖公四年》说:“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晋献公要立骊姬为夫人,龟卜的结果为不吉,但献公“吾意已决”,只不过是借卜筮做做样子,走走过程,虽然卜人有卜人的说法,但献公仍坚持了“从筮”的意见。

晋献公贪骊姬之美色,为后来晋国大乱埋下了祸根。

筮占是以蓍草来进行推算,演成《易》卦,据此推算吉凶。这种预占较殷人的龟卜更加人文化了。它不仅有了物象的依凭,还有了抽象的数学问题。蓍草,别名锯齿草、轴颀草,菊科,多年生直立草本,叶互生,长线状披针形,篦状羽裂,裂片边缘有锐锯齿。我国北部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分布较广。全草可入药,民间用以治风湿疼痛,或外用治蛇伤。茎叶含芳香油,可作香料,亦可栽培于庭院供观赏。百茎共生在一个根上的蓍草,乃神奇之物,用以推算《易》卦,这事《史记·龟策列传》上有记载:“蓍生满百茎者,其下必有神龟守之,其上常有青云覆之。”

原来筮占仍然与龟有联系。

筮占的《易》卦,为伏羲所作,这种传说是从《易·系辞传》中来的。后来,汉代的孔安国、马融即用此说。伏羲八卦,每卦三画,是为乾、坤、离、坎、巽、震、艮、兑。相传夏、商、周三代都有人演绎《易》卦,分别为《连山》、《归藏》和《周易》,前二《易》均已失传或不可信。《周易》被认为是周文王演绎的。《史记·周本纪》说:“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 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今学者认为《史记》所言是神化了周文王。《周易》应是周人所作,文王在其中或起了重要作用。由周文王亲自演绎《易》卦,可以看出周代对《易》占的热衷程度。据《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说,陈厉公(公元前 706 年即位)为儿子陈敬仲预占得知,陈敬仲娶妻之后,到齐国发展,五世之后可成为正卿,八世之后,就能取代姜姓做齐国国君。果然在公元前 404 年,即三百年后,由陈敬仲的后代取代了齐姜氏。周代用筮占,十分普遍,仅《左传》、《国语》中就有 23 次记载。

周文王推演伏羲八卦为六十四卦,并写了每一卦的卦辞,成为《周易古经》,传说孔子及其弟子熟读《周易古经》,创作《周易大传》十篇,称《易传》,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周易》,包含有六十四卦、说卦、大象、彖传、文言、系辞等部分,是历代不断诠释的结果。而《周易》之成为“经典”,则是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此时《周易》成为《五经》之首,取代了《乐经》。

对于孔子是否研习过《周易》,李约瑟在《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中提出了异议,《论语·述而》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李约瑟认为这是后人加上去的,其理由是与《论语》同时代或稍后《中庸》、《孟子》、《荀子》都未曾提过《易经》。而且孔子的性格也不合研究占卜之事,《述而》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我们分析《周易》文化传统时,恰恰应从孔子时代的关注开始。因为假如孔子说过

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他没有思考《易经》的占卜之事,而是在进行哲学的理性的思考了。我们认为,《周易》的两个文化层面——理性思维和巫术迷信——正是从春秋时代开始的。有一个故事说,当时鲁宣公的夫人、鲁成公的母亲穆姜,与大夫叔孙侨如私通,并合谋废掉成公,兼并孟孙氏和季孙氏,立侨如为国君。后来阴谋败露,侨如逃往齐国,穆姜被贬,软禁冷宫。有人为她算了一卦,说是只要随情夫逃走,就可以无咎。穆姜却说,这一卦讲无咎,是因为它有元、亨、利、贞即仁、义、利、智等四种德行,而我参与了叛乱,使国家不得安宁,又不顾尊严与人私通,四种德行一样也没有,怎么会无咎呢!这种解释,赋予了卦辞以伦理道德的含义,认为人事的吉凶同人的道德品质相关,所以虽然卦辞说“吉”,也不能改变人的处境。这就是对于《周易》的理性思维。孔子学易,恰恰在于“不语怪、力、乱、神”而提高到道德的境界,认为《易》是一本道德方面的书,可以使人“无太过”。被李约瑟认为不提《周易》的《荀子》实际上也认为“善为易者不占”。

《周易》的理性思维传统自春秋始,源远流长。到了战国时期,随着百家争鸣的开展,人们的理性进一步觉醒,思想进一步解放,思想家们对《周易》的框架结构和卦辞爻辞作了全面的哲学解释,从根本上改变了它的宗教巫术性质,将这部用于占筮的算卦之书升华为讲宇宙人生哲理的典籍,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易传》。汉代有大批学者研究《周易》经传,这种研究被称为“易学”。易学依据《易传》对《周易》的解释进一步探讨和阐发了其中的哲理。这一经学传统,一直延续到近代。历代大思想家或大学者如司马谈、王肃、王弼、阮籍、孔颖达、欧阳修、周敦颐、邵雍、司马光、王安石、张载、程颐、苏轼、朱熹、王夫之、黄宗羲等都对《周易》经传有很好的研究和诠释,他们抛弃了《周易》的神秘主义成分,具有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特色。这些研究者被称为义理派或称为哲学派。

《周易》研究的神秘主义倾向则在“象数派”中流传,它成为当代伪科学、迷信和“易数巫术”的源头。象数派又称术数派,该派主要特征是以河图、洛书、卦象及《易经》的一些特定象数与数字为研究对象的。

河图和洛书作为《易经》的一部分,据称是伏羲制作八卦的依据。《系辞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说明河图洛书是出圣人的征兆。《尚书·顾命》说周成王殁,周康王退位时,在即位大典上陈列的宝物中,就有河图。这是关于河图的最早记载。但古人记事情简洁,后人竟不知河图为何物,所以就极尽猜测之能事。又因为河图洛书之出,是圣人出道之征兆。所以,各朝都热衷于杜撰河图洛书及其故

事,以示君权神授。李申在《科学与无神论》上连载《话说〈河图〉》认为:一、周朝初年,或许曾有河图存在。但说它是上帝恩赐的神物,则是人为制造的神话,至于这河图的样子,今天也无从得知。二、从《论语》以后,所有的河图都是人为制造的,绝不是由龙或马从黄河里送出来的、上帝恩赐的神物。三、这些人造的河图,汉代人造的是一本书,内容主要是关于谁该做皇帝的话。宋代人造的是黑白点阵,这些点阵被说成是画卦的根据。四、宋代以后,仍然不断有人从事制造河图的工作,其中最著名的是阴阳鱼图。这幅图从清朝开始,被说成是太极图。五、综上所述可知,宋代著名儒者欧阳修早就说过:“河不出图”,并把一切有关龙马负图的神话视为妖言。欧阳修的意见是正确的。

易学作为一种解释性理论,其体系结构包含卦、象、义三个层面,“卦”指卦爻画系统,即六十四卦,它在本质上是数学性的模型。“象”是卦爻的象征物,最基本的八卦对应的是天、地、水、火、风、雷、山、泽,但《易》占时卦爻的象征物却要涉及性别、动物、自然物、五行、方位、季节、昼夜时间、阶段类型、颜色、人体部位、人的性格及其他抽象概念等十多项。以乾卦为例,它代表或象征父、阳、龙、马、天、金、南、西北、晚秋、黄昏、君主、深红色、头部、存在、力量、武力、圆形、广袤和赠与者。“义”即卦爻辞,分别缀于卦和爻作为占断参照,其形式是意义性的陈述。以“乾”卦为例:“乾上乾下。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乾卦由六长横线组成,自下而上,下面是乾卦,上面也是乾卦。“乾”的卦辞是元亨利贞。这四个字代表“仁、义、利、智”,含有“原始、亨通、祥和、守正”之义,又可以代表事态的“开始、发展、成熟和收获”,还可以代表季节的“春、夏、秋、冬”。从初九到上九,均为爻辞,每爻一句。初九是最下面一爻,由于这一爻在其他五爻的重压之下,故有潜伏状,是“潜龙”,不会被重用。所以叫“潜龙勿用”。第二爻仍然是阳爻,代表龙,但此爻处在上下两阳爻之间,如在田间,故曰“见龙在田”,龙出现(见)在田中间,有利于见到大人物。以下各爻均有爻辞。上九,是指最后一爻,在最上面。最后一句“用九,见群龙无首,吉”是对各爻用数的注释。这里牵涉到起爻的问题。

《易经》是一种预兆和农民经验混合而成的经文,其占卜方式至少有如下四种:一,农民预兆解释;二,以抽签拈得蓍草的长短茎,画出连和断的线条以占卜;三,根

据火灼龟甲及兽之肩胛骨所得之裂纹,以占卜休咎;四,用各种简板或其他骰子、骨牌的形式占卜。《易经》占卜就是用这些办法先把占卜时所得的兆应用长短线条记录下来,然后对照卦辞爻辞获取神谕的。现在,我们看正统《易经》起卦法是如何以貌似客观而又随机的方式获得卦爻,然后再去对照卦辞爻辞以获得卦义的。

正统周易起卦法如下:

(1)“大衍之数五十”,用 50 根蓍草或竹签,拿出一根不用(像“太极”)。

(2)一变:剩下的 49 支,任意分成左右两堆(像“两仪”);从右堆先拿开一支(像“人”),然后左右两堆分别 4 根 4 根地数(像“四时”),数到各剩下 4 或少于 4 根为止。将两堆的余数拿开,而这些数过的蓍草集中放在一起,共 44 或 40 根,进行“二变”。

(3)二变:将一变后集中的蓍草,又任意分为两堆,从右堆先拿开一根。然后,两堆分别也是 4 根 4 根地数,数到只剩下 4 根或少于 4 根为止。余数拿开,而数过的蓍草合在一起,共有 40、36 或 32 根,以进行“三变”。

(4)三变:将二变后合在一起的蓍草又任意分为两堆,从右堆先拿开一根,然后两堆分别 4 根 4 根地数,数至剩下或少于 4 根为止,将余数拿开,数过的蓍草合起来,有 4 种可能结果:即 36、32、28、24 根。各除以 4,即为 9、8、7、6。9“老阳”,是可变的阳爻;8为“少阴”,是不变的阴爻;7为“少阳”,是不变的阳爻;6为“老阴”,是可变的阴爻。

(5)这样经过三变,得到的是所起的卦的第一爻即初爻。然后再把以上过程重复做五次,可分别得出第 2~6 爻,总共经过“十八变”,才算完成了起卦的工作。

这样所起的卦即为“本卦”,某一爻是 9 或 6,则需变爻,爻变后,即为“变卦”。

回到乾卦卦词中的“用九,见群龙无首,吉”一句,即是说筮卜所得的阳爻,虽然,有少阳和老阳(又称太阳)两种,分别是 7 和 9,但在爻辞中均下称 7,而称 9,故此卦自下而上称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同理,在坤卦中,各爻都为阴,阴有少阴和老阴两种,分别以 8 和 6 表示,在爻辞中用 6 而不用 8。卦辞为“用六,利永贞”。

虽然《周易》卦象的获取经过了繁复的程序,《周易》的卦辞爻辞也是在貌似辩证的思维中得出来的。但是,这种作为占卜基础的卦爻的获得,永远只可能是随机的,偶然的。在浓重的巫术氛围里,合法的卦爻,只有一个。如果我们允许在同一时间对不同的事情进行两次以上的筮占,那么,两次或多次筮占相同的几率是可以

算出来的。这个几率是很小的。它说明了筮占和投骰子或抛硬币一样,是随机的。之所以不以抛币占卜,而用筮占,一是因为蓍草具有神秘性,另一是因为人事是复杂的,而抛币太过简单了。人事的复杂是一个无穷大的数目,关键在于怎样去分析。不可能有一系列无穷多的卦爻以备考,从八卦推演到了六十四卦,已经够难为古人了。但即令有六万四千种卦爻,又适应得了纷繁复杂的人事吗?

《汉书》中提到一位道家学者,叫严君平。他混得不好,不得已在成都卖卜为生。但他自己认为“卜筮者,贱业”,每天只得数钱,能糊口度日就行。剩余的时间“闭肆不市”,研读《老》《庄》。这说明《周易》文化中的占卜方术,在汉代即有人认为是下贱的事。所以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占筮归入了“术数类”。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民间又出现了一大批借《周易》名义变象数易学为算命术的书籍。这些书如《火珠林》、《梅花易数》、《四柱命理》、《紫微斗数》、《卜筮正宗》等,它们依卦象中的干支排列和五行生克程序,用违反逻辑的推理比附,推断人事吉凶,而很少涉及甚至抛弃《周易》卦爻辞,使《周易》筮法走向堕落。这股术数学风,至当代而变成“周易预测学”。

著名易学家董光壁先生认为:“科学预测有三种基本形式。一种是根据相关事件出现的经验以相关陈述做出预测,如古埃及人在4000年前就根据天狼星偕日日出预报尼罗河涨水。另一种是根据一个观察样本的相对频率逻辑地做出推论,如产品质量的抽样检验。再一种形式,也是最理想的形式,是依据事物的普遍因果性经验规律作预测,根据规律及其前提条件逻辑地推论事件的发生,如赫歇尔根据天体力学预测了天王星的存在,门捷列夫依据元素周期表预告未知元素的存在等。”^[9]与此相反,神秘预测依据的不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经验认识和理性分析,而是以偶然的现象和随机的证据比附或然的经验事实,其哲学基础是形而上学的。《易经》数术的迷人处在于充分利用了人们的关于《易经》哲理的经验事实,利用了人们对于《周易》哲学传统的信赖。这种伪科学搭售使人们真假莫辨,易于入迷。有邵伟华,1936年生,肖崧,自称北宋唯心主义哲学家邵雍之29代孙者,所著《周易与预测学》被国家新闻出版署(91)新出图字第1151号文认定为“宣扬封建迷信”而予取缔,又有(91)新出图字第1302号决定“立即收缴、销毁”,不虞嗣后,邵著《周易预测学讲义》又取而代之,此书变梅花易数、八字、神煞、十天干生旺死绝表等为貌似高雅严谨的现代科学,以易数预测天气、行人、失物、疾病、工伤、配偶、升学、来意、婚姻、怀孕、财运、地震、足球比赛、申办奥运会和卫星发射等等。如其“讼失”章称:

“有的人之所以犯罪的真正原因,就是人的出生年月日时和这个时间决定的卦象中,早就储存了的信息,这种信息,运行到预定的时期,就会爆发犯罪”;“人的出生时间里,储存了犯罪的信息,是有科学道理的”;“因此,有的人出生时间中储存了犯罪消息,或者是基因,这就是犯罪的内因之一,但国内法学界,并未注意这点”;“不管是你过去犯了罪,还是今后要犯罪,都可以预测出来,八卦预测犯罪,对预防犯罪,减少犯罪,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10]这段文字引自况钟副教授的文章,引文中有一处语病,一处错误,前者是“有的人之所以犯罪的真正原因”一句,后者是讲“不管是你犯了罪,还是今后要犯罪,都可以预测出来。”这里姑且不提。批评伪科学原著回避不了的一个难题是伪科学原著的语病繁多,逻辑紊乱,这种情况在柯云路的“生命科学系列”中大量存在,搞得批评界习以为常,见怪不怪。或许宣扬怪力乱神者,本该有点异象。真是内行看门道,邵伟华这位神秘主义者站在易数的高度,一眼洞破了令政治家和法学界头痛的犯罪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神秘易数出版物远不止邵氏一两种,笔者所获《于平通鉴》,系中国经纬出版社(香港)出版,为《易学应用丛书》之一种,另有《阴阳雾》、《完全铁板神算》、《皇极易数》、《铁算盘全解》、《皇极经世》、《铁板神数批判》、《象易》、《瞎子王秘诀》等,其中或有对“神秘易数”进行理性批判者,但多是神秘易数的宣传品,在国内图书市场上可以看到,亦可向出版社邮购。在《于平通鉴》附录邮购目录中,即有邵伟华《邵氏符咒化解学》(内刊)、《周易奥秘详解》(内刊)、《四柱例题剖析》(内刊)三种,因未购得,不知为何等货色。而《皇极经世》即邵氏所称为其祖先的邵雍的著作,约成书于1060年。

在《皇极经世》中的伏羲先天八卦图,是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八卦图。邱雍分析了伏羲八卦和文王六十四卦之后,偶然发现了卦爻阴阳排列的规律。与此同时,西方的莱氏正在研究二元算术,我们的算术,通常都以十为基数,而在整数末位加上零,使数目增加十倍。但这种用法纯属任意的,算数可以用十二,而不用十作基数,这种情况不,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就不会有分数了。有些数目的特性,对任何系统来说,都是基本的,而其他的特性则视任意选择的基数而定。于是莱氏觉得以二为基数的算术不无可能,并且也许会更有用。莱氏以此写成《论二元级数》,于1679年发表。1703年,莱氏的理论系统化了,在这时发表的《二元法算术之解说》的小标题中解释道:“零与一,并论其用途及伏羲氏所使用的数字意义。”于是,伏羲六十四卦被认为与莱氏的二元算术有相近相似之处,并且,由于莱氏的二元算术给予了现代数学逻辑的创立者和制造计算机的先驱以积极的启示,于是伏羲六十四卦

图被一些研究者附丽了二元算术的意义。

柯云路《大气功师》有《再破〈易经〉》一章,在此章中柯云路在分不清《易经》和《易传》、老子和《老子》等问题上受到了评论界的嘲笑。但这不是主要的毛病。主要的问题在于此章抄录了许多神秘易数的东西,其中即有伏羲六十四卦与二进制和计算机数理等一系列易数神奇。

莱氏把他的二元算术与伏羲六十四卦联系,是因为朋友白晋向莱氏介绍了《易经》。白晋曾在中国传教,对《易经》有兴趣。白晋发现若按二元系统,《易经》中的六十四卦若以阳爻代表一,阴爻代表零的话,可以解释为数字的另一种写法。1701年4月莱氏把他的二元数字表寄给白晋时,白晋发现了它与重卦的相同之处,于是白晋制作了两个图表以显示这种相同之处,并于11月寄给了莱氏。在图表中,白晋按伏羲先天八卦次序图,以坤为首,然后是剥、此、观、豫等打乱次序重新排列,以显示其与二元算术的相同之处。这种对应是坤:000000,剥 000001,比:000010,观 000011,豫 000100,晋:000101,依此类推。莱氏收到图表,对自己所写的由63到0之数目《易经》六十四卦,大感惊讶。因为当时的人相信《易经》至少是两千年前的书,他对“创造中国帝国的伏羲氏在推演的八卦中曾用二元算术”这一发现感到异常兴奋,他的相关论文在学者中引起了反响。这就是《易经》与“二元算术”神秘关联观点的来源。

李约瑟认为:那种认为六十四卦隐示一种对位值和零的了解的观点显然是应予弃置的。“发明六十四卦的人仅关怀于阴阳两个基本要素的所有排列和组合而已。阴阳既已形成,则数个同样合于逻辑的排列就可能。……假设重卦(或六十四卦)是具有数学意义的说法,其主要缺陷……乃古代《易经》的学者的思想,绝无数量的计算。就一卦者用断线代替连线或反之,来处理六十四卦的‘变化’而言,他们或可以说是在做二元算术的运算,但他们确是不知觉的。”而“任何的发明,不管是数理的,或机械的,我们必须要求发明者自觉地且为利用而发明”。[11]

对于中国人认为《易经》包含有科学原理的“易数”之风,李约瑟曾引用 Legge 的话:“凡是接触过‘西方’科学的中国文大学者都喜欢说:‘欧洲的’电、光、热和其他物理学原理都涵于八卦中。当被质其国人何不知这些原理时,他们说他们要先从西方书籍学习之,然后一索《易经》,便见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已经知道了。这种浮夸假设,显然稚气十足。除非中国人将对于《易经》已包含一切的幻觉除去,否则《易经》会成为中国人踏上真正科学之途的绊脚石。”[12]

李约瑟认为,《易经》那种繁细的符号系统,几乎从开头便成为一种有害的障碍,它使那些对大自然发生兴趣的人,采用根本不是解释的解释。这种论述是精辟的。《易经》首先是一部筮占巫术之书,然后其中亦蕴藏了一些足以资巫覡自圆其说的辩证的哲学道理,仅此而已。《易经》经各代注解作传所阐述的哲学原理,本不是《易经》所固有的,它只是反映了后人的思想观点。

第三节 谶纬神学

谶纬神学是汉代的一种社会思潮。《论文》:“谶,验也,从言, 声。”谶“诡为隐语,预决吉凶”,是一种神学预言。宣扬的人称谶言是“征信”的,符合神意,故曰“符”,天意之“符”出于“天命”,所以又说谶是一种“符命”,谶纬神学家们所宣扬的经典之作《河图》、《洛书》被染为绿色,以别于其他书籍,这些谶纬之书就被称为“纬”。《河图》《洛书》合称“图书”。纬是织机上的横丝,相对于经而言。以纬为书之名,是从“经书”拈连而来的。我们今天讲“经书”,是讲被奉为经典的书。“纬书”之名是依据“经书”之名造出来的。有些什么经书,就有些什么纬书,故有“五纬”,“七纬”与“五经”、“七经”对着干,唱对台戏。比如,“经”有《孝经》,纬就有“孝纬”,叫《孝经纬》。这些纬书是以神秘主义解释经的微言大义,宣扬天命论,把统治者神化,说国家治乱兴衰、帝王将相的出世,都是天命安排的。《孝经纬右契》说:孔子作《春秋》,制《孝经》。既成,拜天。天降黄玉,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读之曰:‘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刃,在衽北,字禾子,天不服。’”(1)这是一则离合字谜,卯金刃,即“刘”字,“禾子”为“季”。刘季,即刘邦。孔子是春秋时人,他读的有关刘邦出世的谶言由后来的事实应验了。纬书不但有自己的神秘理论,而且也宣扬谶言,故谶言纬书合称谶纬。

谶言是人造的,并非神灵之言,这从它的粗俗浅陋可以看出。并且由于一个人的姓名既定,有些是极不好制作谜语的,所以,虽然用尽了拆字法、五行法、双关法、谐音法、别名法、特征法,仍然未免粗陋。东汉末,董卓篡权,京师出现了“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的意谣,这样的谶谣算是制作较好的。虽然在《说文》中“卓”不由“十日卜”而是由“早匕”组成的,但能做成这样,也不错了。谢承《后汉书》说,东汉蜀郡治安混乱,时有意谣云“两日出,天兵戡。”且云,不久,黄昌到蜀郡任太守,雷厉风行,宿奸大恶皆奔走他乡。这里讲“昌”是“两日”,不是太牵强了吗?

唐代宰相李逢吉与前相裴度相互不服,逢吉任宰相后,便贬裴为地方节度使。后来,唐昭愍帝要召裴度还京,逢吉让手不到处散布谣言说:“非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无口被驱逐。”此讖的解释是:“非衣”为裴,“天上无口”是“吴”字,指藩镇吴元济。吴元济被裴度平息,却“坦”了自己的“腹”暴露了阴谋。舆论既出,李逢吉乘机让其死党张权舆上疏说裴“名应图讖”,居心叵测,不宜回京。

讖言作为信息载体,针对性很强。故常常无中生有,以至于后来由讖谣而生出了“谣言”一词,以示其不足征信。讖言之伪,古人是看得出的。明扬慎《丹铅杂录》卷二从文字学的角度指出:“古文自变隶,其法已错乱,后转为楷字愈讹,殆不可考。如云有口为吴,无口为天。吴字本从口从矢,非从天也。后世谬从楷法言之。予尝谓吴元济之乱,童谣有小儿天上无口之讖。又如董卓为千里草,十日卜;王恭为黄头小人,皆今世俗字,非古文也。史谓童谣乃荧惑星为小儿造谣,审如此,荧惑亦不识古文乎?”^[14]

虽然讖谣之源可以追溯到西周时代预言周宣王的那一句“**棗**弧箕服,实亡周国”(《国语·郑语》)上,但作为神学风尚,讖纬出现在西汉成哀年间。当时齐人甘忠可造《天官历》和《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被认为是“违经叛古”的妖书,甘忠可因而不得病死。哀平之际,讖纬神学才适应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思想而兴起,亦因后来的好仙求道的汉武帝的爱好而兴盛。当然,亦有专家指出,成哀年间,赋税徭役繁重,官吏和地主兼并土地现象十分严重,社会矛盾尖锐,许多农民丧失土地,农民起义因而不断爆发。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和起义者都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武器,讖纬神学也就适应了这种政治需要。

在今文经学和方士迷信基础上产生的讖纬神学,曾为王莽篡位起了舆论作用。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也写信讖言。讖纬神学中有关天人感应以及社会政治伦理的思想在汉章帝刘 亲自主持的白虎观会议上得到确认,并在《白虎通义》中被进一步系统化。讖纬之风持续盛行至魏晋南北朝。此后隋朝出了点事,一是汉王杨谅借“一张纸,两张纸,容量小儿做天子”之讖起兵叛乱;二是杨玄感发现太白金星入南斗,同时听见一则讖谣“太白入南斗,天子不殿走”,以为上天启示自己要做皇帝,便率兵据黎阳反。这种借讖谋反的事使隋文帝杨坚和随后的隋炀帝杨广决心把讖作为自己的特权而反对天不人使用,禁讖之风乍起,讖纬神学低迷。此后唐末至明清,讖纬神学平缓发展,至民国时,或为抗日,或为替国民党解困,讖纬之风仍然未衰。

谶纬神学在哲学上是唯心主义的天命观,在实践上是统治阶级的舆论工具。虽然有少数是诅咒暴政的民谣,但大多是人造的“预言”,是皇帝统治、大臣升迁、叛逆者造反的借口,下论是《河图》、《洛书》还是种种长篇谶书短篇谶谣,莫不是牵强的、粗糙的神秘主义作品,谶言的应验是伪造的应验。

我们今天之所以仍然在反伪科学时提及谶纬神学,是基于以下原因:第一,谶纬神学是古代迷信的重要品种,而迷信的东西有时是会以种种伪装再现的,当它披上科学外衣时,这就是我们须反击的了;第二,谶纬神学之为伪科学下是一种假设,而是一种现实,今天关于《河图》、《洛书》的热衷和包括“测字”(拆字)在内的被冠以科学预测的伪科学品种即来自谶纬神学;第三,种种谶谣和谶书在今天仍有人有兴趣,有人笃信它,有人以信仰的心情在研究它。这就是我要在以下的文字中分析多种“古代预言书”的理由。

在今天仍有影响的谶纬预言主要有八种,它们是周吕望的《乾坤万年歌》、三国诸葛亮的《马前课》、唐袁天罡、李淳风的《推背图》、李淳风的《藏头诗》、宋邵康节的《梅花诗》、明刘基的《烧饼歌》、刘基的《金陵塔藏碑》、清黄蘗的《禅师诗》等,这八种预言诗于1946年被朱肖琴收在《中国预言八种》之中。

这八种预言诗分别署以吕望、诸葛亮、袁天罡、李淳风、邵康节、刘伯温、黄蘗的名字,但《乾坤万年歌》、《马前课》、《藏头诗》、《梅花诗》、《金陵塔藏碑》和《禅师诗》均不见于其他记载,伪造的可能性很大,只有袁天罡、李淳风的《推背图》及刘基的《烧饼歌》见于宋元明清历代记载,但并不见得是袁天罡、李淳风、刘基所作,这主要由于《推背图》和《烧饼歌》预言的准确度令人生疑。

《推背图》共六十象,第三十九象的谶文为“鸟无足,山有月,旭日升,人都哭。”寓意为日本这个岛国最终必将溃败,而日本侵华,令国人悲伤哭泣。此象颂文更点明了12月8日日本侵袭珍珠港事件和1945年日本投降等。这是《推背图》可以附会和应验的最后一象,此后,1945年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世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后从四十象至六十象,无一象可以附会1945年以后的事。据此可知,今本《推背图》是在古本基础上逐渐修改而来的,它是民国时人的伪作。他们假托方术名家袁天罡、李淳风之名以及注批名人金圣叹之名,以眩世惑人。并且令人高兴的是,这种神秘主义作品中竟然还包含有爱国主义的情绪。谢贵安先生认为,民国时人伪造或改造《推背图》的目的有可能在于爱国。因为当时日本人占据了中国大片土地,为了鼓舞人民,便假借了颇具盛名的预言。《推背图》从唐代起对后世进行的

预言都很灵验,这就可能暗示人们,《推背图》中关于“鸟无足,山有月”的预言也不例外地将得到应验。这样就鼓舞了人民的斗志。这种观点是站得住脚的,从谶言历史来看,正因为它的神秘的色彩骗取了人们的信仰,才会为历代统治阶级或起义者所使用,以至于经久不衰。且不唯《推背图》,朱肖琴之《预言八种》都无一例外地“预言”了日本必败。

《乾坤万年歌》预言“应验”的时间稍长些,它说“那时走出草田来,手执金龙步玉阶。清平海内中华定,南北同归一统排。”1948年,蒋介石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国内和平呼声甚高的情况下被迫辞职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但预言者却希望蒋介石重新执政。玉阶,即玉石做的阶基,指蒋介石,草田,指蒋介石在“野”。蒋介石重新“手执金龙”,清平海内,平定中华,使南北归一统。不过,事后的结局是统一南北的不是蒋介石,而是中国共产党。这种借谶言表达的美好愿望无奈地落空了。朱肖琴编辑《中国预言八种》在1946年,1947年由蒋维乔作序,在1948至1949年间出版,《乾坤万年歌》这种查不到来历的作品,很可能是1947年至1949年间的作品。诚如是,也算是年代最近的长篇谶诗了。

明白了古代预言的来历及其政治目的,我们回过头来看它对过去预言的“应验”和对未来预言的无能也就不足为奇了。说白了那不是预言。《推背图》六十象,后二十一象无法附会后来的历史事实,《乾坤万年歌》共110句,预言到蒋介石欲重新登基的是第73~76句,第77句开始,满纸荒唐。《马前课》共十四课,首课讲“无力回天,鞠躬尽瘁,阴居阳拂,八千女鬼”,从诸葛亮说起。“八千女鬼”即“魏”,诸葛亮死后,后主降于魏。此后各课讲了三国以后改朝换代的大事,至第十一课讲“四门乍辟,突如其来,晨鸡一声,其道大衰”。讲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然向东北各地尤其是沈阳发动侵略以来的事。四面国门打开,日本侵略中国了。“晨鸡一声”之后,是一天中日将出来的时候,《马前课》就是这么费事地让人从“晨鸡”去联想日本。第十三课说打败日寇之后的中国,将是“贤不遗野,天下一家,无名无德,光耀中华”。这种政治理想还是蛮不错的。不过“无名无德”一句不知所用何典。

《烧饼歌》不是诗,而是一个故事了。这个故事说:“明太祖一日身居内殿,食烧饼,方啖一口,内监忽报国师刘基进见。太祖以碗覆之,始召基入。礼毕,帝问曰:‘先生深明数理,可知碗中是何物件?’基乃捏手轮算对曰:‘半似日兮半似月,曾被金龙咬一缺。此食物也。’开视,果然。”[15]

于是，“帝即问以天下后世之事若何”，刘伯温和明太祖就在这种氛围里讨论和预测后世之事。

《金陵塔藏碑》同样托刘伯温名。民国十六年丁卯，国民政府在南京奠都时，因拆除明建金陵塔以辟中山大道，见塔下有饒字石，中多隐语，殊难索解，乃明诚意伯刘基所置云云。全文很短，录如下：“拆出金陵塔，关门自己杀。日出东月落，胡儿故乡起烽烟。草弓何优柔，目睹江山落夷手。冬尽江南万古愁，繁荣忽变瓦砾丘。回天一二九，引起白日结深仇，眼见日西休。”

有意思的是，这首讖下但“预言”了1927年后国共两年的武装斗争（关门自己杀），而且还指责了蒋介石等人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草弓何优柔；草指蒋介石，弓指张群）。其余诸事与日本侵略和抗日有关。

《禅师诗》托名清黄蘗所作，有七绝十四首，如“日月落时江海闭，猿猴相接判兴亡。八生运向滇黔尽，二九丹成金谷藏”。虽然隐语很多影响了格律，却是讖诗中写得最像文人诗的。至于所“预言”之事，为明末至日本投降的事，和其他讖诗相似。

讖诗之兴，有如此明确的功利目的，以至于用到了抗日战争中提高民众斗志的事上，可见中国人好讖之习渊远而流长。解放后，讖纬之风衰微，但好作民谣的古风依旧，讖纬预言之书“推陈出新”的也不少。

拆字占卜也属讖纬遗风。北宋拆字术士谢石给宋徽宗赵佶测字，徽服的皇帝在地上写了“一”个字，谢石说“一”加“土”（地上）为“王”，这是皇上亲临了。宋徽宗传位给儿子钦宗，钦宗也请谢石测字，写了个“朝”字。谢石看字后对递字来的内侍说：“这个字下是你写的。‘朝’字拆开是十月十日，一定是这一天出生的一个大贵人写的。”赵佶因此对谢石“赐赉甚厚”。高宗南渡后，谢石又为高宗占卜了一个“春”字。谢石说这是一个好字，至尊至贵，只是“秦头太重，压日无光”。当时得势的秦桧，听到谢石说出的讖言后才分下滴，将其流放。谢石后来死在放逐途中的戍所，甚是凄凉。明末农民起义烽烟四起时，崇祯帝慌了神，请来巫师占卜国运。他写了个“日”字，占卜师说“日”为“明”半，大明王朝只剩下半壁河山了。崇祯大惊。至李自成逼近北京时，崇祯再派内侍混出皇宫，探听民间消息。内侍又见到那个占卜师，随口以一“友”字求占。占卜师说：不好了，反贼出了头了。内侍改口说：他说的是“有”字。占卜师说，更不好了，大明江山已去其半了。内侍还是不服气，改口是请占“酉”字，占卜师说越发不好了，因为天子至“尊”，至尊现已斩头截脚了。内

侍无话可说了。不久,崇祯逃至景山,作了歪脖树下鬼。

谶纬神学之于民间,是各种谶纬方术。测字,占卜,聊供懒汉谋生、盲人糊口,但有信奉者,因为相信命理,应合了“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的认识论和“人事天定”、“上天垂象”以及“五德始终”的观念。既然人世间的一切都是上天早已安排好了的,既然人世间的任何事物都是五行相生相克的结果,那么,人世间的一切都是不可改变的轮回和宿命,谶纬预言的灵验也就有必然的依据了。这是谶纬方术存在的社会心理基础。

谶纬之风给中国文化留下的一点好东西是:它强化了民间制射字谜的休闲文化。与此同时,对于不信谶纬之言的大众来说,一些谶纬传闻反倒成了人们的谈资笑料。有一则故事说,光绪戊子年间,武进刘保桢在会试前更名刘可毅,待考中报录时,家中人竟不知为何人,说:“吾武阳无此刘可 也。”后来人们都称他为刘可 ,刘自己也觉得这是谶语。后来刘果然因战乱而死在通州。

第四节 历代邪教

基于两个原因,我们把邪教放到了中国伪科学的源流中。第一,伪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以邪教的形态出现。第二,当代邪教已经注意到科学的外衣可以使它们更美丽,更具有迷惑性。美国的“天堂之门”、台湾省的“上帝拯救地球飞碟会”和由美国作家罗恩·哈伯德创立的科学教派,无一不穿着科学外衣。特异功能 20 年来的最高成就“法轮功”的歪理邪说中,充斥着反科学和伪科学的言论。

“邪教”是相对正教而言的。或许世界上不同宗教彼此视为邪教,但这种情况不是普遍存在的。魏晋之际,佛教传入就受到了玄学的迎合,道教在佛教中吸取了营养。有人曾经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支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但这样美丽的桂冠无论如何戴不到邪教的头上去。如果说宣扬“大灾大难”、“世界末日”是正教和邪教共有的特点的话,那么,产生“末世论”的出发点却有这样的区别:宗教是基于其世界观、邪教是基于其“敛财”欲。“敛财”,甚至还应加上“获色”,这个简单的目的是否能作为邪教的本质特征呢?我们一直觉得这样的观点过于简单从事,太没有学术含量,而当我们分析了大量邪教时,我们得出的结论恰恰只能是这么简单。“一贯道”是近代著名邪教,据光绪九年(1883年)八月左宗棠奏折所记苏北教徒华景沂供词称,华景沂由教首王觉

一之徒张道符援引入教,张劝他入教时讲到两点:一是入教“可免灾害”,二是“可传徒赚钱”。各种邪教教主的最终也是最直捷的目的,就是赚钱,获利以享受。至多,我们说旧时的邪教是教主为了统治和压迫教徒服务的组织形式。宗教也有自己的宗教利益,甚至曾经也有压迫和剥削教徒的一面。但它在程度上逊于邪教。而宗教劝人为善是一种虔诚的教化,邪教如果也劝人为善的话,那它只不过是为了教主的私利,是骗人的谎言。如果我们一定要给邪教定义的话,我认为:邪教是利用宗教形式组织起来的,以满足教主私欲为目的的,反正统宗教、反现实、反政府的极端主义组织。

邪教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秦始皇统一中国至今的 2200 多年时间里,有民间秘密教门的就有 1300 多年。民间性、秘密性,是邪教的主要特征之一。

东汉末年巨鹿人张角创立“太平道”,开民间道教先河。“太平道”令人“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创立十余年,徒众数十万。184 年,太平道趁东汉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加深之极,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不大吉”的谶谣相号召,发动黄巾军起义,致使东汉王朝元气大伤。太平道在东汉王朝的镇压下,不久灭亡。自此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皆视“太平道”为“邪教”鼻祖。

与太平道同时,张陵在巴蜀一带建立“五斗米道”,该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经张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代世袭经营,徒众遍布巴蜀、汉中,形成令中央和地方大吏都不能忽视的势力。其中,张鲁被益州牧刘焉委任为督义司马,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至公元 216 年,投降曹操。此后,又有“五斗米道”出现,时常倚教起义,故被政府视为“妖道”而遭禁。南北朝时期寇谦之等人改革“五斗米教”,剔除其煽动教民起事反抗当权者的“三张伪法”,增加儒教忠君孝悌等内容,逐渐变为官方宗教,是为天师道。

汉初,佛教传入东土,成为官方认可的正统宗教。此时佛教流行于民间,派生出许多异端教派,如南北朝时期的“大乘教”、“弥勒教”、南宋初年的“白云宗”、“白莲教”等。“白莲教”是由江苏吴郡僧人茅子元创立的,时为绍兴三年(1133 年)。白莲教是佛教净土宗与天台宗结合的产物,是由南北朝时传入中土的弥陀净土信仰演变转化而来的。白莲教忏法仪式简单,教徒生活世俗化,故从者如蚁。元代,白莲教分化,其中一个分支成为抗元势力,为推翻元朝的统治出了力。明初,朱元璋宣布“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巫覡扶鸾禳圣书符咒水诸术”^[16]为邪教,加以制止。朱元璋出身草莽,夺取江山曾得益于邪教,深知邪教的厉害。从此,白莲教转入地

下,潜行于民间。

白莲教是佛教世俗化的产物,它适应佛教求发展的要求,但走过了头,成为异端。白莲教形式上亦佛亦道,实际上非佛非道。它窃取佛教经伦,却下遵守佛家清规;教徒自称“白莲道人”,却不颂道经。

自宋以降,儒、佛、道三教合一成为一种社会思潮。明中叶始,民间创教传教之风盛行,延至民国。那时各类创教者纷纷崛起于乡村里社,杂取三教余绪,吐经造卷,自立一教,动辄称佛道祖,煽惑群愚。或诱以祈福免灾,或诱以学好向善,或诱以强身健体,或诱以成佛成仙。愚民难辨正邪,辗转传习,成为风气,令官府焦虑不安。对此,明万历年间有人奏称:“近日妖僧流道聚众谈经,醮钱会一名、涅教一名、红封教一名、老子教、又有罗祖教、南元净空教、净空教、悟明教、大成无为教,皆讳白莲之名,实演白莲之教。有一教名,便有一教主。愚夫愚妇转相煽惑,宁怯于公赋百乐于私会;宁薄于骨肉而厚于伙党;宁骈首以死而下敢违其教主之令。此在天下处处盛行,而畿辅为甚。不及令严为禁止,恐日新月异,实烦有徒,张角、韩山童之祸将在今日。”〔17〕

随着正统宗教的衰落和社会危机的加深,民间创教、传教活动愈演愈烈,往往一个教门衍化出十几个教派,组织盘根错节,信徒遍及全国。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资料,明代被政府破获的“邪教”名目即达 110 余种。民国时期,各种会、道、门组织多如牛毛。据称“解放初期全国共有会道门名称 336 种,道首达 80 多万”,〔18〕其中犹以“一贯道”最为强大,害人最深,流毒最广。

在对邪教作深层理性分析之前,我们先就“一贯道”的来龙去脉作一系统的陈述。

“一贯道”属“会道门”的一种。“会道门”是对“某某会”、“某某道”、“某某门”的统称。明清时期的各种“教派”并不叫“会道门”。它们绝大多数自称“××教”,如“无为教”、“弘阳教”、“大乘教”、“一炷香教”、“八卦教”等等。它们自认为是与佛、道、儒一样的宗教。因此民间称它们为“教门”,官方称它为“白莲教”或“邪教”。因又有称“黄天道”、“皈一道”、“龙华会”、“义和门”、“大乘门”者,故称“会、道、门”,会道门意义相近,并可与“教”混用,如“黄天教”可称“黄天道”、“一贯教”多称“一贯道”,“大乘教”也叫“大乘门”,“一炷香教”也称“跪香道”。明清时官方禁止“邪教”,民间教门为自保而讳“教”,清道光年以后,自称“道”、“门”的多了起来,清末又有如“西华堂”、“三华堂”、“五仙坛”、“济南道院”之“堂”、“坛”、“院”者,皆民间教门。民

国时,由于法律许可结社,一些秘密教门又以“北平普济佛教会”、“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红枪会”、“同善社”、“道德社”、“宗教哲学社”之类“会”、“社”之名公开活动。解放后,由于政府的抨击,“会道门”至迟在 1954 年前后被清除。1960 年国家暂时困难时期,民间的原会道门分子(包括刑满释放的道首和解除管制的分子)打着抨拳、练功的名义谈道传谣,但已不成气候,被很快抨击下去。1979 年民间掀起“特异功能”、“气功”热潮以来,一些别有用心“功法”头目极力弘法,乘机发展而成为邪教,如“法轮功”、“中功”、“华藏功”等。

“一贯道”作为会道门组织的典型代表,在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它是欺压信众、“一贯害人”的邪教,是辛亥革命军阀混战的工具和日伪统治时期反动势力的帮凶。

“一贯道”自称合参“三教”,道统久长,儒家之尧舜文武和佛家的名师大德均为其太上长老。“一贯道”抄袭佛教禅宗的师承,封达摩为“第一祖”,从“第一祖”到“第六祖”惠能,与禅宗师承完全一致。“第七祖”则变换为道教人物,宋元时期道教内丹派大师白玉蟾和马端阳。实际上,以上儒、佛、道名师与“一贯道”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是乱拉师祖,谬托神圣,以抬高教门身价。

“八祖”罗蔚群,清代直隶人,是一位罗祖大乘教徒。大乘教是罗教创始人罗梦鸿死后从罗教中分化出来的教派,为明代蓟州(今北京)人王森所创。该教既宗罗祖经典,又诵大乘教经。清代康熙六年(1667 年),罗蔚群将此教由直隶传入江西,并与南传的罗教再次融合,从而形成了“一贯道”的最早源头。此后各“祖师”为九祖黄德辉,十祖吴紫祥,十一祖何若,十二祖袁志谦,十三祖杨守一、徐吉南,十四祖姚鹤天。这一时期大约是清初至同治末年,为“一贯道”孕育期。

罗教和大乘教以及由大乘教演化而来的青莲教等,虽是“一贯道”的前身,但它们还都只是民间秘密教派,从八祖罗蔚群到十四祖姚鹤天都只是民间秘密教派的教首而不是“一贯道”教主。真正的“一贯道”是由十五祖王觉一在清末创立的。

王觉一,又名王学孟,自号北海道人,山东青州人。他 27 岁时拜山西姚鹤天为师,“入室静坐由定静而入大化”。后于山东青州开创东震堂。至光绪三年(1877 年),自称“无生老母”降身附体而成为“十五代祖”。此后到江苏、安徽、河南、北京、湖广传道,组织反清暴动。光绪九年(1883 年)在汉口暴动未果,其子被捕,斩决枭首,王觉一隐逝荆门,后避居北京,转天津,于次年病逝于杨柳青。

王觉一的“一贯道”,最先叫“末后一著教”,教名源自《皇极金丹九莲正信皈真

还乡宝卷》和《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有“末劫之时”（世界末日）之意。该教有王觉一著《一贯探源图说》中引孔子“吾道一以贯之”语释道，是为教名来历。

王觉一后，“一贯道”由大弟子刘至刚接掌，称“十六祖”。刘至刚（世昌）传济宁大路中一。路中一广收门徒，有 25 大徒弟。这些大徒弟皆借“鉴训”以“然”而名，其中一个有名的弟子张光壁改名张天然，后来成为该道元凶。路中一死后，其妹路中节称“木公圣母”以掌道。路中节死后，其子陈化清掌道。但与此同时，张天然自掌一派，使“一贯道”分裂为“张”、“陈”两派。

张天然在单县传道时，曾吸收一青年孀妇孙素真（珍）入道，后张与孙通奸。孙素真家族、乡亲闻之大哗，扬言要与张天然算账评理，张天然即骗孙逃回济宁。孙素真后来自封为该道“圣母”。

张天然回济宁后，张派发展不大。七七事变后，济宁沦陷，张天然与日伪勾结，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靠山，道务迅速发展至全国，声势甚大。张天然自称“济公不凡”、“奉天承运办理道务”，他投靠日伪，且吸收大汉奸褚民谊、周佛海、常玉清、王揖唐等入道。

1945 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为掩人耳目，曾明令取缔“一贯道”，但暗中又由特务掌握并利用它，此时张天然指示各地道首暂停办道，换之以“施诊所”、“义务学校”的公开身份继续活动。

1947 年，国民党政府社会部查封“一贯道”南京的佛堂，旋即发还，命其易名“中华道法慈善会”，南京设总会，霍荫九为理事长。

1947 年 9 月 29 日，张天然死于成都。张派“一贯道”又一分二，其一是张妻刘率贞及其子张英誉为首，以杭州为基地，称为“明线”，又称“师兄派”、“正义派”，活动于上海、南京、济南、青岛及东北、东南沿海；另一派以孙素真为首，以成都为基地，称为“暗线”，又称“师母派”、“金钱派”，活动于北京、天津、河南、西南、西北地区。两派均在解放战争期间从事反共活动。全国解放后，“一贯道”以企业、学校为掩护，潜伏下来，暗地里从事反党、反政府、剥削教徒的活动，政府决心取缔它。以北京市为例，1950 年 1 月 19 日始，历时两个月，先后逮捕道首 381 人，枪毙反动道者 42 人，登记点传师 720 人，坛主 4775 人，三才 663 人，声明退道者有 178074 人。与此同时，封闭大小道坛 1283 个，发现并摧毁了隐蔽的“一贯道”核心组织“号”、“善”、“里”，没收道产 23 处，获道首退出的道费 50 万元。

大规模的取缔工作结束后，“一贯道”等会道门的活动并未完全停止，特别是

1954年以后,一些已处理过的反动道首和未处理过的残余分子以为风浪已过,又蠢蠢欲动。有人以“信仰自由”为由,几次到国家有关部门申请备案,争取“合法”,而大多数道徒则改名换姓,秘密串联,进行地下活动。如在取缔中漏网的道首马书鲁,1950年潜逃到昌平隐居后,以演习“中道法”为名传道。此后他辗转至内蒙、陕西一带传道,于1954年初在陕西泾县被捕,递押回京后,与在京搞复辟活动的“一贯道”首犯杜瑞鹏等23人一起被处决。

1960年国家暂时困难时,又有“一贯道”分子死灰复燃,以打拳练功为名,聚会谈道,传谣惑众。其时虽其势如强弩之末,难以作恶,但给世人的警示却是发人深省的。

1800多年的邪教史告诉我们:在有宗教存在的社会里,邪教将是永远的伴生物,这种反宗教、反社会、反科学的邪恶组织的顽强生命力将是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和人民、我们的正义与进步应该时刻警惕的所在。邪教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它的适应性、它的“抗药性”和它的伪装,而“善良”和“科学”就是它们最理想的伪装。邪教的生存需要土壤,“法轮功”被取缔以后,一个关于“法轮功”何以能成势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深思。就是说,我们何以让“法轮功”在社会主义、科学和法制的眼皮底下“成长壮大”起来了?那是一些什么样的土壤和养料?我们今天该如何铲除这样土壤,断绝“邪教”的养料供给?更广泛的问题是:现在还有没有邪教和准邪教在滋长、在潜行、在蓄势待发?如果有,有多少?如果有,它们是谁?在下面的文字里,我将对“一贯道”的本质特征作一些补充说明。我们已经看到了“一贯道”反社会、反政府的一面。我们还将补充“一贯道”在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新中国建立的人民政府方面的一些材料,而更多的,我就给出“一贯道”欺骗和迫害信众的材料,以此说明我在本节开头讲到的邪教的本质特征是敛财获利。在这个问题上,我无法提升邪教的反动性。我认为反政府、反社会不是邪教的目的,而是邪教的手段。其目的是以种种手段以满足“教主”的私欲——有时甚至是改朝换代,取而代之的“私欲”。

“一贯道”的教职层次分为师尊、师母、道长、点传师、坛主、文牒、乩手和引保师。师尊是张天然自封的;师母有张妻刘率贞和小老婆孙素真。道长是道中第二号人物;点传师是开坛点道、吸收道徒等道务的负责人;坛主负责全坛道务;文牒是道内职务,但下属领导层;乩手是经过专门训练的“童男”、“童女”,接下同分工称为“天才”、“地才”、“人才”;引保师分“引师”和“保师”;是道徒入道时的介绍人和担保

人；一般道徒称为“道亲”。

“一贯道”的崇拜偶像是“无极老母”，全名是“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真宰”，乃主宰万物之神。此外，“一贯道”还供奉“济公活佛”、“弥勒祖师”、“观音菩萨”、“南极仙翁”、“吕祖洞宾”以及孔子、老子、关羽、张飞等神灵，耶稣、穆罕默德也在供奉之列。

“一贯道”教义以“三期末劫”说为主，这一点在十五代祖王觉一的“末后一著”教义就已基本成形的。同时，“末世说”也是一切邪教的基本教义。“三期末劫”说认为：开天辟地以来，世界上有“三个劫运”，一为“青阳期”，二为“红阳期”，三为“白阳期”。各个期末必生“劫运”。世界上原有 96 亿个“原佛子”，都是老母所派遣。但这些“佛子”下凡后，为物欲所迷，失去本来“灵性”。故每次“劫降”，老母即降下一“道”来拯救世人。“青阳”、“红阳”两劫已过，各渡回 2 亿“佛子”。现在“白阳”末期已到，世上还有 92 亿个“佛子”。这些佛子尚需由老母降下的“道”即“一贯道”来“渡”，所以入了道，“生能做官享福，死后可入理天、进云城；能躲灾避难，逢凶化吉，逃避三期末劫。”^[19]

“一贯道”“师尊”张天然于 1934 年带着他的小老婆孙素真由山东济宁来到天津，接替他舅舅路中一继续办道。七七事变后，他在日本侵略军的支持下，吸收大批道徒，仅天津就设 18 个坛。张天然利用人们的迷信心理、害怕战争和逃避现实的心理进行宣传，说中国大乱是“三期末劫”，在劫难逃，这时应“修仙入道”，否则便“永罹浩劫”，下能翻身；他说“一贯道”可以“普渡三曹”（天曹、地曹、人曹），要想脱过“大劫”必须加入“一贯道”；入了“一贯道”不但本人可以修炼成仙，连祖宗三代都可以“超拔”、“成佛作祖”。日本投降后，孙素真利用扶乩的“三才”传出“训语”，说“去了口土口，又来天外天”，点传师随即解释说：“日本投降是去了口土口，美国人来是来了天外天。”利用人们在内战时期的恐慌情绪吸收道徒，大肆敛财。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一贯道”们已感觉到处境不妙。1948 年，孙素真委派一百姓点传师从四川到北京，开办“忏悔班”，“考道”以巩固内部，在忏悔班上道首们大肆宣扬共产党杀人放火，要求道徒立愿效忠师母：“从今后随孙师母上山到顶下山到底，如遇任何魔考下位前下扯后，守定三宝下开斋下破戒，有始有终。”北京解放后，“一贯道”又订立了“咬紧牙关，虚虚实实，承认错误，下承认罪恶，账目绝不承认”等等应付“魔考”的 19 条对策。

解放后，潜伏下来的“一贯道”徒千方百计造谣惑众。1950 年“五一”适逢下雨，

道徒便出“天心不顺”的谣言。夏天,又造谣说“鼓楼冒烟”(楼顶有一种蚊虫聚集飞舞)、“石狮点泪”,说“天安门石狮在李闯王时就掉了泪,天不没长久,如今又掉了泪”,并大肆诬蔑共产党和党的领袖是“魔王”、“怪物”,叫嚣要“以道制魔”。农村土地改革时,传出“母训”不准道徒入农会。八角村坛主刘景全还威吓群众说:“你们穷小子别得意,等我翻过身,一个个都把你们的脑袋切不来!”此期间,总坛又传出“苏联人要人眼和女人胎做迷魂药”,现在有人“专门割女人乳房和小孩儿的小便”等谣言,吓得群众晚上睡觉不敢熄灯,拿砖头堵上窗户,白天不安心生产,早早就下班回家。朝鲜战争爆发后,“一贯道”喜不自禁,大肆造谣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美国有原子弹,足以对付四五个苏联那样的国家,八路军要完了,国民党一回来咱们就有出路了,将来师母就是真主,点传师都是县长”。如此妖言,不一而足。甚至到了1960年暂时困难时期的那次“一贯道”骚乱时,还有道徒散布“天不要大乱,白阳要出世收天不”的谣言,真是贼心不死。妖言惑众,是“一贯道”骗收信徒,扰乱社会的最基本的手法之一,其目的是收徒敛财,维护其“邪教”利益。

设“坛”扶乩,“飞鸾仙化”这一传统民间巫术是“一贯道”宣传“教义”、蛊惑信徒的重要手段。一位“天才”自述道:1936年我8岁时,在天津被父亲带入“一贯道”。然后开始了我的练乩手生涯,每天排字,背书,要站四五个钟头。稍不遂点传师的意,就得罚磕头……在我们表演的骗人花样里,有一个叫做“飞刀斩魔”。到了夜深时分,一个乩手身上佩把剑,嘴里嘟囔着“妖怪就要来了”。突然一个毛茸茸的东西爬进来,大家惊骇万分。乩手大喝一声,“妖怪”马上退了出去。接着窗子上一阵沙沙声,乩手袖子里闪出一道光,“啪”的一声,刀飞落在楼梯旁,吓得众道徒惊出一身冷汗。其实这些都是事先排练好的,刀上还涂了朱砂和狐狸毛。至于那道光,是乩手袖子里的手电筒在作怪。为了表演新的高难项目,我还跳过楼,当时摔得我鼻青脸肿,昏死过去,腿瘸了一个多月才好。^[20]扶乩的骗术我们在本章第一节已经谈过。上述借仙佛显灵以惑众的活动称为“借窍”。

“一贯道”为控制道徒,要对其骨干进行极其荒唐的训练。训练“过关”后道徒会不近人情,可以抛家舍业去“开荒”办道。“炉会”是培养点传师的培训班,“纯阳炉”和“顺天会”尤其惨无人道和荒淫无耻。“一贯道”标榜自己戒酒色财气,于是对受训人员考酒、色、财、气。考酒,实际上是驯化教徒的一种手段,因为要受训者喝酒,喝是破了酒戒,不喝是违抗了神的旨意,喝与不喝一样,无非是找一个治理道徒、使其驯服的借口,喝与不喝,都要挨打。这有点像中世纪西欧对巫婆的全面迫

害,巫婆承不承认自己的“以巫作乱”罪行都一样,只要看上了你,你就在劫难逃。1939年2月19日至3月25日北京顺天大会时,男女天才机手刘新泉、齐大姑娘把一盆掺了酒的水说成是“仙丹妙药”,叫每个道徒喝一口以便“长生不老”。道徒颜冯闻到有酒味不愿喝,当场被刘新泉用藤鞭毒打,最后逼颜冯喝完一碗刘新泉尿的“琼浆玉液”才算完事。考财,是道首们敛财的借口,这种借口一直被江湖术士运用,道徒要向“一贯道”捐献财物以表虔诚,捐得越多越好,许多道徒因“考财”连带“欺骗”“恐吓”而倾家荡产。当代中外邪教,莫不承传了“考财”这一传统。“考气”是要忍气吞声,耐得住折磨,吃令人作呕的香灰拌饭,唾液拌饭,冷水浇身,谁要是眉头皱一不就要挨鞭打。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就是“一贯道”把香灰当作灵药,给人治病。东光县郑家园村一个道徒的孩子病了,被道首赐以香灰,孩子喝不香灰,不治而死,道首则说:“这孩子是观音菩萨的茶童,被观音菩萨召回去了。”咸水沽有个叫田方才的农民,入道以后地也不种了,一心一意等待“大劫”来临,整天烧香磕头,他的儿子病了,不去找医生,把道首给的香灰给儿子喝,结果儿子死了,家破人亡。当年取缔“一贯道”时,一个被骗入道的工人控诉说:他当时嘴歪了,大概得了面部神经麻痹之类的病吧。“一贯道”劝他入道,说你的病是神佛对你的惩罚,只要入了“一贯道”就好了。他就带着一家五口一起入了“一贯道”。可是入了道病没有好,点传师让他念“五字真言”(无太佛弥勒),又喝了三包香灰,病还是没有好。以反科学的方式方法治病,是邪教的重要特征。后来的“法轮功”“生病不吃药”、柯云路“新疾病学”以意念治病,“我不病,谁能病我?”沈昌的以信息茶祛病,“山泉功”谷报国的辟谷治病,胡万林的芒硝水治病等等,是有师承的。此外,要信徒“忍”,一为驯服他们以图邪教统治,另一是以“忍”来对抗社会,这两个目的在“一贯道”都很显然。当全国解放,取缔会道门时,“一贯道”首们就传总坛“指示”,以19项对策对抗政府,这19项政策中,不乏“忍”的内容,这一邪教宗旨,也成为上世纪末出现的“法轮功”的“教义”“真、善、忍”三字之一。

考色是这些关卡中最难过的一关,也是邪教主驯化教徒并使自己“滥色”的手段之一。上个世纪80年代风行于日本,至今没有完全消失的“奥姆真理教”、美国的“天堂之门”等各种邪教,1995年被取缔的“被立王”邪教组织,均有类似的“教规”。

“一贯道”考色时,让男女裸体对坐,谁稍有心动,就要拉出杖刑鞭打。在北京“顺天会”上,一次考色有8名男子没能过关,竟被活活用扁担打死。

“一贯道”对道徒严加管制,道首们却随心所欲,荒淫无度。在“顺天会”考财时,天才机手刘新泉“借窍”声称和一个 18 岁的女道徒金小姐有“仙缘”,当即在“顺天会”上结为夫妇,说这是“天作之合”,令众道徒“祝贺献礼”。因为一般道徒随身携带的钱不多,他们便事先在院内设立专用银号,可以开条借钱,会后再还;献礼钱从数十银元到数百银元不等,道徒李德禄一个人就献了 2000 块银元。由于这是考财,故道徒尽力献礼而惟恐因心不诚获罪。这一次天才机手刘新泉即从 200 多道徒身上获献礼 2 万多块银元。考财过后,刘新泉和金小姐昼夜在一单间内赤身裸体,相拥而卧,并令男女道徒每早去他们合卧的床前“问安”。女道徒李德仲和葛太太看实在不像话,坚决要求出会,退道不修了。道首们见事不好,怕内幕被揭露,便坚决不准出会。随后他们又以“还冤愆”的办法,在地窖里设立“阴曹”,道首们有的装“阎王”,有的装“判官”,有的装“小鬼”,半夜里由“小鬼”拉来道徒叫说出自己都有哪些罪过,以道徒有“冤愆”为借口,以大扁担责打“还冤”。怕打的拿钱赎也行,老道徒齐建渊为赎“冤”花了银元 550 块,而李德仲和葛太太,则因“冤愆太重”,被道首们打死。

“一贯道”首以“传道”名义,借神佛之意强奸霸占女道徒、女三才的事,不胜枚举。“师尊”张天然就是以传道之名,与孙素真勾搭成奸的。点传师刘兆祥,借口传道,把吴旗县莫家场妇女王英拐骗至甘肃,说是“前世有缘”,强奸之后长期霸占,不让回家。刘兆祥不仅强奸了王英,还把另一个道首刘宝禄的老婆也强奸了。安次县的道首胡万忠,解放后还胁迫四名女三才隐藏在地洞里,并奸污了其中的诚玉珍。直到 1954 年胡被逮捕法办,四个女青年才得以重见天日。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安次县老提头村道徒洛衫勋因看上了史家庄村的女三才李秀珍,便借词道首找李有事,把李骗到高粱地里给强奸了。北京崇文区体坛坛主刘殿芝才几年间奸污妇女百余人,他说:“我一辈子搞了一百多个女人,总算没白活。”北率安坛主庞顺,强奸其童养儿媳,使之怀孕、产后身死,接着庞顺又霸占了儿子的小老婆,儿子因此被活活气死。庞顺却不以为意,继续与儿媳姘居,这种荒淫和乱伦,正是“一贯道”少数上层道首在“考色”名目下发泄无耻的私欲的写照。

回到本节开头谈到的张道符劝人入教时说的大实话,“可传徒赚钱”,钱财是道首们荒淫无度、花天酒地的基础。“一贯道”少数道首暴富,正是大量道徒倾家荡产的结果。北京市西单道徒魏某原本经营一家皮鞋店,生活殷实,入道后因不断交纳“献心费”、“香资费”,很快被吸于血本,整个皮鞋店及 5 处房产均落入点传师扬生

甫手中。安一坛道徒白文海,因几处房屋均被坛主傅扎森霸占,得精神病死去,其妻白氏带着5个孩子忍饥挨饿不敢声张,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一贯道”各级层层盘剥,而“师尊”张天然立于邪教金字塔尖,其富可敌国。“一贯道”设在各处的总坛,就是张天然的行宫。以兴化总坛为例,这里布置极为阔绰:名贵地毯、紫檀家具,上面还镶嵌有精美的象牙雕饰,百宝阁上古玩玉器价值连城,樟木箱内更收藏有殿版古今图书集成,御拓三希堂法帖及玉石图章等大量珍稀。张天然和张五福在北京城内有多处房产,城外有“义地”、果园和别墅。张天然1947年逃往四川时,所带金条就有1500多(1.5万多两)根之多。“一贯道”道首敛财至如此程度,也算是“邪教”的一种成功。虽然解放后,“一贯道”遭到了彻底的打击和取缔,但张天然作为路中一后“一贯道”邪教的道首,他是最成功的。张天然死于1947年,他躲过了解放后对于“会道门”的打击这一关,这种侥幸的“善终”对于那些“私欲膨胀”的新生邪教教主们来说,无论如何是一个值得羡慕的榜样。

第五节 江湖骗术

我们来做些资料性工作,以梳理关于近代江湖的思路。限于篇幅,在上一节,我们没把近代民间秘密结社问题讲透彻,因而我们首先应该就此事作些介绍。“江湖”和“民间秘密结社”抑或“邪教”,是有关联的话题。本节我们要对三教九流江湖门派作一个初步的介绍,重点提一不那些当代以科学作伪装的江湖门类。

一、近代民间秘密结社

近代民间秘密结社中的洪门、清帮、白莲教,被说成是“红花绿叶白莲藕”,是当时最大的黑帮。其中,又以清帮势力最大。

清帮又称罗教、安庆帮、安清帮、三番子、青帮、家私和临济道,其正式形成在康熙末年,以翁岩、钱坚、潘清三人结友到五台山拜陆逵为师为标志。此时他们已有明确的反清复明目的。康熙驾崩后,雍正继位,翁、钱、潘三人告别陆逵,以为朝廷办漕运的正式身份收徒聚友,此前此后,接纳了旧罗教徒——故清帮又可溯源到罗教,也接纳了天地会成员和粮米帮,以办漕粮的半官方组织作掩护秘密结社,“蓄势以图复国”。清帮有自己的帮规和仪式,按辈分收徒弟,长期在运河漕运中保持封建行帮的地位。后因漕运改为海运,遂在上海、天津等地和长江下游的其他通商口岸沦为游民组织。

洪帮,又称洪门、红帮,原为天地会的对内名称,因为明太祖年号洪武,故以“洪”字为名,有“反清复明”之寓意。入会者均称洪门或洪家兄弟。天地会因“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故名。相传创立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系从福建、台湾沿海地区逐渐扩大到长江流域各省及两广地区。其支派有小刀会、红钱会、哥老会等。“洪帮”一词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国以后逐渐流行。

哥老会发源于清乾隆初年的四咽唱会,最初主要在四川、湖南的农村活动。太平天国兴起后,哥老会流入清朝兵营。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努力争取了哥老会力量,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各地哥老会纷纷响应,这个时期的哥老会是起过积极作用的。也是这个时期人们开始以“洪帮”或“红帮”之名称呼哥老会。究其称谓的原因,一是哥老会确有“洪帮”组织的传承,二是由于哥老会发展到长江中下游和运河一带,为与“清帮”区别,就有取“洪帮”之名的必要了。“青帮”和“红帮”两个别称是民间在语音上的误读。

民国成立后,哥老会的一大批头目接受政府和军中要职,忽视了帮内事务,使部分洪帮组织流落江湖,遭到镇压和取缔,这时的江湖“红帮”,大部分沦为盗匪,另立山头。

清帮与洪帮的融合,是因为清帮在江淮经营的私盐要运往湖广等地销售,而洪帮从内地走私鸦片要销往沿海各地“码头”,这两帮都需要对方的支持和保护。进入20世纪以后,清朝官方文件中,已经很少单独提到清帮或洪帮,而统称为“青洪帮”了。青洪帮合流后,共同从事欺行霸市、贩卖人口、扼杀革命等活动。20世纪30年代,青洪帮兴起建社之风,其中恒社建于1932年11月,是青帮组织,名誉理事长是杜月笙。此外仁、文、毅、心、明等社,皆为帮会组织。抗战时期,一些爱国的青洪帮人士发展组织了抗日的帮会组织,如“五行山”和“丽华山”;而另有一些青洪帮分子组成了汉奸帮会,如“黄道会”、“安清同盟总会”、“中华洪门联合会”等;更有一些青洪帮山党大量吸收流氓、特务入帮,使之沦为流氓特务组织,如浙江的五圣山、四川的武圣山、正诚社、融志社等,其中的“忠义军”或“反共救国军”,则公然与人民军队为敌。大陆解放后,一批青洪帮分子遭到人民政府的镇压或接受人民政府的改造,另一批随同国民党军政人员逃往台湾。到了台湾的青洪帮组织,虽被百姓视为黑道,但由于它与军政具有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联系,其活动是半公开、甚至公开的。在军政各界的支持下,青洪帮组织在台湾得到了发展,现在仅“洪门”就有山头30个左右,徒众约10万。1989年在国民党“社工会”的撮合下,“洪门”各山头还整

合组建了公开的“中华民国社会事业促进会”。一些党政要人以加入帮会组织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一些政党团结帮会组织为自己拉选票,国民党更利用青洪帮“反攻大陆”。许多“新生代”的帮会组织都是以青洪帮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其中势力强大的竹联帮曾在国民党的授意下,制造了“江南命案”。秘密结社为什么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台湾当局的作为给我们提供了答案。

白莲教也叫“白莲社”,是混合有佛教、明教、弥勒教等内容的秘密宗教组织,它起源于宋代,到元代逐渐流行。至大元年(1308年),白莲教被禁止,但参加者仍不断增加,成为民间秘密结社,是一个农民反对封建统治的组织。白莲教教派名称随时随地变化,计有清水教、八卦教、天理教等称谓。白莲教在元、明、清三代组织了包括元末红巾军起义在内的多次武装起义。

作为江湖黑道的帮会组织在建国初期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仅湘西剿匪,就消灭武装土匪10余万。建国初北京市有17万道徒退出“一贯道”,重庆市一个星期之内有18000多名道徒向公安机关声明退出会道门。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复杂的原因,一些带有帮会性质的黑社会组织又死灰复燃。它们以行帮、地方恶势力、犯罪团伙和帮会等形式出现。有关资料显示,80年代以来,已破获的帮会团伙,广州有“新义安”、“三合会”、“白手党”、“头巾党”、“黑手帮”;深圳有“14K”、“水房”、“和胜和”、“和安乐”、“和胜义”、“竹联帮”;福建有“24K”、“金鹰帮”、“斧头帮”、“兄弟帮”和“十姐妹帮”等十多个帮会组织。湖南18个城市几乎都有帮会组织的活动,其中沅江市1985年以来先后破获的就有“龙虎帮”、“梅花帮”、“十三太保”、“忍帮”等帮派团伙39个,涉及成员676人。邵阳、常德地区有“中国黑手党”、“九条九斤帮”、“生死帮”等。益阳市自1985年以来先后出现了“龙虎帮”、“梅花帮”等250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帮派团伙,参加成员3120人。此外,一些船民帮会也相继出现,如长江全钱的“芜湖帮”、“池州帮”、“新州帮”,苏北运河上的“水上游击队”,巢湖上的“飞虎队”,洞庭湖上的“注滋帮”,鄱阳湖上的“瑞昌帮”、“星子帮”,洪湖上的“乔氏帮”。新出现的帮会中,以广州的“新义安”、“三合会”,上海的“震中帮”,东北的“真龙帮”,华北的“青龙帮”,西北的“逍遥帮”规模较大。这些帮会组织,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从活动地域看,这些帮会团伙都滋生和活跃在历史上帮会活动最频繁的地区,有历史渊源。

第二,犯罪形态上看,这些帮会组织大多属于初露头角的暴力犯罪团伙,活动

带有社区性。

第三,犯罪形式多样,犯罪工具日趋现代化。

第四,受到境外黑社会势力的渗透和影响,内外勾结。

第五,组织成分复杂,青少年占很大比重。

二、“三教九流”和“江湖十二相”

三教是指儒、释(佛)、道三教。作为传统宗教,本不能与“九流”混为一谈,但这里所说的三教,是指信奉这三教的游离分子或以此三教为名的江湖中人。人们所说“江湖”,主要指“九流”。

“九流”是指“士农工商”之外的九种人,说是九种,是附会中国传统以“九”为大的“术数”之风俗,各地对“九流”的分法不尽相同。

民国时四川一带的“九流”是指举子(落魄文人)、乡医、武艺、星相、堪舆、游僧、巫、道、琴棋 9 类人物,其中的“游僧”和“道”又是三教中人。江湖中流传四句话:“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星四卜五堪舆,惟有相家排第六,七书八画九琴棋。”这九种人物大都不是什么卑不之流,不过后来有人假托名义,产生了一些江湖骗子。陈雨门据解放后在开封相国寺卖耗子药的李春耀口述而认定的江湖门派,则有上、中、不九流及九金十八汗七十二寡门之称,可细分至三百六十行。可见三教九流不过是一种泛称罢了。其中上九流中的第八九为“测断国家休咎的神童”与“精通阴阳的堪舆家”属于江湖术士一类。中九流则是幻术、武术、马戏、木偶戏、猴戏、口技、商溜、平溜、丝溜,均系杂耍之类,而幻术中又有今天所称的化学魔术,武术中有“气功”、轻功、罗汉气和“铁布衫”之类。不九流则为乞丐、扒手、诱子、骗子、递水烟袋的、跟包的、吹喇叭的、牵头的和娼妓等,分类比较杂乱。

江湖门类的另一种分法是按金、皮、彩、挂、平、团、调、柳分为江湖八大门,此为北方分法,西南地区则称州、火、飘、风、惊、爵、皮、耍为八大门。

和“八大门”分法相似的叫“江湖十二相”,包括京、皮、朵、目、柴、马、离、降、风、火、随、谣。各相中还有支流。从欺骗性看,各流并不相同,如皮相中有些能治病,有些则是“祝由十三科”中的巫术。祝由即巫术治病的意思。“祝问病由,不劳针石”。历代把巫术治病都放到了“祝由”一类,有十三科,祝由科是“皮相”中的“黑道”。离相以杂技谋生。十二相职业有这样的口诀:京背长庚算八字,皮为膏丹妙药医,朵磨浓墨写大字,目为相法看麻衣,柴走天涯和海角,马是营生共坚持,离相彩门要秘密,降桌常常珠泪垂,风相无情生技节,火现黄金把衬欺,随相做敲称底

子, 谣为湿身假借衣, 除皮离二相, 尚有一些真实有用的成分, 其余都是一些骗人以谋生的伎俩或技艺。试述如下:

1. 京相和目相。“京”是江湖暗语“占卦”之谓。目相是为人看相的。江湖上“占卦”看相者都是师门真传的。大相士所遵循的“法”是秘本《英耀篇》。“英”是家底, 身世的意思, “耀”是用非常高明的手法去取得的意思。“秘本”全文 700 余字, 多为江湖暗语。劈头第一句是“一入门先观来意, 既开言切勿踌躇”, 接着分析人们的心理规律, 父亲问儿子, 是希望儿子富贵; 儿子问父母, 必是父母遭到了什么不幸的事情。妻子问夫, 面露希望神气的, 是想丈夫富贵腾达; 面露怨恨神色的, 必然是丈夫好嫖好赌, 或是宠爱侍妾。丈夫来问妻, 下是妻子有病就是她没有养育儿子。读书人问, 是求功名富贵, 商贾来问, 是因生意下旺。“秘本”第二部分是从人们的外表、谈吐、性格, 来分析他的意愿、心理状态以及可能遭遇的命运。如“满口好好好, 欠居高位; 连声是是是, 出身卑微。面带愁容而心神不定, 家有祸事; 招子(眼睛)闪烁而故作安详, 祸发自身”。“秘本”第三部分讲如何套对方的家底、身世, 归结起来是“敲、扞、审、干、隆、卖”6 个字。敲为旁敲侧击, 扞为突然发问, 审为察言观色, 干为责骂、恐吓, 隆是赞美恭维, 卖是在掌握了对方资料之后, 从容下迫地用肯定的语气一一摊出来, 使对方惊异和折服。对于《英耀篇》中的秘诀的运用, 又可用“军马”、“英耀”、“仪注”、“气度”几字概括。“军马”即鼓如簧之舌, “英耀”主要指试探对方是否“一哥”(外行), “仪注”是摆架子, “气度”是貌似严谨, 出言有方, 旁敲侧击、软硬兼施。

2. 皮相。“皮”就是江湖暗语“医生”之谓。这一相内容很广, 有挂账的、有摆摊的, 江湖上称“万相归皮”, 人老了, 就要挂住一个“医”字来骗饭吃。皮相要诀是“无坚下长, 无流下响”。“坚”是对症下药, 医好病人, 以此作广告; “流”是以“洋色”骗人, 即装模作样、假做手术、给人以假药等。皮相的足迹遍布城乡, 有各种招数。墟场开档叫摆“四平档”, 背负小箱叫卖叫摆杂档, 专走窑口(乡村)叫“小包”, 打着小鼓走乡村的叫“如鼓相”, 渡船上卖膏、丹、丸、散、药油的叫“走飘”, 另有疑档、偏档、湾档, 都得多人合作才行。笔者近日在集市见到用卡车车厢搭台唱戏卖药的, 就是湾档。“湾”是“戏”的隐语, 这说明皮相在今天还很流行。“青龙档”是玩蛇而卖蛇药的, 还有以中小药店为对象销售假药的。皮相中以“单挑”一行为多, 即单买一味药, 如膏药、虎骨、“还魂草”。还魂草是一味草药, 在广东英德、韶关、乐昌等地山上随处都有, 晒干的还魂草遇水即变为青绿色, 以此行骗的游医还不少, 据知这

种草对胃病、咳嗽并无疗效，且药性很寒，虚弱的人服了害多利少，但卖还魂草这一皮相之术今天仍然可见。此外，卖虎鞭虎骨、何首乌、老田七、血田七、风湿药的，都是今天仍可见到的皮相。至于今天建造大药厂，利用广告大卖假药的，已不是江湖骗子可比拟的了。

3. 朵相、降相。朵相是谎称自己访友途中被盗被抢，只好以卖字为生的那一类。降相也差不多，他们的目标是大户人家。“开花”时鼓其如簧之舌，说他是世家累代的书香的子弟，因到贵地寻亲不遇，用尽盘缠，囊空如洗，以至于不能返乡，要求帮助。或写一纸一布半通不通的文字，俱言家庭逆境、个人辛酸，背于身上或置于街头，以此行乞。

4. 柴相、风相。柴相多向迷信无知的妇女售“灵符”。风相则扮成道士，专门探听一些有钱而迷信的人家，到其家门口念念有词，久留不去，施钱施米，都不接受。如果有人问他究竟要做什么，他就以手指乱指屋内，及至屋内有人出来，他就说“这屋内有五鬼蠢蠢欲动，想为祸主人，但因主人多行善事，并且是个善良有福气的人，不应该受到危害，所以奉了师傅之命，不辞跋涉由某某山特来此间捉拿五鬼”。如主人相信，则会开坛作法，然后又进一步作教主人迁葬祖坟之类的“踩草”（看风水）之事，以获取钱财。江湖“扎飞”之术，即这种装神弄鬼的表演。

5. 马相、离相、随相。马相是跑单帮，向商店之类表演一些鼻尖顶凳子、鼻孔插铁钉的小杂耍，然后讨钱，它又叫“西行”。离相则是规模很大的魔术、杂技或马戏。但它不是表演收门票，而是卖小册子。如中西催眠术、八仙过海、大变金钱、五色花扇之类。当好奇者买了册子又学不会时，便会按地址去找他们，这时，离相就会把你介绍到“随相”那里去。规模大的离相要几十人合作，如“漂八子蓬”，要有大的帐篷，里面有台上变美人、空中取果子一类玩艺，以收门票为收入。在离相中如果你学到一些小把戏小幻术而想进一步学习“飞剑杀人”、“隐身术”之类，离相就会把你介绍给随相。所以离相和随相是合作的。随相先用“反包”的方法试探你是否着迷，其方法是，做成两个大小相同的纸包并互相粘住，看上去像是一个，先叫受骗人把名字写出，并写出请求学法虔求祖师指示之类，放入纸包包好。然后命受骗人对天叩拜，或向祖师叩头，待受骗者唯命是听，就当面把纸包打开，由于打开的是另一面，受骗人的纸条已不见了，代之以另一张纸条，这张纸条上没有文字，随相拿着在蜡烛边炙烤，不久才显出字迹来。纸条上写的却是“学法之人快要大祸临头，有杀身之祸，须火速斋戒沐浴，诚心拜求某某方可解除大祸”之类，又说大祸解除之

后,还可以得到一笔横财,是七星伴月的地下藏金,得到金银后要救济贫民,不得违抗,等等。随后随相表演“种金”“种银”之术,表演完毕,要受骗人从家里拿出金银来让他种,这样随相便用调包术骗走金银,待三天之后学法人开箱取金,金银首饰已化为乌有。随相种金术在“江湖派”的秘术《阿宝篇》称:学法者的损失归咎于他们的贪财。《阿宝篇》开篇道:“贫者必贫,君子引为太戒,佛门亦以五戒为首。故‘作阿宝’咎下在‘相’而在‘一’(即一哥)。”

6. 火相、谣相。是一种丢包术。由两人或多人合作。谣相就是借名行骗的小骗子集团,此二相施行的是高技巧的骗术,下在本书详述之例。

在曹俊山介绍江湖《假药、绝食与气功表演》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解放前的庙会上江湖艺人的种种表演。一个江湖艺人,口里横叼一把钢刀,把裤腿挽起来,啪啪啪!拍得大腿三响,然后用右手拿下钢刀,顺着“大腿”“喇——”割下一道三寸多长的刀口,鲜血直冒:“喇——”又横着割了一刀,形成了十字,看的人目瞪口呆。随后,表演者扔下钢刀,让一位观众从一堆小纸包里随便拿出一包药,打开包装将药撒在伤口上。顿时,血止了,皮肉如常。此后的工作便是卖药了。那种药是熟石灰。在刘静生的《江湖内幕》中,也有这样的描述,并且揭秘说先在大腿上抹上姜黄粉,刀中蘸上碱水,碱水与姜黄粉一接触,立即变红。这就是“血”的来源。

在曹俊山的《黑白人生》一书中介绍的江湖戏法除了卖各种药膏以外,还解密了种种“气功”,如下:

第一种,油锅捞铁链:表演者在台上成一个火炉,架上一口铁锅,锅内的油烧得沸腾。只见这位气功师运气发功伸手将油锅里事先成好的铁链捞出。而那只带“气”的手,毫无损伤。此招名为热气功。曹俊山认为,“这下是气功所致,在锅中翻滚的有 **80%** 的是醋,仅有 **20%** 的油漂在醋表面。醋的沸点低,受热就往上翻气泡,上面油也就随着翻滚,人们就以为是油被烧得沸滚了,其实锅中温度并不高,既不烫手更不会伤手,即使不发气功,也可以照样把铁链捞出,与跳大神在油锅里捞秤砣是一回事”。[21]

刘静生《江湖内幕》对此有所更正。刘静生说:“我看过一本书上说,锅里大部分是醋,只有浮在锅上面的是少量的油。这是错误的,醋太多不容易气化,气化后醋的温度也是很高的,表演者将手伸进一锅煮沸了的醋中取出 **10** 枚硬币,也是人体无法忍受的。醋不能过多,但也不能过少。醋过少蒸发出来的膏烟也少,顶下动上面的油,造不成气势。”“另外,烧油锅的火不能用煤,煤燃烧的温度高,使醋气化

得过快,观众容易生疑:油怎么热得这么快?用来烧油锅的火,最好是用软性柴草浸油,燃烧的火势很大,火温不高,要烧较长时间才能让醋气化,在时间上显得比较合理。”〔21〕

以上两法,看似合理,且《江湖内幕》之来历又是江湖上人道出的天机,可信度高。但是这些“天机”仍被江湖中人留了一手,因为这里所说的醋是民间用粮食酿制的食醋,其有效成分是醋酸,含量在10%以下,而所谓的“醋”,主要成分是水。醋酸又叫乙酸,熔点 16.7°C ,沸点 118°C 。上述醋的气化温度低,只是相对于油而言,但它与水的熔点 0°C ,沸点 100°C 比就要高一些。水在 0°C 以上即可气化,且随温度增高而气化速度加快,我们平时看见池塘的水,井水冒热气就可领悟这一点。而醋酸在 16.7°C 时才开始解冻。所以如以气化温度高低论,用醋还不如用水。另一个问题是,气化的“醋”还是醋,醋有一种刺鼻的气味,一大锅醋在火上气化,这种气味,是能传到观众中去的,人们就会怀疑这油锅是否有假。如此看来,用醋不如用水。事实也是如此,醋中的醋酸含量只有百分之几,其他成分更是微乎其微,醋中90%以上是水,所以醋的熔点和沸点只比水略高,上述为“气化快”而用醋不用水只是一种外行的猜测。油锅捞物节目用的是油醋混合物,这一点也是对的。这是因为醋作为“酸”的特性被用上了。表演者在油锅中放入醋后,不烧旺火,再利用棍棒或铁勺搅动之机加入小苏打或石灰,这时油就会滚开起来。原理很简单,醋中的乙酸与小苏打反应,生成盐并放出二氧化碳,从油锅中冒出的二氧化碳气泡使油像烧开了了一样滚动,并且附着醋和油气化上升,如滚油的青烟。二氧化碳不像醋那样有刺鼻的气味。这就是油锅捞物的奥秘。虽然这样说,但是火在锅不烧,油也好醋也好还要慢慢热的,太冷也造不出气氛。所以表演者还是要动作娴熟,掌握火候。何时加小苏打,加多少,如何在加时不让人发现也是一个技巧问题。解放初期四川某地农村集体的财产失窃,队长请来巫师抓贼,巫师用油锅捞钱的“法术”查贼,说只要没偷东西,在巫师的法术不油锅捞钱而不会伤手,贼却会伤手。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全生产队的青壮年都不了一次油锅,而且全部烫伤了手,这个巫师的油锅就是江湖的油锅,但社员们不得要领,巫师也不敢使油太冷而让人生疑,所以巫术没有成功。

第二种,气功吞锡。江湖艺人在火炉上架着铁锅,当众把几块锡饼放进锅内融化,温度在 300°C 以上。艺人先用铁勺舀半勺倒在木板上,木板随即青烟直冒。这样就证明了锡水的温度很高。但随后艺人却舀半勺锡水倒进了口中,艺人不但毫

无损伤,还把锡水冷却成锡饼吐出来了。“吞锡”是我国古典戏法之一,解放后因其危险性大而禁演多年。其秘密是锡饼是艺人预先含在口中的,锡水并没有倒入口中,而进入了铁勺的夹层中。

第三种,气功断铁链;第四种,铁指钻砖;第五种,刀枪不入;第六种:卧钉板;第七种:汽车过身;第八种:“轻功”表演;第九种:气功催眠……以上列目不能一一详录。“轻功”中的“踩纸”、“踩气球”、“踩鸡蛋”等节目笔者在海口市街头看见过,小艺人在街头表演,求人施舍。“吊纸环”和“踩气球”的节目被中央电视台搬到了1988年春节联欢晚会,由湖北荆州的张加陵表演。电视中没有说明它是魔术而称之为“轻气功”,这被反伪科学界认为是我国最高级别的媒体向受众推销伪气功和伪科学的一次不光彩的事件。

“气功催眠”,古已有之。奥秘有三:一,用“栽托”,即“自己人”混入观众中表演;二,把麻醉药“氯仿”擦在手上,以发功的手势使被催眠者吸药昏迷;三,用“意念”,让被催眠者在放松的状态下接受暗示而进入睡眠状态。

关于江湖秘闻的书籍不少。但真正读了这种书的人不多。因此江湖泄秘的程度是很有限的,这就是江湖艺人能够长久“混饭”的原因。江湖谋生,并不容易,作为观众,有时明知是假,抑或江湖艺人也告知这是假,但还是有人捐钱或购门票,以满足好奇心或者休闲娱乐。然而,江湖秘籍一旦被道德败坏者掌握,便会变成蛊惑人心、欺世盗名、谋财害命的手段。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中将要谈到当代自1979年唐雨“以耳识字”事件以来各种“特异功能”和“气功”大师在中国舞台上“劲舞”的二十年历史。那些“以耳识字”、“意念致动”的“特异功能”,那些冠以“预测学”、“人生信息”、“符号学”等美称的伪科学,在中国历代江湖中都能找到源头或原形。

注 释

- [1] 周楞伽:《幻术奇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133页。
- [2] 郭庆华:《中国超人术》,时代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82页。
- [3] 罗贯中:《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14页。
- [4] 徐珂:《清稗类抄》,第10册。
- [5] 黄伦生:《东方天国的神秘之门》,广西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
- [6] 卡尔·萨根:《宇宙》,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 [7] (法)伊丽莎白·泰西埃著,白巨译:《预测之谜》,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8~9页。
- [8] 同上,第7页。

- [9] 王昌盛:《虚妄的智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页。
- [10] 同上,第267页。
- [11] [英]李约瑟著 陈立夫等译:《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5页。
- [12] 同上,第417页。
- [13] 王友三:《中国无神论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
- [14] 谢贵安:《神秘的激法文化概论》,柏莲子著:《古代预言全书》,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4~5页。
- [15] 柏莲子:《古代预言全书》,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页。
- [16] 《明实录》,转引自傅斌:《中国人的信仰与崇拜》,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 [17] 《明神宗实录》,卷五三三,万历四十三年六月。转引自李昭主编:《邪教·会道门·黑社会》,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
- [18] 李昭主编:《邪教·会道门·黑社会》,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
- [19] 傅苍树著:《中国黑道》,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05页。
- [20] 崔丽、王尧:《邪教“会道门”及覆灭经过》,中国青年报,1999年11月22日,第3版。
- [21] 曹俊山:《假药、绝食与气功表演》,载《近代中国江湖秘闻》(下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页。
- [22] 刘静生:《江湖内幕》,科学普及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页。

第四章 伪科学论争

中国伪科学从近代的灵学,到当代的人体特异功能,气功和伪技术,一直在科学的批判和与科学的论争中顽强地存在着。

灵学是中国伪科学的外源,它在 20 世纪初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的传统巫术相结合,成为自此而迄于解放前夕最主要的伪科学品种。

人体特异功能是当代最主要的伪科学种类。它发端于 1979 年“耳朵识字”事件,然而经过发生、发展和衰落三个时期,历时 20 余年。

气功外气之争,气功功能态与走火入魔之争,真伪气功之争比人体特异功能开始得略早,而至今仍在进行。在作者看来,气功外气是伪科学观,气功功能态就是被催眠态,其走偏形式被称为“走火入魔”。真伪气功之争试图把假冒气功之名的灵学、巫术和骗术驱逐出局。在作者看来,气功是集养生术、巫术、道术、瑜伽术、催眠术和体操于一体的成年人的游戏。

伪技术是伪科学的实用化。技术之伪,在于技术手段的虚假和理论基础的荒谬。伪技术有骗术和病态技术两种,规避伪技术有赖于制度的完善和全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

第一节 灵学

英文伪科学 (pseudoscience) 一词是指一些貌似科学或者模拟科学建造的“理论”体系,它包括:由科学家建造的颅相学 (phrenology)、灵学或超心理学 (parapsychology);由前科学时代流传下来的占星术;民间科学爱好者建造的奇谈怪论如地平说、行星碰撞理论等^[1],据说其词性具有一定的中性色彩,下像中文“伪科学”仅具贬义。

Pseudoscience 一词出现于 1844 年,比许多灵学史文献认为的纽约州海斯韦村发生的福克斯姐妹请灵事件发生的 1843 年还早,却是西方灵学风生水起的时候。

在以下的论述中,我们将从恩格斯的著作中转述这样的事实。

“伪科学”一词进入中国,则是 20 世纪初的事,这个时期“灵学”传入中国,引起中国人对这种“伪科学”的重视。我们将陈述这段历史,借此考察中国灵学的来自西方的外在源头。这样的考察有望让我们对“中国伪科学”的叙述从古代经近代的“灵学”过渡到当代的“气功”、“特异功能”。这样,中国伪科学史就有一个很好的衔接。

从 20 世纪初的灵学之后至 1979 年起的中国特异功能,其间的几十年除了“江湖骗术”和“邪教”在其他的章节可略加介绍外,无甚大事要讲。其中只有一个插曲,那就是从 1957 年反右开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一段时间里,我国也时常提到“伪科学”一词,其内涵所指的是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及马寅初人口论一类学科和思想,且加前缀称“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这种“伪科学”提法,一方面源于我们的极左思潮,一方面受到苏联的影响。苏联其时树李森科这种科学家为榜样,把摩尔根的遗传说一类真科学打成伪科学加以拒斥,在科学史上闹了一个不小的笑话。这个玩笑的结果是历史终究把李森科论定为伪科学的代表,并使苏联的遗传学进程落后于世界水平有半个世纪。在我国,当时被称为伪科学的马寅初人口论等,如今也正式复还科学的真面目,而当时的某科学家在报上发文作出的稻谷高产卫星的可行性论证,才是真正的伪科学范例和政治笑柄。上述“伪科学”历程,下在本书涉及之列。

我们将要考察的是:包括相术、催眠术、请神术在内的种种伪科学种类;作为中国灵学源头的西方灵学史略;20 世纪初中国灵学运动轨迹及论争;中外灵学之共性;西方灵学之所以是伪科学的理由。

1843 年至 1844 年冬季,恩格斯在英国曼彻斯特见到了斯宾塞·霍尔先生。这位先生在灵学史上十分重要,因为他是和达尔文同时提出物种通过自然选择发生变异理论的华莱士先生十分推崇的人物。华莱士之信仰催眠相术,使他成为科学家同时又相信伪科学的范例。恩格斯在《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一文中提到了这件事,但恩格斯此文没有使用伪科学一词。

斯宾塞·霍尔的奇术叫做麦斯默尔术,原是奥地利医生麦斯默尔“发明”的催眠术。麦斯默尔宣称,人体内有一种叫“动物磁力”的无可捉摸的能量,通过对这一能量的激活,可使入进入催眠(梦游)状态,这种状态对治疗闭尿症、耳痛、牙痛、精神病一类下确定性疾病颇有效果。霍尔的麦斯默尔术就是如此,“他不仅使入进入催

眠状态并发生四肢僵直和局部失去感觉的现象,而且也证实了加尔颅骨图的正确,因为在触摸任何一个加尔器官的时候,在已受催眠的人身上引起相应的活动,并以灵活的动作按规律做了出来。其次,他确定地说,他的被催眠者只要被他触摸一下,就会分享催眠者说的一切感觉;他只要把一杯水说成白兰地酒,就可以让被催眠者喝得酩酊大醉”。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看到了斯宾塞·霍尔后,就发现“他是一个完全的江湖术士,在几个教士的庇护下在国内到处跑来跑去,用一个少女作催眠颅相学的演出,为了由此证明上帝的存在,证明灵魂的不朽,证明当时欧文主义者在各大城市中所宣传的唯物主义的无用”。恩格斯说:“少女受到催眠,只要催眠者摸一摸她的颅骨上的任何一个加尔器官,她就像演戏一样做出了表示相应器官的活动的动作和姿势;例如,摸一下爱孩子的(*philoxerogentivessa*)器官,她就爱抚和亲吻一个幻想的婴孩,如此等等。此外,……他在颅骨顶上发现了一个敬神的器官,只要摸一下这个器官,他的那位受了催眠的小姐就跪下去,把双手合在一起,并且在惊讶的庸人观众面前做出一个为虔诚所迷醉的天使的样子。这就是表演的终结和顶点。上帝的存在就被证明了。”[2]

恩格斯试图破解江湖术士的把戏,想看看能在什么程度上再现这些现象。结果,他和他的一个熟人一起把一个 12 岁的男孩调教得比斯宾塞·霍尔的少女更好。他不但会麦斯默术,而且花样还更多。“如果说华莱士用水使他的被催眠者酩酊大醉,那么我们却在左脚拇指上发现了醉酒的器官,只要摸它一下,被催眠者就会演出最妙的喝醉酒的滑稽戏。”考察和实验使恩格斯知道了所谓麦斯默术完全是施术者和被施者之间串通后演出的双簧。“如果不使被催眠者了解所希望于他的是什么,那任何器官都不能显示丝毫作用”。而“只要被催眠者同催眠者开个玩笑,就是世界上最有魔力的催眠术家也毫无办法了”。[3]

恩格斯在《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中还揭示了使“桌子跳舞”的降神术、摄影师赫德逊伪造“神灵照片”、比古太太在不省人事的状态下被神力摄到三英里外的降神会桌子上、库克小姐降神会等种种神灵事实的秘密,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伪科学”一词出现时欧洲神灵世界妖雾弥漫的时代背景。

恩格斯指出,上述“招魂术”和“请神术”是从美国输入的。输入的时间至少早于 1843 年。许多叙述灵学史的书籍认为 1848 年纽约州海斯韦村的福克斯事件是现代唯灵论的开端,但此前美国的灵学就很成气候自给有余可供出口了。1979 年版美国百科全书称灵学“所说的具体现象形式很多,最简单的特性可能要按叩击或

被打的动作,它被看做是唯灵论运动的开始。这种叩击动作,据说是纽约海斯韦村发生的福克斯姐妹所首创。叩击的音响被当作是愿意与人交往的灵魂的工作。经过适当的符码设计,叩击便成为人神交往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在唯灵论者圈子里,获得广泛而持续的应用”。[4] 1979年4月,日本平凡社的《心理学中兴》也认为1848年纽约州海斯韦村所发事件为唯灵论的开端。该书叙述说:“事情是有姐妹二人作为灵媒,通过被击音节与该家族被杀害的人的鬼魂通于信息。对于这件事的真伪曾做了许多调查,引起了人们对心灵现象的兴趣,涌现了不少灵媒,于是唯灵主义兴起,对此现象的研究也时兴起来。”[5]

当自然科学在西方国家发展起来之后,原先古老的迷信的市场日益缩小,披着自然科学外衣的现代唯灵论就应运而生。唯灵论者借用科学的术语和实验方法使他们的非科学理念及其表演具有科学的外衣,以此蛊惑人心,欺骗信众,图名图利。对此,不明就里的科学界和神秘现象热衷者就表现出对这些伪科学的极大关注,他们加入到恩格斯所说的江湖术士的行列,对神秘力量进行研究。这种研究被称为超心理学、心灵学。我国上海在1918年春成立“灵学会”,使用了“灵学”的译法。大约1852年,英国剑桥大学成立了心灵研究会,以研究超自然体验。1869年,英国伦敦创办《唯灵论者》(The Spiritualist),1872年改名为《唯灵论者报》(The Spiritualist Newspaper),专业宣传降神术。1875年,英国牛津的灵学会成立,同年,律师萨金特·E·W·考克斯在伦敦大学创立了大不列颠心灵学会。1882年2月20日,灵学研究会在英国伦敦圣斯威辛街23号正式成立。英国灵学研究会是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伪科学组织。它组织完善,存在时间长,影响范围广。20世纪初,灵学研究会影响到了日本,被在日本的中国人引进回国,1918年春上海灵学会成立。从此,中国伪科学洋为中用、中外合流的新时期开始了。

我们说英国伦敦的灵学研究会是伪科学组织,是因为它符合伪科学的两个基本特征:非科学并且冒称科学。研究会下设六个委员会,分别研究思维传感、催眠术、莱辛巴赫现象(据称有人可见指尖和磁极表面发出的光晕)、闹鬼现象、心灵的物理效应和文献。各委员会都被要求写出内容翔实的研究报告,但物理现象调查委员会却写不出来,因为,委员们无法在降神会的屋内找到名副其实的物理现象。这种显然怪异的“研究”被研究会自诩为“科学”。在“会议录”中一段表述其研究目标的文字写道:“学会的目标是不带任何偏见或成见,并以严谨准确和不掺杂个人好恶色彩的探究精神去研究该领域的各种问题。这种探究精神曾科学地解决了大

量的问题,这是毋庸置疑,不容争辩的事实。〔6〕

灵媒是近代灵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的是福克斯姐妹那种装神弄鬼、代鬼魂说话的巫婆。1843年3月,纽约州海斯韦村被闹得神鬼不宁。每天晚上都会出现一种奇怪的声音于旷野。只有见多识广的人才知道那是“死者灵魂的通信”,由此证实确有一个“灵的世界的真实存在”。福克斯姐妹的榜样力量使各地纷纷仿效,出现能“产生出各种怪异现象的灵媒”来。

催眠术是“灵学”的一大发现,它的心理学因素使伪科学更具迷惑性。暗示、诱导在控制自我意识和他人意识时的强大效能使它能作为“灵学”所用,因为,“灵学”本身就研究和热衷于那些奇妙的“超心理”现象。一般认为,催眠术接受者不但可以产生幻视、幻听、幻味、幻触甚至麻醉,而且还可以让意志和行为为施术者掌握和操纵,以至于引起记忆和人格方面的变化。顺从暗示的被催眠者体认那种冥冥中若有神助的感觉,言行不由自主,甚至连自己后来清醒后也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这样的奇术当然为巫术迷信所热爱。但催眠术的首创者却反对人们把催眠现象做出迷信的神秘解释。布雷德(1795—1860)是英国外科医生,1841年他的《神经催眠术》首次使用“催眠术”术语,并认为它是神经系统的一种状态,这种特殊的神经睡眠状态是由于精神高度集中造成的疲劳所致。布雷德致力于催眠术的医学运用,在瘫痪、风湿、失语的治疗和截肢手术时的麻醉上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但是不可否认,布雷德的催眠术运用研究受到了当时的巫术之风的影响和启示,而把催眠术当作神秘的魔力不仅在欧美,而且在东方的印度和中国,都有它悠久的历史 and 广阔的市场。印度的瑜伽术实际上就是一种催眠术,佛教的禅定、坐忘就是催眠实践。

中国催眠术有两个源头,其一是西方催眠术。“催眠”一词也是经日译后转用于中文的,其原文 hypnosis 由希腊文“睡眠”变化而来。另一源头就是我国固有的道术和佛教中的各种修炼方面的糅合。这样的中国式催眠术在中国文化的氛围里发挥出降仙童、讨亡、圆光和扶乩等各种迷信,甚至于一切“医、卜、星、相、巫、祝、方外之士、技勇之夫,皆有假催眠术以成者”。〔7〕催眠术之所以受到巫师和唯灵论者的青睐,大抵是这样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施术者对于受术者似乎有一种可以随意摆布的能力,从而产生奇异的效果。这种可以产生奇异效果的能力,很容易被神化,被误认为是施术者先天具有某种神异功能,或想像施术者的异能是来自冥冥中的某种神秘之力,最后把施术者神圣化,视为超人、异人、神人;第二,在催眠师与受催眠者之间,似乎存在一种神秘的因果联系,因而能够使受术者任施术者自由摆布,

这种神秘联系的介质,有人认为是‘磁力’,有人认为是尚未认识的自然力,有人认为是说不清楚的感应力,有人认为是施术者的‘法力’。(8)

应当指出,催眠效应不是生理的而是心理的,是心理效应促成的某种麻木或痛觉顿失的生理反应。不同的人对于心理暗示的接受能力不同,其催眠效果也是不同的。恩格斯在 1844 年间亲历麦斯默尔术时就指出那些受术者都是训练有素的,恩格斯也来了一个实验,培养了一个 12 岁男孩接受催眠术。当然,在恩格斯看来,这是十足的江湖骗术,是江湖术士与受术者合作的结果。因此,催眠术的种种伪科学理论是必不可少的,它可以造成受术者对这种心理暗示术的认可。一个不认可催眠术的人,任凭催眠术士如何“催”,他也不可能“眠”,更不可能随术士的指挥诱导生发出奇异的言行来,这就是“催眠术”不属于科学而属于信仰的原因。我们说心理学可以解释这一现象,并不是说它就是如“心理学”本身一样是一种科学。这一点,连许多心理学家也不自觉。如果催眠师在催眠过程中使用心理学语言而不是使用“催眠术”语言,那么,诱导是不会成功的。这比方说,你告诉受术者:我在给你作一项心理学试验,我将用语言诱导你作些不可思议的事,说些言不由衷的话,甚至让你麻木,让你失去痛觉。但并非你真的麻木了,也并非真的不痛了,而是由于我们的诱导,使你过分专注。如此等等,催眠就不会成功。

颅相学是与催眠术相关的巫术。恩格斯识破的麦斯默尔术就是让受术者在催眠状态不进行的,因而也叫催眠颅相学。

请神术或降神术是近代灵学的另一个主要品种,它包括桌子跳舞、神灵照相、灵魂降临一类奇术。华莱士在他的《论奇迹和现代唯灵论》中举了大量的事例证明奇迹的存在。恩格斯对这样的故事有所转述。他说:1872 年 3 月,主神媒杰比太太跟她的丈夫和小儿子在诺亭山的赫德逊先生家里一起照过相,而在两张不同的照片上都看得见她背后有一个身材高高的女人的形象,优雅地披着白纱,面貌略带东方风味,做着祝福的姿势。虽然后来,摄影师赫德逊因一贯伪造神灵照片被公开检举,可华莱士还巧言诡辩,说即使摄影师不大可以信赖,但杰比太太的神奇还是真实的。

杰比太太的神奇有不列事实证明:“1871 年 6 月初的一个晚上她在不省人事的状态中从汉伯里山公园她的家里,由空中被摄到兰布斯·康第特街 69 号——两地的直线距离是 3 英里——并且被放置在上述 69 号房子中正在举行的降神会的桌子上。”对此,恩格斯风趣地说:“房门是关着的,虽然杰比太太在伦敦是一个板肥胖

的女人(这一点倒的确是有点意思的),但是她的忽然降临却没有在门上或天花板上留下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窟窿。"[9]这样,降神术的“真实性”就印证了“神灵照片”的毋庸置疑。

遥视、遥感或与灵魂交流也是近代灵学的主要内容,据来自《康德传》[10]的材料称,早在18世纪中叶,就有一名叫斯维登伯格(1688~1772)的瑞典的哲学家和数学家善于与神灵和死者的灵魂交往,并能遥视许多公里外的景象。这一奇人的活动时间比伦敦灵学研究会成立的时间早了一个多世纪。斯维登伯格的活动被写进他的八卷本《天堂的秘密》中,这些书籍以及作者的活动对青年康德有很大的吸引力,进而成为康德著作《以形而上学的幻想来解释视灵者的幻想》的主要内容。所以,于光远先生指出:“斯维登伯格的活动,是西方灵学史上很早的一件大事。”[11]关于斯维登伯格神奇,有这样的故事:“一个珠宝商人向荷兰驻斯德哥尔摩公使的遗孀索取她丈夫定制的一套银质茶具的付款。公使的遗孀对她过世的丈夫办事认真细致素有所知。确信公使已经付过钱了。但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付款收据。公使夫人为此万分焦急,因为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款项。于是他把他斯维登伯格邀请到自己的家中。如果他真有那种人们盛传的特殊本领与死者的灵魂交谈,那么他能否向她已死的丈夫询问一下有关茶具付款的事?斯维登伯格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的要求。三天以后,在这位公使夫人那里举行了一次小小的茶会。斯维登伯格亲自出席并以他特有的镇静口吻宣布,他已经同死者交谈过了。该项债款在他死前七个月已经付清,付款收据存放在楼上的柜橱里。夫人告诉他说,那个柜橱是空的,斯维登伯格回答说,按她丈夫的说法:抽掉左边的抽屉,然后位开里面的一块板,那里有一个暗匣,暗匣里藏着绝密的荷兰外交文件和那张收据。全体在场的人都来到楼上,打开柜橱,按照方才所说的去做,果然找到了那只暗匣,这位夫人对此从前却一无所知,而从暗匣里也的确找到了那份外交文件和那张收据。”[12]

另一件显示斯维登伯格具有“千里眼”这类遥视功能的事发生在1756年9月底。“斯维登伯格有一次在距离斯德哥尔摩50英里的一个商人家中作客,忽然脸色变得煞白,他说斯德哥尔摩发生了火灾。过了一会儿,他说大火已经烧到了他朋友的房子,火焰正在朝他家蔓延。到了8点钟的时候,他高兴地大叫起来:‘感谢上帝,大火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已经被扑灭了!’两天以后,从斯德哥尔摩来了一个信差,他带来了有关火灾的消息,同期维登伯格所说的完全一致。”[13]

康德是从一个他以前的学生那里听到这些事的,有一段时间,康德对此坚信不

疑,并开始收集有关资料,还写信给斯维登伯格询问详情,但斯维登伯格不回信,他扬言要以书的形式答复康德,致使康德花高价买了一套《天堂的秘密》。读过书后,康德确信斯维登伯格搞的完全是骗人的把戏,那8卷书卷卷充满了胡言乱语。斯维登伯格的骗局使康德花费了许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在《以形而上学的幻想解释视灵者的幻想》中康德说:“也许有人会问,是什么动机促使我去研究这种无聊的琐事,这等于是在继续传播荒诞的故事,一个理智健全的人很难去听它的。更不用说还把这些荒谬不经的东西放在哲学研究著作中去。”康德认为,之所以研究这种无聊的琐事,那是因为:“愚蠢和智慧之间的界限如此模糊不清,以至于由于在其中的一条道路上走的时间太长了,也难免会沾着另一条道路的边。”康德进一步指出,“但是界限毕竟是存在的,而且如果读者并不把视灵者看做是一半属于彼岸世界的人,反而干脆把他们送进医院,我们是不应因此而指责读者的。”[14]

“灵学”传入中国,是清朝末年的事。1909年,在日本横浜成立了“中国心灵俱乐部”,1911年,该部迁往东京并改名为“东京留日中国心灵研究会”,英文名是 Chinese Hypnotism School,“中国催眠学会”之意。1918年,上海成立分会。1923年改称“中国心灵研究会”,英文名为 Chinese Institute of Mentalism,会长余萍客。1918年前后,在上海成立的灵学团体尚有“灵学研究社”、“上海灵学会”、“福州灵学会”、“预知研究会”、“催眠协会”、“变态心理学会”、“精神”、“大精神”、“灵理”、“灵学学会”、“哲学会”、“催眠养成所”等,又创办了“心灵科学书局”和“心灵科学书店”,翻译和出版的灵学书籍有《灵学丛志》、《心灵学讲义》、《神通入门》、《灵力发显术》、《灵力拒病论》、《灵魂体总论》、《灵力实验法》、《新灵子术》、《心灵现象》、《灵明法》、《太灵道》、《心灵光》、《扶乩原理》等。这种翻译介绍和学术研究之盛况,据余萍客称,仅“中国心灵研究会”至1931年的统计,就有书判讲义3000余种出版,而其会员更有8万之众。由此推知全国灵学之风,非60年后中国大地的气功、特异功能不能比拟。

洋灵学一经进入中国,即被本地化。上海灵学会为适应国情,而设立“盛德坛”飞鸾仙化,与北京灵学组织的“悟善社”的“广善坛”遥相呼应。盛德坛请孟子为坛主,庄子与墨子为其副,北京“广善坛”则邀八仙之一的“孚佑帝君”吕洞宾主坛作怪,可怜古代思想家及神话中人,被拿来装点灵学门面。其灵学的作为,无非是飞鸾仙化、灵魂照相一类中西合璧的把戏。其目的是愚化信徒图谋财色。

上海灵学会是个中翘楚。它成立于1918年1月,其前身是1916年几个留学日

本的中国人在神户组织的“中国精神学会”。它在国内的无锡有分会,成员有素以扶乩名闻乡里的杨光熙、杨璇父子。此二人后来成了上海灵学会的主要筹集人。上海灵学会以中华书局的俞复和陆弗逵的加入而享誉灵学界。俞复任灵学会会长兼盛德坛坛长,陆弗逵任坛督和会刊编辑。由于名人效应,上海灵学会竟得到了曾任“大总统”的黎元洪、末代皇帝溥仪的师傅英人庄士敦和学术界名人严复的支持。严复,这位《天演论》的翻译者,在支持灵学问题上,造成了他同时支持进化论和唯灵论的双重人格,一如伊萨克·牛顿的坚持万有引力而又在晚年致力于注释约翰福音书。此外,与严复一样赞赏灵学的还有丁福保。

我们将从丁福保褒扬灵学的言论来领略中国灵学的理论,亦从反对者的声音中来领略这场灵学与唯物史观的论争。丁福保早年曾接受近代西方教育,后以行医为业,并转向信仰佛教。他曾主编过《中国佛学大辞典》,又于1911年7月出版译著《近世催眠术》,正是对于近世催眠术的译介,使丁福保走上了唯灵论道路,以至于他也如严复一样,在上海灵学会会刊《灵学丛志》中著文论鬼。

俞复曾说:“科学之见重于世,亦以事事征清实象,定其公律,可成为有系统之学而已。以今日所得扶乩之经验,则空中之确有物焉。”这里把灵学诠释为一种“科学”,其目的是宣扬灵学救国,因为“鬼神之说下张,国家之命遂促”。这种说教,学术味十足,而丁福保的说法,则直接多了。丁福保在《我理想中的鬼说》一开头就说:“人死为鬼,鬼有形有质,虽非人目之所见,而禽兽则能见之也。”这样的高论,留下了大量漏洞让反对者痛斥并极尽幽默讽刺之能事。陈大齐在《新青年》上著文问丁福保:“试问禽兽见鬼,丁君何由知之?动物之有心作用,本非人直接所能知。人但能观其发表于外之动作,用以推知其内界之作用耳。禽兽见鬼,必非丁君直接所能知,然则丁君果藉何道以推知禽兽是必能见鬼耶。俗传狗于夜中见鬼,则哭声呜呜,此村妇之谈,贤如丁君,想必不引此为论据。心与身相并行,故观察神经之构造,亦约略可以知某种心作用之有无。丁君医士也,必深于生理解剖等学,岂亦尝解剖禽兽之目,发现其视觉神经有特别作用,足以见鬼耶?抑或于视官外,发现别有感官,足以见鬼耶?侵假而禽兽果能见鬼,果知鬼之有形有质。然丁君是人,非能见鬼者,则丁君何日亦知鬼之有形有质,而著之于文耶?”陈大齐写道,丁文荒谬绝伦,不睹作者姓名,已不敢信为人间所作,刘半农也著文说:“圣妖人辈自造之谬论,如丁福保谓禽兽等能见鬼?丁某似非禽兽,不知何由知之,又言鬼之行动如何,饮食如何;丁某似尚未坠入恶鬼道,不知何由知之?”[16]

陈大齐在《新青年》上著文批鬼说,不厌其烦。在 1918 年出版的《新青年》第 4 卷第 5 号上,他以《辟‘灵学’》为题揭露了扶乩的荒谬,并对伪科学作了理性的分析。文章说:“近日上海有人设坛扶乩,取乩书所得,汇刊成册,名曰《灵学丛志》。并设灵学会以从事灵学之普及。吾所及见者,乃该丛志第 1 卷第 1 期,其内容之荒妄离奇,真足令人捧腹绝倒,据该志所载,所设立乩坛曰‘盛德坛’,由孟轲主坛,庄周、墨翟二人为之辅,下置‘四秉十六司’,此种说法已属滑稽之极,而某日‘圣贤仙佛’临坛时,各有题诗,周末诸子居然能作七绝诗,孟轲且能作大草,又李登讲音韵,能知世界语之发音,此真荒谬。”这就是“盛德坛”的盛况,明确无误是巫师作法。这种巫术的虚伪性在于,它居然敢位科学作伪装。竟有“答吴稚晖先生音韵之篇,该会中人自谓惑人之力量大,足以使科学家信服者”云云,以科学家信服这样的胡诌来印证其为“科学”。这就使巫术成为了伪科学。吴稚晖先生是不信乩术的,但竟也好奇地去问一下音韵这类高深的事,不想难不倒孟轲坛主,连答三篇,咄咄怪事。不过时人见怪不怪,还有乩仙能作七绝诗的、孟轲能写草字的,在灵学家那里,已无时空顺序历史进程,随心所欲无所不能。对于这样的伪科学,陈大齐续有精辟论述:“要而言之,若扶者故作乩书,用以惑人,是有意作伪,是奸民也,无意作伪,是愚民也。”不管怎样,“灵学会”诸君将应“稍加反省”,“不再鼓吹邪说,以蛊惑青年,不再摧残科学,以种亡国之根”。^[17]俞复说“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陈大齐则认为摧残科学的扶乩灵学,才是亡国之根,这是针锋相对。不过,在刘半农看来,陈大齐之说显然还不够犀利,因而写文章道:“陈万年(陈大齐)先生以君子之道待人,予所撰《辟‘灵学’》一文中,不斥‘灵学会’诸妖孽为‘奸民’,而姑婉其词曰‘愚民’,余则斩钉截铁,劈头即下一断语曰‘妖孽’曰‘奸民’作伪,用以欺人牟利。”^[18]

钱玄同根据《上海时报》上的广告买了一本《灵学丛志》,翻开之后大言上当。“真倒霉!真晦气!我们的《新青年》杂志,并非 W·C 的矮墙,供给人家贴‘出卖伤风’、‘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啼郎……’这一类把戏的;然而今天竟不能不自贬身价,在‘随感录’中介绍这种怪物的著作。”其气愤之心,溢于言表。钱玄同并告诫青年人,“如其你还想在 20 世纪做一个人,你还想中国在 20 世纪算一个国;你自己承认你有脑筋,你自己还想研究学问;那么,赶紧鼓起你的勇气,奋发你的毅力,剿灭这种最野蛮的邪教,和这班兴妖作怪胡说八道的妖魔!”^[19]

陈独秀是带头批灵学的,他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中认为“如果相信世间万物有神灵主宰,那西洋科学,便根本破坏,一无足取。若相信科学是发明真理的指

南针,像那些和科学相反的鬼神、灵魂、炼丹、符咒、算命、扶乩、风水、阴阳五行,都是一派妖言胡说,万万不足相信”。[20]陈独秀在《有鬼论质疑》中说:“吾国鬼神之说素盛,支配全国人心者,当以此种无意识之定数观念最为有力。今之士大夫,于科学方兴时代,犹复援用欧美之灵魂学,曲征杂引,以为鬼为存在,确无疑义,于是著书立说,鬼话连篇,不独己能见鬼,而且摄鬼影以示人。即好学尊疑之士,亦以远西性党哲学方盛,物质感觉以外,岂必无真理可寻。遂于不能以科学能释之鬼神问题,未敢轻断其有无。今予亦采纳尊疑主义,于主张无鬼之先,对于有鬼之说多所怀疑,颇期主张有鬼论者赐以解答。”[21]

陈独秀在质疑鬼说时,提出的举证问题,在后来“科玄论战”时丁文江《玄学与科学》一文中亦有阐述。因为举证问题后来一直困扰中国反伪科学(特异功能、气功、UFO之类)的操作,故我认为这种认识是很有深度的。《玄学与科学》写于1923年4月12日,本是为答张君勱给清华大学出国留学生的演讲《人生观》的,此文成为一场历时多年影响极大的“科玄论战”的导火索。丁文江说:“许多假设的事实,不能证明他有,也不能证明他无,但是我们绝不因为不能反证他,就承认是真的,因为提出这种事实来的人,有证明他有的义务。他不能证明,他的官司就输了。譬如有一个人说他白日能看见鬼——这是他的自觉,我们不能证明他看不见鬼,然而证明的责任是在他,不在我们。况且常人都是看不见鬼的,所以我们说他不是说谎,就是有神经病。”[22]

鲁迅先生也在《新青年》第5卷第4号上著文论鬼。他说:“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便须想一个方法排除他。”“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扯西拉,搀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捣乱得更凶的,是一位神童做的《三千大千世界图说》。他拿了儒、道士,和尚,耶稣的糟粕,乱作一团,又密密地插入鬼话。他说能看见天土地不的情形,他看见的‘地球星’,虽与我们所晓得的无甚出入;一到别的星系,可是五花八门了。因为他有天眼通,所以本领在科学家之上。”[23]“其实中国自维新以来,何尝真有科学。现在儒道诸公,却径把历史上一味捣鬼不昭人事的恶果,都移到科学身上,也不问什么是道德,怎样是科学,只是信口开河,造谣生事,使国人格外惑乱,社会上罩满妖气。……据我看来,要救治这‘几至国之灭亡’的中国,……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的科学!——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学!”[24]

20世纪初的灵学之兴,正处在新旧文化交替的时候。“五四”运动倡导民主与科学,开放国门以至西风东渐,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清风徐来之时,灵学的污浊空气随从跟进是必然的,正好中国又有一班如鲁迅所说的“好讲鬼话的人”,他们有很深的巫术情结,从意识形态出发,亦从骗人赚钱计,不得不适应新形势,在国人还难于明辨是非时浑水摸鱼,把种种伪科学冒充科学大加宣扬。

总结 20 世纪初的灵学史,对我们认识 60 年之后中国一场旷日更持久的新“灵学”歪风,具有重要意义。这两次歪风的共同点在于:第一,它们均出现在新旧文化交替、对外开放、思想解放的时期;第二,它们均受到国外灵学之风的影响。第三,都是中西结合,以洋“灵学”掺进中国传统巫术的鬼话的形式出现。第四,均受到了大量信徒的趋附。第五,均受到了来自科学的抵制和批判。第六,均属昙花一现。20 世纪初的灵学后来直接渗透或变化成会道门邪教组织,至 1927 年大革命时成为强弩之末。新时期“人体科学”自 1979 年始,至 1999 年“法轮功”自我暴露并遭到政府的取缔时,众功法组织多有收敛,甚至转入地不活动。第七,都发展成为具有极端倾向的反社会、反科学、反人类的邪教。心灵学为会道门所用,与上海“灵学会”、“盛德坛”遥相呼应的北京“道德学会”和“同善社”,后来都成为了邪教组织,在 1927 年大革命时期被取缔。“新时期”“人体科学”,则发展为“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第八,它们都打着科学的旗号,披着科学的外衣蛊惑人心,是最邪恶的伪科学。对于这几点,以上罗列的材料足可论证。以不单就第三点——“都是中西结合,以洋‘灵学’掺进中国传统巫术的鬼话的形式出现”——补充材料如下:

1916 年,北京成立了“道德学会”,次年,又成立“同善社”。“道德学会”的会长是段正元,在南京、汉口、张家口设有分社,会员人数近千人,尊“万教至圣之神”,试图把一切宗教统一为一种宗教,除讲道、祈祷之外,就是“静坐默想”。“同善社”是从“道德学会”分化出来的,也善于“静坐默想”,并标榜“万教归一”(70 年后,“佛子”张小平创立的气功叫“万法归一”),而“同善社”的真正师尊,据说是原属“礼门”的四川人彭汝尊(1868 ~1950),他是一个具有“遥视、遥感、心灵感通”能“气功”治病的“特异功能”人。“静坐默想”是一种修炼方法,遥视、遥感、感灵、感通和气功却是技艺,这些技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巫术和江湖杂耍的汇合,这样的洋洋大观可由上海出版的一本《灵力实验法》中所列奇术以证明。这些奇术有:木棒分合术、纸刀断棒术、吞火术、人体刺针术、麻绳手断术、人体高飞术、觉醒时觉术、刀刃不伤术、灵媒普兰术、即感人体自由术、铁棒屈曲术、人体架桥术、任意轻重术、动物止动术、刚强

不死术、热汤入手术、手取热铁术、掌上火焰术、木棒术、窥破人心术、灵力灭灯术、金剛不坏身术、魔摆术、物体灵动物、圆桌灵动物、灵智灵觉术、灵动物照相术、万里透见术、现神现佛术等。这些杂陈的奇幻之术,均被作为灵学的研究对象。

发端于 1917 年前后的中国灵学运动最兴盛也是遭到的批判最严厉的也就两三年时间,以后灵学组织转化为各种会道门邪教组织,至 1927 年大革命时虽有所收敛,然而余波难平,直到抗日前夕才风光不再。研究这段伪科学史,我们发现,较之它的国外灵学源头,中国灵学有更深厚的本国固有的文化基础。可以认为,即使没有国外的灵学传入,中国自己的“灵学”也一样能兴衰交替、自然传承。国外灵学的传入只不过给中国的“东方神秘主义”一个爆发的契机。至于引发中国灵学在 20 世纪初风生水起的国外灵学,它们自 1882 年英国灵学研究会至今 100 余年来的研究成果却十分有限。这表现在以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灵学研究遭到了社会各界的猛烈抨击,大量灵媒事迹和学术成果被证明是伪造的、虚假的。在西方,活跃于 20 世纪 20 至 60 年代的 J·B·莱茵被认为是知名度最高、并对东方有过影响的“心灵研究者”,然而他所命名并研究了“遥视”、“传心术”、“预知”和“心灵施动”并未结出学术硕果,这使得倾向于超心理学的《心灵学》一书也不得不认为:“普拉特和莱茵携手掩饰大量非随机性一事,也许可以说他们并非在有意说谎,而是在很‘节俭地’使用着真相。”在俄国,1875 年彼得堡大学物理学会成立的“神媒现象考察委员会”通过十个月的考察后得出结论说:“降神现象发生于无意识的动作或有意识的欺骗,而降神说是迷信。”而一位曾研究过英国心灵学会历史的作者 C·E·M·汉塞尔更把 1830 年至 1920 年的心灵研究概括为“没有产生出任何能视作超自然过程的科学证据的东西。这主要是一段欺骗、作弊、愚不可及的历史”。^[26]当代西方灵学史上的另一个人物即来自以色列的尤里·盖勒的特异功能,也被美国魔术师、反伪科学斗士詹姆斯·兰迪揭穿。对此,兰迪风趣地说:“如果尤里是一个以手艺取悦老人小孩并以此为生的人,很早以前我就会把他当作我的朋友。但他选择了当一个非宗教性的人物,把自己打扮成神圣的模样。”^[27]

其次,心灵学研究受到了各界的关注,但由于得不到理想的科学成果,许多加入者认清了它的伪科学本质,或者对这种研究失去了信心而退了出来。自 1882 年以来,英国心灵研究会的累积会员,计有 9200 多人,而 1981 年,它的会员有 1000 人左右。这些人中有许多在科学、哲学、文学、政治界颇有成就,享有盛誉。其中“有

11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多位皇家学会院士。大不列颠科学促进会(英国科协)的前后8位主席都是心灵研究会成员,其中4位担任过学会的主席;有发现海王星的天文学家J·亚当斯,有心理学家C·G·荣格和S·弗洛伊德,哲学家中的亨利·柏格森,作家马克·吐温、阿瑟·柯南道尔,政治家中有英国首相格拉德斯通和鲍尔弗,等等”。[28]1885年,美国成立心灵研究会,1887年,该会被伦敦心灵学会兼并,1905年重新独立,但1988年初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对在两年多时间内对“涉及130多年来对声称的特异功能行为”的研究结果做出报告,认为“迄今并没有发现任何科学的证据能够证明特异功能的存在”。[29]美国国防情报局支持的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将心灵学、特异功能应用于军事研究的“星门计划”,则于稍后的1995年因无任何成果而告收场。

第三,心灵学说和特异功能信仰被邪教利用,或者,心灵学研究者最终走向了邪教。邪教是“新宗教”运动的产物,但它却是借用灵学观念来招徕信众、蛊惑人心的。如对“圣灵充满”、气功特异功能、催眠术等的信仰。在1997年3月22日制造39个教徒自杀事件的美国“天堂之门”教主爱泼怀特自称其得教是在一次“濒死体验”时开始的,1995年3月20日在日本东京地铁施放沙林毒气,致使12人死亡,5000多人中毒的奥姆真理教的教主麻原彰晃自称能灵魂飞升,并有腾空打坐的照片为证。这样的心灵观念后来在中国气功特异功能热潮中有普遍的表现,并使一些气功特异功能组织极端化为邪教。

第四,心灵学说所研究的问题十分繁杂,即使在研究者内部也很难取得一致的研究结果。而科学界对它一直不予承认,社会学界称之为迷信和骗术。我国研究心灵学的何宏博士曾长期进行“人体科学研究”,虽然他认为不能仅仅因为心灵学的结果还没有规律、暂时得不到科学界的认可就把它划入“伪科学”的另册,但他毕竟也承认:超心理学(即灵学)的“实验结果相当不稳定,甚至混乱不堪、自相矛盾,根本拿不出手”。[30]在灵学家看来,鬼灵,心理致动,思维情感,灵魂附体,预测术,UFO等都可以纳入他们的研究范畴,这些研究取得一致性科学结论的可能性很小。一些科学家参与心灵研究,并不代表科学界对这一研究的认同。科学界对这种研究的拒斥是显而易见的,这种现象的参照是关于灵学研究或灵学批判已被划归哲学家或社会学、心理学家,而正规的科学团体、学术刊物、学术会议均不接受心灵学研究活动和研究成果。百余年来,心灵学研究游离于主流科学之外。

第二节 人体特异功能

“人体特异功能”发端于 1979 年,以 3 月 11 日《四川日报》发表“唐雨用耳识字”报道为标志,此后气功、特异功能和人体科学在中国风行,其中“法轮功”等气功宗派发展成为危害社会的邪教。以 1999 年 7 月 22 日国家民政部发出《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为反击伪科学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标志,当代伪科学盛行 21 年,习惯上,人们称“中国伪科学 20 年”。

此前,中国灵学之盛与中国特异功能风行之间的这段历史里,伪科学主要表现在邪教的流传和大跃进浮夸风这些事上。邪教的流传问题,我们已在第三章第五节《江湖骗术》中提及,并且将在第五章《“法轮功”与当代邪教》中补充论述。大跃进浮夸风是伪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是科学屈从政治的范例,是极左路线的产物。这次浮夸风之盛和伪科学对政治的附庸,可从当时的《人民日报》标题上看出来。1958 年 8 月 13 日《人民日报》称《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福建海星社创花生亩产一万零五百多斤纪录》;1958 年 6 月 12 日《人民日报》报道《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二亩九分小麦亩产 3530 斤,湖北幸福社十一亩亩产 3215 斤》。此期间有科学家在报上发文提出了上述“卫星”的科学依据。新闻图片显示当时人们在劳动工地打出了“深耕二尺,密植十万,积肥万担,亩产万公斤,创造晚稻大王”的横幅标语。这一场伴有伪科学的浮夸风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人民陷入极度的贫病饥荒之中。这场灾难的参照性数据是:1959 年至 1962 年,人口死亡率一直向上攀升,从 1958 年 11.98‰ 升至 1959 年 14.5‰,然后又骤升到 1960 年的 25.4‰,超过当年的出生率,导致中国当代极为罕见的人口负增长,全年人口总量减少 3304 万人。^[31]大跃进之后,虽然在“人定胜天”这样的政治鼓动性多于科学性的口号下,伪科学的存在从未间断,但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使伪科学这样的社会现象在此期间显得次要。这就是我们截取 1979 年至 1999 年这段时间来描述当代伪科学的原因。

“人体特异功能”也称“人体科学”,它包括“特异感知”、“意念致动”和“人体自我控制”等功能。“气功”被包括在“特异功能”之内。特异功能不是我们从字面上理解的人体所具有的一些超常的特殊的功能,它具有特定的内涵。从外源上讲,美国莱茵时代(1927~1965)的超心理学中的两类现象对应于中国“人体特异功能”。

第一类是超感官知觉 (Extrasensory Perception, 缩写为 ESP), 即天眼通、传心术和预知等; 第二类是心灵运动 (缩写为 PK), ESP 和 PK 又被莱茵称为 PSI 现象 (Psi phenomena, 即心的超心理学功能)。按“人体特异功能”倡导者、某著名科学家——这是学术界一致的观点, 也是客观事实——的诠释, “人体特异功能”乃是“透视人体、透视地下构筑、发气拒敌、十步之外摔倒人等功能”。[32] 人体特异功能简称特异功能。

“特异功能”一词在何具体时间由何人提出, 尚不得其详。大致历程是: 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发表《大足县发现一个能用耳朵辨认字的儿童》的报道时, 使用了“奇异功能”一词; 1979年4月3日《四川医学院的调查报告》称唐雨“用耳识字”为“超常的生理功能”; 香港《明报》发表的李学联写于1979年6月18日的《以耳识字, 未必荒谬》一文时, 作者用了“超感官知觉”一词; 1979年9月《自然杂志》发表该杂志社派出的记者采写的《非视觉器官图像识别》观测报告时, 使用了“非视觉器官图像识别功能”这样一种学术语言; 同月, 北京大学陈守良、贺慕严投交给《自然杂志》的《关于人体一种特殊感应机能的调查报告》使用了“人体特殊感应机能”一词; 1980年2月4日, “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于上海举行时, 正式使用了“人体特异功能”一词。

1980年2月4日是“人体特异功能”命名的日子, 同日, 《自然杂志》总编贺崇寅在开幕式上作了《为探索人体生命科学的奥秘而进军》的发言, 这就使“特异功能”有了“人体生命科学”或“生命科学”的别称。这一别称后来被得到承认。某著名科学家对此有过阐述。他说: “气功、中医理论和特异功能, 孕育着人体科学最根本的道理”。[33] “人体科学是一门将中医、气功、特异功能三者融在一起研究的人体的科学”, “人体科学新发展的钥匙, 是中医理论、气功和特异功能”, “中医、气功和特异功能是一个东西, 而本质又是一个东西”。[34] 1987年6月15日, 某著名科学家在一个会议上说: “我们‘中国人体科学学会’被正式批准成立, 开了第一次理事会”, “所谓搞人体科学”, 乃是“用了一个别名”, “搞人体科学的是搞人体特异功能的。因为这个特异功能, 人家反对的很多……所以我们就把它换了一个词, 不叫特异功能, 叫人体科学”。“现在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已经被认可了, 你不必再用一个别名来掩盖一下, 没有必要”。[35] “人体科学”又叫“生命科学”, 因为“我原来说的中医、气功、特异功能等都是指人而言, 所以叫人体科学。今天的概念扩大了, 扩大到整个生命科学, 可以应用于动物和植物, 可以应用于工业和农业”。[36] 当代中国伪科学, 主要

是指“特异功能”运动。这个运动又被学者们称为中国“新世纪”运动，它借用自柯云路的一个书名，因为海外的新宗教运动者自命为“新时代”，而“新世纪”正好与之相仿，并暗示了中国“新世纪”是国外“新时代”这种新宗教运动的反映。香港则称特异功能为“新纪元”。^[37]

在以下的论述中，我们一般只采用特异功能这个概念。在这一节里，我们将简约地勾勒一下特异功能 20 年的历程，并分析一下特异功能运动出现的原因、中国特异功能运动的特点，以期揭示出特异功能是一种怎样的伪科学。

一、特异功能 20 年的历程

20 年特异功能历史可以分为理论论争期（1979～1982），组织发展期（1982～1995）和走向邪教期（1995～1999）。

第一个时期的特点是特异功能事件不断涌现，新闻报道、组织观摩表演十分风行，理论界争论很大，特异功能组织初创。这一时期以关于特异功能的“三下政策”的出台而告结束。

1979 年 3 月 11 日，《四川日报》发表通讯员高琪、丁先发，记者张乃明采写的报道：《大足县发现一个能用耳朵辨认字的儿童，省有关部门已采取措施，对这一现象进行科学研究》，这一新闻标志着当代特异功能运动的开端。

《四川日报》的消息见报后，四川医学院马上派出一个调查组赴大足县进行调查。调查从 3 月 13 日开始，3 月 20 日结束。调查得知：唐雨“出身于一个农村家庭，现年 12 周岁。从五六岁起，经常扯谎，并以为乐。现已学会抽烟。第一次‘用耳识字’就是为了骗取别的孩子的香烟开始的”。^[38]调查认定，唐雨的耳朵并不能辨认字。耳朵识字是弄虚作假的结果，其手法“基本上采取了魔术师的那一套”。

就在四川医学院的调查还在进行的时候，3 月 16 日，《上海科技报》迅速转载了唐雨用耳识字的消息，跟着转载这条“科技新闻”的有《河北科技报》、《湖南科技报》、《南方日报》、《长江日报》和《甘肃日报》等，“美国之音”播出了类似的消息。香港《大公报》、《明报》更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了中国人的惊人发现。

4 月 6 日和 21 日，《安徽科技报》连续两次报道了安徽省宣城先后发现两名能用耳朵识字辨色的女学生的消息，这两名女学生是胡联和何小琴。4 月 13 日，《北京科技报》刊登了记者甄庆如关于 8 岁女孩姜燕可用耳朵识字的报道。

法新社、美联社、路透社、美国之音等新闻机构的驻京记者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希望能进一步了解耳朵识字的情况。与此同时，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信访处

也收到了很多询问信和有关非眼识字儿童的推荐信,其中多数是省地县科委或基层单位正式来函报告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两名科研人员对北京市石景山区 8 岁的女学生姜燕进行了观察和测试,写出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姜燕的考察情况报告》。报告介绍了姜燕在测试中作弊的情况及其方法,并公布了拍摄下来的姜燕偷看的照片。报告认为:“姜燕所谓‘用耳识字’完全是假的。”^[39]

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祖甲《从“以鼻嗅文”到“以耳识字”》的文章;13日,叶圣陶先生《关于耳朵听字的新闻报道》在《人民日报》发表,两文对“用耳识字”这种“荒唐的新闻”进行了批评。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动态》第 8 期(1979 年 4 月 12 日)发表了《未经科学鉴定的奇事不宜宣传》一文,《宣传动态》第 10 期又刊发了《北京一 8 岁女孩用耳朵识字是骗人的》一文并加了按语。两文都批评了“用耳朵辨认字的奇谈”,希望枉绝这类无稽的宣传。与此同时,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还于 1979 年 4 月 24 日对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 1979 年 4 月 23 日第 92 期《信访简报》《揭穿“耳朵识字”的骗术》写了批语。批语称:“穆之、井丹、绩伟、曾涛、香山同志一阅。所有表演过这出丑戏的小孩都没有罪。地县委居然轻信,党报居然发表,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声中,居然出现这样荒谬绝伦的笑话,并由此推想各条战线上必然存在的能同这种笑话相比美的事情,我们该要多么警惕啊!该要多么努力联系实际解决一些问题啊!”

在中宣部的指示和《人民日报》的文章出来后,5月28日,《四川日报》编辑部向省委宣传部作了自我批评,6月5日,四川省委宣传部向中宣部作了自我批评。至此,20 年特异功能的兴起在信仰者一方的暂时沉默下告一段落。

6月18日,香港《明报》发表李学联《以耳识字,未必荒谬》一文,认为“某些部门的党委领导人,对 ESP(Extrasensory Perception 超感官知觉)这门学问或许所知甚少”,因而“过于武断”。这篇文章给受到批评的媒体、宣传部门,对“用耳识字”热衷的各级党政部门、主管部门及具有“非眼视觉”能力的孩子们以极大的鼓舞,四川各有关单位对唐雨的功能进行了重新测试,并层层上报说唐雨“用耳识字”是真的。

耳朵识字的报道,引起了上海《自然杂志》的关注。1979 年 7 月,《自然杂志》派人到北京测试了当时在北京颇为出名的特异人王强、王斌两姐妹,测试结果写成《“非视觉器官图像识别”的观测报告》一文,发表在 1979 年第 9 期《自然杂志》上,

此后,《自然杂志》发表了大量的肯定人体特异功能的观测报告和学术论文(仅1979年至1982年,就发表此类文章53篇)。1980年2月4日至10日,《自然杂志》编辑部组织召开了“第一次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会上,主编贺崇寅做了《为探索人体生命科学的奥秘而进军》的发言。会议期间,14名具有耳朵认字特异功能的青少年接受了测试,会议的结论是:“与会者一致认为:耳朵认字这种人体特异功能的真实性现已为公众所证认。”

“上海会”后的1980年6月,某著名科学家赴上海访问了《自然杂志》,表示了自己对特异功能研究的支持。他认为:“从古以来,人没有能动地去发掘人体的潜在能力,今后应该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研究,自觉地发掘人的潜力。所以对中医理论、对气功、对特异功能,都要进行研究,最后都可归结到开发人的潜力上来。”^[40]因此,某著名科学家勉励《自然杂志》克服困难,勇往直前。“对于中西医结合、气功和特异功能,是有不少反对意见的。这也没有关系,大家一起研究嘛!对于人体,对于自然界,科学不能解释的地方还多着哩!一项新的科学发现,在刚提出的时候,总是有人反对的,科学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总要有个带头人,首先提倡;带头人也要受到反对,因此要有勇气,要挺住腰板。”关于耳朵认字这种特异功能,他说:“它是客观存在,因而是肯定不了的。”^[41]

“上海会”后的1980年3月开始,全国各省市都在组织“人体特异功能”的研讨会、报告会,筹备建立组织,且得到了各级政府领导的支持。某著名科学家公开表态支持和倡导“特异功能”研究后,这种特异功能运动更趋活跃。在这个背景下,1981年5月11日至18日,全国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在四川省重庆市举行了。某著名科学家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开展人体科学基础研究》的论文。这篇长达万言的论文从巨系统理论、量子力学理论和基本核子理论等方面对人体特异功能的机理进行了探索。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106个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室的380多名代表和列席人员出席了大会,他们大多是从事原子能、物理学、高能物理、无线电、电子学、光学、声学、生物物理、生理、心理、航天、神经、大脑、生物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中医、经络、气功、自然辩证法、哲学、科技情报等学科研究的专家和教授。他们向大会提交了147篇论文。大会做出了《关于进一步开展人体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大会成立了“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名单如下:

常务委员:龙文宇、叶兆麟、吴熙敬、林书煌、苏音(女)、贺崇寅,另保留一名。

委员:北京:林书焯、彭庆生。天津:葛葆安。河北:王冠友。山西:王蔼民(女)。吉林:龙文字。黑龙江:张恒轩。上海:贺崇寅、吴汶海。安徽:何文。福建:贾秉钧。山东:秦士德。河南:郭风高。湖北:吴熙载。湖南:谭湘。广东:刘汝琛。广西:韦瑞峰。四川:叶兆麒、金淑然。贵州:孙云寿。云南:苏音(女)。西藏:扬汝楷(女)。陕西:王兴中。青海:古洪。宁夏:钱祖凡。《自然杂志》:朱润龙。此外,内蒙古、辽宁、江苏、浙江、江西、甘肃、新疆等省、自治区,暂时还没有产生代表,名额予以保留。

至此,特异功能现象已得到了科学界和政府许多知名人士的支持和承认。特异功能研究已有了全国性和地方性组织。特异功能运动从此在更广阔的领域更强劲的力量下开展。这使热衷者们有一种迎接“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一样的激越心情。这种心情有如 100 多年前无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向往一样,因而,1984 年 2 月 10 日,某著名科学家在清华大学的一个气功学术会议的报告上,仿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写进《共产党宣言》的话语,称“一个人体科学的幽灵在我们当中徘徊”。

特异功能运动的风起云涌,引起了反对者的关注。这期间,反对者的呼声从未间断,许多人从科学和江湖骗术一类角度对特异功能进行了分析和批评,而真正使论争的声势造大的是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于光远同志出面对特异功能的批判。

于光远对特异功能公开发表看法,最早应是 1980 年 10 月 6 日到 15 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的辩证唯物主义学术讨论会上。于光远那次会上作了一个演讲,认为哲学工作者在所谓“人体特异功能”问题上表现出了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状况。但在特异功能“最初的两年半时间中”,他“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因为,他说:“原先我以为这样的事闹腾一阵子之后就会自生自灭,没想到竟然愈演愈烈。‘人体特异功能’的受骗者越来越多。”于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实在忍无可忍了”,遂于 1981 年 8 月发出“应该停止这种反科学的宣传的呼吁”。[42]

于光远的呼吁是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暑期高校哲学教师讲习班上发出的,时间为 1981 年 7 月。这篇演讲后来发表在《江西社会科学》1982 年第二期,题为《对两年多“耳朵识字”宣传的哲学评论》。于光远演讲中认为所谓“耳朵识字”完全是不可能的,这样的研究在科学上毫无价值,一些人之所以相信是犯了在哲学上的“眼见为实”的经验主义错误。

10 月,在于光远建议下,国家科委成立了“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联络组”,对特异功能进行调查。11 月 4 日,于光远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大会

上明确提出特异功能即“灵学”，提出了“要灵学，还是要自然辩证法”的问题。

此间，著名科学家周培源、茅以升、潘菽等都在不同场合对特异功能进行了批评。

1982年2月24日，在中国科学院举行的科学报告会上，于光远作了题为《对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历史的、科学的分析》的报告，批评了两年多来对“特异功能”的研究和宣传。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李昌在会上表示，他不反对对人体作严格的科学研究，但是他不相信人体特异功能。这些会议内容被《人民日报》于2月25日作了报道，从而导致了特异功能相信与否双方的激烈争论，使中宣部出台了“三不政策”。

《人民日报》发表《李昌于光远在科学院召开的科学报告会上批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和宣传》后，支持特异功能研究的国防科工委主任张震寰、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聂春荣、卫生部中医局局长、中华全国医学会秘书长吕炳奎等人分别向人民日报社、中宣部和胡耀邦主席去信表达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认为特异功能是经得起检验的。4月10日，胡耀邦主席在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转来的张震寰于3月5日致人民日报的信上作了这样的批示：“转乔木、任重、方毅、力群同志。这个问题79年一开始我就怀疑，作过三次批语，提出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报利上不要介绍和宣传。有些话我可能说得绝对一点，但我的主张是站得住脚的。但后来我不管了，报利上登载不少。现在我们主张守住这两条线，请宣传部门把关。”^[43]

4月20日，中宣部发出《关于不要在报利上宣传或批评人体特异功能的通知》，通知发出后，论争双方都不满意，出于求同存异、安定团结考虑，6月15日，中宣部再次发出《关于人体特异功能宣传问题的通知》，指出“人体特异功能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在科学上还没有充分证实之前，今后在报利上不再介绍和宣传，也不要进行批评和组织争论”，这就是20年特异功能历程中有名的“三不政策”，也叫“三不方针”或“三不主义”。

在“三不政策”的要求下，报利上大张旗鼓地宣传或批判特异功能的文章和报道没有了。相信的一方采取出书、作演讲、搞表演、成立组织和发表内刊的方式推动特异功能运动向纵深发展，反对的一方也采取了调查研究、揭伪和演讲的方式向他们认为的伪科学叫板，从而进入了特异功能20年的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时期以1982年6月15日“三不政策”出台为始，以曝光伪科学的《“超人”张宝胜走麦城》的发表为止。跨1982~1995年。这个时期的整体特点是特异功

能向实用领域推广。信仰特异功能者拥有了各种组织,特异功能大师各自弘扬功法,网罗信徒,大肆敛财,新闻出版进一步关注特异功能,一批科学家在特异功能问题上陷得更深,另一批科学家更从证伪的方法上揭露伪科学。伪科学争论双方的分歧在于:信仰者认为这关系到科学发现的艰巨性问题,眼见为实,现象是存在的,现在的问题是原理上的研究,其理论基础是科学是发展的,自然辩证法也是发展的;反对者认为特异功能违反自然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特异功能现象与现行科学原理完全抵触,特异功能经不起严格的科学检验,从认识论上讲,它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学上讲,伪科学是一种欺骗。信仰的一方所热衷的特异功能表演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他们甚至邀请反对的一方前去观看表演,验证事实。反对的一方则说这些东西根本用不着去看。科学家观看表演的情况还是有的,但当相信的一方观看时,实验往往成功,而反对的一方在场时,实验又常常失败。这一时期里,涌现了一批反伪科学斗士,揭露伪科学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头号“超人”张宝胜败走麦城的新闻最终被公开报道。这一时期是中国当代特异功能的发展成熟期,也是中国当代反伪科学事业从顽强抗争到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期,其特点可分述如下。

1. 这一时期,当代伪科学被进一步理论化,一些科学家更坚定地支持特异功能的理论研究和表演实践,他们宣称“一个人体科学的幽灵在我们当中徘徊”,认为人体特异功能“可能导致一场 21 世纪的新的科学革命,也许是比 20 世纪量子力学、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44] 1983 年初,航天医学研究所(507 所)被作为中国特异功能研究的基地开始了长期的特异功能研究。1983 年 3 月 14 日,某著名科学家在 507 所作了《关于科学道德》的报告,自此至 1987 年 10 月 5 日,他在该所共作了 100 多次报告或发言,这些报告和发言涉及人体科学、系统科学、气功、中医、特异功能和科学革命问题,这些讲话后来整理成《人体科学与现代科学纵横谈》一书。1986 年 5 月 26 至 31 日,在人体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某著名科学家作了《人体科学研究的战略》的发言,认为“人体科学”和“共产主义有相似之处。千万不要认为是个简单的事情,这涉及人的思想、意识的革命”。1987 年 8 月,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把同严新作实验的 7 篇论文提交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某著名科学家在《稿件审查意见书》上写道:“此稿内容为世界首创,确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人体可以下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其分子结构。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所以应立即发表,及时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的成就!”1988 年 12 月,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某著

名科学家等著的《论人体科学》。某著名科学家的理论,对特异功能研究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他所具有的权威性,成为中国当代特异功能现象的强大推动力。他把特异功能视作“科学革命”和“共产主义有相似之处”的观点,极大地鼓舞了特异功能信仰者、研究者和特异功能人的士气。他对特异功能的领导作用和推动作用,可以概括为以下 9 条:

①对于中国伪科学的盛行,某著名科学家负有主要责任。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当江湖迷信打着气功的旗号在社会上招摇撞骗时,是某著名科学家肯定和支持了它并赋予了其学术色彩,这就使一些权威人士相信了他进而相信了伪气功。

②某著名科学家一直在(长达 10 余年)构筑所谓人体科学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部分是三项:中医、气功和特异功能。是他的所谓人体科学的鼓动和宣传动员,使许多群众投入了这场愚昧的运动。

③某著名科学家在宣传指导这场愚昧运动时言必称马列,言必称唯物辩证法。这就使这场愚昧的运动带上了一个保护伞,使一些过去本来对所谓人体科学毫无兴趣的老干部成了这场运动的牺牲品。

④某著名科学家在推广这种所谓人体科学时,反复强调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是真正的高技术。他使人们相信靠中华民族的这种独家暗器能够打败发达国家(敌对国家)的高科技。这种误导有效地利用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把本来宝贵的爱国热情引入了邪路。

⑤某著名科学家在宣传所谓人体科学时,始终把于光远先生作为一个对立面,指责于光远不看特异功能表演、否定特异功能。认为于光远目无实践论的原则,犯了主观先验的错误。事实上犯错误的恰恰是某著名科学家,他的错误的本质是蔑视理性思维,这和一百年前英国的某些大人物所犯的错误的是一样的。在于光远翻译的《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对这种经验论的错误有过尖锐的批评。

⑥某著名科学家不但讲话奢书,担任这类组织的领袖或名誉领袖,而且他还用看表演、接待来访、写信的方式,鼓励民间那些想入非非的人,搞什么人体科学研究,致使本来应该严肃进行的科学研究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愚昧的群众运动。

⑦某著名科学家给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写信,用党性来担保特异功能的真实性,这造成了两方面的直接结果。其一,影响了中央关于这类现象的正确决策;其二,造成了此后近 20 年研究所谓特异功能的错误倾向。由于他用党性、人格一类不能够作为科学研究证据的东西充作科学证据,这样就使伪科学的存在合法化。

⑧某著名科学家声称他不看特异功能表演,也相信关于特异功能的实验是真实的,理由是做这些实验的是我们党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这种背离科学精神的主张,大大地助长了在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中的作伪行为。

⑨由于某著名科学家在中国国防研究过程中所发挥的无可替代的作用以及他本人所具有的影响力,导致了中国军方不大气力专人专职开展特异功能研究,浪费了大量财力物力,结果遭到国外同行耻笑,而于国防现代化没有任何作用。〔45〕

2. 这一时期,特异功能研究向纵深发展,一些重要的科研单位开始了对特异功能的长期的研究,特异功能组织顽强地争取合法地位,一些特异功能刊物内部发行,影响较大,气功和特异功能书籍、音像制品畅销于市,特异功能成为最显著的时代特征和社会文化现象。507所作为科研单位,对特异功能进行了课题研究。1982年8月,应国际超心理学会的邀请,507所陈信等人参加了在英国剑桥召开的第25届国际超心理学学会。中国代表在年会上做了关于中国相关研究的报告,并表示承认:所谓“特异功能”,就是西方研究了100多年的“超心理学”或称“灵学”。北京大学的陈守良、贺慕严、王楚、清华大学的李升平、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的陆祖荫、北京市中医研究所的何庆年、北京师范大学的林书煌等对特异功能进行了研究并写出许多理论文章。1983年5月,《人体特异功能通讯》报被《人体特异功能》杂志替代。《人体特异功能》、《中国人体科学》、《自然杂志》及各种气功报刊成为发表特异功能论文和通讯报道的主要阵地。《大自然的魂魄》、《严新气功现象》、《大气功师》、《大气功师出山》等介绍特异功能大师的书籍成为畅销书被读者抢购。特异功能组织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建立健全。1985年12月25日经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国防科工委张震寰被选为理事长。1986年5月26日,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正式成立。稍后,人体科学三大小组成立,其成员是国防科工委的伍绍祖、安全部的贾春旺和中宣部的滕藤,这个小组一直领导着中国人体科学研究。1987年,小组改为四大小组,1990年12月改为六大小组。1990年明确一直在小组中的伍绍祖为领导。各省、州、市及其市、县大多成立了相应的人体科学研究会和气功科学研究会。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及其各地方协会自上而下地领导着中国人体科学和气功研究与运动,特异功能气功信仰者达数千万之众,对特异功能的信仰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3. 特异功能研究朝实用的方向发展,特异功能大师大量涌现。特异功能大师大肆从信仰者那里搜括财富,骗财、骗色的犯罪活动时有发生,一些大师的欺骗活

动搞到了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和老同志那里,由于他们的成功表演,被特异功能界和相应的领导机构尊为国宝级人物。张宝胜、严新、张香玉、张宏堡、沈昌、张小平、张志祥等特异功能大师相继出山并且把自己的特异功能事业做得很大。

4. 新闻媒体和出版界的报道宣传,对特异功能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科学家、作家、新闻媒体和一些政府部门对特异功能的热衷、支持和肯定被认为具有“集团欺骗”的性质。^[46]1986年11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怀揣着求医者的电报、信函,从重庆出发北上——中医师严新千里迢迢找病人,他集中医、气功、武术和特异功能于一身,沿途为不少人治好病》的报道,1987年1月24日,《光明日报》报道清华大学气功科研组实验发现了“导致生理效应发生改变是气功能治病的原因”,并称“这项发现表明我国气功的研究从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9月4日,《光明日报》报道:“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首次发现,气功外气能够影响核酸分子结构,证明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分子结构。”这些报道影响很大。1988年,新闻界的张宏堡热有力地推动了“中功”的发展。1988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会上,气功师张加陵表演的纸上悬人、踩气球和1989年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会上张宏堡的“电气功”表演,影响很大。作家柯云路关注特异功能,写作了《大气功师》并于1989年出版,此后一发不可收,先后出版气功、特异功能著作十余本,成为中国当代最有成就的特异功能作家,他的《发现黄帝内经》推出了医学骗子胡万林,这是中国当代特异功能运动中的重要事件。2000年1月,由《科学与无神论》杂志和《中华读书报》联合主办评选出的“中国十大伪科学代表作”,全部都是主要的和部分的涉及特异功能内容的著作,其中包括:李培才著《大自然的魂魄——记自然中心功传授者张香玉》(长虹出版社,1989年)、纪一著《大气功师出山——张宏堡和他的功法秘宗》(华龄出版社,1990年)、尹一之著《沈昌人体科技——21世纪的曙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张小平著《中华奇宝——“方法归一功”秘传真经》(华艺出版社,1993年)、李洪志著《转法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李卫东著《人是太空人的试验品》(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张志祥著《中国元极功法》(科学出版社,1995年)、经纬、艾人编著《严新气功科技实验纪实》(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柯云路著《发现黄帝内经》(上下册)(作家出版社,1998年)和邵伟华著《周易与预测学》(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其中《周易与预测学》属于传统的神秘主义题材,但亦与这些当代特异功能略有关系。柯云路因著作太多,其于1989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累积发行近30万册的《大气功师》榜上无名。李

伦编著的由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累积发行 15 万多册的《严新气功现象》也被上述另一部关于严新的著作排挤出局。以上所列伪科学代表作,多在这一时期,成为这一时期伪科学盛行的证据。

5. 特异“功法”多样化、“功能”实用化。“非眼视觉”不过是特异功能的一种,美国莱茵所研究的两类超心理学 ESP(不通过已知的感官渠道而获取外部世界的信息)和 PK(精神直接作用于某个外界物体或某个客观过程并使之运动,一个人用精神直接作用于另一个人),在中国特异功能中都能找到,前者如“天眼通”、“传心术”、预知,后者如“意念改动”。各大师中,严新具有气功改变 2000 公里外的物质分子结构的功能,张宝胜能用意念把药片从玻璃瓶内抖出来,张香玉能使用“宇宙语”与来自天外的信息作交流,沈昌能用意念把病人的癌抓掉,张小平能治百病,张宏堡把特异功能发展为一种叫麒麟的“文化”,而张志祥则把元极功做大成为“实业”。这个时期特异功能的“功能”以实用为主,治病和健身是最主要的功能。“辟谷”除了治病健身外,还可以节约粮食。严新气功可以用于灭火(用意念在大兴安岭火灾区降水)和分子物理的研究。张宝胜的功能则对军事情报一类工作有助,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华夏智能功可以使农作物增产,而“元极学既不是气功,也不是体育方面的,是一门自然科学”^[47],可用于基础研究。这些五花八门的“功能”,成为了气功特异功能人网罗信徒、骗色敛财的借口。

6. 特异功能组织化。随着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的成立,各特异功能组织在各地体育、民政部门或其他负责气功管理的部门注册,而更多的则是没有注册或虽然申请但未获准注册的非法气功、特异功能组织,这些非法组织有的是气功功法组织,有的是以研究为名义的气功组织,后者以柯云路的“中国生命科学院”为典型。柯云路于 1995 年 7 月 21 日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获中国科协批准成立了“中国生命科学院”,并自命为院长。此院被反对特异功能者称为“伪科学院”,全国政协八届三中全会对此提出了第 2086 号提案,中国科协学会工作部通知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终止了这个“伪科学院”的活动。此一时期的特异功能组织除进行理论研究的学术组织外,功法组织均以特异功能或气功功法命名。如郭林气功、庞明益智功、沈昌特功(特异功能)、田瑞生香功、中华养生益智功等。这些功法组织数量,目前尚无科学的统计,据柯云路《中国气功大趋势》附录三^[48]称,经柯云路考察和学习过的气功师(气功功法)就有近千人(种)。柯云路在书中共列举了 275 名特异功能和气功师,计有功法 262 种。有些是两名气功师共用一个气功,如“常玉兰和周

文歧性命双修九步功”。一般认为,中国气功特异功能功法有上千种,其中在北京活动的有**300**多种,各级气功研究组织和气功功法组织则有一万个左右。中国特异功能和气功功法弟子,即那些笃信一种功法,拥有这种功法的修炼资料,甚至参加了这种功法的基层组织,经常地练习这种功法的人,有数千万之众。具体的统计很难做出,以中国最大的气功组织“中华养生益智功”为例,该功法的宣传资料自称有**3000**万弟子,但这个数字有自我吹嘘之嫌,实际弟子数应在**1000**万上下,很可能不足**1000**万。在特异功能**20**年后期成势的“法轮功”,自称**1**亿弟子,学术界及政府统计则在**200**万左右。中国特异功能功法虽多,基层组织也多,但练功者主要集中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和农村集镇等地区,修炼者又以有闲的中老年人为主,青少年学生这个年龄段及边远农村的农民这个区域相信或修炼特异功能、气功者较少,所以,特异功能信仰者人数应在全国总人口的**10%**上下,即**1**亿多人,实际修炼者则比这个数字还小得多,或上**10**倍于“法轮功”弟子,或几倍于“中功”弟子,总数在数千万之众。国外报道中国有三亿人练气功,中国学术界也把中国气功修炼人数估计过高,其根本原因是他们片面地把城市社区抽样估计作为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实际上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国家。如果以占全国人口**5%**的人修炼气功特异功能计算,则修炼人数在**6000**万左右,**5%**的比例就是每**20**人中有**1**人练功,如果我们看身边的情况,就会觉得这个比例的估计还是下低的,实际比例可能还要低一些,当代中国的练功者应该在**5000**万左右,即**5**个“中功”或**20**个“法轮功”的人数。

7. 更多的科学家和社会学家加入了反对特异功能的行列,反对特异功能的研究进入了现场揭伪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阶段。于光远、何祚庥等均提出了特异功能实验的“双盲”原则,对“眼见为实”这种显然是过分强调经验而忽视理性的经验主义观点提出的批评。反对特异功能一方认为“眼见为实”只说明特异功能人在玩魔术。于光远说:我每次看到魔术师在空中钓鱼,都看不出破绽来,但魔术师的鱼并不是空中钓来的。“眼见为实”、“经验主义”、“亲身体验”、“突破现有科学”等涉及科技哲学的基本命题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对特异功能这种伪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科学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社会心理学——被提了出来。反对特异功能者认为:所谓特异功能,就是历史上的“灵学”和巫术,而根本不是科学。特异功能现象违反全部现成的科学原理,“眼见为实”的经验主义伪装、掩盖了它欺骗社会的伪科学本质。

1995年前后是特异功能论争最为激烈的时期,这个时期出现的一些事情决定了特异功能 20 年第二个阶段的结束和第三个阶段的开始。1995 年,特异功能界出现了这样的大事:张宏堡把他的宗师崇拜发展到了极致,他要求弟子在家中悬挂他的头像和“宗师真像”,顶礼膜拜;2月2日,早晨,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医政处安宝华处长在宿舍楼前被两凶犯用木棒击倒,脸上被划3刀;同日晚9时,在成都四川科委干部伍义江家,3个男人用利器将伍妻砍了8刀。以上两位受害者,都是公开反对过张宏堡的干部。这个时期,柯云路带领一班特异功能人进行“健康万里行”,张宝胜在北京电视台餐厅表演失败,佛子“张小平”落网。种种迹象表明,特异功能研究已经败坏了科学的声名,特异功能组织不同程度地危害着社会。与此同时,反对特异功能和伪科学的呼声日益高涨。2月,中国科学院112名院士联名发出“科普倡议书”,希望通过科普来反对伪科学。5月26日,《北京青年报》发表《“奇人”张宝胜败走麦城实录》这篇发生在1988年5月的迟到的报告。6月,《中国青年》第6期发表反伪科学专题:《科学与伪科学——世纪末的较量》。同月,中国科协酝酿成立一个“保卫科学精神,反对迷信愚昧”组织委员会。6月2日《北京日报·京华周末》发表何祚庥等人的呼吁:《该揭露伪气功和“特异功能”了》。7月,司马南《神功内幕》出版。11月23日,针对“三不”政策客观上限制了反伪科学活动的情况,一些政协委员和院士签名上书发表意见。12月2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向伪科学宣战》。这些由传媒表现出来的反伪科学举动,标志着特异功能 20 年第三个时期的到来。

第三个时期,从1995年“同伪科学宣战”开始,特异功能功法由上千种遍地开花的“乱世”现象转入少数几个大的功派称雄的局面。上个时期就已显示的特异功能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受到了法律的打击,“中功”、“法轮功”等特异功能组织进一步走向邪教。党和政府对“法轮功”的沉重打击标志着特异功能 20 年的结束。

如果说,特异功能 20 年的第二个时期以相信的一方对表演和实验的热衷与反对的一方以理性思辨为根本方法对所谓的“实验”不屑一顾为特征的话,特异功能 20 年的第三个时期则是以热衷者将特异功能实用化、实业化研究和行为与反对者对特异功能的社会危害不断揭露并敦促司法干预为特点。这一时期,“中功”的违法行为受到关注,“国气联”受到查处,胡万林事件遭到司法追究,沈昌的特功商业受到工商查处,反伪科学界声讨为伪科学摇旗呐喊的柯云路。后来居上的“法轮功”在形成势力后充分暴露了它的邪教本质,被党和政府果断地取缔。这一时期特

异功能的违法犯罪活动的情况及国家机器对此的关注,可从 1997 年 3 月 12 日公安部办公室给人体科学工作小组办公室的函中看出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关于对人体科学工作 汇报提纲 的意见的函》称:人体科学工作小组办公室送给公安部的《人体科学工作汇报提纲》及会议《纪要》稿收悉,经认真研究,提出了三条意见。此函指出:“近年来,一些气功组织利用群众修炼气功的热情,进行各种违法活动,有的散布反政府的言论,有的宣传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的所谓观点学说,有的搞封建迷信和帮会性活动,还有的骗财害人,偷税漏税,个别的还奸污妇女、进行流氓犯罪活动,这类活动严重地危害社会正常的管理秩序,影响社会的安定。建议提纲中增加这方面的内容,以引起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切实加强管理和引导,发现利用气功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应严厉打击,坚决取缔。”此函指出:“目前气功组织太多太滥,需要进行清理整顿,建议把整顿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写入提纲。最近发现一些气功组织,如国务院领导批示查处的台湾宋七为邪教组织在大陆的宋七为夫人合一学会及其‘莲花圣光功’,得到国家负责气功管理部门的注册,以合法身份进行违法活动,又如‘中功’,‘元极功’,‘华夏智能功’,‘法轮功’等气功组织,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违法活动。”^[49]这些内容,较为粗略地说出了特异功能运动所从事的违法犯罪活动和气功管理部门在管理上出现的问题。此函的第三条表述了公安部对批判“伪科学”的看法,指出:“对前一阶段批判‘伪科学’的活动,似应给予全面正确的评价,下应全盘否定,应当看到其在揭露利用气功搞诈骗活动,倡导实事求是、严谨科学态度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50]这段文字很重要。虽然没有看到人体科学工作小组的《汇报提纲》,但公安部的函中谈到的上述看法,应是人体科学工作小组没有的甚至相反的看法,否则,公安部在函中就毋需提及。如果这样的推断正确,那么,人体科学工作小组到当时(1997 年 3 月 12 日)对批判“伪科学”仍没有“正确的评价”,而是“全盘否定”。这一点也不稀奇,人体科学组织方面作为特异功能论争的一方,是极为维护特异功能这种“伪科学”的。这一段文字给我们透出的另一个信息是:社会各界,至少是像公安部这样的国家机关,他们是能正确对待特异功能、反对伪科学的。这一时期是反特异功能一方频频出击,并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时期,在全国上下一片反伪科学声中,“特异功能”一方很委婉地表达出了他们的退缩。

人体科学研究会的主要负责人伍绍祖在特异功能 20 年中的地位,早在 1982 年

时即已奠定。这一年3月3日,时任国防科工委主任的张震寰找到曾和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一起工作过的伍绍祖等人观看张宝胜的特异功能表演,并希望伍绍祖向胡耀邦反映。虽然那天的表演很不理想,但还是给伍绍祖留不很深刻的印象,从此,他走上了支持特异功能的道路。1996年1月20日,在人体科学工作会议上,伍绍祖介绍了自己从不相信到相信和支持特异功能的这段历程。他指出,特异功能表演“100个中即使有99个作假,只有一个可以完全排除作假的可能,也是值得研究的”。但是,回顾特异功能研究17年历史,他感到无比悲怆。他说,“在我有生之年大概研究不出什么结果”了。这种悲观情绪发生在特异功能研究的领导层,不能不算一种信号。这个信号就是特异功能从理论到实践的由盛转衰。在研究者中,陈守良直到1996年还在《中国人体科学》上发表《耳朵认字是真的吗?》一文重温历史,为自己的科研作辩护,但是,在1997年的一次小型报告会上,他坦诚对自己过去从事过的人体科学研究感到“压力很大”。什么压力?一则因“反伪”呼声日益高涨,一则因陈守良自己拿不出一一点证明“耳朵认字”的硬邦邦的证据。他无法让“耳朵认字”接受科学的检验。1997年2月26日,人体科学工作组办公室主任李杰在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秘书长工作会议上认为:关于特异功能、气功、外气的存在性检验,目前还缺乏铁证,不能被科学界公认。1998年2月,507所何宏博士参加“国际超心理学联合会第40届年会”后认为,相对于西方的超心理学研究,中国的人体科学研究还缺乏严肃、客观的科学态度;人们在对待特异功能问题上,可能会犯相近的观察性错误。1998年七八月间,何宏在一次谈话中认为:到底有没有特异功能,还不能肯定。迄今为止,气功研究总是个别研究者所在研究组才能获得惊人的结果,外人重复不出来。但个别研究者既不屑于做给别人看,却又连续不断地报道新项目、新发现,满足于自己验证自己的发现。

特异功能信仰者的有限退缩,表明反对“伪科学”的阶段性的胜利。但是,由于一开始就有着不纯的动机,许多特异功能组织在他们的保护伞行将失去、他们的欺瞒行将暴露之时,不惜铤而走险。

当严新气功如火如荼时,1987年,北京钢铁学院肄业的张宏堡自创中华养生益智功正式出山。“一代宗师”张宏堡是特异功能大师中的大手笔,他自称能意念杀死兔子、意念偷用前面小车的汽油、意念控制红绿灯、呼风唤雨让祥云托起飞机。他把“中功”产业化、宗教化、专制化、文化化。他编造麒麟文化,在四川青城山建立“中功”基地,建立严密的“中功”组织垂直管理他的众多弟子。他愚化弟子,要把他

们训练成“敢闯禁区”“敢掉脑袋”的可怕的具有恐怖主义倾向的信徒。他搜刮信徒钱财,财富数以亿计。他奸污猥亵妇女,并称他享受三宫六院是应该的。而所有这一切都归结为他的做教主的野心。这个野心他自己表白得很清楚:“我实际是在搞意识形态。”“共产党的一套我早就看透了。我是真龙。”^[51]这种狂妄的语言,已不需要半点遮掩。如果不是“法轮功”把事情闹大打破了“中功”宗师的“真龙”梦,特异功能 20 年还不知要生发出些什么来。2000 年 1 月 29 日张宏堡丢不他的“中功”弟子,持假护照逃到了美国关岛,后辗转跑到加拿大,成为“法轮功之友”(该组织的前身是“中国气功联合会”)成员,这是后话。

1991 年 9 月,李洪志去泰国探望妹妹李平后回国,声称得到佛法,创立并传授“法轮功”,从此不断努力把“法轮功”这个蛋糕做大,直到成为特异功能 20 年最后的疯狂者。“法轮功”一则以种种歪理邪说神化自己、愚化信徒,一则以疯狂的手段对抗社会、正义和科学,终于在 1999 年 4 月 25 日组织 1 万多名弟子围聚中南海向党和政府示威。1999 年 7 月 22 日,国家民政部、公安部发布关于取缔“法轮功”的决定,这标志着特异功能 20 年的结束。

20 年特异功能,是我国当代最大的伪科学思潮和运动,关于特异功能的论争,虽在党和政府取缔和打击“法轮功”邪教的斗争中悄然平息,但问题并未阐明,相信者只是迫于政治形势暂时沉默,如何使他们相信自己曾经对特异功能的信仰是一种伪科学,也许,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而特异功能组织在特异功能 20 年后期向邪教或巫术的两个方向分化,则又为反击伪科学提出了新的课题。如绪论所言,伪科学是和科学相随的。在今后的科学和社会历程中,纵令不会再有“特异功能”这种名目的论争出现,但巫术、灵学和邪教则是难于绝迹的,这就是反伪科学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第三节 气功

气功之争开始于 1978 年。1982 年之后,它与特异功能合流,成为人体科学的组成部分,因而已贯穿在特异功能之争的始终。当 1999 年政府取缔“法轮功”,特异功能之争悄然平息之后,气功之争却仍在进行着。气功理论的玄妙性以及气功长远的文化源流,使气功争论存在于似是而非的学术氛围中,这是气功争论双方难分伯仲的原因之一。

气功有悠久的历史。古代体育、养生术和神仙术中都有气功的源头,历史上三教九流均对气功有特异的兴趣。如第二章第三节“神秘主义”之“宗教”部分所述,各种宗教修炼中,都有气功的内容,而道家方术中的养生术所包含的练气、日暴、辟谷、服食、导引、行气、房中术,佛家修炼中的坐禅,更是中国气功的滥觞。气功的不甚科学甚至伪科学性,使它获得了东方神秘主义的别称。

中国当代气功学说是由刘贵珍创立的。刘贵珍(1920~1984),男,1945年参加工作,1956年担任北戴河气功疗养院院长。据刘贵珍介绍,参加工作之初,他患有严重的胃溃疡病,长期遭受着胃病的折磨,又引起失眠。在解放区医疗条件较差的情况下,经人介绍,他跟本村农民刘渡舟练内养功。诚心诚意地练了102天后,自觉有些变化,如胃溃疡病好了,其他病痛如失眠的症状也有所减轻。解放后,刘贵珍内养功有疗效的消息被传出去。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条件下,河北省卫生厅对刘贵珍内养功十分关注。在命名问题上,经过有关人士商讨,决定将刘贵珍的这种锻炼方法与当时流行于世的导引、吐纳、行气、服气、坐忘、守神、炼丹、坐禅等各种称谓的锻炼方法合在一起,统称为气功。后来,河北省卫生厅委派刘贵珍前往北京,向国家卫生部汇报。1955年12月19日,在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大会上,卫生部对刘贵珍在传播气功中作出的贡献给予了表彰奖励。这样,刘贵珍的事迹经由报纸电台报道而传遍全国,全国迅速掀起了当代气功第一次热潮。

第一次气功热的特点是全民健身运动,它讲究气功操作,而不是功理研究。这种健身运动对于在缺医少药条件下提高国民体质,增强国民建设祖国的活力,是有积极意义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气功遭到了批判。文化大革命后的1977年,气功热随思想束缚的解放而慢慢升温,这是当代第二次气功热潮的开始。但是这次气功热潮的时代背景已非20多年前可比。此时,世界发达国家已进入电子时代,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也由1978年的全国科技大会提出,全国大民向往科学、追求科学。所以,这次气功热潮一开始就获得了科学的关注。气功运动已不单是修炼的热潮,而且也伴随着科学研究的热潮,并且是科学研究推动了气功热。加入到此次气功热潮中来的,除了数千万气功修炼者,主要有以下几种人:科学研究者、气功功法传授者、气功运动组织者、形形色色的骗子。1978年5月,《自然杂志》创刊号上发表关于气功“外气”的文章,气功之争由此拉开序幕。从此,在气功外气、功能态与走火入魔、真伪气功等问题上,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论争。

一、气功外气之争

1978年5月,《自然杂志》创刊号上,报道了运气疗法中“外气”之一是受低频涨落调制的红外辐射,“证实了气功发功者发出了带有信息的红外电磁波”。同年9月,《自然杂志》第1卷第5期又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原子核研究所顾涵森和上海中医研究所赵伟的《气功“外气”物质基础的研究——微粒流的初步实验结果》,宣称气功修炼者赵伟发功时,受功的一方“收到了微粒流信号”。此后,顾涵森对气功修炼者赵伟、程志久、林厚省、覃尧卿进行测试,写出的系列论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顾涵森认为:气功存在一种物质形式的发功信号,这种信号是一种红外电磁波、微粒流。经过气功锻炼的人,确能发射“受低频涨落调制的红外辐射”这样的高体信息。[52]

1978年顾涵森等人的气功理论研究,适应了当时气功运动逐渐升温的形势,当“用耳认字”等非眼视觉的特异功能运动在全国兴起后,气功马上被纳入人体潜能的范围与特异功能并列。1980年6月,某著名科学家在上海访问《自然杂志》时指出,“对中医理论、对气功、对特异功能,都要进行研究,最后都可归结到开发人的潜力上来”[53]而“外气”的物质基础研究,是气功研究的主要内容。1982年6月15日,“三下政策”发出之后,气功研究与特异功能研究混合在一起,相互渗透,一些特异功能师同时又是气功师,各种气功已不单纯为刘贵珍创立时的健身法,而首先是一种超常的特异的功能。

气功的特异,最初是由大师严新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严新,男,1951年出生于四川省江油县。1977年成都中医学院毕业后,在四川绵阳中医学校任教,其时,他以常开奇怪处方,用凉水、面条、香油或酒配菜籽油治病而著称。1982年调重庆中医研究所门诊部正式从医。1984年,严新因搞封建迷信被取消处方权,从此浪迹天涯,成为江湖郎中。1984年7月,特异功能和气功运动“三下政策”后的发展阶段,《四川工人报》捕捉到了严新这样一个怪医后进行了题为《神医·神话·现实》的长篇报道。严新的名气由此变大。1986年6月,严新北上为两弹元勋邓稼先治癌,虽然一个月后,邓稼先因不治而逝世,但严新的名声却变得更响。11月,严新随气功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张震寰率领的气功科学研究会代表团访问日本,严新趁势造出“东京斗法”的神话使自己声名飙升。11月18日,《光明日报》对严新进行了报道,严新作为集中医、气功、武术和特异功能于一身的大师造出了全国性影响。从此,严新表演出了气功外气影响激光偏振面、气功外气在2000公里超距离外改变分子性

质、气功降水为大兴安岭灭火等神话,学术界的陆祖荫、李升平等追随严新做实验写论文为大师造声势。严新到处做带功报告,表演电气功,使全国掀起了一股持续多年的严新气功热。1989年1月严新到香港表演,结果不尽如人意,香港人立即悟出严新报告中的外气不过是一种“傻气”,气功乃是“戏”功,透视原是“偷”视,气功师原来是“魔术师”。这就是中国当代气功热中有名的香港大论战。这次大论战是由化学博士甘巨廷对严新的六篇气功论文的质疑开始的,大论战在较短时间内,共发表文章2000余篇,参加论争的人员达700余人。这次论争,从根本上否认了气功和特异功能。香港论战的热潮迅速影响到大陆后,大陆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对严新气功揭伪和理性批判的工作。进一步指出严新是“为了个人名利,故意宣扬‘外气’,故弄玄虚,愚弄众多无知者,打着气功和科学的牌子,制造一种以他为教主的新式宗教崇拜”,^[54]严新从此放弃了在国内的表演,悄悄跑到北美去了。

严新在中国特异功能20年中的作用,主要在于他邀集一班人进行的气功外气实验使气功这种神秘事物披上了科学的外衣,进而使气功特异功能伪科学欺世盗名10余年。严新与清华大学气功科研组作出的6篇实验论文受到著名科学家的赏识,这位科学家在《稿件审查意见书》上“此稿内容为世界首创”,“应立即发表”的意见,成为权威影响伪科学运动走向的一件大事。1987年9月4日,《光明日报》报道:“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首次发现,气功外气能够影响核酸分子结构,证明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其分子性状。”

对气功“外气”持反对意见的,以中国中医研究院气功研究室主任张洪林为代表。在严新气功热的时候,张洪林所在的气功研究室在研究科学气功作用机制的同时,也分出了部分精力来研究“外气”现象。他说:“在临床及实验的基础上,我从1984年起,首先在全国气功会议上和气功杂志上向气功界提出外气形式治病的机制是心理暗示的观点。并于1988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院报发表‘对外气浪潮的反思’、‘再论外气’等文章,在1988年第五期《医学与哲学》杂志上发表了‘气功学领域中科学与迷信的较量——外气实质初评’文章。并在这一阶段提出‘伪气功’概念。”^[55]《健康报》1989年1月开始连续发表张洪林评“外气”的文章,并开展对“外气”实质的学术争鸣。紧接着《中国体育报》和《法律与生活》杂志也连续发表张洪林一系列批驳“外气”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外气”治病的实质是心理暗示,在患者与外气师之间阻断暗示,则外气师失灵;相反,利用暗示,则非外气师也能重复所谓的外气效应。这证明“外气”存在的主要实验在方法学上经不住科学

检验。“外气”论至今拿不出一例符合科学规范的实验事实来证明“外气”具有物质性。将未被科学实验证明的内容当作科学定论大肆传向社会,制造轰动效应的作法是极端错误的。1990年,在北京科学会堂举行的“弘扬科学气功破除封建迷信”报告会上,张洪林重申了上述观点。这些观点经由新闻媒介传播出去,造成了对气功外气论的沉重打击。张洪林在写理论文章批驳“外气”论的同时,还对严新在清华大学进行气功外气实验一事进行了调查,1988年12月3日,张洪林约同《健康报》陈皓、王国辰二记者去清华大学采访,清华大学科研处等部门声称陆祖荫、李升平和严新所做的实验未经清华大学科研处审查批准,他们以清华大学名义发表文章的作法是错误的,他们的行为不代表清华大学。1989年1月28日,《健康报》刊登了有上述采访内容的报道。2月25日,《健康报》则又刊登了作者屈占魁《就气功外气问题与张洪林商榷》的文章,认为张文“不讲一点道理”。对此,张洪林继续深入采访了清华大学。3月11日,《健康报》发出张洪林写的揭露严新的所谓外气实验内幕的文章,4月13日,《健康报》发出消息称:“清华大学科研处最近郑重声明,这些研究与清华大学无关,也根本谈不上是一项成果。”“我校并未成立所谓7个系和部门组成的气功科研协作组,也从未批准成立过‘气功研究所’,而我校工会组织的气功协会只负责开展群众性气功健身活动,不是科研组织。”[56]

《健康报》的报道虽然传达了对严新实验的否定性观点,但是由于清华大学并未对严新实验进行严格的科研审查和鉴定,这就使严新、李升平和陆祖荫等人有办法为自己的行为作辩护。他们组织了一个《清华大学气功科研组(分部)与严新医生协作进行气功科研是属实的》的材料,并称:“自1985年起,经上级有关领导批准,我校气功科研正式列为学校科研项目,并拨款进行实验,其中,在校科研处立项编号为0458403及0448714,共拨款肆万元;另获校物理学院科研经费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国家人体科学基金计贰万伍仟元。为综合研究气功,气功科研课题组曾有生物系、物理系、化学系、无线电系、热能系、哲学教研组、校医院等多个部门的有关科研人员……”此材料送达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张震寰处后,张给各新闻机构写了一封推荐信,称:“我看了清华大学气功科研组(分部)写的材料,觉得情况属实,对于澄清事实真相是有益的,对于继续开展气功科学研究是有推动作用的,特别是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良好风气将起很大的作用,我建议报纸杂志予以刊载。”[57]这封推荐信的作用以及严新等人的活动,使1989年对以严新气功为代表的“外气”宣传的遏制未能完全彻底。直到1995年,科学家何祚

麻、霍宏暹、王蕴玉、高崇寿、郭海、宋心琦等写的一组文章在《工人日报》上发表,同日即7月26日发表消息《在本报座谈会上科学家就伪科学污染著名学府院所发表呼吁:科学殿堂不容玷污,与会专家指出严新“气功科学实验”不真实》时,才得以掀起又一次揭露严新气功高涨,使严新气功受到科学的否定,而此时,严新早已在北美华人圈子里继续他的“带功报告”。

1995年8月9日,《工人日报》发表了《张宏涛重申五年前声明:严新“科学实验”与清华无关》,同时报纸还刊登了《清华大学原校长张效文披露:严新曾在清华露马脚》。报道称:“1987年,清华有位教授找他,说严新想当清华大学名誉教授。对这个要求他不同意,但无奈这位教授再三推荐,只好拿出一张表让严新填。等聘书写好后,张效文对这位教授说,听说严新能意念移物,我的图章在保险柜里,如果严新能把章移出来,我就把聘书发给严新。严新听罢只好悻悻而去。”

气功“外气”之争,以严新气功的破产而告结束。但气功“外气”存不存在,气功外气到底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按照“气功外气”信仰者的观点,气功外气是一种“波”和“粒子”,具有物质性,而按照张洪林的观点,气功外气是不存在物质性的,它是一种心理暗示,是精神的。气功外气之争以对严新气功实验的田野调查这种社会学方法的成果而告结束,这就使气功“外气”的物质性观点破产了。然而,气功外气的物质性破产,并不是气功“外气”的破产。在以后的气功运动进程中,气功外气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气功运动者们承认气功外气是意识的,但他们又搬出了“意识”即“物质”的观点。张宏堡、柯云路就是这种观点的持有者。而在张洪林等看来,气功外气是不存在的,气功的作用机制是心理暗示,是催眠效应,以严新为代表的“外气”理论是一种伪科学,严新的“外气”实验是一种欺骗。

二、功能态与走火入魔之争

气功修炼所进入的境界,被称为功能态。功能态如何?有“专气致柔”的,有头昏目眩、满地打滚的,有痛感消失、自我感觉病灶去除、病体康复的,不一而足。气功所讲究的吸气所达到的昏眩状态,如李约瑟所分析的,是由于缺氧所致。而所谓阴阳双修的与性相关的功法修炼,更是从古至今人们对性问题的不甚科学的探究,由此得出的种种性修炼理论是伪科学的。这样的观点,我们在第二章第三节中已经阐述。

气功诱导下的种种怪相是匪夷所思的。1993年12月28日至1994年1月3日,在北京妙峰山“高级气功强化培训班”上,学员们在气功师的诱导下,每人头上

盖一口钢精锅。这种钢精锅被称作信息锅。信息物被气功师用来蛊惑人心,是屡试不爽的。气功师沈昌卖信息茶,搜刮的信徒钱财数以千万计,而信徒们却在信息茶问题上感觉良好。信仰疗法这种中外均有的伪科学品种被痴迷者在“功能态”中欣然接受。为了实现返老还童的梦想,在一个礼堂内,练“返老还童功”的男男女女大庭广众之不掀开衣裳,亮着肚子躺在地上,他们任气功师摆布的情形说明他们已经进入了功能态。而这种功能态,是暂时的精神病态。

人的精神状态有常态与非常态之分,非常态又有超常态、异常态和病态几种。何云路在《生命科学最新报告》中称特异功能状态是“逻辑中断的状态,是理智思维中断的状态,是意识空白的状态……是梦态、醉态、恍惚态、形象思维态,等等”。[58]何云路试图在种种功能态术语中兜圈子,以显示气功态和特异功能态的“特异”,然而,严谨而直率的科学工作者则惯于直截了当地指出:功能态就是一种病态。

1995年8月16日,北京医科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主任医师张彤玲的《是练功出偏,不是“特异功能”》一文发表在《工人日报》上,这给功能态是超常态还是病态提出了权威的论证和来自医疗第一线的实例证明。文章说:“作为精神医生,目睹了近这些年来伪气功泛滥造成的恶果。一谈到这个问题,我就马上联想到出偏者的悲惨境遇。由于我们研究所在1989年率先设立了练功出偏引起精神障碍的专科门诊,所以接触的病人较多,仅我个人就有392例。”“病人中的绝大多数是伪气功的受害者,练功不但没有解除他的原有躯体疾病,没有强身健体,反倒引起了精神疾患”,“如果我们亲眼看见那些成天自言自语、疑神疑鬼、疯疯癫癫、身伤自残自杀的惨状,就会自然引起声讨伪气功的共鸣。”

接着,张彤玲分析了伪气功作为伪科学的表现以及使修炼者出偏的原因。她说:“伪气功在目前之所以成为伪科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因为它违背了气功作为我国优秀的民间健身方法的初衷。除了那些露骨地宣扬封建迷信的功法之外,大都披上了科学的外衣,打着人体科学的旗号,兜售所谓的‘特异功能’,使广大的练功者上当受骗。他们大量引用信息、场论、程序、基因等等现代科学词藻,将违反科学道理、异想天开、子虚乌有的东西说成是科学的尖端,扬言要推翻现代医学基础,甚至要刷新人类的各个学科。因此,这是一场科学与伪科学的大是大非之争,绝不只是与一些气功大师或几个作家的争论。”她说:“由于伪气功将练功与‘特异功能’勾连在一起,使某些人的练功目的产生质变,从祛病强身演化成追求‘特异功能’,悲剧往往就发生在这里。练功人的入境是通过他人暗示和自我暗示,使大脑皮层

广泛区域被抑制。而局部区域则处于兴奋状态,这时过度的不科学的暗示就有可能成为致病的因素。‘气感’就是在暗示的作用下,将注意力集中到身体的某个部位,通过条件反射产生的感觉异常现象。幻觉与妄想等精神症状的产生,也与暗示有关。如果在练功中出现了气串周身的感觉,凭空见到了稀奇古怪的影像,并不证明人体有了‘特异功能’,这只能说是一种虚幻的知觉和感觉。倘若收功后这些虚幻的影像仍不消失,即使不练功它也出现,并且处于极度亢奋之中,那就证明患有练功出偏引起的精神障碍了。因此我们说:练功出偏不等于具有‘特异功能’。”

功能态的一种主要形式是“入静”。这种状态是《资治通鉴》中所称的“静处一室,屏去左右,澄神静虑,无私无营”的状态,是佛家的“入定”和儒家的“坐忘”状态,是一种“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的状态,也是“万态俱泯,一灵独存”,“一念代万念”的状态。入静状态是心理暗示的结果,是催眠效应的体现,对于心理暗示的作用了解不深者视“入静”为奇妙,进而神化了气功本身。心理暗示的结果本身是有良性与恶性之分的,良性的心理暗示结果使修炼者杂念全无身心轻爽,而恶性的心理暗示结果则或者使人迟钝、或者使人因精神专注而意识偏执,出现心理障碍。这就是练功出偏。在历史上,道教将修持时急于求成、长时间沉湎于习练“内丹功”而导致的言行失常现象称作“走火”,佛教则将教徒禅定时急于求成、执著修习而出现的言行失常现象叫做“入魔”。气功出偏就是“走火入魔”的真实写照,其实质是练功导致的精神障碍。

练气功而致“走火入魔”的情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据张彤玲对 1983 年 8 月至 1995 年 6 月的 356 份病例的分析,练功出偏者男 156 例,占 43.8%,女 200 例,占 56.2%,平均发病年龄为 39.5 岁,最小的 14 岁,最大的 73 岁,各种文化层次、各种职业的练功者都有出偏的现象,且与精神病家庭史关系不大。张彤玲的统计涉及 107 种功法,其中以自然中心功(17.4%)、鹤翔桩(10.1%)、中华养生益智功(5.1%)、山泉功(3.9%)、智能功(2.5%)、站桩(2.2%)和郭琳功(2.2%)为多^[59]。这说明练功出偏具有普遍性,且与练功者人数的多少相关,上述几种功法正是统计所涉及的年代中最流行的。而在世纪之交,“法轮功”坐大成势期间,走火入魔的“法轮功”分子数也在各功法中增加了。张洪林曾和几位精神病专家在福建三明、永安作调查,结果,精神病专家“一眼就断定那几位很难转化的”“法轮功”“顽强分子”是“典型的精神病人”。^[60]

李约瑟在《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中曾谈到瑜伽功夫的“出神状态”,这种状态

也就是“入静”的气功功能态。李约瑟对于“出神”这种功能态的认识,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观点。他说:“瑜伽的观想和出神冥想的功夫似乎需要修炼催眠术,自我催眠,以及用意识控制自律神经系统的功夫。……其实瑜伽的功夫只不过是一种出神状态,在很多痴呆症的例子中都可以看到。惟一可观看的,是训练有素的正常人,也能够随意进入出神状态。”^[61]李约瑟的观点是说,“出神”态是一种“病态”。

气功理论界非常谨慎地讨论着气功功能态的问题。直到 21 世纪的今天,对于“走火入魔”的限定仍在那些因练功走向偏执的行为上。事实上,当一个人对某一件事专注到缺乏理智的时候,他就已走火入魔,不独气功如此。我们应该认识到,气功仅仅是一种健身的体操,一种成年人乐于接受的修养身心的游戏。任何拔高气功的理论都会使修炼者走向偏执的实践,而这种偏执是有害的。我们十分小心地谈论着练功出偏的话题,是因为我们不忍伤了太多的健身气功修习者的自尊心。我们必须认清“法轮功”及其他气功、邪教痴迷者的精神病态,但同时我们不能放弃对这种危害社会的精神病态者的打击。我们强调的精神病态,就是指一种类似于精神病患者的状态。类似不是等同,类似是指症候和病理上的相似性,承认这一点,不但对转变气功和邪教痴迷者有益,对警示练功者有益,对我们的政治也无妨碍。

三、真伪气功之争

纵观中国几十年的气功,我们看到,气功其实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把“气功”一概而论分为“气功”与“伪气功”是不恰当的。两分法实际上就是一分法,因为“伪气功”不是气功,气功理论界的意见很不统一,气功师、气功修炼者和特异功能信仰者认为应该使气功有一个宽泛的外延域。这样,那些与江湖法术、巫术、道术和信仰组织、准宗教组织相似的组织、团体或功法,只要它以气功命名,应都属于气功之例。这样的观点虽不多见于理论文章,但气功的实践可以证明这一点。另一类研究者则抱定气功是一种以暗示和自我暗示为主要特征的身心修炼方法,属于医学上自然疗法的范畴。此类意见把一切带有巫术、道术、法术和宗教信仰性质的自称的气功组织和以气功命名的妖术骗术,统称为伪气功,界定在气功之外。此外,体育性质的太极拳属于气功还是体操?这个问题似乎也没解决。

怎样划界?由谁划界?这样的问题在气功界应提到学术讨论的日程上来。

如果最初命名的刘贵珍先生说了算,那么,气功无疑是一种以防病治病为目的的静坐、吐纳、导引、内养等修炼方法。刘贵珍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古代流传不来

的导引法、内养功、吐纳法、内功、深呼吸、静坐呼吸养生法等,虽然名称不同,均属于气功之前身。”他说:“我患有严重的胃溃疡病,长期受胃病折磨,又引起失眠。在解放区医疗条件较差的情况下,经介绍跟本乡刘渡舟老师(一位农民)练内养功,诚心诚意地练了一百零二天,我的胃溃疡病好了,其他症状也随之减轻。”〔62〕从刘贵珍的叙述看,他命名的气功具有以不特点:

第一,一种锻炼方法。

第二,以防病治病为目的,故称“气功疗法”。

第三,古代“流传不来的导引法、内养功、吐纳法、内功、深呼吸、静坐呼吸等养生法”,是气功之前身。

这样的界定已经十分清楚。亦即气功是一种由古代流传不来的导引法、内养法、吐纳法、内功、深呼吸、静坐呼吸养生演变而来的以防病治病为目的的锻炼方法。

这个定义可以把以不古代养生法包括在气功之内:导引、内养、内功、吐纳、深呼吸、静坐呼吸、行气、服气、坐禅、坐忘、静修、入静、炼内丹等。

这个定义可以把以不现代养生和治病方法概括在内:信仰疗法、自然疗法、催眠术、心理暗示、心理疗法等。

这个定义可以把巫术、法术、妖术排除在气功之外。包括一切妖魔术、魔术、江湖杂耍、硬功、巫术、请神术、相术、谶纬术、占卜预测等。

这个定义也把现代气功术宣称的以不特异功能完全排斥在气功之外:透视、遥视、遥诊、遥控、六根互用、追述和预知、穿墙术、意念致动等。

这个定义还使不列各项方术存疑:辟谷、阴阳双修等。

刘贵珍气功定义的特点是具有明确的目的性:防病、治病,即古人说的养生。一些带有宗教内容的方术不在气功之内。而且刘贵珍定义是以锻炼方法命名而不是以锻炼结果命名。故五眼通、非眼视觉、意念致动、奇门遁甲等根据修炼结果命名的方法都不在气功之例。

刘贵珍在《气功疗法实践》一书中,对“为什么称它为气功疗法”作了解释:“‘气’这个字在这里代表呼吸的意思;‘功’字就是不断地调整呼吸和姿势的练习,也是俗话说的要练得有‘功夫’,将这种气功疗法,经用医学观点加以整理研究,并且用到治疗疾病和保健上去,去掉以往的迷信糟粕,因此称为气功疗法。”〔63〕

刘贵珍的进一步定义使我们清楚,所谓气功,是与“气”有关的功夫。“气”即呼

吸。刘贵珍所提到的那些古代方法,如静生、吐纳、导引、内功等,确实都对呼吸方法有明确的规定性。如果我们承认刘贵珍的定义,则凡属不规定呼吸方法的功法不叫气功;如特异功能、体操、巫术、魔术、灵魂术、谶纬术等。而规定呼吸方法的太极拳一类体操又应纳入气功的范畴。

刘贵珍的定义及划界已经很明确。假如有人有意见说一些不以规定呼吸方法为特征的锻炼方法也应纳入气功范畴的话,那么现在问题是:刘贵珍定义了“气功”,他说了算,其他的方法,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吧。所以,1979年唐雨一出,并不叫气功。及至以后,凡是种种不可思议的奇术均只叫特异功能。

是什么原因使气功队伍膨胀,以致鱼龙混杂、面目全非的呢?有两个方面。

一是气功之“气”的规定性使传统医学的“气”和古代哲学的“气”趁虚而入。这就是张洪林认为的刘贵珍把“功法”命名为“气功”所带来的历史性失误。应该说,中国古老哲学中,把“气”作为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是不奇怪的。西方哲学史上亦有类似的情况。中医理论在尚不科学的情况不引进“气”学说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里的气已经抽象了,不是气体之气,而是一种原理,一种机理。但是,如果把哲学意义上的“气”和中医理论中的“气”具体化庸俗化,那就会犯不可饶恕的错误。

这个错误是特异功能向气功的比附造成的,这是使气功外延加宽的另一个原因。气功之与特异功能的比附,是因为古代的吐纳、坐忘、静修、炼丹等道术本身依据了“气”的理论,同时,道家修炼为的是飞升成仙。成仙的感觉如何,谁能知道?大抵是催眠状态不的感觉,是闭气而使大脑失氧、氧化还原反应受阻而造成的昏厥、意识混乱的感觉,因此,自然而然,非眼视觉和五眼通均成了气功修炼的结果。其他的特异功能也鸡犬升天同入气功阵营。

以上即气功队伍庞大的原因,庞大的气功已不是刘贵珍所定义的气功了。

那么刘贵珍的划界算不算呢?很显然,不管是提倡广义气功还是狭义气功者,都觉得依刘贵珍的定义划界有问题。

广义者已把特异功能,神仙术,妖、魔、法术均放入气功之内。

狭义者如张洪林先生,李胜先先生的观点,均指出了刘贵珍定义的明显不足。

张洪林说:“气功是使用自我暗示的方法,使意识进入自我催眠(所谓入静)状态,通过良性的心理调整,使体内各系统生理功能趋向协调,甚至使病态的形态实质得以修复,从而达到防治疾病目的的一类自我身心锻炼方法。”^[64]张洪林的定义是从病理学和现代心理学的角度进行的,它显然是对刘贵珍定义的重新诠释。这

种诠释已加入了现代科学的理论。这种诠释使“气功”的外延在“呼吸”的范围内进一步缩小而在“意识”的方向上有所扩大。比如,修炼者“使用自我暗示的方法”,把自己想像成千里眼,能看见 2000 公里以外的东西,不断强化这种意念,使自己进入一种催眠状态,于是自己终于有了看见 2000 公里之外物体的感觉,这是不是一种气功修炼方法?又如带功报告,按张洪林的定义当属于气功了。既然带功报告算,那么,报告磁带算不算?磁带都算了,写有暗示性语言(说明书)的“信息茶”算不算?如果这些都算,那么沈昌是气功师无疑了。应该说明,从医学心理学角度研究气功的张洪林是一个坚定的伪气功反对者,是第二届反伪科学突出贡献奖获得者。他在弘扬科学气功的同时,坚决反对伪气功。他反对伪气功的业绩在于在气功与特异功能合流的时候,明确指出特异功能的骗局,毫不留情地与严新、田文平、戴复生、陈景怀、覃尧卿、黄仁忠、樊映培、柯云路等过招打擂,揭穿骗子的把戏,还气功本来面目。但是,作为气功理论的权威,我认为从实际应用上说,他的气功定义将会使一类以心理暗示为特征的功法成为堂而皇之的气功。而心理暗示有语言暗示和动作、物体暗示,这就使“信息物”成为气功传功产品的名义合理化。虽然张的定义还有许多修饰语,包括心理暗示以自我暗示为主,目的是“使体内系统”“趋向协调”、“病变得以修复”、“防治疾病”等。但这丝毫不影响“信息物”成为“气功”产品。它和某些医用“安慰剂”具有同样的功效。假如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它将造成气功“信息”产品事实上的欺骗而成为社会问题。这就是气功的无奈了。

李胜先认为:“气功”二字出现是在刘贵珍提出之前,晋代以前可查的有两本书提到这两个字,1915年、1929年、1934年、1938年出版的四种影响不大的出版物中有“气功”和“气功疗法”的提法。气功所谓的“气”在刘贵珍是指“元气”亦即“真气”,这种中医学中当成“物质”的气,由于它具有模糊性,为现代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遗传学及其他相关科学所不支持。所以刘贵珍所指出的气存在因不确定性而容易产生歧义的缺陷。

李胜先查实,《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第 77 卷《中医基础理论》中无单列气功条目,只在第 27 条“养生方法”之下的几种养生方法中讲到“气功导引”,且有许多忠告。《全书》第 89 卷《气功学》说:“气功学,是研究人体自我身心锻炼的方法与理论的科学”,“它概括着我国古代医学中和神、调息和行气等重要理论和经验。”“我国古代,人们在长期生活实践中,以整体观点为基础,通过内练‘精、气、神’,外练‘筋、骨、皮’,以培养元气,从而促进其充身熏肤泽毛的效应;这样,身心正气得到抒发,

体质得以增强,气功就是我国这种传统保健强身锻炼的功夫。”据此,李胜先认为:《气功学》对气功的界定若明若暗,例如气功是一门“功夫”,内练“精、气、神”,外练“筋、骨、皮”都是功夫;八段锦、太极拳等肢体运动也是功夫;调身、调心、调息作为自我身心锻炼方法是可操作的,而练精、练气、练神就显得玄乎了,只能靠各自去“意会”。结合“气功学”的理论,对气功的界定更难了。

对于刘贵珍先生的气功理论,许多专家都指出过它的缺陷。

刘贵珍先生说:“气功之‘气’,主要指真气(元气)而言。”著名养生专家蒋维乔先生说:“现在大家都称‘气功’,其实这个名称并不妥当……在古时叫养生法。”李立知先生说:“常常有人顾名思义地把气功理解为练气,于是专在‘气’字上用功夫,以致发生了各种流弊。”〔65〕

气功学持行气、食气、布气的理论,这些理论的流弊在什么地方呢?

行气,是指“气”在“体内运行”或“流走”,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精神体验。因为物质的“气”是不可能“充盈”丹田,更不可能在体内“流走”的。我国民间关于气的观念可以是经验的和物质的,也可以是巫术的。巫术的“气”是指一种神奇的力量和无法描述的作用。“在体内流走”的“气”只是在精神病学教科书中才有描述,即坚持这种“气”的观念不单是知识的错误。把精神病症状的体感异常进行观念联想加工,后患甚多。“走火入魔”就是后患之一。巫术思想是中魔的前提条件,这种气功偏差,使外行人看起来十分迷惑。

食气,是指吸纳自然界的清气以求养生延寿的方法。由于古人不知新陈代谢的道理,看到龟、鹤、麋鹿等动物“食少而服气”,且长寿,就认为“食少而服气”是长寿的原因,进而倡导“食气”而“却谷”。古书上说,“食气者寿,食谷者夭”。

布气,指气功内练有素者,能将“内气”发放于体外,进而作用于他人。这种自1979年顾涵森首开研究记录的“外气治病”的理论和方法,被称为典型的伪科学。但据气功专家称:“布气治病之法,我国先秦时期以来,代有所闻,可谓源远流长。”内气外放以治疗,并非当代人的发明。

李胜先是精神病学专家,反伪科学斗士,他最终认为:“气功是在暗示和自我暗示基础上,以调神、调身、调息为手段的一种自我身心锻炼方法,仅此而已!气功能治疗疾病吗?请君千万慎重!因为气功是一把双刃剑,有适应证和禁忌证。由于它是以暗示和自我暗示为基础的,不易掌握,稍有不当极易出偏走火入魔而伤及自身,以至伤及社会。”〔66〕李胜先的定义,是刘贵珍定义的扩大化——他把刘贵珍列

举的气功种类概念化,提出了调神、调身、调息三种手段。这三种手段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个定义的宗旨不是为真伪气功划界,而是典型的“坏气功”主义。在李胜先的视野里,气功不是一个有缺点的好孩子,而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有优点的不良少年。

也许,我们应该另起炉灶,以更大的视角观察气功。这种观察使我们觉得对于气功,它的社会学意义远远大于它的科学意义。本人始终认为,在社会学的视角上对气功的研究也许更加合适。气功本不是科学,那种在科学上寻找定义的做法无异于缘木求鱼,那种在实验室测量外气进而分析出外气是一种波一种粒子一种场的作法,是典型的病态科学,那种在意识与物质的关系上寻找突破口、在灵魂与肉体的关系上寻找有关气功的答案的做法,是十足的唯心主义。关于气功和特异功能研究上的唯心主义,如气功主义者和特异功能信仰者也承认,他承认他们的有些观点是唯心主义的,但他们又补充说“但它是确实存在的”。这种说法的逻辑错误是显而易见的,但并非说话者不具备正常人的思维,而是由于说话者在处理即不想承认自己是唯心主义者又要表达自己唯心主义的观点这种矛盾心理问题出现的语言的不正常。

我想从更广泛的视角指出气功的特点。

这些特点包括:

第一,气功是一种古老的养生术,这种养生术是建立在不甚科学甚至反科学的理论基础上的。气功学不是科学,而是东方神秘主义的典型代表。《黄帝内经》说:“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妄而不惧,形劳而不倦”,“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这种论述已实质性接触到了以“呼吸”“守神”为特征的古老养生观。在《道德经》中,亦有类似的论述:“虚其心,实其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庄子》说:“吹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道教是中国传统宗教,由东汉张道陵创立后,到南北朝时盛行起来。道教以《道德经》为教义,以追求修炼成仙为终极目的。对于修炼成仙,道教的不同派别有不同的修炼方法。丹鼎派、全真道认为通过内养、炼养便可达到长生久视的目的;而符派、正一道则认为符咒语、科仪斋醮可以禳灾求福、祛病延年。道教方术、内养功和房中术,与现代气功有直接的传承关系。道教方术内容庞杂,大致包括养生术、外丹、内丹、斋醮及杂术等,养生术中又有练气、

日曝、辟谷、服食、导引、行气、房中术、饮食、调养等,其中除饮食调养尚未归入今日气功范畴外,其他各种均是今天的气功品种或修炼方法。

由于气功术与道家方术以及巫术的传承关系,气功的机理与科学相去甚远,作为观念形态的气功理论,是玄妙的难以捉摸的形而上学。事实上,西方学术界早已把中国的气功和佛教的瑜伽术合称为东方神秘主义。

第二,气功是集巫术、道术、瑜伽术、催眠术、体操于一体的大杂烩,气功是成年人的游戏。

巫术与道家方术有交叉的关系,即道家方术中有巫术,但并非所有的巫术都是道家方术。黄伦生在《东方天国的神秘之门——中国巫术文化探秘》中把命禄、符瑞、鬼妖、讳忌、卜筮、风水、祭祀、祈禳、谶纬之术均归入巫术。这些巫术中有许多已被发扬光大为气功术,如许多气功师、特异功能师能够通阴,可以追叙过去、预测未来,这些都是巫术中的鬼妖术和谶纬术。气功的信息物,如信息茶、信息水或单纯的能够传递并且影响对方的信息,实际上是一种符瑞巫术。

今天所称特异功能人,在古代巫术奇闻中往往可见。《梦溪笔谈》中有个故事说,山阳地方有个女巫非常灵验,凡是人间之物,虽在千里之外,问她,她都能说出来,沈括的伯伯曾请他来当场实验,当众问她衣箱中有何物时,女巫马上就能知道。李卫东博士把这个故事写在《人有两套生命系统》中,以此证明“特异功能”古已有之。

道家练气方术与佛教瑜伽术之间,存在一种难于明了的关联,佛家修行讲究呼吸宜有规律而缓慢,而道家故意使气在肺中久久停留。瑜伽的观想和出神冥想的功夫则是一种修炼催眠术、自我催眠,以及用意识控制自律神经系统的功夫。

气功作为催眠术的观点,张洪林和李胜光都有很好的论述。在体育锻炼方面,我们上面已谈到练气与按摩术的关系,太极拳和鹤翔桩一类体操明显具有按摩术和练气养生术的特征。基于此,我们可望得出气功是集巫术、道术、心理疗法和体操于一体的大杂烩。这个大杂烩如果一定要命个名的话,那它就是成年人的游戏。

之所以认为它是游戏,是因为气功的机理不甚科学,有些还是伪科学,所以你不能说它是一种身心锻炼的方法。游戏是休闲的产物,游戏可以上瘾,可以入魔,游戏是不甚讲究科学原理的,比如打牌,就其本身对锻炼身体而言,不具有科学性。打牌适度与否,与对身体的好处和坏处直接关联。所以对于气功修炼者我们完全可以这样看待:休闲嘛,消磨时光嘛,伙伴们聚一聚嘛,活动活动筋骨嘛,何必认真。

第三,气功组织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团体,它的一部分具有兴趣小组的性质,另一部分则属于信仰组织。强调大师崇拜的组织严密的气功团体,是一种宗教组织,其中的极端组织,就是邪教。

中科院宗教研究所的钟科文研究员认为:自1979年开始的中国特异功能、气功热潮是对同时期世界“新宗教”运动的呼应。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新宗教”运动呈现出宗教组织数量大、生灭快的特点。日本在1976年有23万个宗教团体,1978年有5000家宗教事业单位。据1987年《现代宗教热之谜》一书的统计,其时日本合法登记的宗教组织总数便达185000个之多。美国的情况大致相仿,20世纪90年代初,仅新增加的宗教团体就达2500多个。

钟科文认为:新宗教运动具有下列特征:

①以教主个人为信仰和崇拜的主要对象,所以也被称作“新崇拜团体”。教主是所奉教理的源泉,是启悟和修持的导师,是组织信徒生活的领袖。

②信仰人人都具有自我拯救或超越自然的能力,强调自力,反对他力。其中尤以开发潜能、与自然或神灵合一,把自己变成“神”或“新人类”为目标的学说最具鼓动性;而宣扬凭借此类信仰,听从教主,即能包治百病,健康长寿,以致为所欲为,则是吸引普通民众的最常见的手段。

③用高科技名称包装,或者以反科学为号召,启用原始巫术、原教旨和传统神秘主义作为主要的修持理论和方法,从而把最时髦的科学词句与最陈旧的迷信结合在一起。^[67]钟科文指出:“‘大师’、‘超人’等具有种种神通异能的人物不断涌现,由他们带动和组织起来的大小团体,或松散、或严密、或地区性、或全国性,都符合上述新宗教的三个基本特征。”虽然他们下自称为宗教团体,也下向国家宗教行政部门登记,“他们或称为气功功法组织,或称为某种新兴的或祖传的科学研究学科,或者借挂上企事业单位的招牌,或者使用什么研究会、研究院、学会的名义,或者操办学校、大学讲授班、报告会,如此等等,很难从名称上进行判断。”但它们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称为“新宗教”的团体毫无二致。

中国“新宗教”运动的极端组织如“法轮功”,已是彻头彻尾的邪教。在郭周礼主编的《国际气功报》上刊登广告的“宋七力天人合一研究会”是“中国体育气功研究会”直属分会。但宋七力的组织在台湾省就被作为邪教取缔。

第四,气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气功,它是传统宗教、

传统医学、传统体育中的神秘主义在新时期的反映;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观”在科学昌明的今天的重新诠释;是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人们思想解放时面对科学技术遥遥领先于我国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而产生的很多浮躁的幼稚的冲动的扭曲的反映。中国何以能使气功、特异功能成为热潮,何以能使“法轮功”成势,个中社会心理原因十分复杂且耐人寻味,在此不拟详述。

总之,气功是集养生术、巫术、道术、瑜伽术、催眠术和体操于一体的成年人的游戏。气功的流行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

第四节 伪技术

技术是指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工艺操作方法与技能。这些方法和技能能真实可靠地创造社会财富。如基因技术可用来诊治疾病,钻探技术可用来寻找矿藏。如果一项技术与这项技术所宣称的由它创造的财富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那么,这种技术就是伪技术。例如魔棒探测与找到地下水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带功报告与患者疾病好转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伪技术中,有一部分是技术发明者在主观上无欺骗故意的病态技术,而大量的伪技术实质上是骗术。

当代伪科学论争历程中,伪技术论争占有重大比重。这是因为:伪技术的实践性使它更热衷于表演和推广,这就引起了反对者的关注;伪技术的推广以敛财获利为目的,这就造成受害的一方的出面,进而成为社会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伪技术的实用性,使它更受大众的关注,因而也可能造成更多的受害者。当代伪技术的两次高峰是大跃进时期的工农业增产技术和特异功能 20 年期间的健康技术。在以下的陈述中,我们将更注重这些伪技术的基本内容,而略去真伪技术论争的大量事实。这样做的原因是这些争论的过程存在于这些“技术”从推广到破产的始终。

伪技术是伪科学理论下的技术,或者伪技术提升出了伪科学理论,因而,伪技术与伪科学是相联系的。科学和技术是理论和实践两层面上的陈述。大而言之,科学技术是一体化的。我们之所以分述伪技术这样的问题是想在这样的角度对当代伪科学之泛滥作一种描述,以期获得某些规律性认识。这些认识包括伪技术的表现、本质和如何防止伪技术的产生。

一、伪技术表现

由于技术是一种创造财富、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手段,因此,这种手段本身的虚假性就是最主要的伪技术表现。又由于任何手段都是受理论指导的,或可以归纳出某种理论,亦即,任何手段的现象都反映规律性本质,因而,理论的虚假就是伪技术的另一种表现。

1. 技术手段之伪

技术手段与技术目的之间存在的联系是必然的,如果这种手段达不到特定目的,那么这种手段就是虚假的。如果这种目的不是某特定手段造成的,那么,这种手段也是虚假的。魔术师空中抓蛋,蛋这种特定目的物如果不是空中抓来的,那么“抓”这种技术就是虚假的。真实的技术可能是“抖”,是快速从袖中抖出了鸡蛋。这种例子还有“永动机”的实例。在历史上所有的永动机表演中,凡属成功的表演,其永动技术都是虚假的,真正的技术是暗藏的另外的动力装置。大约在 280 年前,有位德国博士奥尔菲留斯发明了一个“永动机”——自动轮。这个轮子的永动性于 1717 年在波兰得到了鉴定,发明者也名利双收。但后来博士的女仆发现了秘密,原来,每当检验者开门查看永动轮是否历经数月仍在“动”时,就有人在机房的夹壁里悄悄地牵动绳子。^[68]这就是说,永动轮的动力并非来自“地心引力”这类“永恒”的力量,而来自于人力。“永动机”违背了能量守恒原理,因而它只能是神话。

伪技术手段表现在大跃进时期的工农业高产卫星上,就是砸锅炼铁这样的闹剧。高产农田的稻子,虽然远不及报刊宣传的数千斤之巨,现场参观时看了让人喜欢的丰产田,往往也是从别处移来稻子加密的结果。这就是说,所谓的丰产稻,不是用深耕、密植、多积肥等技术种出来的,而是把快要成熟的稻子移来凑合的结果。这样一来,声称可致亩产数千斤的深耕、密植等一整套技术,不过是伪技术而已。

“水变油”是典型的伪技术实例。王洪成,男,汉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生于 1948 年。小学四年级文化,当过兵,做过公共汽车乘务员和公共汽车驾驶员。王洪成“水变油”的发明据称来自于 1982 年 11 月某日一次火灾后的顿悟。1983 年开始,他已是到处表演,名闻全国了。到 1992 年第 11 期《新青年》、1992 年 12 月 19 日《工商时报》和 1993 年 1 月 28 日《经济日报》的文章吹捧时,王洪成的“水变油”已是“中国第五大发明”,“世纪之‘药’”。王洪成“水变油”是当代伪技术中引起社会关注最广泛的范例,也是造成经济损失最大的个案。一开始,中央有关部委为王洪成创造条件进行实验,并准备组织科学鉴定,签订有关协议,但都被王洪成以各种借

口回避。王洪成在社会上折腾了七八年后,人们终于认清了他的骗子本质。1992年12月20日,朱基副总理根据有关部委的汇报,明确指出“不要再折腾了”。^[66]

然而,折腾远没结束。1993年前后,《经济时报》、《工商时报》对“中国第五大发明”吹嘘之时,哈尔滨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潮领头在王洪成家看表演搞鉴定,这个外行鉴定的过程被制成录像到处播放。与此同时,王洪成也伪造了中国科学院印发的“王洪成发明成果证明”文件,伪造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管理中心科技部“关于大力推广应用水基膨化燃料的决定”的文件,编造了《洪成膨化柴油鉴定资料汇编》,伪造了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指导名义下的《王洪成水基燃料是领先世界的常温核聚变创举》的研究报告,并有《盘古开天撩世篇——中国王洪成》的录像片上市。

1993年1月29日,公安部和物资部联合发文通知指出水变油宣传造成的认识混乱和经济损失,1993年4月29日,国务委员罗干同志亲自主持会议听取了情况汇报,会上国家经贸委揭发王洪成的表演是采用了“调包”手法的骗术,石化总公司介绍经科学分析王洪成所称的膨化剂实际上是普通的肥皂,国家科委等单位则指出“水变油”违反了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的基本原理。会议决定由国家科委尽快组织专家对“成果”进行鉴定。1995年,在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赵忠贤等41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要求“认真调查‘水变油’的投资情况及对经济建设的破坏后果”的第0787号提案。此提案转国防科工委研究办理后,不见回复。而此时,1995年3月5日,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吴林、校长杨士勤则联名向江泽民总书记上书认定“水变油”技术的真实性。此书称“哈尔滨工业大学是国内外知名的一所国家重点大学,我们愿对此事的真实性负全部责任”。^[70]王洪成拿到哈工大领导给江泽民总书记的信和一份据说有国内10名专家认定的《考察与见证报告》后,复印了1000份到处散发。

哈工大上书后一个月,哈尔滨实业房地产开发公司因一年多的损失达690.4万元而宣布退出“洪成集团”。该公司上书国务院恳请“采取得力措施制止其继续在全国各地进行欺骗活动,以免使国家遭受更大损失”。而此时,全国数十家单位和企业“在水变油”上的投资已超过4亿元。

“水变油”到底是什么技术呢?据称,这个技术的关键在于向水中投放一种“母液”进而使水变成可燃物。这种“母液”叫“洪成燃料”,又称“水基燃料”,它极易获得,生产成本低廉,但效果惊人。只要向自来水或海水中掺入十万分之一的“水基燃料”,原来的水就可燃了。这些变成“油”的水可以作为汽油、柴油、重油的替代

品,且废气排放大大低于国家标准。这种新型燃料热值可达 **16700** 大卡/公斤,比同重的汽油还高。

王洪成“水变油”的神话是在伪造的材料、新闻的炒作、个别专家和教授的“证明”之下,依靠他自己的表演实现的。表演中的最大手法是调包,也就是说,所谓“水变油”技术,其实是一种伪技术,在这种技术的表演中,真正燃烧的**不是水,而是油**。

1984年5月17日,黑龙江省领导邀请中央某领导观看了王洪成的表演后,促使有关部门决心把事情搞清楚,于是王洪成被请到北京,住进高级宾馆。有关方面按王洪成的要求提供实验条件后,由国家安全部派人负责协助这项实验。“实验”进行了**3个月**没有取得进展,最后王洪成说他能把 **100吨水**变成油,于是按照他的要求造了个大水池,他往池里加入他配制的“水基燃料”,通上电,少顷,王用他自己喝空的啤酒瓶取样,点火,样品立即燃烧。如果王洪成真正取了池中之水燃烧,那么,大功也就告成了。然而偏偏国家安全部的同志事先有所准备,对每个啤酒瓶都做了记号,王洪成取样的瓶子与用来做燃烧表演的瓶子并非同一个,他的调包计就这样败露了。骗术败露后的王洪成下辞而别,跑到北京火车站准备溜之大吉,被早有察觉的公安部的同志抓回来,关进了秦城监狱。几个月后的**1985年1月**,王洪成出狱,然而,他下思悔改,继续把“水变油”的牛皮吹大,直到让哈尔滨市公安局的某些领导,甚至黑龙江省的某主要领导也相信了他的发明,同他合作。至此,王洪成终于坐上了专车,揣满了腰包,而投资的工厂却陷入了困境。**1987年10月**,王洪成第二次关进了秦城监狱。应说,至此王洪成的神话破灭,也不至于给社会造成数亿元损失。然而此后,一些人却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认为王洪成入狱,是极左思潮误国误民误科学的铁证,于是,王洪成又被从狱中放出来,终致把“水变油”牛皮吹爆。王洪成**1996年1月1日**被收审,**1997年11月14日**被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这次刑期是十年,如果他在狱中表现良好的话,可能还能提前出狱。我们期待王洪成成为新人,但伪技术不会因“水变油”的破产而绝种。

2. 伪科学理论下的技术

技术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技术。技术应该符合一般的科学原理,反映规律。在伪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技术,表现为一种伪技术,这同样可以用“永动机”的实例说明。前面已述,“永动机”之所以动,并非某种技术产品能够“永动”,而是暗藏有其他的动力。我们所见到的“永动”技术制造的产品只是一个假象,这就是技术手段

之伪。现在反过来分析,由于“永动”的理论违反能量守恒原理,是伪科学理论,因而,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技术”是下不可能成功的。永动机下不可能造出来,因而,永动机技术就是一种伪技术。

在当代伪技术论争上,W型超浅水船是一个重大事件。这个事件我们在第一章第六节“伪科学处置”中已经提到。由于W型超浅水船所依据的理论是违反科学原理的,周锦宇等也就只能是“技术骗子”而成不了发明家。

医疗领域是伪技术的最大市场,它构成随特异功能 20 年兴起的伪技术的主要内容。这些伪技术是在伪医学理论指导下的技术,或者干脆就是胡编乱造的理论下的骗术,因而,它们是下能取得疗效的。

伪医术的范例是胡万林的“运动疗法”。

胡万林,男,汉族,1949年12月12日生于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魏城镇秀山村一社,小学文化。1974年和1983年,胡万林先后因反革命罪和故意杀人、诈骗、拐卖人口罪入狱,1997年5月19日胡万林被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哈密监狱“无罪”释放。在新疆服刑期间,胡万林即以气功或凉水疗法为人治病。1995年2月22日,西安市《国际气功报》以《一个囚徒创造的神话》为题报道了胡万林的行医经历,此后,该报社长郭周礼、副社长刘权寿等人多次采访报道了胡万林。胡万林获释后,在郭周礼、刘权寿的陪同下,往北京会见了作家柯云路。在他们的共同策划下,柯云路以郭周礼提供的材料为基础,扩充写作了吹捧胡万林的《发现黄帝内经》,此书1997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现黄帝内经》神化胡万林及其“运动疗法”,为胡万林以医行骗制造了舆论,同时又给柯云路以巨额版税收入,成为中国当代伪科学代表作。

胡万林“运动疗法”是从终南山医院开始实施的。1997年7月23日在西安市长安县太乙宫镇开业的终南山医院,是郭周礼和胡万林等合伙开办的伪医疗技术实践基地。1998年2月26日晚,西安警方出动百辆警车,千名警员包围终南山医院,强行取缔了“涉嫌非法行医”的终南山医院,胡万林逃匿。1998年6月15日,胡万林应邀到河南商丘卫达医院试诊,漯河市长刘法民在胡万林治疗下病情恶化,虽经转移郑州抢救,但终于回天无力,不治身亡。商丘市小学教师何素云也在此期间被“治”身亡。这就是“商丘事件”。1999年1月16日,胡万林在商丘被捕。10月8日,“胡万林案”在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12月28日商丘中院认定胡万林犯有非法行医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胡万林自称为“生命医学”、“运动疗法”创始人,他说:“运动疗法不同于中医,中医的知识都是来自书本上,而我是从山林中学来的。我的运动疗法是诞生在生命世界理论基础上的新型科学,它自然无限,毫无拘束。我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不学教授学禽兽。教授什么都懂,就是把身体搞不好。动物深居山林,什么都不懂,却矫健长寿。为什么呢?因为动物掌握了生命的钥匙。”^[71]据柯云路说,1957年,胡万林在山林中给一个16岁的姑娘胡定青开玩笑,大吼一声吓死了那个姑娘。这事使胡万林很“歉疚”,因此,他下了决心,背着他能够找到的药书、经书,潜入深山老林。“他与天地自然合于一林,尝药,学医,练功,悟道”。“二年多的深山苦修,他终于悟透了医学和生命的奥秘”。^[72]原来如此,胡万林的医学是在山中悟出的,这个过程伴随着练功和悟道。胡万林练的什么功?大约不外是内养、气功之类,他悟的什么道?他悟的不是老子之道,天地之道,而是为他后来行骗所用的胡说八道。胡万林医术果然来历不凡,这种来历就是巫。胡万林诊病有神奇的速度,何祚庥根据《文艺报》上胡万林四年看了120万病人的说法,计算出胡万林平均36秒看一个病人。《作家文摘》1998年3月18日登的一个来自北京301医院的医师叫孟宪臣的则说“胡万林看病的速度是10秒钟看一个人,他就用眼睛这么扫视一不,就对病情诊断得很准确!”交40元诊费,病人可获得三瓶汤药,其中一瓶是经胡万林在瓶口捂了一不的。“喝药须知”上说“发给患者的药剂已经胡医生发功,并在发功之后10小时内喝完”,^[73]而所谓汤药,一律都是砒硝水。病人喝后上呕不泻。

从上面的介绍可见,胡万林的所谓运动疗法,就是让病人呕吐和奔跑于病房与厕所之间,这种“运动”,往往给病人一种异样的感觉。在胡万林的医院的神秘氛围不,有些病人获得了较好的自我感觉,但大剂量的砒硝最终都将使病人的病情恶化。所以,对于病重的患者,胡万林要同他们签订死亡与医院无关的“生死文书”,是可以理解的。

砒硝,其精制品又称元明粉、玄明粉,性寒味苦,是一味具有泻不通便功能的中药。砒硝在医疗上的剂量是严格控制的,常用量为2钱,即6克左右。但胡万林用药不论克,而是大把大把往铁锅中撒,最多可撒到12把,他自己承认有2500克。大剂量地服用砒硝水,使病人出现严重呕吐和腹泻等毒副反应,流失大量体液,使病人体内水分和电解质大量丢失,进而引发患者脱水,水和电解质平衡紊乱,给患者雪上加霜。胡万林不是神医,他甚至连行医执照也没有,是非法行医者,但他对砒硝的作用应是知道的。他之所以要大量使用砒硝治病,无非是为其疗法制造一

点神奇,这种神奇让人觉得是在让病人向体外排出毒素,而当用药停止,止呕下泻也就停止了,代之以对食品和营养的更大需求,这就足以让人觉得病况好转。而实质上,被砒硝水损坏的身体比“运动疗法”前更难修复。胡万林使用致病之药来治病,采用伪医术以行骗。他的药疗理论,与科学无缘。胡万林不向外透露其药方,而是以种种神秘的理论来阐述“运动疗法”的医理,这种来自于禽兽的医理,是虚假的非科学的,其实质是巫师的编造和骗子的胡诌。在骗子的谎言下,胡万林的“运动疗法”包治百病。胡万林称,他的“运动疗法”对癌症的治愈率可达 50%,艾滋病也治好了 33 例,而戒毒则有百分之百的效果。伪技术在此凸现了它在自己宣称的领域内无所不能的特征。

二、伪技术的基本类型

1. 作为骗术的伪技术

伪技术大量出现在高新技术和健康技术领域,其目的是为了推广进而获利。在经济大潮中,盲目冒进、追求高效的社会心理,在物质精神生活质量提高后人们在病患和死亡面前无所适从充满恐惧的心理,是伪技术得以推行的社会心理基础。伪技术之所以被认为是骗术,是因为伪技术推行者有欺骗的故意,而伪技术推行将造成社会危害。这种危害轻则危害人们的健康,重则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在健康领域,磁疗的宣传自西方灵学发端之时的“动物磁力说”始从未间断过。磁这种只出现在有铁质存在的环境中的神奇力量被无限夸张,比附于人体,这令许多人把健康的希望寄托在一块磁铁之上。但是关于磁疗的文章和理论,又下出自科学家之手,而是一些信仰者的牵强附会。这使磁疗成为重要的伪技术。人体非自然增高和人体增肥减肥美容增智方面的伪技术,今天更容易得到应用。对不可检测的模糊疗效的宣传,成为伪医术产品行销的动力。在保健品领域,对于补脑健身、恢复元气、补血益肾、滋阴壮阳、调节生理、抗病延年、美容养颜的功能宣传,成为一种风气。1999 年,卫生部查处了 64 种不合格的保健品,它们包括有人参、鹿茸、蜂蜜、虫草、蚂蚁和鸡精制品等,就是上述疗效的使用品。而更大销量更大知名度的保健品,从它们行世起,就已受到了科学的质疑,但司法的追究却是一种奢望。在质量上“存在严重问题严重地危及广大人民生命健康”^[74]的三株口服液行销全国达三四年之久,到人们发觉它所宣传的疗效虚无缥缈、出现信任危机之时,厂家已赚足了钱。

伪技术作为一种骗术,在社会财富的损害上的例证,莫过于大跃进中的正农业

产品产量卫星对国民经济的根本性破坏和“水变油”这样的高新技术对相关企业的毁灭性打击。“邱氏鼠药”是河北农民邱满国发明的一种鼠药,据宣传这种鼠药可以把投药地点的老鼠引诱出来,药杀干净,且具有想杀公的就杀公的,想杀母就杀母的这类神奇效果。在强劲的广告和新闻宣传下,邱氏鼠药行销全国,但鼠药中使用了国家禁用的氟乙酰胺这一事实,却被发明者隐瞒了。这种剧毒农药对环境有很大的污染,危及非靶生物。1992年4月,为保护生态环境和人畜安全,赵桂芝、马勇、汪诚信、邓址、刘学彦等联名写成《呼吁新闻媒介要科学宣传灭鼠》一文在报上发表。1992年8月,邱满国以名誉遭到损害并造成经济损失为由状告五位科学家。1993年12月,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一审判五位科学家败诉。1995年2月,北京市中级法院判五位科学家胜诉。“邱氏鼠药”虽经由一场历时三年的官司而告破产,但已经投放的鼠药对环境的破坏和仍然库存的鼠药对人畜安全的威胁却是很大的。氟乙酰胺是一种剧毒农药,目前世界上尚无解药,这种药一克可毒死六、七人。国防科工委曾购入“邱氏鼠药”,下知情者将用剩的500克毒饵(大米)煮了粥,结果77名就餐者中有68人中毒。无极邱氏鼠药厂1997年11月破产,但各地留存的鼠药很多,仅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就有准备出口俄罗斯的20吨。作为当代伪技术第一号大案,“邱氏鼠药”案是由伪技术状告“科学”开始的,这个案件在当时引起了较大的轰动。人们对科技打假的关注直接表现在五位科学家败诉这种事上,而五位科学家的最终胜诉却是在一年多以后。这期间,朱光亚等200多位政协委员发出了“严禁非法生产销售使用剧毒灭鼠药物”的呼吁。1994年春季召开的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上,政协委员也提交了《请抓紧处理“邱氏鼠药”的打假工作》的提案。一审和二审期间取证、化验等工作,也存在着实证和假证的复杂斗争,所以即使是从中国“伪科学论争”的角度看,“邱氏鼠药”这一伪技术案,也是一件大事。

2. 病态科学下的伪技术

病态科学是科学界内部由于科学工作人员使用了下正确研究方法或下不正当的测试手段以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和预言的现象。病态科学原文 Pathological Science, 是美国著名化学家欧文·朗缪尔在1953年首先提出来的。按照原义,它是指“科学家完全是诚实的,十分热衷于自己的研究……但完全自己欺骗了自己”的那些事件,“这些事件中没有任何弄虚作假,但由于作者不了解作为一个人完全可以被主观的因素,一厢情愿的想像,或某些阈值效应而引入歧途,以致完全陷入错误的泥塘之中”。病态科学是一种由低噪比、低统计得出的被宣称有高精密度的

违反曾被确证的实验事实的“科学”结论,它拒绝批评,并且在不同的病态科学家之间也会出现各不相同却又自以为是的结论。病态科学具有信仰的特点,支持者往往能重复发明者的结果,而反对者不能。1989年在美国出现并造成国际影响的“冷聚变”现象的发现被认为是这样的病态科学。而长期以来某些科学家所热衷的“永动机”,是一个经典的“病态科技”。

病态科学之所以不被反伪科学界重视,是由于它本身没有作伪的故意,因而没有道义上的过失。

把气功作为一种医疗技术时,伪技术本身具有了骗术和病态技术两重性,其区别在于有些人连自己也不相信气功外气治疗这些事理,他所吹嘘的气功治病完全是骗局。而另一些人,他们在片面的偏执的心智下,把偶然的巧合理解为必然的结果,把隐晦的因果牵强附会起来,他们自以为是,拒绝批评,在一厢情愿的想像和阈值效应的显现不沾沾自喜,陷入错误的泥淖。1979年特异功能兴起之初的5月16日,云南个旧市第三中学的王伽林给自己做了剖腹手术,在身体上设置胆汁引流管,进行了长达四个多月的气功状态不胆汁分泌活动情况的观测,获得了气功状态不胆汁分泌活动情况的大量第一手数据。王伽林所从事的科学研究显然已进入病态,这种自残性研究令“人体科学”领导者们好受感动。在特异功能20年中,除了那些别有用心心的巫师、邪教教主和江湖骗子,有些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实际上是陷入了不能自拔的病态科学泥淖。如果说,病态科学只适应于科学界人士;那么,一些非科学界人士对于种种科技神奇的热衷,如若不是在搞“集团欺骗”,那么,就是“病态科学”效应的结果。这就是说,研究科学有病态的,认同科学也有病态的。

病态科学及其技术,可以在科学界的自由批评争议中得到纠正,也可以由时间来沉淀和澄清。

三、伪技术规避

自“邱氏鼠药”始的伪技术论争,使人们逐步认识到了规避伪技术、防止伪技术危害社会的重要性。

规避伪技术,主要应从制度入手。任何漏洞,都是制度漏洞。如果我们从制度、从管理、从法律上消除伪科技产生的条件,并且从提高全民科技素质上铲除伪技术滋生和成长的土壤,伪技术就会少得多。

规避伪技术,可以从下列几方面入手。

1. 完善科学技术同行评议制度,加强技术成果评议的民主制度建设。科学的

是非,由科学来裁定,像邱氏鼠药那样的案子,如果有科学家陪审,充分吸取科学家的意见,也许不会出现一审科学家败诉那样令法律尴尬的结果。同样的案例还有1993年周锦宇起诉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周俊麟副教授和《中国运河报》社及记者周家华侵害名誉权案,湖北高院在1994年8月的终审判决是周俊麟、周家华败诉,科学和新闻监督最终败在了“W型超浅水船”这种伪技术的发明者手下。

2. 技术交易必须立法,技术交易必须在严格的法律约束下进行。像“水变油”这样的伪技术,本来就没有经过严格的技术鉴定,所以如果我们依据可能的法律办事,“水变油”就进不了技术市场,即使混入了技术市场,受让一方在受到损失后也还有第二责任方即技术市场管理部门可以追究。在没有上述条件时,企业和技术拥有者私不交易,骗子更易得逞,企业有可能遭受更大损失。

3. 加强专利制度建设,严格专利审批和检验程序,防止伪技术骗取专利进而进行“合法”的欺骗。

4. 新闻媒体要严谨求实,不要发表未经证实的科技报道,更不要制造虚假报道而成为伪技术骗子的合伙人。

5. 要提高广大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伏尔泰曾说:“伪科学是由骗子和相信骗子的人造成的。”因为,骗子只是用伪装铺设了一个陷阱,是我们自己走进了骗局。如果我们有健全的心智,那么,我们对“耳朵听字”那样的伪科学,对10秒钟看一个病人那样的伪技术就会有本能的抵制和否定,而如果我们本身具有迷信思想,受“信息”诊治或头戴铝锅接受气功治疗,也就在所难免。1992年12月13日某报头版报道“水变油”奇迹,称10毫升膨化药剂加一吨水可以把水变成油,且这种膨化药剂生产成本奇低,“一台简陋的设备运转22分钟可生产一吨”。有一位叫孙智斌的作者据此估算了一不,如果按10毫升加一吨水即1:1亿说法为准,那么,“一台简陋的设备运转14.6小时生产出来的膨化剂”,足以把洪泽湖变成大油库;运转31-32天,可以把全中国的所有江、河、湖泊统通化为油江油河油湖油海;14台这种设备连续运转,一年之后就足以把我们这个地球化为见火就着的大油球!”这样的计算也许稍显复杂一点,但是如果我们在这种归谬推理的自觉,遇到伪技术便推理一不,我们就会对伪技术说不。这样的推理很多,例如,假如正常人的睡眠要靠某种口服液,那么,一旦中断了这种口服液后该如何?假如人体可以凭一双鞋垫增高,假如某药品可以帮助你考上大学,假如某种毒药使地球上的老鼠死光……总之,正常的心智可以筑起一道拦截伪技术的堤防。此外,对专利知识的了解,对

广告的理解,对新闻报道的认识,都与科学文化素质相关,而这些领域,正是伪技术显示的地方。在专利上,专利申请与获得专利是两码事,专利申请后,可能并不能授予专利,但周锦宇的“W型超浅水船”骗局正是借助了专利这一手段。周锦宇曾经申请了4个与W型超浅水船有关的专利,但是,有两个专利权是在专权保护期满前被终止的,有一个虽已申请但未授予专利。只有一项被授予实用新型专利。其中,记者于卓在《科技时报》1995年12月30日报道称:“前不久厦门资产评估事务所遵循公正、客观、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对周锦宇发明的4项专利技术进行了价值评估。评估结果,4项专利技术的使用价值为2.24亿元。”报道中自诩“公正、客观”的评估,恰恰是不“实事求是”的。1996年2月10日,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专利事务所的《专利通讯》第1期上秋石写文章认为:把两项已放弃、一项尚未确认的专利权和一项实用新型专利权绑在一起评估,是荒谬、可笑的。然而,正是这种荒谬可笑的评估,为周锦宇的闹剧创造了条件,使许多企业因受让这样的荒唐专利而蒙受巨大损失。广告的吹嘘、报刊的吹捧、领导的推荐或权威人士的首肯,均不是检验科学技术标准,公众必须逐步形成怀疑的自觉,使伪技术无空子可钻。

此外,由于伪技术行骗是一个社会问题,它又涉及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方方面面,伪技术的得势与各方面的制度不健全是有关的,而腐败的存在是最大空子,这些,就不在本书研究之列。

注 释

[1] 拉德纳著,安宝明、张松林译:《科学与谬误》,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页。

[2] 恩格斯著,于光远等译:《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3页。

[3] 同上,第54页。

[4] 于光远:《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269页。

[5] 同上,第270页。

[6] [英] 吉尼斯:《心灵学——现代西方超心理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

[7] 《催眠术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第363页。

[8] 钟科文、杜镇远:《走出无知的迷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

[9] 同[2],第56、57页。

[10] 阿尔森·古留加:《康德传》,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5页。

- [11] 同[4],第271页。
- [12] 同[10],第75、76页。
- [13] 同上,第76页。
- [14] 同上,第77、78页。
- [15] 《灵学丛志》第一期:《答吴稚晖书》。转引自[8]第49页。
- [16] 同[4],第278、279页。
- [17] 转引自申振钰、曾昭贵、徐升国:《正与邪》,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 [18] 同[4],第280页。
- [19] 同[17],第10、11页。
- [20] 同[17],第7页。
- [21] 同[17],第8页。
- [22] 张君勱、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页。
- [23] 同[17],第7、8页。
- [24] 同[4],和第280页。
- [25] 同[6],第36页。
- [26] 同[6],第461页。
- [27] [美]詹姆斯·兰迪著、钟静译:《美国头号“特异功能大师”盖勒调查记》,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封底。
- [28] 何宏:《“特异功能”探秘》,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 [29] 同[6],第300页。
- [30] 同[28],第87页。
- [31] 翟振武:《“错批一人与误增三亿”质疑》,载《纵横》,2000年第7期。
- [32] 钱学森:《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载《创建人体科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页。
- [33] 钱学森:《开展人体科学的基础研究》,载同[32],第42页。
- [34] 同[32],第37、50页。
- [35] 钱学森:《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发展纵横观》,载同[32],第471页、472页。
- [36] 同上,第120页。
- [37] 同[8],第113页。
- [38] 四川医学院调查组:《四川唐雨“用耳识字”也是假的》。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信访简报》第93期,1979年4月23日。
- [39] 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信访简报》第92期,1979年4月23日。
- [40] 钱学森:《自然辩证法·思维科学和人的潜力》,《哲学研究》,1980年第4期。
- [41] 专讯:《钱学森同志访问本刊编辑部》,《自然杂志》,1980年第8期。
- [42] 同[4],序1、2页

- [43] 于光远:《让事实说话》,载何祚庥主编《伪科学再曝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45 页。
- [44] 钱学森:1982 年 10 月 16 日在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第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孕育着新的科学革命吗?”。
- [45] 2000 年 6 月 12 日,作者在北京某宾馆茶座上,就钱学森同志对当代特异功能的作用问题请教于司马南,司马南说了上述 9 条。征得司马南先生的同意,我作了记录。
- [46] 郭同旭:《严新在北美》,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 年 3 月第一版,第 19 页。原句为“洋大人也趁火打劫:‘中国的科学家在搞集团欺骗。’”此处使用“集团欺骗”一词,但欺骗的主体内涵已扩大,且语意与郭同旭引用时相反。
- [47] 杨付军、沈乃煜:《曝光伪科学》,学林出版社,2001 年版,第 74 页。
- [48] 柯云路:《中国气功大趋势》,新华出版社,1997 年第 1 版,第 455 页。
- [49] 王昌盛编《虚妄的智慧——破译柯云路与伪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插图第 5 页。
- [50] 同上。
- [51] 杨克朴:《走近神仙张宏堡,记者不解献六疑》、《科学与无神论》,1999 年 9 月创刊号,第 32 页。
- [52] 顾涵森:《生命信息科学初探——人体收发离体信息的探索》,《自然杂志》3 卷 8 期,第 567 页。
- [53] 同[40]。
- [54] 同[46],第 27 页。
- [55] 张洪林:《正本清源 还气功本来面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 15 页。
- [56] 申振钰、曾昭贵、徐升国:《正与邪——科学与特异功能伪科学及邪教大论战》,群众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78 页。
- [57] 同上,第 179~180 页。
- [58] 柯云路:《生命科学最新报告》,作家出版社,1996 年版,第 194 页。
- [59] 张彤玲:《谈练功出偏的恶果》,何祚庥主编:《警惕祸国殃民的伪气功》,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 159~162 页。
- [60] 张洪林:《再谈“法轮功”为什么能“迷魂”》,《科学与无神论》2001 年第 3 期,第 63 页。
- [61] 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65 页。
- [62] 同[55],第 7 页。
- [63] 同[55],第 7~8 页。
- [64] 同[55],第 6 页。
- [65] 李胜先:《气功,一种不安全的健身方法》,《科学与无神论》,2001 年第 1 期第 46 页。
- [66] 同[65]。
- [67] 同[8],第 12~20 页。

- [68] 郭正道:《科学求真》,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2-83页。
- [69] 郭正道、祝永华主编:《揭开伪科学的面纱》,大象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 [70] 严金海:《中国20年伪科学现象透视》,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页。
- [71] 杨杨:《“神医”胡万林揭秘》,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 [72] 同[71],第21页。
- [73] 同[71],第25页。
- [74] 《南方周末》,1999年3月12日,第6版。
- [75] 《我不信邪——何祚庥反伪科学论战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47~345页。
- [76] 孙智斌:《我所经历的“燃油掺水”试验》,郭正道主编《揭穿涉资亿元的“水变油”大骗局》,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

第五章 伪科学现状

“法轮功”是邪教化了的伪科学组织，它属于当代伪科学中的江湖派。当代伪科学具有江湖型、学院型和权威型等基本类型，其中权贵型伪科学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品种，它的危害性极大。中国当代伪科学具有江湖化、学术化、政治化、产业化、大众化和国际化特点。中国当代伪科学自1995年以后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自此之后，学院型和权贵型伪科学走向沉寂和反思；江湖型伪科学在最后的疯狂之后，以其强大的余波影响我国，这就导致了反伪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特点。中国当代反伪热潮自1995年开始节节胜利，显出科学昌明和时代进步的大势不可阻挡。

第一节 “法轮功”与当代邪教

在第三章第四节“历代邪教”中，我们已经讲到历史上自“太平道”至“一贯道”的邪教历史，我们也提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邪教“被立王”、“法轮功”等。在其他有关章节中，我们还提到了自1979年以来兴起的“特异功能”、“气功”热潮中那些随风而起的用“功”“法”名义掩盖的至今尚未揭盖的可能的邪教组织。在此，我们有必要阐明如下四个问题：第一，邪教的特征；第二，“法轮功”为什么被称为邪教？第三，《转法轮》中的伪科学。第四，中国当代邪教。

一、邪教的特征

1. 反正统宗教的教主崇拜。

正统宗教的崇拜对象是超人世的神，如基督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安拉、佛教的佛、道教的太上老君。正统宗教的神职人员，是神的仆人，不是神本身或神的化身，因而不是崇拜的对象。邪教教主无一例外地自封为神，或称“上帝”或称“耶稣再世”，或称“弥勒佛转世临凡”，甚至自吹超过诸神。“一贯道”“十七世祖”路中一，自称“弥勒佛转世”；被立王教主吴扬明自称“耶稣再世”，李洪志虽不敢明言自己是神，但实际上却把自己吹嘘成法力无边、无所不能的宇宙至尊，公然以救世主和最

高神自居,自称法力高出释迦牟尼几十万倍。自诩“这世界一切都应听我的,没我不行”,他生而为神,是专来度人的,能在末法时期最后一次度人。他有无数法身,连他书中每个字都是他的法身,都是佛的形象,能保佑所有弟子。他特意把自己的生日改为释迦牟尼生日的同一天,意为“佛祖再世”,许多信徒把他视为佛和太阳,顶礼膜拜,至死不悟。

2. 反现世,宣扬灾劫说。正统宗教也有大量关于“大灾大难”、“末劫”、“世界末日”的宣教,把现实世界视为丑恶、虚幻之世,因而把彼岸世界视为最美的最终的归宿,希望死后灵魂升往天国,或者未经死亡便直接羽化登仙。但正统宗教同时又是和现实世界相容的,它们并不刻意排斥现实世界。正统宗教在强调世界末日,神的救赎、天国幸福的同时,还以相当大的注意力,关注人们的现实生活,给人以安慰、劝勉和鼓励。邪教却偏执一端,视现实世界为极度堕落、注定要毁灭的世界,并急欲逃离或摧毁之。邪教主无一不是极为渲染灾难的恐怖,扬言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这种极端偏执的信念在邪教教主的煽动下产生的两种可能的后果是消极地自杀自残和积极地攻击社会,对社会危害极大。

3. 反社会和非法非人道的教内生活。当正统宗教努力寻求与社会的调和之际,邪教却公然违背人类社会公认的伦理道德准则,违反法律,违背政治制度,使用种种手段干涉教徒的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剥夺他们的合法权利,摧残他们的身心。他们巧取豪夺、破坏家庭;他们蹂躏妇女,摧残生命;他们建立秘密王国,实行专制统治。

4. 反对政府,具有叛逆的政治性格和暴力倾向。在少数政教合一的国家里,教会利益和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宗教是政权的支柱。在政教分离的国家,正统宗教并不以颠覆政权、建立神权政治为目标。而是力求与政权相协调,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民间团体的辅助作用。正统宗教不具有暴力色彩。邪权具有反对政府、叛逆的政治性格和暴力倾向。当邪教的反社会、不人道行为与道德和法律相抵触时,必然引起司法制裁。面对制裁,邪教与政府的对抗就公开化。邪教反对的“现实”不是抽象的人生,而是具体的政府组织。社会的阴暗面更成为他们反政府的借口。在教义上,邪教极为鼓励教徒为他们的狂热的宗教理想而奋斗。“法轮功”在被取缔后,活动在各地的“法轮功”信徒或通过互联网上的信息,或通过潜伏下来的组织的联系,千方百计地进行反政府的“弘法”活动。他们选定一些喜庆的节日制造事端,比如,在2000年元旦、国庆等节日,他们就曾到天安门广场等地聚集闹事。在教会组织上,邪教具有政教合一

的教派结构。日本的奥姆真理教具有 20 多个省厅,俨然一个国家。“被立王”打上了中国封建帝王制色彩,吴扬明以皇帝自居,其姘妇之一被封为“主母”,还按被他诱奸的先后次序,封一些女教徒为“主”、“权柄”、“奉差”、“代权”。其中“权柄”就有 16 人,相当于大臣。他说:“将来的天下是被立王的。”如果说“法轮功”还只是以冲击新闻单位、传播反政府妖言、静坐示威等手段对抗政府的话,那么,发育成熟的邪教则有自己的武装和军队。美国财政部烟酒火器局依法对“大卫教”庄园进行搜查时,遭到大卫教徒的武装抵抗,双方交火 45 分钟,官方武装有 4 人被打死,伤 16 人。日本奥姆真理教则拥有研制毒气的技术力量和工厂,并试图通过日本自卫队获得生产核武器、细菌武器和毒气的军事技术和作战指挥技术。他们曾在日本东京地铁中施放沙林毒气以小试牛刀,他们更大的计划是用原子弹炸毁华盛顿。目前,这个邪教仍然未消失。对于邪教的处置往往遇到的司法疑难和法律教条,使邪教如癌细胞扩散,社会肌体难以痊愈。中国的“法轮功”教主李洪志已经成为国际人物,与国际的反华势力沉痾一气,进行反对我国政府的活动。

以上是邪教的主要特点。邪教的反动性是广泛的,全方位的。邪教的目的是维护一小撮上层分子,最终也就是维护教主的利益,与此相冲突的都在它们的反对范围之内。所以,在反对邪教问题上,宗教界和无神论者能够结成最广泛的同盟。

二、“法轮功”为什么被称为邪教?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法轮佛法”,系吉林省长春市人李洪志于 1992 年创立。“法轮功”适应当时社会上特异功能和气功的热潮,信徒逐步增多,至 1999 年,信徒超过 200 万。创立以来,“法轮功”多次组织信徒围攻新闻单位和政府机构,1999 年 4 月 25 日,一万多名“法轮功”信徒聚集在中南海周围示威。7 月 19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22 日,民政部做出了《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7 月 31 日,公安部发出对邪教头子李洪志的通缉令。

据公安部研究室公布的材料,李洪志身世如下:李洪志,男,1952 年 7 月 7 日出生于吉林省公主岭市(原怀德县公主岭镇),1960 年至 1969 年先后在长春市珠江路小学、第四中学、第四十八中学读书;1970 年至 1978 年先后在总后 201 部队八一军马场、吉林省森警总队吹小号;1978 年至 1982 在森警总队招待所当服务员;1982 年至 1991 年转业到长春市粮油公司保卫科工作;1991 年停薪留职后从事“气功”活动,1992 年 5 月起传播“法轮功”,1995 年逃往美国。

对“法轮功”的定性,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按李洪志自称,“法轮功”不是宗教,不是气功,也不是政治组织,而是“佛法”。确实,国内宗教界人士都不承认它是宗教,而国家体委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也取消了其登记资格,不承认其为气功。但是,李洪志说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并不能作为“法轮功”定性的依据。李洪志不承认其为宗教、气功和政治组织,只能说明它在这三者上都不是成熟的形态。作为邪教,“法轮功”必须假借宗教的某种形式和内容为己所用;作为功法,它又利用了一些气功的动作;作为政治组织,它的垂直领导和组织网络是成功的,卓有成效的。它可以发动上万人步调一致,围攻中南海,神不知,鬼不觉,况且作为政治组织,它们有明确的政治野心。当“法轮功”的发展遇到了各种正义力量的打击时,“法轮功”组织一直在为其活动的合理化和组织的发展壮大而努力。“法轮功”弟子称李洪志应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至少应进全国政协。“法轮功”被取缔后,他们勾结国外反华势力进行疯狂的反党反政府的活动。因此,李洪志说“三不是”,其实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至于他说的“佛法”,即令是“佛法天地”的那个“佛法”,也正是“神秘主义”的代名词。

善于生造和借用概念是邪教的特点。如张宏堡将其功法冠以“麒麟文化”的美名,张小平骗术为“万法归一”,张香玉巫术为“大自然中心功”,胡万林疗法叫“运动疗法”,柯云路系列神秘主义作品叫“生命科学”系列。故,李洪志也可以给他的东西取个“佛法”“法轮功”的牌子,这个概念不是抽象的,它有深刻的内涵,这个内涵的另一个名称叫“邪教”。

理论界对“法轮功”的定性是谨慎的。最先的说法是“歪理邪法”,而且至今仍与“邪教”说法并用。但“法轮功”一出,就有学者看到了它的“邪教”性质,1999年8月9日《科学时报》发表了记者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畅征教授的访谈,指出了“法轮功”的邪教性。畅征教授认为邪教有四方面的共性:第一,宣传世界末日的来临,进行恐吓蛊惑人心;第二,邪教头目自封为神、佛;第三,害人和敛财;第四,具有国际性。1999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法轮功”就是邪教》,其理由有六点。第一,教主崇拜;第二,精神控制;第三,编造邪说;第四,敛取钱财;第五,秘密结社;第六,危害社会。这篇文章同时公布的数字是:①,1996年8月李洪志指挥“法轮功”组织围攻《光明日报》以来,聚集300人以上的非法示威事件达78起。②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修练“法轮功”致死1400人。③“法轮功”在全国有39个辅导总站,1900多个辅导站,练功点28263个,曾一度拥有210万练习者。

④1992年5月至1994年年底,李洪志同他人办56期“法轮功”学习班,收费300万元以上,武汉总站负责人开办的武汉深深集团公司,非法出版有关“法轮功”的书籍和音像资料,得书款9000余万元,按合同,除支付李洪志稿费、校对费外,还要将总码洋的8%交李洪志个人,此案与另外两个“法轮功”非法产业案合计非法经营款初步测算在1.6亿元,非法获利4000多万元,并且已查明李洪志在海外银行有巨额存款。⑤据10月25日《人民日报》公布破获一批“法轮功”组织及其人员非法获取国家秘密文件的案件,共有59件,其中绝密文件20件,机密文件24件,秘密文件15件。

1999年1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轮功”现象综合课题组富芳的文章,称《“法轮功”是地地道道的邪教》。现在,我们另辟蹊径,从“法轮功”与明清时期以至近代史上的邪教会道门的相似之处,来理解我们把“法轮功”称为邪教的原因。

首先,“法轮功”信仰集儒、道、佛三家于一身,符合明清以来反动会道门风行的三教合一的社会潮流。“法轮功”的所谓“佛法”,如业报轮回、修炼成仙、度人到天国等说法均窃自佛教和道教,“法轮功”的“真、善、忍”三字信条更蕴含着丰富的儒教思想。

其次,“法轮功”与明清以来的邪教有相似的教义。“一贯道”宣传“无生老母主神说”,“三阳更替世运说”等,宣扬彼岸世界和末劫观。“法轮功”则说地球有三次爆炸,现在是第三次爆炸之前,李洪志说现在人类道德标准严重扭曲,背离真、善、忍的特性越来越远,世风日下,道德败坏,十恶俱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到可怕的地步,神已不把人当人待,将降大灾难予以处罚。邪教认为免遭劫运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修炼他们的“道”、“法”,李洪志希望人们修炼“法轮功”以提高层次,他以此煽动信徒围攻新闻单位,静坐在中南海,说只有敢于与政府对抗,才可以提高层次。

第三,教主崇拜。我们说这是世界邪教的共同特征,明清时邪教虽有自己的神,但教主实际上凌驾于神之上。黄天教主普明及妻子普光都自称为佛,一个是太阳佛,一个是月亮佛。八卦教教主刘佐臣自称是救世主弥勒佛转世,孔子再世临凡,李洪志虽不言自己为神,但他把自己的生日从7月7日改到5月13日,因为1952年5月13日是阴历四月初八,是佛祖诞生日,李洪志改成这一天便使他方便宣称自己是“释迦牟尼转世”。李洪志说地球爆炸日期快到了,是他怜悯,推迟于30

年。这么大的本事,当然是神,而且他这个神是全世界惟一的。他说:“在国内外,真正往高层次上传功目前只有我一个人在做。”“我是第一个真正把修炼的东西留给人,这是从来没有的,我做了一件前人从没做过的事,给人留了一部上天的梯子。”“我要度不了你,谁也度不了你。”^[1]

第四,相同的修炼方法。黄天教、八卦教等受道教影响的民间教门,大多讲究性命双修,既修心性,又炼内丹。李洪志为了掩盖自己的功法窃取了传统宗教的内容这一事实,宣称法轮佛法不同于任何修炼法门。称其“不炼丹,不结丹”;但“既修性又修命”的说法却暴露了与其他邪教相同的从道教中偷来的“性命双修”内容。还称“佛家的法轮,道家的阴阳,十方世界的一切,无不反映在法轮里。”^[2]

第五,相似的传教方式,明清以来的传教,大多以教练气功手段招徕徒众。八卦、弘阳、收原、混元、清莲等教门都讲究生功运气,声称功夫到了,能“出神上天”“见无生老母”;李洪志出道之初,就是以传功治病招徕徒众的,他大肆吹嘘练功的神妙,可以不看医生,不吃药,只要修炼,听他的话,病就可以自行消失。

第六,严密的组织和惊人的能量。“法轮功”在全国建立自上而下的组织机构,实行从法轮大法研究会到辅导总站、辅导站、练功点的多层次垂直领导,组织十分严密。“4·25”围攻中南海及此前围攻北京电视台,齐鲁晚报社等单位的活动均显示出了该组织惊人的能量。7月22日民政部、公安部取缔“法轮功”以后,“法轮功”组织进一步国际化,李洪志利用互联网指挥“法轮功”信徒的活动,国内国外的“法轮功”信徒仍在李洪志的遥控下频频出击,扰乱社会治安。

第七,相同的目的:敛财。“一贯道”教徒的献心许愿,教主或坛主的考财,都是勒索和敲诈教徒钱财的手段。一些坛主、点传师、道首等头目因而大发横财。大道首刘天然在日本投降后去成都时,一次带走黄金1.5万多两,其富裕程度可见一斑。李洪志在“传功”初期,以“治病”吸引信徒。虽称免费治病,却在家中设立“功德箱”,暗示弟子告诉患者每人应捐100元以上的功德费。“传法”初期,李洪志通过举办培训班聚敛了大量钱财。

第八,都是反政府、害人的。明清以来的邪教均是有反现实、反政府、反社会性,这一点在“法轮功”表现十分突出。“法轮功”在“真善忍”的假面目下,从事的是反社会、反政府勾当。他们围攻有关新闻媒体,冲击天津教育学院,围攻中南海,听不得任何批评和意见,当他们的伪装一旦撕破,他们就赤膊上阵,毫不“忍”耐地攻击政府和我们的国家。现在潜伏下来的“法轮功”顽固分子不生产劳动,不读书学

习,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声援师傅、弘扬佛法的活动,公然违抗《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和民政部《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的决定》。“法轮功”使一部分信徒走火入魔,至2001年底,已有1600多名信徒死于笃信“法轮功”歪理邪说的不治疗、不吃药后的不治或神经错乱、走火入魔后的自杀。“法轮功”破坏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现在和将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还会给我们的社会安定造成不良影响。至于对200多万信徒精神上的“愚化”和肉体上的“磨难”,则是最直接的危害。

第九,“法轮功”和明清以来的邪教、反动会道门一样,对社会的影响和破坏是长期的、深远的。“一贯道”仅从路中一传道给刘世昌的1864年,到我国基本取缔的1954年,也有90年的历史,后来1960年,还有“一贯道”分子乘暂时困难之机活动,这样,“一贯道”最恶劣的影响有一百年历史。今天,我们的党和政府绝不会允许“法轮功”邪教长久地存在不去,但是,由于“法轮功”邪教的国际化,由于上世纪70年代以来波及全世界的“灵恩”运动和层出不穷的邪教的影响,“法轮功”必将成为一块我们祖国健康肌体上的牛皮癣。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总之,无论从邪教的共性上,还是从“法轮功”与明清以来会道门的相同相似处考虑,“法轮功”都是一个趋于成熟的邪教。

三、“法轮功”与伪科学

李洪志的基本观点是:“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人类即将毁灭,对此,现代科学已无能为力,任何政府也管不了。只有‘法轮功’才能拯救人类,李洪志则是惟一的‘救世主’,只有他一人能度人上天堂。”[3]据新闻出版署政策法规司组织的专家分析认为,“法轮功”有如不才种歪理邪说:第一,宣扬“末世论”,宣称人类即将面临“毁灭”;第二,否定现代科学,认为现在的科学是根本错误的;第三,宣扬哪个政府也解决不了社会问题;第四,宣扬“法轮功”是拯救人类社会的“惟一大法”;第五,胡编一套“宇宙观”,声称地球是宇宙的“垃圾站”;第六,妄谈生命起源,鼓吹人是神造出来的;第七,宣扬生老病死是“业力”回报;第八,自称是当今惟一的救世主;第九,李洪志为了神化自己,宣扬自己有“法身”,可以给修炼者装“法轮”、“开天目”;第十,强调修炼“法轮功”,与其他学说必须一刀两断。

李洪志的歪理邪说,一部分是借用宗教用语构筑的理论体系,如“法轮”,是“佛法”的别称,佛教徒以释迦教法,能熄灭烦恼,犹如转轮王的轮宝,能摧伏怨敌。“业力”,佛教徒称一切行为、言语、思想为业,分别叫做身业、口业、意业,合称三业。业

包括善恶两面,一般专指恶习,如杀生、偷盗等。因为恶业会障碍修行,故名业障。“业”后缀“力”组成一个名词,也许是李洪志的杜撰。从李洪志的《转法轮》中领悟,“业力”大概是指信徒们作恶的那种邪念的力量。“开天目”也是佛教用语。佛经中讲如来佛有“五眼”,包括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这五眼各有各的功用:佛“以慧眼转物”、“以法眼遍物”。严新气功曾用“五眼通”的概念,其中“开天目”按他们的解释就是大脑里的天目穴开了,“这样头部就可以像荧光屏一样,能够看得很远,能够穿越障碍,能够透视人体”。[4]这是气功师宣称的一种非眼视觉,是一种特异功能。于光远先生认为,气功师们使用“五眼通”是歪曲了佛经的原意,“他们的眼其实是一通都不通。他们对佛学一窍不通,只知道拣来一些带有神秘色彩的语言骗人而已”。[5]至于“末世论”是一切邪教愚弄信众的杀手锏,是邪教恐怖的法宝。李洪志歪理邪说的另一部分,就是借用国际国内反科学思潮和伪科学骗术中的一些论调,其主要内容如下:

1. 反对“进化论”,鼓吹“神创论”,宣扬“地外生命”等伪科学论调。

“神创论”是宗教最基本的观点,它的实质是反“进化论”的。李洪志说:“大还说,人是猴子转变的,这都是现代科学带来的东西,这不可笑吗?达尔文的进化论是漏洞百出的。”[6]在李洪志看来,“进化论”漏洞百出,只有“神创论”完美无缺,他说:“其实人怎么造的都有。更大的神只要一想就能把你造出来。任何物体都是活的:给你造出了外形之后,再造出内脏。”又说,人很笨,而神只需“用思想就能做,他一想就造出物体”。[7]宗教的神创论是一种稳固的思想,但李洪志的神创论却是一锅神秘主义的大杂烩。他除借用基督教等的神创思想外,又把近年来伪科学在宇宙起源和天外生命方面的论调捡拾起来了。他说:“人的真正生命的产生,是在宇宙空间中产生的。因为在宇宙有许许多多制造生命的各种物质,这些物质在相互运动不可以产生生命,也就是说,人的最早生命是来源于宇宙中的。”“不只是人,动物,还有植物都是有生命,在另外的空间里任何物质都会体现出生命来。”“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过程,是受外星人控制和推动产生、发展的。”“外星生命至今仍然是假说,我们现在仍然找不到证据。1996年,美国国家航空和宇航的科学家宣称,1984年在南极洲发现的一块6.3盎司重的石头,是从一块火星陨石上分裂出来的,其中含有少量化学物质—多环芳香碳氢化合物、磁铁矿和硫化铁。这似乎暗示在26亿年前,这个红色的星球上就存在着细菌。但是,在这块石头中发现的氨基酸,也在发现地周围的冰块中存在。另外,来自其他天体的一些石头,比如来自显然不会有

生命存在的月球上的石头,也同样显示出生命存在的“迹象”。到 1998 年,《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大多数研究人员都认为,火星生命之说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站不住脚。”^[8]火星生命是科学家探索外星生命的重点,许多外星生命的猜想都希望借此成立,它是外星生命之说看见的第一根救命稻草,现在,这一根稻草也已沉没。但这不妨碍丹尼肯等“伪科学家”的外星生命学说的流传。世界上的邪教,正是利用了人们对外星生命的关注、好奇和恐惧这一特点大肆宣扬伪科学。“天堂之门”、“上帝拯救地球飞碟会”,莫不如此。李洪志为了蛊惑人心,也使用了宣扬莫须有的“地外生命”和“飞碟”这一招。

2. 拿来“史前文明”邪说,宣扬“末世论”。

“末世论”也是邪教所共用的论调。“一贯道”宣扬的“三世末劫”,被李洪志巧妙地古为今用了。他说:有一次我仔细地查了一查,发现人类有 81 次完全处于毁灭状态,只有少数人活了下来,留下一点史前文明,进入了下一个时期,过着原始生活。李洪志毫无天文学和史学知识,他的“史前文明说”不过是拿来“丹尼肯学说”,以此制造邪教恐怖。一个时期以来,丹尼肯著作在我国流行,并且被董妙先和李卫东等人移植在自己的神秘主义著作中,使“史前文明”的奇谈怪论流行于世。邪教不失时机抬起了这种破烂,李洪志说:“金字塔与埃及人根本没有关系,是史前一次文明中造的,后来在一次大陆变更中沉到水里边去了,在第二次文明出现将要造就新大陆的时候,它又从水底升起来了。”^[9]这种怪论曾出现在丹尼肯著作中,又出现在美国作者理查德·艾尔曼《众神的宫殿》中。《众神的宫殿》属于我国系列出版的伪科学著作“世界伟大考古纪实报告”中的一种,虽然这种奇谈怪论在美国也没有什么市场,只是游戏之作,早已被美国学术界定论为伪科学著作了,不过上述讲话李洪志是站在美国国土上,李洪志弄伪科学之斧也不看看场合,都弄到“班门”去了。上面的讲话接着说的是“诺亚方舟”的真相,白人的文化就是在那次大洪水中淹掉的。这种论调来自世界最主要的伪科学品种“《圣经》考古”,它也属于“史前文明”论调的一种。这个品种的深入人心使我们的一些媒体也误入圈套。我在中国无神论学会 2000 年学术年会上提交的论文《对伪科学“异常扩散”的研究及其意义》中指出:猎奇是人的天性,比如 9 月 15 日《工人日报》消息说:“一支美国考古探险队 13 日发布消息表示,他们在黑海底发现了古代人类的建筑,由于这里曾于 7500 年前发生过严重的洪水泛滥,它可能是与圣经故事‘诺亚方舟’有关的遗迹。”^[10]这是一个很平常的考古消息,但由于发布者硬要把它与“诺亚方舟”联系起

来,因而与流行于国外的“《圣经》考古”这个伪科学种类有了关系,成为一个异常事实。李洪志对于科学的无知并不影响他对于骗术的精通。他利用了风行于世的伪科学学说,这种利用比起他另起炉灶地生造奇谈怪论来,要省事得多,也更有效。

3. 宣扬神秘主义,贩卖伪医学。

气功和特异功能用于“治病”使一些气功师和特异功能大师发财了,李洪志看到了这种征服灾病的歪理邪法的号召力。解放后首开气功治病先河的刘贵珍,就为缺医少药的人民找到了一种锻炼的方法,并且,在某些疾病的防治、治疗或辅助治疗上确有有限的效果。但是,自此以后,气功师对于传功与发财的关系看得很清楚了,一些靠传功发财的气功师被不耻于此的气功师和学术界称为“伪气功师”,李洪志也看到了这一点。李洪志 90 年代初开始就打着气功旗号治病骗钱。1991 年 5 月去泰国探望妹妹李平,回来后声称得到佛法,于 1993 年 4 月出版《中国“法轮功”》,但同年 8 月,他却在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登记。此时他虽然称其功夫为“佛法”,但他认为利用气功的名义骗钱还是很合潮流的。那些沈昌“抓瘤”,张宝胜特异功能,严新本领,李洪志是都有的。但李洪志也发现传功治病有个弊病,就是治病“效果”不好会使一些信徒失去信心,他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于是,后来他不讲治病了,讲练功是为了提高“层次”。李洪志的伪医学理论集中表现在“业力”说上。他说“生老病死都是有因缘的,都是业力回报,你欠了债就得还。”这是病因。又说:“病的实质是在另外的空间里的问题反映到这个空间来,如病菌,另外空间里存在,人怎么能根治?所以我们在修炼界不讲病,不谈病,都是业力。”^[11]这是对病的认识。“练功的人的功自动就在消灭病毒和业力。吃药是把业力压了回去了,就不能够清理身体,因此也就不能治病。”这就是李洪志教信徒生病不吃药的谬论。李洪志的伪医学是骗人的,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他生病就吃药,有公安机关在他住所搜出的病历和尚未吃完的药丸为证。练“法轮功”而死于非命的 1000 多信徒中,绝大部分是生病不吃药而不治的。值得注意的是,李洪志这一点荒谬的伪医学,也不是自己发明的,“山泉公”谷报国的治病良方就是“辟谷”,巫师沈昌的治病方剂是“信息茶”,柯云路提升特异功能界的种种奇谈怪论为《新疾病学》,说:我想病,我就生病;我不想病,谁能病我?李洪志的伪医学老师,大抵与上述三人相关。

4. “反科学主义”。

李洪志继承中国谶纬神学的传统,用一些粗俗的打油诗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在登载他的言论的印刷品《洪吟》上,有一首作于 1998 年 7 月 7 日的《世界才恶》,这

首诗咒骂人类“十恶不赦”，宣扬他“现在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哪个政府也解决不了”的观点。中有“迷信科学，变异人类”一句，把科学也看成了“十恶”之一。

“反科学主义”是一种国际潮流。其特点是利用和夸大科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片面地反对科学。人口问题、生态问题、战争问题都是“反科学主义”反对科学的口实。但是，任何反科学者的言论也没有李洪志的来得直捷。李洪志曾说：“宇宙中不好的人往下掉，掉到宇宙的中心——地球。地球就是宇宙的一个垃圾站。”在这里，我们如果认为这个同样也是“垃圾”的李洪志的科学知识已经“进化”到了“地心说”的阶段，那是高估了他的智商。因为地球是中心，宇宙中不好的人往地球上掉。怎么叫往“下”掉呢？且不论它。李洪志这里讲地球是“垃圾站”是一种比喻，应不涉及“反科学”常常指责的环保问题。李洪志的反科学是与“佛法”比较而来的。他说：“现在的科学不算科学……因为用这个科学这条路永远都探测不到这个宇宙的奥妙。”^[12]“这个科学，正因为它的肤浅，导致了人类社会道德的败坏……因为科学认识不到微观的物质存在的具体形式。”^[13]“人类现在的科学，实质上是站在一个错误的基点上发展起来的，对宇宙、对人类、对生命的认识都是错误的，所以在修炼界，我们修炼的人根本不承认现在的科学，认为它是一个错误。”^[14]李洪志为什么“反科学”？因为只有科学才会指出他的谬误，他先说不承认科学，科学的批评在他看来就不算了，于是他就没有了对手，于是他的歪理邪说就成为了真理了。他说：“和天目有直接关系的一种功能叫做遥视。有人讲：我坐在这里可以看到北京的景象，看到美国的景象，看到地球那边去。有人理解不了，从科学上理解不了，我给大家剖析出来：在这个场所的空间中，在人的前额部位有一面镜子，不练功的人是扣着的；练功的人它就翻转。……在翻来翻去的时候，它就无处照不到。”^[15]佛家的“五眼通”和道家的神仙术，被李洪志用来对抗科学了。李洪志反科学，是因为“人类的(科学)技术达不到更高的认识……但是我们的修炼可以做到，佛才是最高的科学家。”^[15]“在这个世间，无论是哲学也好，天文学也好，物理、化学、人类的历史等等，人们觉得很复杂，它其实很简单，都是佛法范围之内最低的人类的那点儿东西，都是一个理，就是这个宇宙的特性和物质存在这一层的形式所造成的，就这么一点。”^[16]这段话阐述的歪理和它在标点、语言上的错误一样明显，一本《转法轮》就是这样的文字堆砌的。我们非常看不起自己，那么多的专家、政治家都在分析一个神经质的骗子的胡言乱语，还那么逐条逐段、字斟句酌。我们被江湖骗子牵着鼻子走，还觉得自己了不起，在做学问。我们用心良苦，认为那么多人

听信了李洪志的歪理邪说是因为他们对这些理论理解不深；如果是文盲，那是因为他没有文化；如果是科盲，那是因为他缺乏科学知识；如果是科学家，那是因为缺少某一领域的科学知识或者缺少自然辩证法思想等等；如果是政治家，我们也会认为他们是出于好心，受了蒙蔽；可是当我们苦口婆心地讲明科学道理，逐字逐句地批驳完《转法轮》之后，那些信徒都说：“你们不懂，那是你们常人（或凡人）的看法”的时候；当我们把信徒们看做朋友和他们讲理而他们却说：“不同你说，你没有到我们这个层次”的时候，我们就到了该考虑邪教流行的更深层的社会历史原因以及科学说教以外的治理方法的时候了。“法轮功”之所以成势，绝不仅仅是信徒的“科学素质”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在本节展开了，但相信我们的读者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的。根治“法轮功”后遗症，防止“法轮功”回潮或新的邪教滋生的方案，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应参与设计才是。

回到原话题。李洪志“反科学”最精彩的一招是当我们的学术界还拿不准可不可以把“法轮功”称作邪教的时候，李洪志早已把科学宣判为“邪教”了。他说：“科学是个宗教，是个完善的宗教……这个宗教是从物质上引导你到精神上相信；而一般的宗教是从精神上引导你对物质的真正认识，它是走了一个相反的路，所以才不能被人识别。……你要反科学，虽然它不会杀死你，但会群起而攻之，谁都说像迷信，谁都说你是可笑，它会把你从社会中贬得一钱不值。……从这一点上看，这个科学又是一个邪教。”〔17〕

四、中国当代邪教

本节标题是“法轮功”与当代邪教，由于“法轮功”话题扯得太多，故对当代邪教就只能从现状从数量上作些介绍。

当代邪教之多，活动之猖獗是我们局外人难以想像的。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间秘密宗教辞典》中收入的秘密宗教组织有四五百种之多，这些秘密宗教组织虽然大多已成为历史，但新兴的秘密宗教组织和以“特异功能”“气功”为名的邪教组织的数字仍然是巨大的。

我的这些叙述使用了李昭同志在《邪教·会道门·黑社会》中的材料。李昭同志曾指导过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当前我国一些地方的‘邪教’问题及对策研究”。

尽管抗日战争时期，一些邪教和民间秘密结社成员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和艰苦工作下，曾经为革命作过贡献，大刀会、红枪会、哥老会及部分青洪帮分子曾

参加过抗日战争,但早在辛亥革命之后,民间秘密结社已由过去的统治阶级的对立面变成了与反动统治阶级同流合污,会道门和黑社会的头面人物已蜕变成为反动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上述情况虽然不算“中国当代邪教”问题,但我们必须从此说起。有一点要说明的,就是以下所叙述中把邪教和黑社会混在一起说了。这是因为当一个组织危害社会的时候,执法部门并不会去计较它是邪教还是黑社会组织,分析这些是学术界的工作,而数字却是混在一起的。

全国解放后,针对一些反动道首妄想“坐天下”、“当皇上”,企图颠覆我人民政权的情况,1950年至1954年,掀起了一场取缔反动会道门的运动。河北省公安机关1951年就破获反动会道门自称皇帝阴谋武装暴乱的“化党天国”、“三路大元帅”、“检阅佛兵”等九起案件,平息了定兴“大佛教”、建屏“九宫道”、通县“一贯道”、武安“兵道”的四起武装暴动案。天津摧毁了“中皇天”,上海抓获了组织“顺政国”自封“顺政国皇帝”的张顺宝。1955年至1957年,各地陆续发生反动会道门复辟案,从1958年至1959年,公安机关对其进行了又一轮打击。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进入了暂时困难时期,台湾国民党当局乘机叫嚣“反攻大陆”,反动会道门再一次进行猖獗的破坏活动,这就导致了1963年公安机关对反动会道门的又一次打击。“文革”时期,反动会道门活动时时有发生,但相对较少,不成气候。

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来,邪教、会道门组织在一些农村地区活动频繁。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门徒会”、“呼喊派”、“被立王”等从境外传入或自生的打着基督教旗号的邪教组织在农村发展了大量的信徒。据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仅“门徒会”的活动就涉及陕西、四川、湖北、河南、安徽、湖南、甘肃、云南等8省150多个县,影响群众数十万人。而会道门的复辟的年度情况则是:1980年57起、1981年102起、1982年134起、1983年1~8月96起,这是仅就发现的情况而言,呈逐年上升趋势。有些地区会道门活动一直比较突出,如河北邯郸,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市共破获各种会道门复辟活动2400余起,其中阴谋武装暴乱案118起,打击处理反动道首复辟案近50起,涉案人员2500余人。此时的会道门活动还有一些新特点:一是拉拢党员入道。永安、广平、魏县破获的20余起会道门复辟案中,涉及党员100余人,二是诱骗青少年入道。魏县破获的10余起会道门案中,入道不久的道徒3000余人中,有2400余名是青少年。一些邪教组织把奖励机制运用到位青少年入伙上。有个邪教宣称拉一个学生入教奖2000元。笔者的学生程某某加入“法轮功”后,于2000年上半年进京活动时被公安机关

依法带回关在拘留所,老师们去做正面工作时,同室的“法轮功”信徒却给程说,你是大学生,是我们这些人中学历最高的,你一定要坚持。可见“法轮功”是何等重视“知识”和“人才”。据有关方面的统计,至1999年7月22日取缔“法轮功”时,我国200万左右“法轮功”信徒中,有党员12万左右,党员中的7万是党员干部。^[16]如果这些数据确凿无误,那么,李洪志发展党员、干部练功的策略是“卓有成效”的。三是以经商作掩护,有的会道门还打着信仰某领导人的旗号作掩护。如永年县一个道者,将道名改为“毛主席道”,墙上挂着毛主席像,桌上供着“老母”像。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欺行霸市的行帮,他们有的从事某一行当(如盗窃、吸毒贩毒、拐卖妇女儿童)的“职业”犯罪活动,有按旧中国或境外的帮会组织的形式组织的团伙。这些犯罪组织名目繁多,如“新义安会”、“三合会”、“白手党”、“头巾党”、“黑手帮”、“十四K”、“水房”、“二十K”、“和胜和”、“安和乐”、“和胜义”、“竹联帮”、“金鹰帮”、“斧头帮”、“兄弟会”、“十姐妹帮”等等,还有许多水上船民帮会,如“芜湖帮”、“池州帮”、“新州帮”、“水上游击队”、“飞虎队”、“注滋帮”、“瑞昌帮”、“星子帮”、“乔氏帮”,这些帮会,大的数百人,小的只几人,他们均带有黑社会性质,进行违法活动。况且,这些帮会出现了联合的趋势:1989年5月,300多名全国各地帮会的代表汇集青岛峻山以“求道学武”为名,讨论联合事宜,甚至各地帮会还酝酿成立“全国联帮协会”,选举执行机构及领导人,令人惊诧。

自1979年以来,特异功能、气功的风行,成为东方神秘主义泛滥的一个新高潮。在这持续20年的神秘主义热潮中,许多特异功能、气功已经变成了新的邪教,或者,有的邪教在“特异功能”和“气功”上找到了存在和发展的掩护。“法轮功”首先就是以气功的名义出现的,而台湾邪教分子宋七力“天人合一学会”的广告却登到了由郭周礼主编的《国际气功报》上。在这个广告上竟然还有庆祝“中国国际气功研究会宋七力天人合一学会”正式成立的文字,^[19]于是,这个在台湾岛上都被称为“邪教”的宋七力“天人合一学会”,就轻易登陆了。

邪教具有秘密的特征,“法轮功”算是一个例外,这是因为作为一种“佛法”它是公开的,因而我们也公开打击它。打击秘密帮会和邪教的工作属于“政治保卫”的内容,我们媒体没有对它大力宣传的可能,因而许多情况大众是不得其详的。对于现行于世的各种合法的或非合法的民间社团和组织,学术界对它们是否邪教的定性存在着来自政治界的压力,因为政治界不喜欢这种打草惊蛇的喧嚣。这就是学术界对包括张宏堡“中功”和吴泽恒“华藏功”在内的明显过分的气功组织不敢说三道

四的原因。一切的定性有待于权威的政府部门出面表态,而我们的群众不会等政府定性后才决定自己是否加入。

不管怎样,我们与“邪教”的相处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法轮功”的顽固性已经是这个观点的现实证明。假如说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彻底消灭了“一贯道”的话,那么,仅从 1864 年路中一从刘世昌那里得道后进入兴盛期算起,也已有 136 年的历史,而路中一还只是第十七世祖。我们希望“法轮功”迅速地消失,但也许这只是一厢情愿。政府的打击已经使它元气大伤,但“国际化”的现状又使它仍有苟延残喘的能力。况且,邪教也是一个国际话题,一个国际上头痛的问题。奥姆真理教因 1995 年 3 月 20 日在东京地铁施放沙林毒气致使 5500 人伤亡而被日本政府取缔,但是目前奥姆真理教仍然拥有与政府较劲的势力。美国邪教教主罗恩·哈伯特于 1954 年成立的科学教派虽然从 1986 年以来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受到了查封,德国也于 1991 年 4 月将科学教派送上法庭,美国更早于 70 年代末就对其进行查处打击,但科学教派的活动仍然在世界各地持续着。科学教派教主哈伯德写于 1950 年的《戴尼提》1983 年 10 月由我国某出版社出版,一共印行了 30 万册。海南省某出版社 1999 年得到哈伯德图书馆的授权,出版了教主罗恩·哈伯德的科幻小说《地球使命》共十卷,并称其歪理邪说为“20 世纪科幻小说巅峰之作”。目前科学教派正使用互联网向全世界传教,我们的出版社已帮了他们的大忙。近年来,美国等国取缔了危害最大的“人民圣殿教”、“太阳圣殿教”、“大卫教派”、“上帝之子”、“天堂之门”、“上帝拯救地球 飞碟会”等邪教,但每一次取缔都使政府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比如 1993 年取缔大卫教派时,当局出动了坦克、装甲车、直升机和 450 名军警对其在得克萨斯州的梅尔尼园包围了 51 天,花费两百多万美元才将其摧毁。而在美国,记录在案的邪教组织却有 700 多个,它已成为美国割不掉的社会毒瘤。今天,这个毒瘤又加上了一个从中国内地迁去寻求庇护的“法轮功”。

第二节 伪科学类型

本节试图从类型和特点的角度来分析此前尚未详述的当代伪科学的重要人事,以期全书臻于完善。在“绪论”中,我们对伪科学定义、伪科学与科学、非科学和反科学的联系与区别、伪科学成因及伪科学处置已有阐述,在接不来的章节中,我们着重从史的角度陈述了中国伪科学源流,它们和本节所述的伪科学类型和特点,

构成中国伪科学研究的基本范畴。

中国伪科学中的江湖派、学院派和权贵派构成了相应的伪科学类型,从这些类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得知当代中国伪科学江湖化、学术化、政治化、产业化、大众化和国际化特点。

江湖化和学院化是世界伪科学共有的特点,是伪科学的基本类型,它反映出伪科学作为骗术和病态科学的本质属性,而权贵型伪科学则是社会思潮与政治结缘的产物,它在更深刻意义上影响伪科学的发展速度和泛滥的空间。江湖型、学院型和权贵型是中国伪科学基本类型。

一、江湖型伪科学

江湖型伪科学是传统的江湖文化披上科学的外衣或现代伪科学走向江湖的结果。“江湖化”的特点表现为伪科学的民间性、复杂性和欺骗性。

江湖文化之所以流程长远,就在于它能适应时代的特点不断地改变自己的表现形式改进自己的内容,江湖文化的顽强生命力是对“适者生存”的最好诠释。江湖八大门,金皮彩挂平团调柳,分别指看相算命、挑方卖药、杂技魔术、保镖卖艺、说书曲艺、乞丐、吹鼓手和戏剧等江湖类别。其中的看相算命、杂技魔术和江湖郎中是江湖型伪科学充斥的门类。在江湖文化中,黑道就是专指以假充真的江湖骗术,它与以技艺为主的白道相对应。江湖黑道如果假借了科学的外衣,就成为江湖型伪科学。当代特异功能和某些气功表演,就是旧社会的黑道在新形势下的表现。在金门中,科学算命、电脑算命、周公解梦和假以天文学知识的占星术,是典型的伪科学。在皮门黑道中,祝由科的巫医在当代伪科学热潮中十分活跃,张香玉的巫术表演、严新的偏方治疗是最典型的例子,而“信息茶”的发明者沈昌,则出身于巫师世家。

张香玉,女,初中文化程度,话剧演员。张香玉自称于1985年得功,1987年离开西宁到北京传授“自然中心功”,1990年春在北京北太平庄授功获得暴利后,因涉嫌诈骗和宣传封建迷信被公安部门逮捕。1992年12月,北京海淀区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出狱后,张香玉去了美国。张香玉的巫术理论与实践,被收录在某报刊记者李培才撰写的《大自然的魂魄——记自然中心功传授者张香玉》(长虹出版社,1989年)中,此书为“中国十大伪科学代表作”之一。张香玉敛财之多,可以从“1990年3月18日至31日期间,就授功27场次,共从11693大手中,赚取人民币409255元”^[20]中略见一斑,而其敛财手法,则完全是通过表演巫术从病患者手中骗

取。

《大自然的魂魄》对张香玉巫术作了充分的描述,张香玉在与死者灵魂的对话、人蛇对话中,完成她对病患者的欺骗。而这一切,又始终伴随着其拯救人类、造福于民的科学谎言。书中说:“中年妇女半睁半闭着双眼,便说起一种既不像外语又不像少数民族语言的语言。据说,她在北京外语学院开设气功门诊和授功时,外语学院的一些专家曾研究过她这种语言,认为这种语言既不是外语,也不是少数民族语,但肯定是一种能交流思想感情和信息的语言。别人问她这究竟是什么语?她毫不忌讳地回答:‘宇宙语’”。“此刻,中年妇女在她身后又说起那宇宙语,继而又唱起那宇宙歌……此时此刻,泪,在房内很多人的眼眶内滚动、溢出。”[21]

上述令人感动的宇宙语,据司马南考察,原来是“信口胡来满嘴跑舌头”的“巫师跳大神”时的那种语言,其表演者具有癡病状态。说话者故意把“原音节拉长缩短,音值升高降低,音量忽大忽小,眼全睁、全闭、半睁半闭,或先做出几个像是不由自主的动作来表示已进入‘与宇宙信息相通’的状态,然后再口若悬河”地说些“小蚂蚁爬呀爬,碰土一个大豆芽”[22]之类把戏,是由传统的巫婆表演与现代气功说法相结合的产物。

这种“宇宙”呓语的奇异效力,则更表现在巫风吹拂的灵魂领域。书中说:“一位香港老板太太向张香玉提出一个请求:‘我爸爸死了 20 多年了,不知现在情况怎样?’”“‘你爸爸在哪儿死的,叫什么名字?’张香玉问,那老板太太都一一相报。”然后,张香玉与死者对话说“你女儿让我问问你现在的情况怎样?”对方则回答说“很不好,心情非常痛苦。”[23]

身为记者的作者李培才为了宣传科学未解之谜向我们展示了上述场景,却不知这种场景自巫术盛行以来就不再新奇,人鬼对话是迷信的重要题材,自古而然,任何标榜科学的做法,都会显出不懂历史的幼稚可笑。李培才连篇累牍描述的,无非是这些巫的神迹。书中说:“1988 年初的一天,张香玉和张震寰等人来到一位领导同志家中。一进门,张香玉顿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突然,她听到一种声音:‘我居住过的地方,不准别人住,我居住过的地方,不准别人住!’这声音连续重复了多遍。”“张香玉一听,纳闷了,心中暗暗想,这是谁呀?”然后有一种浓重的家乡口音回答说“我是 大老呀!”在场的张震寰则证实说“这是 大老生前住过的房子”。[24]这样,人鬼对话就已被旁证。

在张香玉的事迹中,尚有与屈死的蛇的灵魂对话等奇闻怪事,充分体现了这位

“大自然的女儿”是非凡的,她其实就是“玉帝的女儿”。张香玉的奇功,虽则加入了“信息传导”、“五眼通”、气功等当代流行的伪科学概念,她也用这些技术为人治疗且使多人因失去正常治疗的机会而亡,但总体说,她的法术还主要是传统的巫术,是皮门黑道的现实表现。她借助了气功及其他貌似科学的东西的名义,是因为在她活动的时代,气功和假冒的科学甚嚣尘上。她没有理由不搭伪科学的便车。

江湖派中的另一族,则是由伪科学走向江湖的。他们或者是病态科学家,或者是科学工作者中的投机派。他们由病态科学研究和学术投机,逐步走入江湖,进而以江湖形式延续他们的事业。

所谓江湖的形式,就是以符合江湖特点的作法。江湖有江湖的规矩,这些规矩具有民间性、表演性、欺骗性和艺术内涵,是江湖白道用以谋生和江湖黑道得以骗人的手段。当病态科学的研究越来越经不起科学的检验的时候,它们的研究者或承认自己的错误改邪归正,或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以固执己见来维护自己可悲的自尊,以饿死不乞讨、打死不求饶的传统文化中的恶劣形态促成自己在伪科学道路上渐行渐远。和严新一起在清华大学做气功实验的陆祖荫就最终同严新一起到美国去了,他把自己的科学工作者身份一改为严新一样的“江湖”人士,真正去“浪迹天涯”了。而同样为严新的出山尽心尽力,为严新逃到美国大唱赞歌的作家郭同旭,却可以在“法轮功”被取缔后中国伪科学界风云突变之时,摇身一变为“反伪科学斗士”,反对起他曾经鼓吹的东西来。伪科学走向江湖在江湖型伪科学中较为少见,但就伪科学而言,如果它以强势的科学的面目始,当它遇到反对和批判前程暗淡处境维艰时,它往往以遁入江湖终。这样的情况成为江湖型伪科学的源头活水,使江湖也透出学术的高雅的假象。而江湖八大门之流,一旦返璞归真,也仍然是地道的江湖,比学院型伪科学蜕变所致江湖派来得清爽而正统。也就是说,仅就从谋生活命的追求上讲,江湖中人较易令人同情,远非即使从学院型伪科学蜕变为江湖型伪科学,仍然不改是一副假面目者可憎。柯云路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有兴趣于伪科学、支持和歌颂伪科学到成立“中国生命科学研究院”从事伪科学研究、组织伪科学家“健康万里行”进行伪科学表演的历程,应该说是一个文化人走向伪科学江湖的过程。虽然柯云路自我标榜是进行学术研究,但他网罗天下江湖好汉,对他们进行研究,组织他们进行表演,显然是以江湖中的老大自居,比张香玉、张宝胜者流更江湖。他撰写《发现黄帝内经》把胡万林推向中国当代伪科学的前台,干尽了谋财害命的勾当,成为他的江湖生涯的辉煌顶点。他的《大气功师》、《气功修炼的奥秘

与误区》、《生命科学最新报告》、《中国气功大趋势》、《新疾病学》和《发现黄帝内经》等著作,成为了中国伪科学江湖派的经典言说,把中国伪科学挥洒得浓墨重彩。

江湖型科学具有民间性、复杂性和欺骗性特点。

民间性亦即非官方性,具有自发的、大众的未经官方首肯和验证等特点。气功的民间性自不待言,特异功能之风起于青萍之末时,亦自民间开始,以政府的否定告终。“法轮功”、“中功”、“沈昌特功”、“元极功”均曾以民间社团注册,也都曾建立过民间的自上而不垂直领导的机构,这反映出它们组织形式的民间性。气功和特异功能组织所宣传的内容,均具有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特征。气功和特异功能的群众性,更体现了其参加成员的民间性特点。

张宏堡,男,1953年生于黑龙江,北京科技大学本科肄业,1987年11月“出山”从事气功组织和表演,同年中华养生益智功风靡京城。张宏堡“中功”自高校传播开始,逐步向科技界、国家政权机构渗透,并利用媒体的作用,最终向全国铺开。他创办“麒麟文化”,把气功组织宗教化、气功经营产业化,把“中功”事业做到了极致。张宏堡在四川青城山修建的“中功”基地,有着“紫光阁”一类的名称和昔日皇宫一样的建筑布局。“中功”在其内部刊物《麒麟文化》上称其在全国有5000多家分支机构(同时又是“中功”的实业机构),18万骨干队伍,3000万学员,攫取的钱财数以亿计。

张宏堡“中功”把中国当代气功、中国伪科学做到最辉煌处,使之终于比“法轮功”更隐秘、更具群众性、更具反动性的邪教组织。但就其起点及流程中的基本特点而言,它仍然是一个具有民间性的江湖型伪科学组织。1986年,张宏堡看到社会上兴起气功热,他就开始揣摩建立自己的功法,而他表演的最初功法却是“脱骨功”这样的民间戏法,充分表现了“中功”源头的民间性。“中功”标榜自己功法的文化底蕴,把它命名为“麒麟文化”,这一名称又窃取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祥云瑞兽热衷的精神,符合民间文化特点。“中功”管理弟子时实行的拜师、尊师、清门等制度,具有完全的江湖黑道特点。

江湖型伪科学具有的复杂性特点,表现在它杂糅各种宗教修炼术和民间技术、为我所用这样的功法特点和集传统文化糟粕于一体的理论特点。在江湖型伪科学中,各种民间修炼法、巫术均有表现,周易预测、占星、圆梦和命理测算等迷信理论和实践充斥其中。而现代科学名词的进入又使之具有了伪科学的特点。据报道,航空工程师张延生发现,他所研究的“手相”和“遥知遥感”竟然与中国古代的《周

易》息息相通,而他的充斥着周易、二进制、场、爱因斯坦等名词的理论指导下的占卜却准确得惊人,[25]沈昌是伪科学界的江湖派名人,他把传统巫术与当代灵学理论糅合在一起,做成的卖信息产品的沈昌实业卓有成效,是以复杂——更准确地说,是杂乱——的理论指导下进行伪科学实践而成功的范例。

沈昌,男,1956年生于江苏省启东县聚阳乡,其祖父是“阴阳先生”,祖母和母亲都是巫婆,他曾就读于江苏农学院南通专科读书班,业余爱好气功。1991年他以“中功南通辅导站”名义办班,因手续不全被取缔。随后,他组织了自己的气功组织“沈昌求是者协会”,并大肆贩卖“气功信息”产品。他把10元1公斤的三级茉莉花茶改成“沈昌牌信息茶”后以十倍的价格卖给信徒和患者,或把录有自己报告的磁带以25元一盒的价格出卖,谋取了暴利。据说,“沈昌靠他所谓信息产品,牟取的暴利至少有5千万之巨!仅在苏州一家银行的存款便超过2000万元!”[26]后经查明,1991年至1993年,沈昌共偷逃税款78万余元。1996年,苏州物价、技术监督、税务等部门根据国家有关法规,相继对沈昌的经济违法行为进行了查处,对沈昌做出了没收非法所得,罚款等共约2000万元的处理。1996年6月27日,苏州市检察院以偷税罪对沈昌立案,随后查明了案情并冻结了其银行存款2000多万元,但沈昌一直未到庭。2000年6月,苏州公安机关在南通将沈昌抓获。2001年9月18日,江苏省苏州市虎丘法院以偷税罪和非法经营罪判处沈昌有期徒刑12年。

虽然沈昌最终是以经济罪被判刑的,但沈昌却是一个以把古老的巫术和现代伪科学理论糅合起来并进行产业化推销的典范。他的理论与实践被尹一之写进《沈昌人体科技——21世纪的曙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一书中,此书成为中国当代伪科学代表作之一。

沈昌理论是荒谬的,但这种荒谬较之张香玉“世间无宝在宝中,宝中无宝看谁听,识宝有人下相识,相识才有玉宝灵”[26]一类巫师呓语相比,似乎更多一些伪科学性。1992年,沈昌为自己在北京开的“信息茶馆”拟的一则广告说:“沈昌信息茶是阴阳两世界正负信息交换的场所。人体有很多功能,宇宙有很多信息没有被认识和利用。从医学角度而言,人体有生命功能,同时有治病功能;宇宙有生病信息,同时有治病信息。任何事物都是正与邪、矛与盾、克与生、阴与阳相互对称、相互制约、对立统一。如果人类回归自然,利用自然存在的‘人体治病功能——宇宙治病信息’,就有希望从中医、西医的人为康复转变为生病不吃药、不打针、不动刀、不营养、不休息的自然康复了。朋友,你觉得沈昌先生的自然康复的思想和理论有道理

吗？……人为什么生病呢？沈昌先生认为是因为自己需要生病，需要破坏自己才生病的。因此，只有当一个身患疾病的人相信自己——我不需要生病，我不需要破坏自己的时候，人体外界师父的信息才起作用，所谓病——这个寄生于人体的寄生物就离开人体，回到那个世界去了，病就好了。”[27]

沈昌把“阴阳两界”说与现代灵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反映出他理论中的古今结合、中西合璧的特点。他在带功报告中吹嘘“今天听我的报告，不会饿肚子，作为老师的我应该为人师表，我从昨天起就不吃东西了”，并以“释迦牟尼 49 天不吃终成正果”为例宣扬“辟谷”的巫术，又称“如果有了饥饿感，你可以假设看见一只烧鸡，然后用意识吃不去，就吃不去，就吃饱了”。[28]沈昌擅长特异功能，可以使学员的手指在听课过程中变长变短，并现场对着一名妇女胸前空抓几把，用“刮痧疗法”把乳房肿块刮掉。沈昌贩卖的杂乱理论和荒唐说教，在特异功能这门伪科学界具有普遍意义，炮制这些理论和说教，不说明他们具有中西结合、古为今用的学术功力，而是表明他们为了他们的利益而不惜破绽百出地胡拼乱凑所谓的理论，其实质就是以显而易见的荒唐理论做幌子，欺骗受众。而我们的受众，竟看不出个中的荒唐，把浅陋的骗子当作深奥的神明，这种走进骗局的自觉反映出邪教一类信仰组织具有巨大的魔力。当这种魔力发挥作用时，信徒便会失去正常的思维，与平时的判断理解相悖。沈昌也懂得这一点，所以他并不忌讳称自己为巫覡。他说：巫师没有什么不好。这里有一个如何认识和评价“巫”的问题。他认为，“巫”字由“工”“人”“大”构成，“工”字上面一横为天，下面一横为地，当中一竖是顶天立地的意思，两边各一人，是顶天立地的人，也就是超人。而这样的话，还不是沈昌论点的最惊人者。1994 年，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的陈文轩编写《沈昌人体科技的理论与实践》第 8 页写道：“沈昌老师在 1991 年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生产力。”1995 年 12 月 3 日，沈昌在常州市体育馆作报告时大肆发表他的正邪意识理论，他说：“想当年，毛主席的正意识调控了全国人民的正意识，形成了正意识合力，蒋介石的邪意识调控了全国人民的邪意识，形成了邪意识合力。毛主席正意识合力与蒋介石邪意识合力就构成当时社会的一对社会意识矛盾。由于毛主席意识调控功能大于蒋介石的调控功能，蒋介石被毛主席一调，从大陆滚到台湾，永世没有翻身。”[29]就是这种报告，竟能打动信众。1996 年 1 月 26 日，《工人日报》刊登了《常州日报》记者秋云飞采写的《听沈昌吹牛——“心想事成”太荒唐》，沈昌据此向北京东城区法院起诉《工人日报》侵害名誉权。10 月 10 日晨，法院前胡同

里人山人海,拥挤着情绪激动的沈昌信仰者,一位女弟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沈昌老师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他在我们心中是人民的救星,国家的救星!谁敢欺负他,我们就和他没完,我们和沈昌老师同生死共患难。”^[30]这场官司后来至 1998 年才告结束,成为伪科学状告舆论界的一个有影响的案例,它最终以《工人日报》的胜诉而终。但沈昌现象乃至气功特异功能现象留给我们的思考,是深刻的。沈昌服刑期间,向来访的记者抱怨狱中的伙食。记者问:“你不是可以‘辟谷’不吃饭,可以运用‘想像’的理论解决饥饿和营养问题吗?”沈昌无奈地说:“你就别取笑我了。”

江湖型伪科学的第三个特点是欺骗性。一切江湖骗术都是以欺骗受众而获得利益为目的的。但民间文化属性的江湖白道和犯罪性质的江湖黑道有着质的差异。江湖白道以表演这种劳动赢得收入,他们有自己的行规、秘密语言和方法,他们表演的节目亦以拳脚功夫和魔术杂耍为主,这些具有文化底蕴的江湖门类很能获得观众的认同。但江湖伪科学则以冒称科学的江湖门道欺骗受众。巧取豪夺而置信众的生死于不顾,这就具有了犯罪的性质。我们熟知的张宏堡、李洪志、严新、张宝胜等大师,莫不是靠伪科学起家的经济暴发户。张志祥的元极实业尚未成型时,他首先就知道如何捞钱,有信徒接受张志祥授功、灌顶,他按八卦原理八八六才四,每次收 64 元人民币的灌顶费。大师的产业就是这样一砖一石垒起来的。

二、学院型伪科学

学院型伪科学是由那些靠学术起家的伪科学家构筑起来的。那些懂得学术,曾经做过学问的学者、专家对伪科学的贡献在于,它们使伪科学的外衣变得更加巧饰更具欺骗性。学院型伪科学大抵由学术骗子和病态科学家组成,前者是学术投机人,后者是心智欠缺者。学院型伪科学具有比江湖型和权贵型更大的欺骗性。因为,江湖型不管怎样巧饰,仍脱不了江湖气,令人生疑。权贵型虽然也参加貌似科学的实践,但更多的是鼓动和倡导,以自己的权威来主导伪科学方向,而学院型伪科学,则是为伪科学运动提供一手材料的基地,是伪科学事实的证据所在。

纵观 20 年伪科学历程,我们发现学院型伪科学功不可没。1978 年,当气功之温刚刚在百废待兴的祖国大地缓缓回升之时,是顾涵森在《自然杂志》上撰文证实了外气的存在及其物理学机理。当耳朵识字的特异功能在祖国大地奇闻突起时,是陈守良等科学工作者在第一时间看出了它的科学价值,进而进行了长久的人体特异功能机理探索和少年儿童特异功能诱发实验。当神秘主义泛滥之时,像李卫东这样的高学历者竟然利用学兼中西的优势,把国外的丹尼肯伪科学思想与中国

传统的神秘主义巧妙嫁接进而发表“人是太空人的实验品”及“人有两套生命系统”一类高论。至于邵伟华,这位自命的阴阳家邵雍之后,孜孜以求的是把祖国的神秘主义传统发扬光大一而再再而三地翻版《周易》与预测学”一类陈谷子烂芝麻。以上这些人,都应是学院型伪科学的杰出代表。

学院型伪科学家之众,也许是我们的想像力所不及的。如果说,1980年2月,《自然杂志》在上海主持第一届人体特异功能讨论会之时,一些高校和科研单位派人参加会议还是在不明真相情况下对新事物的热情的话,那么,1981年5月,当重庆召开“全国第二届人体科学讨论会”时,106个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参加并提交147篇相关论文的洋洋大观,就注定是学院型伪科学闪亮登场的机遇了。其时安徽一所大学的五位教师提交的一份论证有形人和无形人的论文,大抵代表了当时的研究方向及所达到的学术高度。这篇后来发表在《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资料》1982年第5期中的《意念论》认为:“人体意念功能,就是人体在意念作用‘激化’时产生的功能,就是无形人的功能,一个人体,除了有形人外,还存在无形人;一个世界,除了有形世界外,还存在无形世界。”这个“无形人”,就是特异功能人,就是神灵。他“能够在几米、几十米的有形距离内打‘意念电话’”,进一步提高的话就可以在“几百公里、几千公里甚至在两个星球之间打‘意念电话’了”。无形人还有在近距离“拨动手表、装卸按钮、折弯钥匙、启锁开门”,从“在几公里的有形距离内,完成送物取货的功能”进而开发为在“两个星球之间送物取货”的功能。类似的理论成为了严新千里遥感、张宝胜意念拨表之类特异功能的学术基础。

张宝胜,男,生于1960年,南京人。初中文化,辽宁本溪某铅矿勤杂工。当“耳朵识字”兴起之时,张宝胜即宣称自己有“非眼视觉”功能,并能做用意念偷走妇女的黄瓜一类“送物取货”表演,1982年5月,被气功特异功能组织调到北京。507所认为张宝胜的特异功能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经国防科工委批准,1983年6月2日,张宝胜被正式调入507所,从此,张宝胜的足迹遍布政府要员、部队首长、知名科学家、演员、歌星、华侨和海外侨胞所在的单位或家庭寓所,通过表演、报告、办班、治病,他赢得了“神人”、“中国圣人”、“国宝级气功师”、“活佛菩萨”等美誉,成为享受专车、专宅、专职服务员的中央领导级待遇的国宝。1988年5月21日,何祚庥、林自新、庆承瑞和铁路文工团提日升等五位魔术师、杂技演员,观看了张宝胜的表演。这个表演是由507所所长陈信主持的,是向国家安全部、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中宣部等几个部门的几位领导作出的汇报表演。结果,何祚庥等人发现被张宝胜抖

出药片的药瓶已被偷偷打开过;何祚庥把字条放进信封并在封口签字后,张宝胜认不出;张宝胜自愿表演使嚼碎的名片复原的节目时,调包的诡计却被提日升发现……事后,何祚庥等三人写出《“超人”张宝胜走麦城》一文,于7年后在《北京青年报》登发。1990年7月28日,美籍华人袁志道听说张宝胜有把烟灰缸变进别人肚子里的功能,就请张到钓鱼台国宾馆,自愿受试,结果张宝胜大出洋相。1995年8月11日,张宝胜在北京电视台餐厅表演抖药片时,由于事先“抖”出来藏在身上的鱼肝油药丸受热粘结,结果粘在张宝胜手中“抖”也抖不,张宝胜出尽洋相,不得已躲开门外云集的记者,从不常使用的一扇小门往一工地方向悄悄溜走……此后,1995年5月26日,张宝胜走麦城的迟到的报告与读者见面。1995年,中国反伪势头正猛,张宝胜在北京电视台餐厅所出洋相,成为最后的表演。

把张宝胜作为学院派伪科学大师是错误的,他是江湖中人。但张宝胜却是507这种“学院”研究特异功能的标本。是学院型伪科学用来研究伪科学的材料。并且,由张宝胜之盛,可以看出中国学院派伪科学之盛。

1979年以来,《自然杂志》发表大量有关伪科学的论文,这些文章中,有大部分是貌似科学的学术论文,例如:《非视觉器官图像识别与人体电磁感受机制探讨》(罗冬苏)、《人体能感知地磁》(潘锦堂)、《特殊感应机能的普遍性问题》(陈守良)、《非视觉器官识别色谱的实验》(王胜利)、《人体特殊感应机能与方向判别》(张祖启)、《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与人体科学》(钱学森)、《磁与人体科学》(林书煌)、《人体特殊感应机能对多层重叠样品的辨认过程》(罗林儿等)、《色盲儿童运用人体感应机能辨色的初步观察》(贺慕严等)、《人体特异功能学效应的初步测试》(云南大学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组)、《人体特殊感应机能辨认纸团纸卷时的图像显示过程》(邵绍源等)、《人体特异功能移物的若干实验》(林书煌等)、《皮肤对图像信息的识辨机理探讨》、《气功“外气”对革兰氏阴性杆菌作用情况观察》(冯理达等)、《气功“外气”对兔血压的影响及其机制探讨》(王玉芹等)、《气功“信息水”对小鼠免疫功能影响的初步探讨》(李彩照等)、《人体信息能可促进植物生长》(吴陆平等)。这些论文,大致反映了学院型伪科学的研究方向。

在中国当代伪科学历程中,学院派伪科学家的研究初衷,还可以从每一具体伪科学的研究的角度去考察。几乎每一门伪科学的出台,均打出学术的招牌。例如,严新气功就有《气功2000公里超距离对物质分子作用研究》(李升平等)等一组5篇论文,王洪成“水变油”闹剧中,有的科研单位对其进行了不甚科学的肯定性鉴

定,有人竟以中国化学会理事和分支机构负责人的名义在“水已转化为碳氢化合物的油”的考察与见证书上签字。哈工大的校长、书记等竟然给中央上书保证“水变油”实验的科学性。在江湖骗子面前,科学的质疑和伪科学的庇护形成对峙,这样的事实贯穿于中国当代伪科学的整个历程。置身于伪科学之中不能自拔,甚至推波助澜的科学家,如若不是江湖派似的故意欺骗,那么,他们的病态是无疑的。这样的观点看似稳固,实际的情况却往往复杂得多。一个人庇护伪科学,为伪科学说话、作证,甚至于固执己见,死不醒悟,这其中可能还有深刻的心理原因。试想,在承认自己的病态、愚昧、与固执己见、把显而易见的认识分歧搅浑为深奥的学术分歧之间,哪一种情况对他们更有利?他们显然宁愿选择后者。所以像陈守良一类学院派伪科学家,直到1996年还在《中国人体科学》上发表《耳朵认字是真的吗?》一类文章,重温历史,为自己的“科研”作辩护。即使到了1997年,陈在一个小型报告会上坦承对自己过去所从事过的人体科学研究感到“压力很大”,但也仅此而已。他不承认那种研究属于“伪科学”。因此,以学术分歧作借口从事伪科学研究,还是由于心智的偏执误入病态科学的樊笼,非对学院型伪科学工作者作精神病理学方面的考察不能确定。

任恢忠,男,1941年8月生。福建福清人,林业工程师,业余研究哲学,集33年研究成果之大成,于1995年出版《物质·意识·场——非生命世界、生命世界、人类世界存在的哲学沉思》一书(学林出版社),该书获得哲学界、科学界、新闻出版界知名人士数十人的肯定与支持,被视作福清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项目。对于这样一部专著,我们却难得认为他“很有创见”,“言之有据”。^[31]仅摘该书第32~33页部分内容,即可看出该著论点之荒谬。该书认为:“今天,人类对于宇宙场的认识,已经深入到‘量子场’这一层次。量子场,就今天人类的认识水平来说,它在力场、基因场的背后,具有更为深远的物理意义。”“可是,我们今天面对‘思维传感’和‘心灵感应’所表现出来的大量事实,又使我们意识到,对于物质与意识的中介——场的认识,如果仅停留在量子场的水平上,是肤浅的,远远不够的。”“比如,相距千里的母子,母亲生病了,儿子会突然感到,或儿子在外出了什么事,母亲也会突然意识到。这在孪生兄弟、孪生姐妹之间更为敏感、确切。相传曾子(曾参)外出打柴,家里来了客人,曾母便在自己手指上咬了一口,曾子顿时心惊肉跳,丢下柴火赶回家中……亲人之间的遥感或心灵感应,这是古今中外不胜枚举的客观事实,已不是你信不信的问题。”任恢忠在这里都把“曾母啮指”的故事用作“心灵感应”的证据,

只差没把恩格斯在《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中所列举的诸“神媒”请来作证了。任恢忠在专著中以气功治病和心灵感应的真实性作依据,进一步构筑了一个作为物质和意识桥梁的“场”的理论体系。他称,这个场理论是当代科学最基本的理论之一。他说:“场是物质的一种特殊的形态,又是意识的一种物理载体。它是物质吗?不!它是意识的;它是意识吗?不,它是物质的。它是物质与意识的界限,它是物质与意识的中介。在这里,时空消失了,生灭既寂,有无既寂;物质也就是意识,意识也就是物质,物质与意识同一了,物质与意识圆融了。”^[32]原来,说白了,任恢忠是希望借“场”这个中介来达到柯云路在《大气功师》中直白的“意识即物质”这样的学术高度,为伪科学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不过,学术界大可宽容任恢忠这样的探索者,因为他毕竟是一位业余的哲学爱好者。而在1981年,教育部组织编写的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教材中,竟也会有这样的肯定人体特异功能的文字。该书130页称:“意识能动作用的潜力远未穷尽,人体‘特异功能’的发现,就是一个越来越引起科学界和哲学界瞩目的新征兆。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意识能动作用的潜力将会愈来愈充分地表现出来。”^[33]这样的言论,在哲学教学中产生了不良影响。无独有偶,1990年5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谢龙主编的《现代哲学观念》,第十二章为“主体思维和人体特异功能”。这些专著对“特异功能”在学术上的肯定,对当代学院型伪科学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对于学院型伪科学的评价,刘华杰认为:“从事这类活动的多数是科学家,他们往往有很好的动机,人品也不错。起初他们只是觉得如此层出不穷的特异现象中一定该有真的吧,后来一步步渐入佳境,成为伪科学骗子的俘虏甚至帮凶。他们中一部分以江湖型伪科学活动者为考察对象,进而与他们合作,最后同流合污。当然也有一些及时撤出,告别伪科学。”这类伪科学工作者“一般不靠此活动谋生、发财。客观上这类活动的直接社会危害很小或者没有。”^[34]因而是无可指责的。但刘华杰同时指出对“别有用心的大巧妙利用是另一回事”,这就仍然说明这类伪科学成分的双重性,因而,学院型伪科学的特点也就具有投机性和病态科学性两个方面。这两个特性善恶有别,相同的是,它们均以“学术”为基本表现形式。这样的特点,在此不展开分析。

三、权贵型伪科学

伪科学中的权贵派,是指支持、领导或从事伪科学研究和伪科学运动的学术权

威和达官显贵,由他们形成的权贵型伪科学,是三类伪科学中最具鼓动性最有能量的一类,是中国当代伪科学泛滥的罪魁祸首。权贵型伪科学在国际上也存在,如有关权贵支持的苏联李森科主义,但它最具有中国特色。因为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权贵的力量是无穷的,“官大学问大”,权威显贵的支持和鼓励足以掀起任何荒唐的革命性运动。在美国,虽然也有里根总统相信占星术,信仰 UFO,但他的行为更具有个人性,因此学术界认为,里根的言行是个人行为,不代表一个国家领袖。但在中国完全不同。想当初胡耀邦总书记认为特异功能不是我们的研究方向,但由于另有权贵的支持,有“三下政策”的出台,中国特异功能还是向纵深发展了。试想如果胡耀邦总书记不是有分才地表述自己对特异功能的意见,而是表示他相信,那么,中国特异功能运动将会闹到什么地步!中国人信仰权贵的精神是两千年封建意识积淀的结果,这就促成了权贵这一阶层在任何重要运动中作为领导力量的存在。确切说,如果不是权贵型伪科学的存在,光凭一些江湖骗子和可悲的心智偏执的学术工作者的躁动,中国伪科学是成不了气候的。权贵型伪科学代表了一种特殊的思想腐败和劣性,是当代中国伪科学泛滥的直接原因。

权贵型伪科学具有政治性和鼓动性特点。

就政治性而言,由于权贵的存在,中国伪科学由学术文化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于光远在回顾反伪科学之初的情形时,就指出了一些伪科学热衷者故意把学术问题扭向政治问题以增加反伪难度的情况。他说 1979 年至 1982 年间最初他没对特异功能问题表态,直到实在忍下不住了才出马。于是,“他们”议论说“现在于光远出来反对我们,我们该怎么办?他们之中的‘高大’说,这下要紧,我们要想方设法让中央负责同志相信,这样,于光远再反对我们,那就不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这招果真发生了作用。他们到一些‘中央负责同志’那里去表演,让他们亲眼看见了‘人体特异功能’,欺骗他们,使他们相信这种‘人体特异功能’能治病。于是也真有些领导相信了人体特异功能,并且直接间接地支持这种反科学宣传。”这就使我们理解到了当时中宣部出台“三下政策”的理由。直到今天,于光远仍然对“三下政策”耿耿于怀。他认为“这个‘三下政策’,始终没有什么中央文件,但新闻出版界却在实践中坚决贯彻,结果变成了口头上说要‘三下’,实际上对伪科学的宣传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近乎放任和鼓励,甚至等于给了保护,以致出现了李洪志、胡万林等”。权贵的进入使伪科学问题政治化,进而影响了社会机制对它的遏制和政治力量对它的打击,甚至于使中国当代伪科学问题成为学术

上的禁区,使本人对笔下这样的话题左右为难。其实,权贵的力量再大,也不能使最高领导者相信这些伪科学。1979年4月24日,胡耀邦同志给国家科委、中科院信访简报《揭露“耳朵认字”的骗术》上就批示“耳朵认字”是“荒谬绝伦的笑话”。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仍然坚持不相信特异功能、反对这种宣传的立场。当“水变油”骗局给许多企业造成巨大损失,而各地仍有宣传,哈尔滨工业大学领导甚至还向中央领导同志写信为“水变油”《考察与见证报告》的真实性作证时,朱基同志就明确指示“不要再折腾”了。1995年,中科院院士何祚庥等写了一个报告,认为“实际上只准别人宣传,不准我们批判”的“三下政策”不合理,要求科学家也可以批判伪科学。这个报告送到江总书记那里,江总书记就指出,“科学家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就不相信‘水能变成油’”。^[37]但是,伪科学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在它蔓延和泛滥的过程中,总是能积极地利用那些有利于它的因素而规避一切反对它的力量。这些对伪科学有利的力量主要在于,一方面把伪科学政治化,另一方面,又极力标榜那些伪科学的观点是学术问题。因为对于学术问题,自由的讨论和研究是最基本的原则,这就为伪科学的成势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

权贵的加入,使反击伪科学空前受阻的另一个原因是文化方面的,由于权威在一些学术领域具有重大的贡献,由于显贵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甚至权贵们一边在支持和从事伪科学,一边还从事着对党和人民有益的研究工作和领导工作,所以,“为尊者讳”的传统思想使我们的反击受阻。

“为尊者讳”是一种文化传统,一种人际关系的策略。它的前提是“为尊者讳”者本身明白所“讳”的内容,只是心知肚明,下说罢了。大家心照不宣,该歌颂的还是歌颂它,该否定的也在心里否定了。这样的传统有中华文化“敬老尊贤”的内涵,是中华文化的含蓄美的体现。但是,在伪科学问题上出现的问题是,“为尊者讳”造成了两个坏影响,一是“为尊者讳”让人下知“尊者”还有什么过失被“讳”了,即把所讳也认为是正确的了,也即讳的结果使人们看下出尊者的过失。第二,“为尊者讳”使“尊者”固执己见,把错误问题推向深远。即令“尊者”已知错误,在别人下讲他之时他便认为别人下敢讲他,进而满足了他下主动认错或者进而对敢于质疑他的人也不认错,这就会使错误的作法和观点离真理越来越远。“为尊者讳”只是一种避免尊者当众难堪的处世策略,它并非是为尊者隐瞒、和尊者共同作弊一类意思,“为尊者讳”也不是一种认识方法,它恰恰是反“实事求是”原则的。迟至2002年上半年,在《文艺报》《摄影文学导刊》上,钱学敏同志为某著名科学家作的“摄影文学”报

道中,仍然把他的《人体科学》著作和“系统论”著作相提并论,这不光是“为尊者讳”而显然是把尊者的错误言论与学术成果搅在一起混淆视听了,其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人们认识上的混乱。长期以来,反对伪科学的呼声没有间断,反对特异功能 20 年,至“法轮功”这个“特异功能”运动的直接产物危害社会遭到取缔之时,是非应已明了。而问题却不如此简单。今天,我们在反对特异功能问题上遇到的阻力仍然十分强大,有相当一部分人仍然在信仰着特异功能。这些人对于我们否定特异功能十分生气,似乎反对者不看表演,不眼见为实,而是强词夺理,拿政治口号压制人;似乎他们才是其正受冤的严谨的学问家,而反对伪科学者才是政治投机者(有人蔑称何祚庥为政治院士)和学术上肤浅的不讲道理的人。这样的现实应该为我们长期以来“为尊者讳”的策略打上-一个问号。

我在写作《中国伪科学史》中遇到的最大阻力也是如何为尊者讳的问题。我们知道,某著名科学家曾以“一个人体科学的幽灵在我们当中徘徊”为题在清华大学一个气功学术会上作报告;他也曾把“人体科学”提升到哲学的层次去研究,认为通过“大天观”可以使“人体科学”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认为“自然辩证法要与科学技术同步发展”;他研究以气功、中医理论、特异功能和人与人的遥远感受为主要内容的人体科学,以便完善他的系统科学体系,为建设社会主义做贡献;他在为我国国防科学做出巨大贡献之后,又在以“特异功能”“气功”为主要内容的伪科学运动中,以权威和领导者身份,折腾了 10 多年。而我在本课题的研究中,却只能给读者一个大致的轮廓。我们还没有以史学的方式详录这部具有若干生动细节的真实历史。我曾就我的困惑求教于龚育之教授。他提示我:“从根本上说,这是同一种社会思潮、一种社会现象的斗争,不要把它看做只是同哪一些人的斗争。”龚教授为我指出了伪科学研究的社会学角度,但也许直到该课题结题时,我和读者均会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这就使本课题具有了后续研究的价值。

权贵型伪科学决不止由一两们著名科学家或国家体委的某领导同志组成的,它有一支庞大的队伍。一位伪科学大师的背后,支持他的上司有一个或几个,拥戴他的地方领导和社会名流,却有一大群,这是中国政治腐败的特定内涵之一。刘华杰在《反科学与伪科学》一文中,对“权贵沙龙型”伪科学进行了十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在伪科学运动中,达官显贵的示范作用是十分突出的,“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出于某种少见的好奇心,对伪科学趋之若鹜,不时利用自己的身份发表高论,甚至在人事、财政上给予骗子们实质性的支持。他们常把大师请到家里小聚,或者组织

达官显贵观看大师表演,请大师讲法,并即席发表与任何科学无关的关于科学发展的伟大预测。也有少数人相互勾结,组织万人带功报告,以共同致富为目的”。“这些权贵人物一般并不直接从事科学或者伪科学研究,他们只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网罗一批江湖术士、特异功能大师,使别人做具体事情。但他们的确是伪科学泛滥的罪魁祸首,没有他们的鼓噪和有效的庇护,中国伪科学永远登不了大雅之堂,也永远不会出现区区‘水变油’事件使国家财产损失4亿元以上的笑柄”。“权贵沙龙型中的一些达官贵人不学无术,但天性喜欢装腔作势,附庸风雅”。他们“不但胸无点墨,而且没有明确的政治信仰。他们大多言必称马列主义,但他们同时又支持、信奉各种低级迷信、灵魂不死、大预言、超自然见解,甚至耶稣基督和释迦牟尼的神迹等”。“共产主义学说和伪科学是完全不相容的,但在他们身上两者好像圆融无碍。这真是奇迹。但这只能说明一点,他们并无坚定的信仰,他们很有些像政治骗子,他们从一开始就在欺骗舆论,欺骗善良的中国人民。在这一点上,他们比江湖型伪科学活动者可恶得多、阴险得多”。[38]刘华杰的论述,生动地描述了伪科学权贵派虚伪和阴险的真面目,是伪科学权贵派的标准像。

四、中国当代伪科学特点

中国当代伪科学,具有江湖化、学术化、政治化、产业化、大众化和国际化特点。

1. 江湖化。江湖骗术是中国当代伪科学的主要源头,江湖型伪科学是中国伪科学主要类型。江湖化的特点是指不论何种类型的伪科学,他们大都最终显现出江湖性——民间性、表演性、欺骗性、群众性——特点。许多伪科学热衷者,不论其为学术界人士,还是达官显贵,他们却最终走向了江湖。

2. 学术化。当代伪科学中以气功外气研究为代表,显现出学术化特征,而病态科学是学术型伪科学的主要队伍。伪科学研究中的学术派明显不同于江湖派的胡诌,他们以貌似科学的方法进行自以为是的研究,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方法的错误和心智的偏执。他们的研究被认为是学术界可以容忍的。一些科学概念如“相对论”、“量子力学”、“场”、“信息”、“全息”之类进入伪科学研究“成果”之中,使它们更具欺骗性。学术性也为伪科学江湖化提供伪装。“元极功”大师张志祥曾把元极功称为“元极学”,并称“元极学既不是气功,也不是体育方面的,是一门自然科学”。[39]

3. 政治化。权贵型伪科学的出现使伪科学披上了政治的色彩,伪科学政治化,是伪科学成势的根本原因。打击伪科学最终也使用了政权的力量,从而从另一

个方面证明了伪科学的政治化特点。政治打击的实例是取缔“法轮功”。“法轮功”邪教,在理论上是伪科学的。在伪科学泛滥和反击伪科学两个方面,民间的力量都只是一种补充。

4. 产业化。我们从胡万林终南山医院治病与购送锦旗和购买《发现黄帝内经》相配套,即可以看出伪科学的商业化特征。而产业化则指一类具有共同特质的规模化了的经济行为。它包括产、供、销甚至研究等系列内涵。中国当代伪科学多具有这样的特征,从“法轮功”的文化产业式经营,到“中功”的企业、沈昌特功的商业,莫不如此。近年来,“元极功”已把“功”法组织改称实业实体,而逃到国外的“法轮功”,则仍把办报纸、电台、办企业作为其邪教事业的一部分。产业化的实质是经济利益是伪科学的最高利益。

5. 大众化。大众化即群众性特点。传统的伪科学如命理、占星、鬼神迷信、宗教信仰,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气功在百姓中的市场大大超出我们的意料,它已经具有了休闲性和游戏的特点,是普通百姓寻找慰藉减轻心理压力的一种方式。各个文化层次都有的对于不同种类伪科学的热衷,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精神寄托对于人类的重要。而科学人文精神的迷失使人们在无所适从中找到了伪科学这个虚假的精神港湾。

6. 国际化。中国伪科学是二战以后国际新宗教运动在中国的反映。国外新宗教对中国巨大的信仰市场垂青已久。灵学、UFO信仰、人类神秘起源及史前文明信仰、世纪末大灾难的观点已成功地进入我国并发生了作用。科学教派的著作《戴尼提》和奥姆真理教的著作等都曾成功地登陆中国图书市场。丹尼肯学说、反达尔文主义等伪科学思潮在中国已结出了许多伪科学成果。而中国伪科学大师纷纷出国已促成了以东方神秘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伪科学向世界各地的浸润。国际化特征在越来越发达的信息化时代,将会进一步明显。

第三节 反击伪科学

1995年之后的中国伪科学,显示出人体科学研究进入艰难的反思期、江湖派伪科学进入疯狂期和反击伪科学顺利向前推进的整体特征。这种形势的发展使中国伪科学在世纪之交形成一个自然段。新世纪反伪科学虽然仍需要艰难地解决当代伪科学 20 年来的许多问题,但当权威型伪科学渐渐沉寂、江湖派大师或被法律制

裁或遁入江湖,而反击伪科学获得了最广泛的共识时,反伪热潮必将出现新的特点。也许,哲学反思和预防打击伪科学的社会操作将是新时期反伪主要特征,这是新的课题。

我们截取 1995 年至今的段落进行分析,以期“中国伪科学”有一个完整的历史脉络。而对伪科学现状中的三个特点的分析,将对伪科学现状的后续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提示。

一、人体科学研究进入艰难的反思期

1982 年以后的人体科学研究,一则以那些“眼见为实”的大师表演为实验材料,进行理论的升华,一则以中国古籍中的特异记录作素材作关于人体科学的“古研究”,双管齐下。“古研究”实际上是以假设的人体科学理论去解释古籍中的特异记录,而不能从古记录归纳出科学论点。这样,一旦以大师表演材料为主要论据的现实研究出现尴尬时,“古研究”就变得没有多少意义。

人体科学古研究的内容丰富多彩,它主要表现在:第一,对气功这种神秘现象进行了源头论证,已经把它追溯到了《黄帝内经》时代以至更久远一些;第二,对特异功能进行了古典哲学解读,把“天人合一”思想改造升华为科学的“天人观”。第三,以现代人对特异功能的理解去解释古籍中的神秘记录,复以古籍中的神秘记录作为当今特异功能存在的历史证据,搞循环论证。

中国十大伪科学代表作作者李卫东是擅长“古研究”的人物之一。李卫东,男,1961 年生,1989 年毕业于陕西师大唐史所并获硕士学位,1995 年毕业于首都师大历史系并获博士学位。李卫东所具有的历史学知识使他在“古研究”上具有优势,因而,当他在西方伪考古学家埃利希·冯·丹尼肯的《众神之车——历史上的未解之谜》一类著作中获得研究灵感之后,他响应人体科学界的号召进行的“古研究”就得心应手。李卫东的伪考古学观点,集中表现在他的《人是太空人的试验品》和《人有两套生命系统》中。他的研究方法就是牵强附会下作出种种想当然的结论。这从以下大段的议论中可以看出:“《淮南子·论言训》曰:‘稽古太初,人生于无,形于有,有形而制于物。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谓之真人。’”“印第安人的古文书《波波卡·乌夫》这样写道:最早的人类,‘精通世界上的一切事情,他们环视一下周围,马上就能看透天体和地球内部各个角落。他们连隐藏在黑暗中的东西都能看到。’”“《庄子·逍遥游》云:古有藐姑射神人。‘下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古之真人……入水下濡,入火下热。”李卫东在列举了上述三个古

记录后分析道：“这几则记载中所说的人，肯定就是我们现在这样的人，而不是神。这些记载的作者们，肯定是努力想向后人描绘人的某些功能，而不是神的魔力。可惜的是，我们看不懂；可悲的是，我们曾嘲笑过类似的想法和记载。”李卫东的学问就凭几个蛮不讲理的“肯定”完成了，也不想想究竟是谁“可笑”复“可悲”。

1995年，当张宝胜走麦城事件克服重重阻力曝光出来之后，最经典的人体科学研究素材消失了。当现实的研究已越来越站不住脚，“古研究”的意义就大打折扣了。这时，人体科学研究就剩不一种叫“唯象科学”的东西了。早在1986年，某著名科学家就提出要建立唯象气功学。并且解释说：“什么叫唯象科学？就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41]气功这种只有大师表演却找不到这些表演之所以成立的理由的东西却又穿上了科学的外衣，“唯象”真是一个好借口。

1995年，美国研究所(A·I·E)应中央情报局的要求，对所谓“透视”的特异功能进行评估，于11月发表了《对遥视研究及应用的报告》，得出了“利用异能人从事谍报工作既不可靠又无价值，而且实验研究并未验证特异功能的存在”这样的结论。因此，中央情报局决定取消称为“星门”的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项目。这是1995年这个时候特异功能国际背景中的一件大事。这样的背景如若没有对当时国内的特异功能研究产生大的影响，至少中外特异功能研究形势在时间上有一种巧合。

在这样的形势下，人体科学热衷者表现出了悲观情绪。

1996年1月20日，伍绍祖同志在人体科学工作大会发言中说到特异功能17年没有取得什么结果时说：“在我有生之年大概研究不出什么结果了。”^[42]次年2月26日，人体科学工作组办公室主任李杰在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秘书长工作会议上更进一步承认：关于特异功能、气功外气的存在性检验，目前还缺乏铁证，不能被科学界公认。

1996年，针对当时社会气功活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中宣部、国家体委、卫生部、民政部、公安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不发了《关于加强社会气功管理的通知》，《通知》强调今后对未经批准的社会气功大型活动的制止和处罚，对社会气功活动中非法行医、宣传封建迷信和利用气功进行诈骗等各种违法犯罪活动，要依法严厉打击。

此后，中国特异功能20年的研究，以气功外气研究始，又复归于气功外气研究。而关于人体科学或特异功能的研究，从此走向了衰落。至于气功外气研究这样的终点，较大的活动是1998年2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的一个气功“外气”

存在性检验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强调了七部委《通知》精神,强调了研究的学术性。但自此以后,学术研究也未见有即使是他们自称的成果问世。

1999年7月在《科学与无神论》试刊号上,张洪林同志发表《气功不是练气的》一文,指出气功的心理暗示机理。2001年9月,官杉在《科学与无神论》上发文认为气功是练“真气”的,以此与张洪林商榷。2002年1月,张洪林复著文答官杉先生,重申自己的观点。这样的事情,已属20年气功特异功能热潮之后的死水微澜。但气功的问题,学术上的关注还远远不够,它甚至还没有沾到科学的边。

人体科学研究一开始被看做是具有“共产主义”的性质,是“科学革命”和“文艺复兴”,20年风风雨雨过去了,它又回到了它原来的起点。也许,这种退缩并不意味着认输和放弃,但至少是一种深刻的反思。

二、伪科学最后的疯狂

当权威和学院型伪科学归于反思的沉寂,江湖型伪科学则是一步步走向疯狂。

1995年,伪科学江湖中人的疯狂已有所表现。1月,张宏堡要求弟子在家中悬挂印有他头像的挂历,摆放7英寸的彩色“宗师真像”,进一步将“中功”宗教化。2月2日,早晨,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医政处处长安宝华在宿舍楼前被两名凶犯用木棒打倒,脸上被划3刀。同日晚9时,在成都四川省科委干部伍义江家,三个男人用利器将伍妻砍了8刀。安宝华和伍义江都是公开反对过张宏堡的干部,此案疑与张洪堡有关。2月22日,《国际气功报》以《一个囚徒创造的神话》为题报道胡万林,从此一步步将骗子胡万林推出。7月21日,柯云路在海淀区五塔寺24号他的住所召开“中国生命科学研究院”记者招待会,他决心凭借这个伪科学院把自己的事业做大。而张志祥的《中国元极功法》也在这一年出版。自此以后,1996年,沈昌凭卖“信息茶”获得的强大财力和众多信徒的支持公开同反伪的舆论界叫板;1987年,胡万林大闹终南山;1998年,“法轮功”频频攻击新闻媒林;1999年4月25日,1万余名“法轮功”信徒围攻中南海,实现了江湖型伪科学最后的疯狂。

今天,我们面临的现实是,数量巨大的邪教化了的伪科学顽固分子的存在。这些顽固分子不独指“法轮功”分子。跑到国外的“法轮功”分子和其他一些气功、特异功能功法分子的勾结,伪科学势力与其他反华势力的勾结,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反对我们的外力,而国内20年伪科学热潮的冷却,却非一朝一夕之功。1999年,于光远提出的“反对伪科学八条”中,就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三尺冰冻亦非一日能解”^[43]的观点,这说明了反击伪科学的艰巨性。用于光远的话说:“同伪科学至

少要用很大力量斗一百年。”伪科学最后的疯狂只不过是它走向灭亡的转折点,而我们这里指的还不是所有的伪科学,还不能预料今后又会出现什么新的伪科学品种在人们措手不及就乘势作乱。伪科学作为科学的对立面,与科学共存亡。

三、反击伪科学热潮

学术界已公认 1995 年是当代反伪科学运动的转折点。这一年在全国科技大会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号召“打击各种假冒科学之名,危害人民利益的违法活动,反对各种伪科学活动,使科技工作沿着法制的轨道有序地进行。”^[44]5月,宋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重申了反对伪科学的基本立场,强调要“反对伪科学”,“对于违反科学规律、弄虚作假的借科学之名招摇撞骗的要坚决禁止。”^[45]张宝胜走麦城的消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不公之于众的。6月,《中国青年》第6期发表反伪科学专题:《科学与伪科学——世纪末的较量》,《北京日报·京华周末》发表何祚庥等人呼吁:《该揭露伪科学气功和“特异功能”了》。7月,司马南《神功内幕》出版,8月5日至8日,在广东汕头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华人物理学大会”上,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等人表示支持中国科学界、新闻界反对伪科学和伪气功。次年,张洪林著《正本清源,还气功本来面目》和何祚庥主编《伪科学曝光》出版。此期间,传媒表现出了对反伪的极大热情,魔术师和精神病专家也出面为伪科学作证伪性公证。当 1999 年 7 月 22 日“法轮功”被取缔时,中国反伪科学界已进入乘胜进击和清点成果的时候。

我们应该大书特书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中冲锋陷阵的斗士,它们包括被授予“反伪科学突出贡献奖”的于光远、何祚庥、龚育之、郭正谊、司马南、申振钰、孟东明、张洪林、张彤玲、刘华杰、潘国彦、李胜先、李波、张玲、敬永祥和李力研等前辈、专家、学者和斗士。但是,当我们回首当代反伪科学风雨历程,将会发现在社会运动中,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是微不足道的,只有科学昌明和时代进步的大势,才具有不可阻挡的伟力。我曾经聆听过上述反伪科学界的大多数专家和斗士的见解,他们均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我相信这不仅是奋斗者的虚怀若谷的表现,更在于,他们通过自己的言行,诠释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叫科学。

注 释

[1] 本书关于“法轮功”和李洪志的引文,除注明外,均引自《转法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

- [2] 李洪志著,非法出版物:《法轮佛法修炼动作图解》。
- [3] 钟科文:《“法轮功”何以成势》,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 [4] 李伦:《严新气功现象》,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7页。
- [5] 何祚庥主编:《伪科学曝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
- [6] 李洪志:《法轮佛法——在美国讲法》,转引自《现代谎言——李洪志歪理邪说评析》,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5~76页。
- [7] 同[6],第81页。
- [8] 《科技界这20年,大错特错有20个》,载《世界科技译报》,2000年11月8日第7版。
- [9] 同[6],第26页。
- [10] 《文萃》2000年9月20日,第5版。
- [11] 同[6],第95页。
- [12] 同[6],第35页。
- [13] 同[6],第40页。
- [14] 同[6],第41页。
- [15] 李洪志:《法轮佛法——在悉尼讲法》,转引自《现代谎言——李洪志歪理邪说评析》,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 [16] 同[15],第39页。
- [17] 李洪志:《法轮佛法——在欧洲法会上讲话》,转引自同[15],第42页。
- [18] 据2000年11月1日中国无神论学会会员代表大会郭正谊同志发言。
- [19] 何祚庥:《何祚庥与“法轮功”》,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
- [20] 申振珏、曾昭亮、徐升国:《正与邪》,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页。
- [21] 李培才:《大自然的魂魄——记自然中心功传授者张香玉》,长虹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 [22] 司马南:《神功内幕》,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第258~264页。
- [23] 同[21],第305页。
- [24] 同[21],第311页。
- [25] 杨萃:《当代巫师与魔女》,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186~187页。
- [26] 何祚庥主编:《伪科学再曝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页。
- [27] 李力研:《司马南还活着》,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0、22页。
- [28] 秋云飞:《听沈昌吹牛——“心想事成”,太荒唐》,载《工人日报》1996年1月26日。
- [29] 同[26],第198~199页。
- [30] 同[27],第42页。
- [31] 任恢忠:《物质·意识·场》,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扉页《黄楠森给任恢忠的信》。
- [32] 同[31],第36页。
- [33] 于先远:《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250页。

- [34] 刘华杰:《反科学与伪科学》,载《科学时报》1999年2月10日。
- [35] 于光远:《让事实说话》,载何祚庥主编《伪科学再曝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341页。
- [36] 于光远:《追踪到公审——胡万林事件采访内幕·序》,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序1页。
- [37] 同[19],第65页。
- [38] 同[35]。
- [39] 杨付军、沈乃煜:《曝光伪科学》,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 [40] 李卫东:《人有两套生命系统》,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 [41] 《自然杂志》,1986年,第5期。
- [42] 《中国人体科学》6卷4期,第155页。
- [43] 于光远:《同伪科学至少还要斗一百年》,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页。
- [4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北京日报》1995年5月22日。
- [45] 1995年5月30日宋健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科技进步与对策》,1995年第4期,第17页。

后 记

“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1999—2000 年立项重点科研课题《中国伪科学研究》(99124C)”

《中国伪科学史》初稿成于 2001 年初,此后虽有几次校改,但并未加入多少新内容。从时间上讲,写到世纪之交为止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原名“中国伪科学”,太刺眼;又拟名“中国伪科学研究”,太学术味,担心吓跑许多关心这个话题的读者。权衡再三,用了现在这个名字。

“中国伪科学”是一个难题。20 年伪科学、特异功能和邪教刚刚经过,至今余音袅袅,其学术面目仍在云遮雾罩之中。作者虽借众多大家著作、内部材料,辅之以本人有限的亲历和采访而完成了论据性资料的整合,使本书观点有所附丽;动笔之初,亦曾就若干问题求教于前辈和专家。但拙著论据的不足和论点的不完善仍在所难免,原因终究在于作者学识的肤浅。作者曾一度专注于 20 年特异功能热潮中的人和事,有一种看笑话炒秘闻的热衷。是龚育之先生授我以社会学视野的开阔思路,才使拙作不至于钻牛角尖、入死胡同。研究方法上,拙著在例证的描述和随笔或议论之外,点缀以哲学的、社会学的和心理的分析,然后归入“史”的纵线条中,以此实践作者对伪科学作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企图。

1999 年,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把“中国伪科学研究”作为重点课题立项,此后也一直关注着研究的进展。书稿就是在这种鼓舞和鞭策中按时完成的。但在自 2001 年初始的两年时间里,书稿虽旅游了八家出版社,最终却回到了作者手中。也许,本书并没有作者自嘲的那么精彩,但难产的原因竟不在此。中国是神秘主义的故乡,所以,如果我说有些事情说不清道不明,读者是可以理解的——尤其在看完本书之后。书稿旅行期间,身份不同的作者和编辑,领受的无奈有所相同。

中国科协、中国无神论学会、中国反邪教协会的领导及同仁,于光远、龚育之、何祚庥、郭正谊、杜继文、申振珏、王渝生、李中、张小林、司马南等专家对此课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支持,在此深表谢意。

承蒙贵州教育出版社不弃,使本书得以付梓。所以,如果读者从本书所说的话题中获得了别样的知识和快感,你们定会像作者一样,把最诚挚的谢忱献给为本书的出版而费力操心的人们。

于光远先生拨冗为《中国伪科学史》写序,在此敬表谢忱。

徐建华

www.aixin99.com, dyth@163.com

2003年8月

316 新时空
Wenji

2007年11月11日 星期六



ISSN 1000-0000